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达利自传

 **eBOOK**
网络资源 免费下载

达利自传

献给前行者——加拉·格拉狄瓦

我是一位天才吗？

六岁时，我想当厨师。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从此，我的雄心壮志一直不停地增长，就像我对各种伟大事物的狂热迷恋一样。

司汤达在日记中，提到一位意大利公主，她在某个酷热的夏夜，品尝着冰淇淋，说了一句话：“真可惜，这并非一桩罪过呀！”可我六岁时，在厨房里吃东西却是桩罪过。我父母禁止我干的少数几件事之一，就是不许我进入家中的这一部分。我记得，过去了很长时间，我一直咽着口水，等待着溜进这个充满无穷乐趣的地方。在女仆们开心的喊叫声中，我终于进入了厨房，偷一块没煮好的肉或一只烤蘑菇，冒着被噎住的危险，匆匆吞下它们，我体会到一种难以形容的不安和幸福，我的负罪感使这种感觉更加强了。

除去不让我进入厨房，我几乎干什么事都成。我在床上撒尿，一直撒到八岁，这纯粹是觉得很好玩。在家里，我是小霸王。我感到什么都不够好。父母把我当成宝贝。主显节那天，我收到一大堆礼物，其中有件华美的王袍，还有一顶装饰着玉石的金冠和一件真正白鼬皮里子的披风。我长久地穿戴着这套确认我王权的服饰。听话的女仆们时常把我赶出厨房，我穿着王袍，独自一人呆立在昏暗的过道里，一只手拿着权杖，另一只手拿着鞭子，我怕最终会用这条鞭子抽打取笑我的仆人们。这些场面几乎总是发生在中午前后，发生在夏天的这个令人不安的时刻，在这时会产生一些让人透不过气来的幻影。躲藏在敞开的门后，我听见这些手红红的像牲畜似的妇女在奔忙，我看见她们结实的屁股，她们像马鬃一样散开来的头发。汗水流淌的女仆的刺鼻气味，葡萄粒的气味，烧开油的气味，拔下的兔腋窝毛的气味，腰子的气味，蛋黄酱的气味，这些浓重的气味同一股马的强烈气味混合在一起，从中午的炎热中，从全部准备工作的嘈杂声中向我扑来，预示了香喷喷的一餐。一缕阳光，透过滚滚烟气和飞舞的苍蝇，照射在打出的蛋白上，使它门耀着光芒，就像从长久在尘埃中奔跑得筋疲力尽的马匹下唇上收集的白沫一样。正如我说过，我是个受宠的孩子……

我出生前三年，我的哥哥得脑膜炎死了，那时他七岁。只有我的降生，才使我绝望的父母获得了安慰。我与哥哥如两滴水珠那样相像，同样天才的外貌，同样令人不安的早熟神情。不过，他流露出“无法克制的”智慧的忧郁的目光，他的某些心理上的特点，使我们两人有所不同。相反，即便我能反映一切，我也远不是智慧的。作为保持着婴儿性感区所有对天堂的完整记忆的、发育极为迟缓的孩子，我将特别成为“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的原型。我怀着无限自私的顽强态度，紧抓住快乐不放，完全不用费力，我就变得会伤害人了。一大夜里，我用一根大头针残酷地划破了我敬爱的奶妈的脸颊，原因只不过是求她带我去买“糖葱头”的小店关了门。毫无疑问，因此我才能活下来。在一种完全不可能的情况下怀出来的我的哥哥，不过是我本人最初的试产品。

今天，我们知道形式总是对物质的一种查问过程的结果，是物质对一种空间强制做出的反应；这种空间强制从各方面抑制着物质，并迫使它膨胀地表现自身，从而便它特有的生命恰当地发挥出反应的各种可能性。受到一种过于专横的冲力激励的物质有多少次被消灭了？更加节制野心，更为适合快

乐的物质，只是按照它最初形式的本质向专横的空间让步。有什么东西比像乔木般繁茂的玛瑙更轻柔、更荒诞、更自由？然而它却是受到一种“胶质环境”最强制约束的产物，它被束缚在严格的结构里，经受压制的所有折磨。它那些最纤细、最轻灵的分枝只是一种漫长苦刑的痛苦绝望的“绠线”，只是一种仅向矿物界的无限增植物让步的物质的最后叹息。不过蔷薇也是这样的！每一朵花在狱中生长。自由是没有定型的。形态学（为曾让列奥纳多着迷的数不清的后果创造了这个名词的功劳应属于哥德）现在使我们懂得了恰恰就是最具无政府主义色彩的、最不同质的、最杂沓的各种对抗倾向，导致了形式的最严格等级制的胜利统治。

正如宗教裁判所之火点燃了那些头脑狭隘、智力有限的心灵，那些形形色色和无政府倾向的心灵同样也在这些火焰的闪光中找到了它们的精神形态学。已经提过的我的哥哥就具有这些难以压制的智慧的一种；这些智慧只朝着唯一的方向，不会有反光，并且在日趋衰竭。与此相反，正像我也说过的，我本人是位多形生理本能反常者，头脑迟钝，带有无政府主义的倾向。我所有的觉悟都体现在贪吃上，而我所有的贪吃也都变成了觉悟。大家都想改变我，可我没有任何的变化。我胆小、懒惰、让人讨厌。我的心灵，应当在西班牙严格刻板的思想里，找到我独特天才的耶稣和乔木状的血玛瑙的最高形式。我父母给我取了个与我哥哥相同的名字：萨尔瓦多，正如这个名字所显示的，我注定要从现代艺术的虚无中真正拯救绘画，这发生在一个多灾多难的时代，发生在这个我们有幸或不幸生活于其中的机械而又平庸的天地里。如果我回首往昔，我觉得拉斐尔那样的人就是真正的神明。无疑，在今天我是唯一懂得为什么不可能接近（哪怕是远远地）拉斐尔完美形式的人。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就像一场大灾难。我多么希望生活在一个不需要拯救什么的时代啊！但如果我转向当代，尽管我并没低估那些比我高明得多的专家，我却无论如何也不愿把我的个性与同时代的任何一位的个性交换。

一个独一无二的生命达到了一种其形象堪与文艺复兴种种宁静的完美相比的生活境界，这个生命就是加拉，我选择了她做我的妻子，这真是奇迹般的幸福。她那些转瞬即逝的姿势，她那些表情就是又一部《第九交响曲》，它们反映出一个完美灵魂的建筑般轮廓；这个灵魂在她特有的生命等级制的海洋泡沫中，凝聚成肉体的海岸、皮肤的花朵。这些姿势和表情，经过阵阵最微妙的感情分类、提纯，体现并排列成一座肌肉和骨骼的完美建筑。

我也能这样谈论坐着的加拉，她宛如布拉曼特的小礼拜堂一样优美动人，该礼拜堂就坐落在罗马蒙托西奥的圣彼得教堂旁边。正如司汤达在梵蒂冈做的那样，我同样也能度量她高傲的细长圆柱、她童年的温顺而又固执的栏杆以及她微笑的神圣楼梯。我悄悄地注视着，她一直都没发觉，在我蹲在画架前工作的漫长时间内，我反复想着这么一件事：她可以被美妙地画成一幅维米尔或拉斐尔的作品，而我们周围的那些生命总好像很不完美，被描绘得十分乏味，使得它们更像是由一位饿肚子的艺术家为了换钱，在露天咖啡座匆匆涂抹出来的漫画速写。

七岁时，我想当拿破仑……我得解释一下。我们家的三楼住着马塔一家，他们是阿根廷人。这家的女儿，有一位叫乌苏丽塔·马塔，她就像神话中的美女一样可爱。在1900年口头流传在卡塔卢尼亚地区的传说中，人们窃窃私语，说她就是欧仁尼奥·多尔斯的著作《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原型。正是在七岁开始之际，三楼的尘世利比多的诱惑力就开始对我产生作用。夏季炎热

的傍晚，我一动不动地呆在阳台上，忍着干渴，一直等待着头顶上方的阳台传出轻微声响，我所希望的一扇落地窗会打开。在三楼，大家把我当成一家人，十分喜爱我，每当六点左右，大家就来到客厅，围绕上面放着一只标本鹤的大桌子坐下来，这些披长发的、阿根廷口音的、可爱的人喝着巴拉圭茶。大家用一个大的银器，传递着一口一口地喝这种茶。嘴这样混杂在一起，特别让我心绪不宁，阵阵道德不适的旋风在我心中吹过，妒忌的钻石已经在这些不适中闪耀着白光了。

轮到我吮吸这种微温的饮料时，我觉得它比蜜还甜，而那蜜已比血甜了。因为我的母亲，我的血液总是在场的。我尘世的固恋因而是通过嘴的胜利之路达到的；由于拿破仑也在场（哪怕不是他本人，至少在装巴拉圭茶的小木桶上有他的彩色图像），我也想吮吸这位皇帝的体液。这个拿破仑像奥林匹克运动会上骄傲的英雄，他有一个可食用的白白肚子，一种帝王般的肤色红润的面颊，头戴一顶线条优美的黑帽，完全符合我本人想当的国王的模样。

大家当时唱着：

拿破仑在尽头，
在大队人马的尽头。

这个小木桶上的拿破仑形象，像荷包蛋（但却没有盘子）一样，抓住了我的心灵，让我神魂颠倒。我从想当厨师急剧转向想当皇帝，这种欲望就源于以巴拉圭茶面目出现的这个可喝的拿破仑；这正如我看到从我们家厨房中溜走的那些高大的女人而产生的最初色欲，在不知不觉中已被作为1900年美女原型的美人乌苏丽塔·马塔取代了一样。以后，我会详细解释和描述我所发明的种种“思想的机器”。其中的一种，特别是以可喝的拿破仑的观念为根据的，在这个可喝的拿破仑身上，实际体现了我童年时代的两个基本幻想——口腔的狂热和令人眼花的心灵帝国主义。于是人们就会理解为什么在我的心灵中，摆在秋千座上的五十杯温奶，恰好跟拿破仑圆滚滚的大腿是同一回事，就会理解对大家来说这有多少可能变成真的。没有一位有信仰的人不是这么看待事物的。在这部感情的书中，我将解释这件事和其他更奇特但同样确切的事。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无疑的，这就是我在本书中叙述的一切（绝对是一切），责任完全在我，而且仅仅在我。

第一部

第一章 轶事性自画像

我知道我所吃的。
但我不知道我所做的。

有一些男人微笑时，就会大胆地展示挂在牙齿间的、被称之为菠菜的那种可怕的、有损名誉的蔬菜残屑，我无幸成为这样的男人。这并非是由于我比别人刷牙更认真，而是由于一个暗伤般的原因，即我从不吃菠菜。事实上，我一般总是把各种食物、特别是菠菜当成具有美学和伦理学本质价值的事物来看待，反胃的哨兵永远守候在那儿，迫使我严格挑选食品，用认真的关怀态度监视我的饮食。

实际上，我只爱吃那具有清晰的、能被智力理解的形式的东西。如果说我讨厌菠菜，那是因为它像自由一样不定型。与菠菜相反的是甲壳类动物，我爱吃这种东西，特别是所有小小的这种东西，实际上也就是所有带硬壳的东西。作为一种外骨骼动物，甲壳类动物实现了这种从本质上说是哲学的美妙想法，把骨骼移到了外部并把细腻无比的肉藏到了内部。由于严格的体型保护着它们柔软而有营养的种种妄想，它们才能封闭在庄严的容器内，不受外部的糟蹋，只有去掉外壳才会使它们遭受我们味觉器官帝国的征服。用牙齿咬碎小鸟的颅骨这是何等美妙的事情呵！人们能换一种方式吃脑髓吗？

牙床是我们获得哲学知识的最佳工具。有什么能比你慢慢地吮吸仍在臼齿间裂开的骨头的精髓更具有哲学意味呢？当你从全部东西中寻找骨髓的那一瞬间，你似乎就控制了形势。这就是突然从中涌出的真理的味道，这就是从骨之井中喷出来的，你终于紧含在齿间的赤裸裸的鲜嫩的真理。一旦克服了障碍（多亏了它，一切自尊的食品才能“保持其形式”），对欲望来说，除了鱼发粘的玻璃状眼睛、鸟的小脑、骨头的精髓或牡蛎的柔软淫荡就没有什么会完全是粘糊糊的、胶状的、颤动的、含混的和可耻的了。不过我已经顶感到你们的问题：你喜欢卡芒贝尔奶酪吗？它保持着形式吗？是的，当卡芒贝尔奶酪正开始流淌并自然地具有了我著名的软表的形式时，我非常喜欢它。我要补充一句，如果有人成功地制造出菠菜形的卡芒贝尔奶酪，很可能我就不再喜欢吃它了。

不要忘记这一点：把山鹑用特殊方式贮藏到有点变味后，再用酒精烧烤它，随后放在它本身的排泄物中端上来，这是巴黎上等饭店的习俗，对我来说，它永远是美食学庄严领域内一种真正文明的最优美象征。放在盘子上的赤裸山鹑的苗条躯体，仿佛达到了拉斐尔式的完美比例！

因此，我明确而又无情地说，我要吃这个！我更加惊异地观察我周围那些什么都吃的褻渎神灵者，他们好像仅仅是在做一桩不得不干的事！我永远清楚地明白我想从自己意识中获得什么东西。对我那些如肥皂泡一样轻飘易破的感情来说，则是另一种情况，因为我从无法预见到我行为的歇斯底里和离奇古怪的进程。除此以外，我种种行动的最后结果最先令我感到意外。恰如每一次，从我感情的无数彩虹般肥皂泡中，总会有一个泡泡在死亡的坠落中得救，奇迹般地成功着陆，一下子变成这些关键的行动之一，就像炮弹爆炸一样吓人。没有什么能比那些将源源而来的轶事更好地说明这点了。我不

按照时间顺序来介绍这些随意潜入我的过去的轶事。这些严格忠实于实际、直截了当叙述的轶事，是我自己形象的外骨骼的组成部分，是我自画像的钙质材料。

我五岁了。在巴塞罗纳附近冈布里尔一处村庄，正值春天。我刚刚认识了一个比我小的男孩，他一头金色鬃发，我们一起在乡间漫游。他骑一辆自行车，我则步行，我用手臂扶着他的后背，帮他向前蹬车。我们经过一座正在建造的桥，桥栏杆还没修好。我张望了一下，确信没人注视我们，突然一下把这个男孩推到虚空中，他从四米高的地方跌在了岩石上。随后，我跑回家宣布这条消息。整个下午，来来往往的人不断，全家陷入了普遍的混乱，我从这种现象中获得了一种甜美的错觉。我呆在小客厅里，坐在一把装饰着卷叶形花边的摇椅上吃水果。椅背和扶手的花边上缀满了大量长毛绒的樱桃。这间小客厅与门入口相邻，从那儿我能注视整个乱糟糟的场面。为了阻挡室外的炎热，百叶窗紧闭着，这使室内保持着一种凉爽的昏暗。整个白天，我不记得曾有过丝毫的犯罪感。当天晚上，当我照惯例散步时，我记起了尝过的每一株草本植物的美。

我六岁了。客厅里挤满了客人。大家谈到一颗彗星，如果天空一片皎洁的话，在夜晚就能看到它。有些人断言，彗星尾扫到大地时、万物的末日就来临了。虽然我能觉察到他们谈及这些话题时含有说反话的意味，可我却感到十分恐惧，浑身战栗起来。我父亲的一位雇员出现在门口，宣布终于从阳台上看到了彗星。我们的客人全都跑上楼梯，把我单独留了下来，我坐在地上，吓得几乎无法动弹了。我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奔向楼梯，穿过走廊时，我看到我三岁的小寻妹在地上爬，我停了下来，略微犹疑了一下，在那种疯狂的快乐（它刚使我做出野蛮的举动）的摆布下，我朝她头上狠狠地踢了一脚，就又奔跑起来了。但是正站在我身后的父亲看见了这个场面，他抓住我，把我关在他的办公室里，我在这儿一直呆到吃晚饭时。

这次惩罚使我没看到彗星，它作为我生活中最难受的事情之一留存了下来。我极其愤怒地哭叫，结果把嗓子都弄哑了。我的父母终于为此惊慌起来。认识到父亲抗拒不了它，我后来常利用这种没多大威胁的战术。有一天，我被鱼刺卡住了，我看到他离开饭厅，因为无法忍受抓牢我的那一连串咳嗽和抽动，为着更好地吸引全家人痛苦不安地注意我，我肆意夸张它们。

大约在同一时期，一天下午医生到家中给我妹妹穿耳朵孔，自从踢了她一脚的事件后，我更温柔地爱她了。我觉得这个手术是桩可怕的暴行，于是决心不顾一切去阻止它。我等着医生坐下来，戴好眼镜，准备开始工作；趁人不备，我闯进了房间，用掸子抽打医生的脸。这位不幸的人疼得哭了起来，他伏在把我们拉开的父亲肩上，呜咽着断断续续说：“我真不相信竟会有这种事，我是那么喜欢他！”从这天起，我喜欢生病了，这仅仅是想看到我懂得使之哭泣的这位老人的面孔俯在我床前。

又一次在冈布里尔，大约在我五岁左右时，我同三位很漂亮的夫人一起外出散步。其中的一位夫人特别令我着迷。她头戴一顶大帽子，上面缠绕的白纱遮住了她的面孔，她拉着我的手。我发觉她真让人动心。我们漫步到乡村的一处僻静角落，这些少妇们开始以暧昧的方式相互谈笑。她们的窃窃私

语令我心慌、令我妒忌。她们多次劝我去玩，我并没走多远，以便更好地侦察她们，我看到她们做出了一些古怪的姿势。最美的那位呆在中央，她累坏了的同伴奇怪地盯着她看。她低下头，分开双腿，手放在腰间，轻轻地令人难以觉察地撩起裙了。她的静止状态满足了人们的期待。一个紧迫的事件即将发生。至少有半分钟，令人窒息的静寂控制了一切，直到从裙子下喷出一股有力的液体，这静寂才结束，在她脚下很快就形成了一片覆着泡沫的水洼。晒热了的土地吸收掉一部分尿液，其余的则显出一些小蛇的形状，这些小蛇增长得飞快，把这位“蒙面纱的妇人”涂白粉的鞋子都弄脏了，尽管她跳来跳去躲闪。在代替了吸墨水纸的两只鞋子上，浅灰色的湿斑向上伸展扩大。”蒙面纱的妇人”全神贯注于她的职责，并没觉察到我看得呆掉了。她抬起头看到我时，向我嘲弄地微微一笑，她那透明的面纱使这微笑更令人心慌意乱。她瞧着她的两位朋友，似乎想对她们说：“现在，太迟了，我无法再忍下去了。”少妇们发出一阵大笑。这一回，我懂得了，于是心跳得更加厉害。两股新水柱扑打着地面。我并没转过头去，而是一直睁大双眼，凝视着半掩在面纱后的那对眼睛。随着我疯狂的血液的起落，我产生了极度羞辱的感情。天空中，黄昏的暮色取代了夕阳的绯红色，在这时，有如三只鼓在合奏，长久忍住的、猛烈而又珍贵的狂暴水柱，就仿佛是沸腾的三股野蛮的黄玉小瀑布在喷涌。

黄昏时分，我们返回冈布里尔。我不想让三位少妇中的任何一位拉着我的手，我略微落在她们后面一点儿，仇恨和甜蜜使我的心在收缩。我握紧的拳头里拿着从路旁捉到的一只萤火虫。我不时小心翼翼地张开一点手指，看它发光。我的手握得太紧了，汗水很快弄湿了它。我怕淹死这只萤火虫，不断地把它从这只拳头移到另一只拳头里。这么做得次数太多了，有一次，它掉了出来，我不得不在月光染蓝的暗淡尘土中拾起它。一滴汗水从手上淌下来，在尘土上打了个洞，看到这个洞，我不由地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感到恐慌，我拣起萤火虫就朝走远了的三位少妇跑去。我的奔跑令她们惊奇，她们停下来等我。蒙着面纱的那位拉住我的手。我不愿这样，我想独自走。我们接近家的时候，我二十岁的表兄来迎接我们，他挎着一支有背带的卡宾枪，举起手中的东西，想让我们从远处看到它。由于它的高度，我们辨认出一只小蝙蝠，他把它的翅膀弄伤了。我们走进家中，我的表兄把这只动物放在一个小铁桶里，由于我非要它不可，他又把它送给了我。我跑到洗衣槽后面，这是我心爱的地方之一。在这儿，我已有了一些发着金属般光泽的小瓢虫，它们呆在一个翻过来的玻璃杯里的薄荷叶上。我的萤火虫也加入到它们之中，我把它们全都放在蝙蝠蜷缩着的这只桶里。晚饭前，一小时梦似地过去了。我大声跟这只我开始宠爱的蝙蝠说话。我一遍又一遍地亲吻它毛茸茸的头顶。第二天早晨，等待我的是一个可怕的景象。玻璃杯倒了，瓢虫们飞走了，萤火虫也不见了，身上爬满疯狂的蚂蚁的蝙蝠，嘶哑地喘息着，嘴张得老大，露出小老太婆式的牙齿。“蒙面纱的妇人”恰巧在这一时刻出现了，她站在门栅栏处。我拣起一块小石子，全力向她掷去，可没有打中她。她吃了一惊，向我投过来一股柔和的好奇目光。我颤抖着，呆在那儿，很快就感到难忍的惭愧，这种惭愧让我做出了一个不可理解的动作，吓得这位少妇发出一声恐惧的惊叫。这就是，被怜惜蝙蝠的感情支配着，我匆忙拾起它，我实际上打算吻它疼痛的头，但我却没有这么做，而是用牙死命地咬了它一口，我觉得它断成了两截。惊恐之中，我把这只蝙蝠抛在了洗衣间，匆匆跑掉了。

洗衣间椭圆形池子里已布满了腐烂的黑色无花果，它们是从一棵大树伸出来的枝条上落下来的。当我跑到离那儿好几米的地方，眼中含着泪水回头望时，在那些浮起的无花果中，我再无法分辨出不幸的蝙蝠断开的尸体了。从此我不再走过这间洗衣房。哪怕就是在今天，每当一些黑点让我忆起淹没了我的蝙蝠的水池中的无花果时，我还会吓得浑身发抖。

我十三岁了，是费格拉斯的主母修士会学校的学生。从教室到操场，我们要从一处很陡的石砌楼梯走下去。一天傍晚，无缘无故，我忍不住想从楼梯高处往下跳。可是我害怕了，我犹疑不决，我得把这种强烈的欲望推迟到次日实现。第二天，我再也忍不住了，与同学们一起下楼梯时，我发狂地跳到了空中，跌落

在楼梯台阶上，随后又滚到下面的台阶处。我摔得鼻青脸肿，但是一种无法解说的巨大快感，使我觉得这痛苦无足轻重。这件事在同学们和修士们中间引起了强烈的震动，大家围着我，给我治疗，用湿的绷带包扎我的头。在这个时期，我非常腼腆，一点小事就会使我脸红到耳朵根。我是孤独的，把时间用在躲避旁人上。不安的人们大批拥来，在我心里引起了一种奇特的感觉。四天后，我又重复了同样的事，事情发生在第二轮文体活动期间，修士学监并不在场。我跳下去时，发出一声尖叫，把整个操场的注意力全吸引到我身上。虽然受了挫伤，但却快乐极了，我又干了一次。每次我从楼梯上下来，同学们都极端不安地喘着粗气，等待着什么。我永远记得十月的一个傍晚。雨刚停，操场上升起潮湿的土地和玫瑰花的气味。被落日映红的天空中，清楚地显出了壮丽的云彩，我觉得它们像一些爬行的豹，像拿破仑，或像断了桅杆的帆船。封神的无尽光芒从天上照亮着我的脸。在一派死寂之中，在停止了游戏的同学们的发呆目光中，我从楼梯上，一级级走下来。我不会同任何一位神交换角色。

我二十二岁了，在马德里美术学院学习。获得绘画奖之前，在绘制那不使画笔触到画布的竞赛作品之际，我就打赌能得到它。实际上，通过把构成一种惊人的点彩派绘画的飞溅色彩从一米远的地方抛到画布上，我成功地画了规定的题材。素描与色彩都那么准确，从而使我获得了一等奖。第二年，我必须通过美术史考试。我怀着要表现得极为出色的念头参加考试。而且我也认真地为这次考试做了准备。走上主考官们就座的讲台，我抽出落到我身上的问题。我的运气出奇的好，该问题恰好是我想发挥的。但是，我突然感到一种无法克制的怠倦情绪；令听众目瞪口呆，我明确宣布我比三位教授加起来还聪明，我拒绝由他们来考我，因为我对提出的问题极为精通。

一直在马德里美术学院。不断而又系统地与大家唱反调的欲望，把我引向各种荒谬怪诞的言行，它们很快使我在马德里艺术界获得了真正的名气。有一天，绘画课上，规定我们照一尊哥特式圣母小雕像写生。教授在离开前，还嘱咐我们如实表现每人“看到”的东西。他刚一转过身去，受到疯狂地想愚弄别人的情绪的支配，我参照一册作品展目，着手最精确地画一台秤。所有的同学都确信我真地疯了。到了周末，教授来纠正和评价我们的工作，他面对着我交给他的图画，板起了脸。所有我旁边的同学全陷入了惶惶不安的沉默，我用因腼腆而有点发窘的声音大胆地说：“您可能同大家一样看到一

位圣母，然而我看到的却是一台秤！”

我二十九岁了，夏天在卡达凯斯，我向加拉献殷勤。我们与一些朋友在海边共进午餐，在那向上攀爬的葡萄丛下，蜜蜂的轻微嗡嗡声让人昏昏欲睡。我幸福到了极点，尽管成熟的爱情重担已压在我肩上，它诞生了并像一个闪耀着无数痛苦宝石的粗大金章鱼紧紧卡在我的喉咙里。我刚吃了四只烤龙虾，灌了当地产的土酒，这些土酒不会声张，但它们却是由地中海地区最美妙的秘方制成的。

这顿午餐拖了很久，太阳都开始下落了。我赤着双脚，一位崇拜我多时的女朋友，已多次暗示过我脚的美丽。这正是拉·帕丽斯的真理，我觉得她不停地对我重复恭维话，太愚蠢了。她坐在地上，头轻轻靠在我膝上。突然，她把手放在我一只脚上，试图用颤抖的手指怯生生地抚摸它，在一种唯恐失掉自我的情感左右下，我跳起来，仿佛我突然变成了加拉。我撞了这位崇拜者，把她推倒在地上，使劲地踩她。大家不得不把沾满血的地与我拉开。

我献身于各种想干和不想干的古怪行为。我三十三岁了。我刚接到一位最杰出的年轻精神病医生的电话。他才在《米诺陶》中读到关于“偏执狂活动的各种内在机制”的论文，他向我表示祝贺，我对这样一个题目的正确科学认识（一般而言，这是极为罕见的）令他吃惊。他想见见我，当面讨论一下这个问题。我们商定当晚在我位于巴黎高盖街的画室里会面。这临近的会面使我十分激动，整个下午，我都在努力起草一份我们要谈的事情的大纲。实际上，我满意我的各种观点（就连超现实主义团体中最亲近的朋友们，也把它们看成是自相矛盾的心血来潮的产物）会在一种科学的环境中加以考虑。我一心想使我们初次交换意见这件事能正规地、甚至有几分庄严地进行。在等待年轻的精神病医生到来之际，我继续凭记忆画一幅肖像，我正在把它画成诺埃依子爵夫人。这幅用铜版制作的画，搞起来很难。为了看清我画在光洁如镜的褐色铜片表面上的素描，我注意到在反光最明亮的地方能清楚地辨认出我作品的细节。因此我在鼻尖上贴上一块三厘米的方形白纸片来做画，这块白纸片的反光完美地显示出我的素描。

六点整，有人按门铃。我收起铜版，给来访者打开门。雅克·拉康进来了，我们马上开始一场非常紧凑的专业性讨论。我们惊奇地发现，由于同样的原因，我们的观点与公认的构造主义论断是对立的。在两个小时内，我们以真正激动的辩证方式谈论着。雅克·拉康离开时，答应定期跟我接触，以便交换意见。

他走后，我在画室里来回踱步，尽力概括我们的谈话内容，更客观地估量我们之间暴露出来的少数不同点。可有一点令我困惑不解，那就是这位年轻的精神病医生不时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这令我不安。仿佛一种奇怪的微笑想掀开他的嘴唇，而他克制着不让自己显出惊奇来。他在致力于对我的面貌（那些使我心灵激动的想法让它富于生气）进行形态学研究吗？当我去洗手时（这个时刻正是人们能最清楚地弄明白不论什么问题的时刻），我解开了这个谜。不过这次是镜子给了我答案。在那两个小时内，我忘记除掉贴在鼻尖上的小白方纸片，以一种客观严肃的语调，极为认真地谈论着先验的问题，却毫没料到到我鼻子的可笑样子！可有哪个犬儒主义的故弄玄虚者能把这个角色演到底呢？

我二十三岁了。居住在费格拉斯父母的住宅里，我正在我的画室中画一幅立体主义的大画。我弄丢了室内便袍的腰带，它在活动时总妨碍我。我随便找了根电线缠在腰间。可这根电线的一头有个小灯泡。管它哪！我懒得摘掉它，就把它当成腰带扣用。过了一会儿，妹妹通知我，来了一些重要的客人，他们想见我，正在客厅里等着。我摆脱了对这件作品的不满，来到客厅。父母朝我沾满颜色的室内便袍不满地瞟了一眼，不过大家还没看到挂在我屁股上的灯泡。相互介绍后，我坐了下来，灯泡在安乐椅与我后部之间爆裂了，发出炸弹般的声响……

就是这样，巧合热衷于让我生活里那些最微小的事情变得强烈而又令人难忘。而在别人身上，这些最微小的事情不注意地就过去了。

1928年，我在故乡费格拉斯做了一次讲演，市长和地方当局的官员们主持这次讲演会。一群不懂规矩的人拥在大厅里，我气冲冲地说：“女士们、先生们，讲演到此结束。”我就这样讲完了结束语。我的声调是愤怒的，几乎是挑衅性的。大厅里的听众不懂我讲演的结尾，而我则不满他们笨得无法了解我的思路。可是，在我清楚地说出“结束”这个词时，市长当即倒毙在我脚下！

那种激动的情绪真无法形容，因为这个人深孚众望，为市民爱戴。那些幽默的报纸硬说，我讲演中大声讲出的种种十分荒谬的话杀害了他。实际上，这只不过是心绞痛的急剧发作造成的。

1937年，我得在巴塞罗纳做一次关于“床头柜的现象学的和超现实主义的神秘”的讲演。就在那一天，爆发了一场无政府主义者的起义。那些仍来听我讲演的听众中，有一部分是当地的囚徒，这准是由于匆忙降下了临街的玻璃窗的铁帘子。在我讲话期间，能断续听到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队伍的一阵阵枪声和炮弹的爆炸声。

在巴塞罗纳举行的另一次讲演期间，有一名白胡子的医生，突然犯了疯病，从听众中站起来，想杀死我。人们费了好大劲……拚命制止他，把他从大厅里弄出去。

1936年，在我们位于圣心教堂附近的贝克海尔街的房间里。加拉要在次日上午动手术，当晚得在诊所里安静地过夜。手术很难做，然而加拉毫不在意，下午我们用来制作两件超现实主义的作品。她好像一个孩子，制作出令人吃惊的不同物件的装配物后，再无意识地把它们破坏掉。后来，我才懂得她的作品充满了对她那临近的手术的无意识暗示。卓越的生物学特性在其中体现得十分清楚：一些金属触角准备撕碎一些薄膜，一碗面粉减轻了那些乳房的冲撞，在乳房处生出了一根公鸡的羽毛。我本人制作了一个“即将入睡的钟”：在一个豪华的底座上放置了一只大的棍状面包，在面包背上，排列整齐地嵌着一打装满塘鹅牌墨水的墨水瓶。每个墨水瓶上插着根色彩各异的羽毛笔。我为产生的效果欣喜若狂。

黄昏时分，加拉的作品完成了，于是我们决定去诊所前把它给安德烈·布列东看看。我们叫住一辆出租汽车，小心翼翼地把这件作品放进去，很不幸，

刚一摇动，它就散开了。盛着一公斤面粉的碗倒了下来。我们看到自己浑身一片白。出租汽车司机不时回头张望我们，他的眼神里流露着同样多的惊异和怜悯。他在一家面包店前停住车，我们又买了一公斤新鲜面粉。一个事故接着一个事故，我们很晚才到诊所，像幽灵一样出现在院子里，站在迎接我们的那些护士面前，样子显得很怪。我和加拉拍打着身子，一大片云雾状的面粉从我们的衣服和头发上飘散开来。我把加拉留在诊所，很快回到家里，同时继续漫不经心地拍打着身上。我晚餐吃得很香，吃的是牡蛎和烤鸽子。喝过三杯咖啡后，我重又动手制作下午开始搞的作品。从离开它的那一刻起，我一直急于回到这桩工作上来，我始终想着我的作品，这种不关心妻子手术的态度，令我自己都有点儿感到吃惊。但是，哪怕我尽力去做，我也感受不到一点点不安。这种对我认为是深深爱恋的生命的各种痛苦全然超脱的状况，向我的心灵提出了一个道德和哲学的问题，对此我只能以后给以解答。

就像被灵感控制的音乐家，我感到在自己心中翻腾着各种构想。我添上了六十个墨水瓶的形象，在它们上面，插着用水彩在小小的方纸片上画出的笔杆，用一条线把这些形象吊在我的面包下面。我出神地凝视着我的作品那极为实在而又荒谬的形状，随后在凌晨两点左右，我躺下来，陷入天使般的甜睡之中。五点钟，我醒了，这次就像个魔鬼一样。我生活中的最大苦恼把我钉在了床上，费了半天劲，我终于把令我憋闷的那些被子抛开了。我浑身都是悔恨的冷汗。天亮了。鸟儿疯狂地歌唱使我彻底醒了过来。

加拉，加露琪卡，加露琪基尼达！我的泪水涌了出来，它们就像生孩子的抽搐一样灼热和痛苦。一旦止住了泪水，我就重新看到靠在卡达凯斯一棵橄榄树上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夏末在克鲁斯海岬的岩礁中弯腰拾一块光彩夺目的云母石的加拉的形象，重新看到游得好远只能让我看到一张微笑的小小面孔的加拉的形象。由于重睹上述景象，我的泪水很快又涌了出来，这回它们流淌得更厉害了，好像感情的机制压紧我眼球的肌肉膜，要让泪水流尽似的。我的爱情的每一灿烂景象，都装在了回忆的青灰色酸柠檬中。

我奔到诊所，怀着野性的痛苦，一把抓牢外科医生的大褂，使得他特殊地看待我。一周内，我时刻在哭泣，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都惊呆了。最后，在一个星期天，危险过去了。死亡恭顺地匆匆退去。加露琪卡微笑了。我抓住她的手，紧贴在我的面颊上，充满柔情地想到：“在这之后，我或许会杀了你！”

我去维也纳游历过三次，三次旅行在一点上十分相似。早晨，我去看塞尔南收藏品中的维米尔作品，下午，我有充分的理由不去看弗洛伊德，这理由就是每次都有人告诉我，出于健康的原因，他呆在乡间。我忧郁地忆起吃着巧克力馅饼，拜访古董商，在维也纳漫步的情景。晚上，我独自一人与弗洛伊德进行了想象中的长谈。只有一次，他屈尊陪我回到我住的萨切尔旅馆，被我房间的窗帘缠住，他同我在那儿度过了一个夜晚。

在我最后一次试图见到弗洛伊德几年后，我与几位朋友在桑斯的一家餐馆共进晚餐。我吃着心爱的食品蜗牛时，从邻座的肩上看去，见到一份报纸的首页上登着这位大师的照片，我马上从这份报纸上弄到了一份宣告弗洛伊德来到巴黎的样本。他的颅骨就像一只蜗牛，只要用一根大头针就能从中挑出脑浆来。这一发现深深地影响了我在他去世前一年为他画的肖像。

拉斐尔的颅骨与弗洛伊德的完全不同，它像一块凸面的钻石，是八角形

的，它的脑浆像石头上的纹理一样。列奥纳多的颅骨像个核桃，也就是说，它显得更真实。

我终于在伦敦见到了弗洛伊德。斯蒂芬·茨维格和诗人爱德华·詹姆士陪伴着我。穿过这位老教授居住的大楼院子时，我看见墙上靠着一辆自行车。车座上绑着一个红色橡胶热水袋，竟然有一只蜗牛在这个热水袋上移动！

并不像我希望的，我们谈得很少，不过我们都贪婪地盯着对方看。弗洛伊德除了知道他所喜爱的我的绘画外，对我一无所知，我试图在他眼前显示出具有一种“渊博知识”的花花公子的派头。我后来了解到，我给他留下的印象完全相反。离开他之前，我想送给他一本刊登我写的一篇论偏执狂文章的杂志。于是我打开这本杂志，翻到印有我的研究成果的那一页，请他答应读一下它，如果他有空的话。弗洛伊德继续凝视着我，根本没注意我给他看的东西。我向他解释，这与超现实主义者的心血来潮无关，它涉及的是一篇论文，其中的那些抱负实际上是科学的。我用手指指在它上面，还向他重复了好几遍它的标题。面对着他毫不动摇的冷淡，我的声音越来越尖锐，含有坚决要求的意味。弗洛伊德继续观察着我，仿佛整个生命都投入捕捉我的心理现实的活动，这时他突然向斯蒂芬·茨维格喊道：“我从没看到这样完美的西班牙人的典型，多狂热呵！”

第二章 子宫内的记忆

我猜想我的读者完全记不得、或是只能极为模糊地记起他们存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即他们来到世上之前在母体内渡过的时期。然而我却能记得它，就如同这是发生在现在的事一样。这就是我为什么打算以真正的开始时刻，以我自己在子宫内生活时留下的稀有而又清晰的记忆来开始这本书的原因。自世界文学史开始以来，这些回忆无疑将是此类作品的最初体现。

这么做了，我确信会在读者的记忆中引发相似回忆的出现，会或多或少在他们的心灵中确定大量感情的位置、确定大量难以说出和无法限定的印象的位置、确定大量灵与肉状况的景象的位置，他们将把这些情况与诞生前生活的回忆中的某种预感混合起来。我不可能就这个主题给奥图·兰克博士那本轰动的著作《诞生之创伤》提供过多的建议，该书将以一种更科学的方式向读者指明情况。我本人对子宫内这个时期的回忆，十分清晰并富于细节，它只不过证实了兰克博士的论点，当这种论点与“失去的天堂”的这一时期发生联系时。

事实上，如果你们问我感到的是什麼，我会立即回答你们：“那是神、是天堂。”可这个天堂是怎麼样的呢？请别有一丝担心，那些细节都留存着。请允许我以简短的综述开始：子宫内的天堂有着地狱火焰的色彩，红、橙黄、黄、淡蓝。它是柔软的、静止的、热的、对称的、双重的、粘糊糊的。在这时，全部快乐、全部美景尽收眼帘。我看到的辉煌景象就是两个荷包蛋，但它们却没有盘子。无疑，由此产生出在我一生其他时刻，面对这令人迷惑的形象时，所感到的烦恼和激动。我出生前看到的没有盘子的荷包蛋，是壮观的、闪着磷光的，它们那略带蓝味的蛋白被一层层分开了。这两个蛋靠近我后又离去了，它们从左移到右，从上移到下，又从下移到上。如同珍珠一样光彩夺目，随后它们渐渐不再换位，直到消失不见了。今天，我仍然能自觉地再现出相似的景象，虽然没那么强烈，特别是缺少当时的魔力，这一事实，使我能解释如同假光觉一样的这个转瞬即逝的蛋的景象，以及这些由闭上眼皮的眼睛压缩产生的发光感觉。为了使一切在我面前重现，我只要模仿胎儿特有的姿势，把拳头放在紧闭的双眼上就够了。这种时常出现在儿童身上的游戏，构成了一些有时被称为“天使”的色彩圆圈。还是在那儿，儿童痛苦地压制眼球，想尽力找到所怀念的胚胎期的视觉记忆。儿童找到的各种光色，使得他重又看到了在失去的天堂中见过的天使的神圣光环。

似乎人的整个富于想象的生活倾向于借助类似的处境和表现，重建这种最初天堂的状态。正如这种生活热衷于征服可怕的生之创伤，在生之创伤后，我们被逐出天堂，突然从一种保护性的封闭环境进入一种面对所有危险的世界，一句话，就是面对一个极其“真实”的世界。这伴随着种种窒息的、压制的、盲目的、扼杀的现象，此后这些现象会带着痛苦的、惊愕的和不开心的痕迹留在我们的意识里。

死的欲望，经常表现在要回归我们来的地方的急切冲动中。自杀者在大部分情况下都是不懂得征服生之创伤的人。同样，那喊着“妈啊”死在战场上的人，那时正从反面表达了再生和重返被逐出天堂的欲望。没有什么能比某些原始部落的习俗更好地说明这种情况，根据此种习俗，要把死者摆成胎

儿那样的蜷曲姿势来埋葬。

然而，要检验我刚才陈述的现象，并不需要死亡。睡眠就足够了。因为在睡眠时，人们找回了一些他试图用各种微小细节重构的这种天堂的境界。在这种场合下，睡眠者的姿势最有说服力。我的前睡眠状态特别显示出特有的蜷缩模样，我说“蜷缩模样”，这是最为确切的形容。这是一种真正的哑剧、有着一些小小的姿势，抽搐和变动，这是一种预示着完全投入睡眠的短暂涅槃的神秘芭蕾舞，通过它，我们见到了失去的大堂的一些珍贵的地方，入睡前，我保持着胎儿的“蜷曲”姿势。被其他手指攥紧的拇指都发疼了。我的后背尽力紧贴在被单这想象的胎盘上，试图使它紧紧包住我的屁股。即便在非常炎热的时候，我也需要被单包裹，不这样做，我便无法入睡。我的姿势必须永远具有一种严格的准确性。尽管睡神有权彻底占有我，但是必须让脚的小趾靠左或靠右一些，使上唇不知不觉地贴在枕头上才成。随着睡眠抓牢我，我的身体失去了知觉并完全局限在头部，用全部的重量侵入它，使它昏昏沉沉。我本人的这种描述与我对子宫内存在的记忆结合在一起，我可以把这种记忆确定为围绕着两个圆形物（我的双眼）的一种重物。我时常把睡魔想象并表现为一颗巨大的沉重头颅。它有一个用现实的拐杖保持着平衡的非常纤细的身体。当这些拐杖破碎时，我们就产生了“跌落”感。我的大部分读者都体验过这种突然跌进虚空中的感觉，这恰是在睡眠要彻底控制他们之时发生的。蓦地一下子醒来，一种抽搐的颤抖使心脏激动不安，你们永远无法猜想到这种眩晕感不过是对分娩时排出母体的记忆。

多亏了弗洛伊德，我们懂得了与航空有关的全部事情的色情含义。什么也不如飞行之梦的象征那么清楚明白。所有投入虚空中的人，实际上只有一个欲望，这就是不顾一切地再生，哪怕是从另一个方面，完全挂在降落伞这条脐带上。降落伞的计策对有袋类动物是十分自然的事，这些动物并不把它们的孩子突然抛进现实中，而是让它们在母亲肚子上的袋里找到一处间歇的庇护所。因此，它们能舒服地适应外界的生活。应该与我发明的有袋类雌性半人半马怪对照的，正是这些动物。

外部的危险具有激起和扩大我们子宫内记忆的各种表现和幻影的功效。我记得夏天的大风雨，在那时，我们这些孩子躲在铺着台布的桌子底下，或是用椅子和被单匆匆搭起一些小屋，藏起来避开别人的眼光。听着外面隆隆的雷声，那时是多么快活啊！回忆这些游戏真是美妙！我们全都“蜷曲”在那里，高兴地吃着糖果、喝着热糖水，试着相信我们当时正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把这些暴风雨的日子的游戏称为“造洞穴”，也称为“扮演帕杜菲老爹”。多少年代以来，帕杜菲老爹一直是小卡塔卢尼亚人的民间英雄。他长得那么小，结果有一天他在田野中迷了路，被一头想保护他的牛吞进了肚里。他的父母喊着：“帕杜菲，你在哪儿？”四处寻找他，最后听到了他的回答：“我在牛肚子里，这儿既没有雪也没有雨。”

轮到我扮演小帕杜菲时，我在那些抵御雷鸣的人造掩蔽所里，在与我诞生前生活有关的大部分形象中又看到他。我爬在地上，膝手相触，诱发它们。我的头无力地垂下来，像钟摆那样来回摆动，使血液流向它。这种活动一直持续着，直到产生了令人快乐的昏头昏脑之感。那时，不用闭上眼睛，我就看到了突然涌现的浓重黑暗（比我在真正的黑暗中看到的一切还黑），看到了突然涌现的闪烁磷光的圆圈，在这些圆圈里形成了那些出色的没有盘子的荷包蛋。这些火红色的蛋终于同一种柔软而又不定型的白色面团混在了一

起，被拉向四面八方，面团的延展性适应着各种形状，好像要屈从于我那想看到它被揉捏、折叠、合拢、“蜷曲”的不断增强的欲望。我高兴极了，希望一切都像这样。

机械的物体必然会成为我最凶恶的敌人，那些怪物本身将是柔软或不柔软的。

第三章 萨尔瓦多·达利的诞生

1904年5月13日12时，在费格拉斯市，面对着该市学识渊博的法官米盖尔·柯玛斯·昆塔纳及其秘书弗兰西斯科·萨拉·依·萨伯利亚，家住该市蒙图里奥尔街20号的公证人，出生于热罗纳省卡达凯斯的、已婚的、四十一岁的堂·萨尔瓦多·达利·依·库西到庭了，目的是在户籍簿上登记一名孩子的出生。为此，他申报如下：

前述孩子于今年5月12H8时45分诞生在蒙图里奥尔街20号，我们将给他取名萨尔瓦多·菲利普和亚辛多，他是申报人及其配偶巴塞罗那人、三十岁的堂娜·菲利帕·多姆·多门耐克（她亦住在蒙图里奥尔街20号）的合法儿子。其祖父为唐·加洛·达利·维纳，生于卡达凯斯，现已去世；其祖母为堂娜·特列莎·库西·马尔科斯，生于罗萨。其外祖父为堂·盎斯尔摩·多门耐克·塞拉，生于巴塞罗那；其外祖母为堂娜·马利亚·弗列斯·萨杜尔耐，生于巴塞罗那。证人是家住本市卡尔扎达·德·罗斯·蒙热斯20号的皮革商堂·霍塞·梅尔卡德尔，生于热罗纳省拉—比斯巴尔；以及家住本市贝列拉达街5号的音乐家堂·爱米里奥·白格，生于费格拉斯；上述二人均已成年。

所有的钟都敲得多么响亮啊！那弯腰在田野劳作的农夫，把他那像是被北风吹歪的橄榄树的后背挺得那么直，他以多么高贵的沉思态度把脸颊埋在满是老茧的手中……

看哪！萨尔瓦多·达利刚刚诞生了。风停息了，天空万里无云。地中海一平如镜，在它光滑的如鱼背脊上，能看到像鳞片那样闪耀的太阳的七彩光芒。它们的时间不多了，这太好了，因为萨尔瓦多·达利不再想要它们了。

正是在一个相似的清晨，希腊人和腓尼基人在罗萨海湾和盎浦利亚海湾登陆，定居在世界上风景最凝固最客观的盎浦尔当平原中部，以便在那儿准备我诞生的文明之床和那些特有的戏剧性铺盖。

克鲁斯海岬的渔夫也把桨放在桨柄架上，让它们静静地呆在那儿，水从上面滴下来，他把嘴嚼多次的雪茄头吐到海里，同时用卷起的袖子擦去早就挂在眼角的一滴喜悦的泪珠。他多么认真地朝我这边凝望啊！

而纳尔西斯·蒙图里奥尔，你也向我抬起你蒙胧的灰眼睛。看哪！你也没看到什么吗？你们大家，也没看到什么吗？

在蒙图里奥尔街的一幢住宅里，一位新生儿被父母满怀爱意地整夜守护着。

不幸的是你们大家！你们认真记住我要告诉你们的事情吧！我的死日不会是这样的！

第四章 童年的虚假记忆

我七岁时，父亲决定让我上学。为此，他不得不动用武力，拽着我的手。我大吵大闹，弄得所有商人都走出柜台看我们走过。我的父母成功地教会我两件事：认识字母表上的字母和会写我的姓名。可上了一年的学，他们却发现我完全忘掉了那些极有限教育的初步知识。我没有错。在这个学年内，老师来到教室只是为了在那儿睡觉。这位老师名叫特拉依代尔先生，用卡塔卢尼亚语念他的名字，听起来有点儿像“煎蛋”。他真是个古怪的人，留着分成尖尖两撇的白胡子，胡须很长，他坐下去时，两撇胡须就垂过了膝盖。这副乳白色的胡须，不断被一些黄褐色的斑点弄得脏兮兮的，那些斑点就像染在吸烟者手指上的那样，偶尔，也像染在钢琴键上的那样，尽管钢琴并不吸烟。

特拉依代尔先生也不吸烟。这会妨碍他睡觉。作为补偿，当他每次短暂苏醒时，他就拿出一种很凶的烟草，这种烟草使他的全部灵魂都喷到了一块沾满赭色斑点的大手帕里。他难得一换这块手帕。特拉依代尔先生很像一位混杂了列奥纳多成分的托尔斯泰。他那双浅蓝色眼睛，让人猜想到无穷无尽的梦，无疑还有大量的诗意。他穿戴得很糟，头上戴一顶在当地极罕见的大礼帽，浑身散发着强烈的臭味。然而，他那聪明人的名声使他不受到伤害。每个星期天，他去郊外游览，回来时，他的小车总是满载着哥特式雕塑和柱头，这都是他在教堂里偷的或是廉价买的。有一天，他发现了嵌在一座钟楼上的一个罗马式柱头，他特别喜欢这个柱头，设法在夜晚去拆卸它。可是他挖墙挖得太过分了，使钟楼倒塌下来，两只钟落在邻近的一所住宅上。钟把屋顶砸了个洞，结果这家人以及全村人都被惊醒了。特拉依代尔先生只有在飞落的碎石块下匆匆逃跑的功夫了。如果说费格拉斯的居民曾有点儿被他感动的话，那么这件事就立即成为了这位教师的光荣，从此他被当成为爱艺术而献身的人了。这些探索的最积极成果，就是特拉依代尔先生在市郊建起了座非常俗气的别墅，他把在当地劫掠的所有宝物都痛快地堆集在这里。

我父亲之所以为我选择了一所有特拉依代尔先生这么特殊的教师的学校，这是因为他是一位具有自由思想的卡塔卢尼亚人，是一位富于情感的巴塞罗那人的儿子、霍塞·盎斯尔摩·克拉维合唱队的成员、弗列尔案件的狂热者，他把不让我受修士指导当成一个原则问题；由于我们的身份，通常我必须到修士会去。于是他决定把我送到市立小学，这被视为一件真正的怪事。谁都毫不了解特拉依代尔先生的教学才能，因为除了穷人，谁也不把自己的孩子托付给他。就这样，我与费格拉斯最贫穷的孩子们一起度过了我学校的第一个年头。这件事对我天生的狂妄自大倾向的发展是十分重要的。处在围绕着我的那群破衣烂衫的小淘气中间，我这个富人的孩子，怎么能不认为自己是完全特殊的、珍贵的和优美的呢？我是唯一随身带着装有热巧克力的保温瓶的人，这只保温瓶用一个绣有我姓名开头字母的套子包着。只要略擦破点儿皮，就会有人用一条洁白的绷带包扎我的膝盖或手。我穿着一套袖子上绣有金色标志的水手服。我精心梳理的头发总是洒着香水，孩子们轮流走近我，来闻我的头。我总是唯一能炫耀擦得锃亮的皮鞋和银光闪闪钮扣的人，我丢掉它们时，我那群叫化子同学就会为争夺它们打得头破血流。我既不跟他们玩，也不跟他们讲话，而且他们本身也这么对待我，他们只会怀着不信

任的态度走近我，从近处欣赏一条带花的手帕或我新的银头软竹手杖。

在这所可怜的小学度过的一年间，我能做什么？我安静而又孤独，四周的孩子们玩耍、打架、喊叫、哭泣、欢笑，贪婪地生活着，我距他们太远了，面对令他们激动的这种行动的需要无法有丝毫表示！我宁愿迎面走上去。我每天都忘掉一样东西。我欣赏这些聪明的、手指灵巧的捣蛋鬼，他们会修他们的文具盒，用一片折纸做成许多形象。他们那么灵巧地结上或打他们廉价帆布鞋的带子，可我却会因不懂如何转动门把手，整个下午关在房间里。我在任何一所房子里都会迷失方向，就连在那些最熟悉的住宅里也是如此。我从不能自己脱掉海军衫，而在一些难得的场合，我忍不住试着自己脱时，我这种完全的首创精神就有可能把我闷死。全部实践活动都是我的敌人，日复一日，各种外部世界的对象变得愈加可怕了。

特拉依代尔先生本人，越来越接近植物人了，他陷入睡了又睡的状态。他的梦有时仿佛在摇动他，一会儿像芦苇般轻柔，一会儿像树干般笨重。那些短暂的苏醒，使他能闻鼻烟、打喷嚏、把吵醒他的小顽童耳朵揪出血来。那么我在这空洞的一年又干些什么呢？只有一件事，而且是一件我怀着顽强精神干的事，这就是制造一些“虚假记忆”。真记忆和假记忆的不同之处与珠宝的情况相似；假的显得更真更光彩夺目。早在这个时期，我就爱怀着焦虑的心情回忆一个成为我最初虚假记忆的景象。我凝视着一个裸体的小孩，有人正在给他洗澡。我对这孩子的性别并不关心，可我在他一片屁股蛋上看到了一堆蚂蚁，它们在一处桔子般大小的坑里爬来爬去。这个孩子被翻过来调过去，因而有一阵子他是仰卧着的，我想那些蚂蚁会被压碎了。但是这个孩子重又站起来时，我再看不到蚂蚁了。那个坑也消失了。这个虚假记忆极为清晰，虽然我无法确定它的年代。

七八岁时，我生活在幻梦和神话中。后来，我无法把现实与想象区分开。我的记忆把真的和假的融为一个整体，只有对某些极为荒谬的事件进行客观考证才能区分它们。因此，当我的一个记忆发生在俄国时，我不难把它归入假的那类，因为我从没到过俄国。

关于俄国的那些最初的形象，是特拉依代尔先生提供给我的。

所谓的学习日程结束了，我们的老师有时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很长时间，在那些留存着我大量记忆的地方中，我心里一直把这个地方看成是最神秘的地方。浮士德工作的房间想必与这个古怪的房间差不多。在一个大书柜的搁板上，一大堆怪诞而又神秘的东西，与布满灰尘的厚厚卷册交替摆放着，它们激起了我的愤怒和爱虚构的毛病。特拉依代尔先生让我坐在他膝上，笨拙地抚摸我细腻光润的下巴，用大拇指和食指捏它，他沾染着颜色并有股臭味的手，就像被太阳晒得发皱变温、有点儿坏了的土豆一样粗糙。

特拉依代尔先生开始跟我讲话时总是这么说：“现在我要给你看看你从没见过的东西。”于是他走掉了，回来时带着一串大念珠，他只能勉强把它挂在肩上，他把它拖在身后，弄出一种可怕的声响。他补充道：“我的妻子（愿上帝保佑她！）恳求我到圣地旅行时给她带回一串念珠来。我给她买了这串世界上最大的念珠，这是用橄榄山上的树木切削成的。”特拉依代尔先生暗暗地笑了。

另一次，他从一个内部衬着石榴红色天鹅绒的大桃花心木盒子里拿出一尊闪闪发光的红色梅菲斯脱费尔小雕像，点燃一个形似魔鬼挥舞的三叉戟的精巧装置，一束焰火升到了天花板，这时，他在黑暗中捋着白胡须，像慈父

那样欣赏我惊叹的表情。

在他的房间里，用一根线吊着一只枯瘦的青蛙，他一会儿把它称作 *La meva pubilla*，一会儿把它称作“我的舞女”，他喜欢重复说只要他看它一下就能预测天气的变化。青蛙的姿势每天在变化。我非常怕它，然而却不能抗拒那支配我的诱惑，我忍不住去接近这个怪物。除了大念珠、梅菲斯脱费尔和青蛙晴雨计外，特拉依代尔先生的房间里还藏着大量我不知道的东西，它们可能是物理实验的仪器，不过它们精确而又合理的形状让我害怕。最美妙的吸引力存在于一种视觉戏剧中，我童年最有力的错觉就归功于它。我不明白它恰恰符合什么：在我的记忆中，人们好像是通过一个立体镜或一个依次染上彩虹的全部色调的小箱来看这种戏剧的。在我看来，那些形象就像是从后面照亮的一组组细点子，它们活动的图画让人梦想到将入睡时的幻影，这些幻影是从头一觉中产生出来的。不论我这方面的种种记忆的精确程度如何，可正是在特拉依代尔先生的视觉戏剧中，我首次看到了那位俄国少女震撼心灵的影像。我感到她穿着白色毛皮大衣，坐在三套马车的内部，一群眼睛闪着磷光的狼追赶青这套马车。她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表情里有种吓人的高傲，让我心情沉重。她的鼻孔与她的眼睛一样有生气，这赋予了她一种森林间小动物的样子。这种活泼的生气同面孔的其他部分形成鲜明的对比，使她具有了与拉斐尔笔下的圣母相似的和谐特征，是加拉吗？我确信这就是加拉了。

在特拉依代尔先生的戏剧中，还展现着一幅幅俄国城市的景象，这些城市的圆屋顶在白鼯的风景中闪闪发光，我觉得我的双眼“听到了”在每一片飘落的雪花之下，所有东方珍贵的火焰在劈啪作响。这个遥远的白色国家的景象，配合着我对“绝对奇异的事物”的需求，它在我身上具有了越来越重的分量 and 越来越大的实在性，终于把那些日益失掉重量的费格拉斯街道都抹掉了。

下雪了，我第一次目睹了这种景色。我觉得费格拉斯及邻近的乡村被一块完美的裹尸布包了起来。由于它，平凡的现实终于像在我的一声命令下被掩埋掉了。我不感到吃惊，而是陶醉在这一派宁静之中。我看到了在一种不停的活跃梦幻中会随之而来的最为美妙动人的事件，我只有在讲述它们时才又重见了它们。

大约在上午过了一半时，雪停了。我离开结上一层霜的玻璃窗；刚才为了不错过一星半点这个场面，我一直把鼻子贴在玻璃窗上。母亲带我和妹妹去散步。踏在雪上，每一步都发出声响，我觉得这就像奇迹一样，别人已把完美无瑕的白雪弄脏了，我感到懊恼，我希望它只属于我一个人。

我们走出城市，白色变得纯净了。穿过一片小树林，我们来到一处林间空地，我一动不动地呆立在这个雪景前。不过让我停留下来的，主要是一个小小的圆棕色物体，它恰恰就在空地的中央，它是一颗法国梧桐球，它掉下来时，一定是微微裂开了，因为从我看它的地方，我辨认出一点点它内部的黄色茸毛。太阳恰好选择这个时刻从两块云间显露出来，一下子照亮了这块地方，法国梧桐球在雪地上投下一块蓝色的影子，那黄色茸毛仿佛变得热情并充满生气了。我被弄花的眼睛里含着泪水。我小心翼翼地走近它，拾起这个碰伤的小球，怀着温情吻它的伤口，并对妹妹说：

“我找到了一只侏儒猴，可我不想给你看。”

我觉得它在我手帕里动弹着！一种无法抗拒的召唤把我引向那处“已发现的泉水”，我用惯有的专横态度坚持要散步到这个地方来。距那儿不远，母亲遇到了一些朋友，她对我说：

“到泉水那儿玩去吧！可千万别出事。我在这儿等你。”

那些朋友在一条掸掉积雪的石头长凳上给我母亲让了块地方。可石头仍然是潮湿的，我极为蔑视地看着这伙人，她们竟敢向我母亲提供这样一个座位，我只能想象给她提供最优越的舒适环境。不过，母亲借口要站着更好地监督我，拒绝坐在那儿，这让我放心了。于是我走下那些台阶，转向右方的那处已发现的泉水。她就在这儿！她本人，我在特拉依代尔先生的神奇戏剧中看到的那位俄国少女，就在这儿。我把她称作加露琪卡，这是我妻子的爱称，我是那么深地信赖这个称呼，我整个爱情生活中的同一女性形象永远与它联系在一起。加露琪卡在这儿，面对着我，就像她坐在雪橇中那样地坐在一条长凳上。她似乎很久一直在观察我，我蓦地一惊，因为我的心跳得那么厉害，我真怕会把它吐出来。在我手里，手帕下的那颗小球开始像活物一样动了起来。

母亲看到我走回来，注意到我心烦意乱，对她的朋友们喊道：

“瞧他多任性！他不停地要我们去已发现的泉水那儿，而现在我们到了这儿，他却不再想去那儿了。”

我答道我忘了手帕，看到她打量着我拿在手帕，我忙补充说：

“我用这条手帕包我的猴子，我得有另一条擦鼻涕的手帕。”

母亲用她的手帕给我擦了鼻涕，于是我又出发了。但这次我绕了个弯，走到泉水的另一边。用这种方式，我就能从背后看加露琪卡了，同时并不让她发觉我。我必须穿过一处荆棘丛，母亲又一次喊道：“他一定要做跟大家不同的事，下台阶对他来说太容易了。”我爬到一座小山坡的高处，事实上我看到了背面的加露琪卡，她的真实存在令我放心，因为当时我实际上不再认为能在现场发现她了。她一动不动的背影使我呆住了，可我却并没后退，我跪在雪地上，躲藏在一棵老橄榄树干的后面。我相信度过了无限的时间：在没有任何感觉和思想的彻底空虚状态下，我像圣经中描述的那样，变得呆若木鸡了。如果说我的精神是一派空茫的话，那么与此相反，我却极为敏锐地看到和听到了一切。有个男人来到泉水处灌了一罐水，我听见满溢出水罐的水的碰溅声。于是，魔法结束了。停滞的时间重又开始了它的历程。我站起来，感到克服了全部的胆怯。我的膝部冻僵了，我再也觉不出它们的存在。无法知道那种令我沉醉的轻快感是来自我爱情的暴露还是来自我膝盖的麻木。我受到一个明确念头的控制：我就要接近加露琪卡并要用全力搂住她的脖子；可代替实现这一欲望，我转而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刀，决定把法国梧桐球坏掉的部分全都削去，只剩下那些细细的茸毛，我将把它送给加露琪卡。

这位令人崇拜的小姑娘已经站起身来，她跑向泉水，去灌她那个小小的水罐，而我还没动手切削呐。我匆忙行动起来，想把我的礼物原样放在凳子上的一张报纸上留给她。可是，一种致命的羞愧感左右着我，我把这个小球藏在报纸下面了。我浑身颤抖，极度不安：她会回来坐在那张掩盖着我的小球的报纸上吗？母亲来找我了，她喊了我好几分钟，而我却没听到。她怕我着凉，用一条大披肩裹住我的脖子和胸膛。她感到害怕，因为我试图讲话时牙齿碰得咯咯响，我是属于她的；尽管我非常不愿离开这些地方，但我变得麻木、顺从了……

我心爱的小球的故事不过刚刚开始。关于围绕着我跟这个我妄想的护符新相会展开的各种富于戏剧性的令人惊愕的情况，请耐心听我讲述吧，这是值得的啊！

雪消失了。因它而改观的费格拉斯和风景像是中了魔法一样。三天过去了，在这期间我没去上学。我继续做我的白日梦。在经历过这么多难以承受的奇遇之后，当我重又回到特拉依代尔先生的令人厌倦的课堂时，我体验到一种宽慰的感情。同时，重返现实使我不适应。我的忧伤将慢慢愈合。失掉我的小球和侏儒猴令我难过，我得用凝望我们学校肮脏的天花板来安慰自己。一些潮湿的大块斑痕让我想到了云朵，随后是由一个很明确的人引发的各种更具体的形象。我随时随刻都在重新发现和构造着那些头天看到的形象，并使那些幻觉更完善。它们中的一个一旦变得太明确了，我便立即放弃它。这种现象（注定要在后来成为我未来美学的关键）的令人惊异之处，就存在于下述事实中，即我总能根据自己的意愿重见其中的一个形象，重见的不仅是它最后的形状，而且是被扩展和调整得十分完善的形状，使它仿佛是自然而然产生的。

加露琪卡的雪橇变成了一座遍布圆屋顶的俄国城市全景图，接着又变成了一副长着胡子的昏昏欲睡的面孔——特拉依代尔先生的面孔，这次轮到这副面孔变成一群饥饿的狼，它们正在一处林间空地展开残酷的撕杀。这一切就好像我的头脑是一架真正的电影放映机，由于它在我身上发生的一切，通过我本人的被照花的双眼，变成了外界能看到的東西。一天，我比往常更出神地凝望着，我感到有两只手放在了我的肩头，我跳了起来，在不恰当地欲言又止的情况下，发出一阵有益健康的咳嗽，它能为我通红的脸孔打掩护。我认出了以这样的方式出现在我面前的孩子就是布特查卡斯这个人。

他显然比我高大，人们称他卡特查卡斯，在卡塔卢尼亚语中，布特查卡斯就是口袋的意思，这是由于他那奇装异服上有大量不寻常的口袋。很久以来，我把他当成所有人中最漂亮的人，我只敢偷偷地看他，每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血管里的血液就凝住了。无疑，我爱上了他，因为没有别的原因能解释他的在场给我带来的心绪不宁，一些时候以来，在我的梦中，由于他的形象一会儿与加露琪卡混淆起来，一会儿又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物，他的形象不那么占优势了。

我再也听不懂布特查卡斯跟我讲什么。我就要失去知觉时，我的耳朵只听到一种美妙的耳鸣声，它把我与世上的一切嘈杂声响分隔开。我能肯定的就是布特查卡斯马上成了我唯一的朋友，以及我们每次分别时都要久久地亲吻。我觉得他是唯一能知道我侏儒猴秘密的人。他相信了或是装作相信了我的故事。我们好几次在傍晚去“已发现的泉水”，试图重新“捕捉”我的侏儒猴、我心爱的小球；在此期间，我的想象力把一个生命的所有品质赋予了它。

布特查卡斯一头金发（我把他的一根头发带回家，这是真正的金丝，我精心地把它珍藏在一本书中）。他的蓝眼睛和粉红色皮肤，同我的忧虑的而又暗淡的黄褐色皮肤形成鲜明对比，在我的肤色之上，仿佛笼罩着已杀死了我哥哥的脑膜炎这只鸟儿隐隐约约的阴影。

我觉得布特查卡斯像少女一样美丽，尽管他的膝盖粗大，他的屁股紧贴在过窄的长裤里。然而，一种无法克制的好奇心驱使我盯着那些紧绷绷的长

裤看，每次，随着一个突然的动作，它们好像就要裂开了。一天夜里，我向布特查卡斯吐露了我对加露琪卡的感情。我高兴地发现他不仅没有妒忌，而且还答应像我一样爱我的小球和加露琪卡，我们温柔地拥抱在一起，不停地谈着这些梦幻的造物。然而，我们把接吻留到分别的那一刻。我们怀着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感情等待这美妙的时刻。对我来说，布特查卡斯就是一切，我把那些最宝贵的玩具送给他。他越来越贪婪地把它们收集起来。当我再也没有什么玩具时，我开始劫掠各种物品：父亲的烟斗和纪念章、瓷制的金丝雀，最后还有我觉得非常美妙和富于诗意的一个彩陶大汤盆。

布特查卡斯的母亲当然会发现这件有点太显眼的礼物，她把汤盆带给我母亲，母亲一下子找到了家中丢掉那么多东西的线索，而这种情况原来谁也猜不透。我觉得非常倒霉，热泪滚滚，哭诉道：“我爱布特查卡斯，我爱布特查卡斯。”我母亲总是犹如天使，她竭尽全力安慰我，并给我买了一本豪华的纪念册，我们在它里面贴了许多一次完成的移印画，把它送给我的心上人布特查卡斯。

但是，由于有些时间没见到我，这种见面的重要性减少了，它不再吸引布特查卡斯。他开始同别的孩子一起玩耍，在这纷乱的游戏期间，他只给我留下短暂的时刻。充满着活力，他仿佛把我引进了一种疯狂的旋风中，这旋风使我每天都远离我这位牧歌般的心上人。有一天晚上，我声称找到了我的小球、我的侏儒猴！我巴望用这计策使他重新对我发生兴趣！事实上，他尽全力坚持要我给他看我的猴子，并伴我走到我们家门口。我们躲在一处楼梯门后。天已经黑了，我怀着惶惶不安的小心态度，从手帕里拿出一颗在树林间捡到的法国梧桐球。布特查卡斯突然从我手中抢过小球和手帕，他走到街上，捏着小球的梗，倒悬着让我看并嘲笑着我，随后把它抛向空中。我都没跑过去捡它，因为这并非我“真正的”小球。

布特查卡斯朝向这边的空中吐了几口唾沫，接着就走掉了。他变成了我的敌人。我想说点儿什么，但又忍住了，回到我的房间，躲在那儿尽情地大哭了一场。让他等着瞧吧！

我相信我生活在俄国，虽然这回没看到大雪覆盖着这个国家，这或许是夏季的一个炎热午后。一些男人在浇灌一座大公园的林荫道。一群风度优美的人（主要是女性）缓缓地来到林荫道的两侧。在一处仿佛是用宝石筑成的平台上，军乐队正试奏着乐器。那些铜管乐器发出了反光，就像乡村弥撒的圣体显供台的反光那样耀眼。这些声响洪亮的准备工作，引起了一种焦急的期待。

从我这方面说，处在这个场面发生时的那种年纪，焦急之情总是以排尿的欲望来体现的；终于把黄昏撕成血红色碎片的双步舞曲响起最初一些节拍时，这种欲望就会爆发出来。同时，一滴无法控制的泪水，像弄湿我长裤的小瀑布一样热烘烘的，烫着我的眼角。就在这天，这种极端的感受加倍地出现着，因为我突然发现加露琪卡在场，她站在椅子上，为了更好地观看游行队伍的到来。我确信她也看到了我，我立即躲到一位高高大大的奶妈身后，她给我提供了一处避开加露琪卡无法抵抗的目光的隐蔽所。这次意外的相会，使我昏头转向。我周围的一切仿佛都消融了，我不得不把头靠在这位成为我欲望护墙的奶妈背上，我闭上双眼，再睁开时，我只看到一位裸臂夫人把一杯巧克力送到嘴边的景象。笼罩着我的那种失神和虚无的奇怪感觉极大

地增强了我视觉的敏锐力，这位夫人的手臂以难以置信的清晰明确向我显示了它的种种细节。一切都具有了一种颠狂的具体性。

我越来越缩在这位奶妈的后背那儿，她的呼吸节奏，使我想到卡达凯斯的荒凉海滩。我只想着一件事：天黑下来吧！快点黑下来吧！我在昏暗中将不再觉得拘束，我就能注视加露琪卡，而她却不会看到我脸红。可每当我的眼光转向她时，我就会注意到她牢牢地盯着我。她的眼神是这么有力，粗壮的奶妈的后背一下子变薄了，如同刚刚在它上面开了一个真正的窗子，把我毫不留情地暴露在那毁灭性的眼神之下。幻觉这么快地变化着，我真地在奶妈背上看到了一个窗子。然而，它并没有开向人群和加露琪卡，而是开向一处荒凉的大海滩，落日犯罪般的忧郁光线照亮着这处海滩。

突然回到现实时，我被一个可怕的景象吓坏了。我面前再也没有奶妈了。在她的位置上，游行队伍中的一匹马刚刚滑倒在地上。我赶忙躲开，紧靠着墙壁，才没被它踩到。马的每一次抽搐，都让我担心会被它的蹄子踏烂。它拖着的那辆马车的一根车辕插进了它的肋部，一股浓稠的血迸射出来，周围的一切都被溅上了血迹。两名士兵冲向这头牲口，一位按住它的头，另一位用双手将一把小刀刺入它额头正中央。一阵临终的痉挛后，这匹马一动不动了，一条僵直的腿指向天空中最初的星星。

从林荫道的另一侧，加露琪卡向我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她挥动着一个棕色的小物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奇迹，可这的确是真实的啊！我那遗失在泉水处的珍贵小球找回来了！我羞愧地垂下眼睛。我陷入难以忍受的困惑中，我觉得只有完成一件英雄的、完全不可理解的行动，才能摆脱掉这种困惑。我走向马头，用我全部的心灵吻着从它那翻起的嘴唇中露出的牙齿。随后，越过这匹动物，我向加露琪卡跑去，来到距她一米远的地方。但是，新发作的胆怯使我僵住了，我转回身，溜进人群中。这回，加露琪卡向我走过来，我无法再后退，于是把头埋在水手领内，我确信要被衣领上浸透的紫罗兰香水的浓烈气味闷死了。一股反叛的气息冲着我的头脑；加露琪卡轻轻触着我的衣服。我狠狠地踢了她一脚，她发出了一声悲叫，双手伸向膝盖。她一瘸一拐地走开了，坐到公园的另一端，在最后一排椅子和一堵爬满常春藤的墙壁之间。我们现在面对面坐在那儿，冰凉光滑的膝盖紧紧贴在一起，弄得它们都发痛了。我们呼吸急促，说不出话来。

从我们呆着的地方，一条长长的斜坡向远方伸去，同上方的一条小路联在了一起。一些带着滑板的孩子步行登上这处斜坡，在一派可怕的撞击声中，令人头晕目眩地从上面滑下来。当在这伙又喊又叫的顽童中发现了布特查卡斯流淌着汗水的通红面孔时，我真没不愉快！我觉得他很丑，向他投去仇恨的目光。我在他眼睛里也看到了同样的表情。他挥动一个滑板，把它重重地砸向我的椅子，同时连声喊叫着，并像个流氓似地大笑起来。我和加露琪卡一起，试着躲在墙壁和一棵高大的法同梧桐中间，这样，她避开了可能遭到的打击，可我本人仍旧处在易受这个疯子暴行伤害的状况下，每一次滑下来时，这个疯子都发狂地试图砸我。这种断断续续向我们猛扑来的危险，使我们俩独处的时刻显得分外美妙。一种无法解说清楚的相通之感建立了起来。各种最不同的感情诞生并死在我们灵魂的人口处。布特查卡斯的每一次新攻击，只不过是增强着我们心醉状态中的纯洁和热情，也增加着我们美妙的痛苦的危险。加露琪卡开始摆弄戴在她颈上的~条精美项链，她仿佛想用这种多情而又调皮的妩媚姿态，向我指明某种珍贵的事物是同困境紧密相联

的。

实际上，从她的上衣里慢慢地显露出了我还没见过但却希望见到的一件东西，我的眼睛盯在她袒露出的胸肩那柔嫩的雪白皮肤上，然而，加露滇卡装作让那条小项链滑落下去，那件东西重又像蛇一样灵敏地藏了起来。她重又开始玩她的小游戏，把小项链叼在牙齿间，仰起头来，以便重新展示那件东西。

“闭上眼睛！”

我服从了，因为我已经知道重新睁开眼睛时会看到的是什么，那是我珍贵的小球、我的侏儒猴啊！但是，一旦我流露出想拿它的样子，加露滇卡马上就把它藏回她的上衣内。

“闭上眼睛吧。”

我又服从了，眼睛闭得都发疼了。这时，加露淇卡拉起我一只手，坚决地把它轻轻引向她那件与细嫩肌肤相触的上衣，一个扣子蹦开了，我那只麻木的手笨拙地在温润的胸脯上移动。我终于抓住了一把灼热的纪念章，我在它们中间分辨出让人强烈向往的小球粗糙的存在。我还来不及享受我的幸福，布待查卡斯滑板的有力一击，把我们打倒了。我发现自己趴在了地上。受到这一击打，小项链断开了，我借机装做在椅子下面寻找小球和那些纪念章。加露琪卡的目光，使我明白了她没上我的当，我把藏在水手服领带褶皱里的宝贝交还给她。加露琪卡离开我，坐到一棵法国梧桐旁边，以一种仍然带有十分纯真的母性温柔的调皮姿势抚摸着这个小球。

这么多激情把我弄昏了，我靠在椅子上一动不动，椅子上堆满了两位十分漂亮的夫人的衣服，她们坐在我旁边，由一位向她们献殷勤的军人陪伴着，不时发出一阵阵欢笑。另一把椅子上，放着这名军人的红斗篷和佩剑，闪闪发光的剑柄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的脑海里掠过一个凶狠的复仇想法，谁也不能阻止我进行凶杀，在无可挽回的冷酷判决控制下，我的心中没有任何别的感情了，我平静地转向斜坡的高处，布特查卡斯身后拖着滑板正向那儿攀登。我无声地把手伸向出鞘的剑柄，一把闪光的利刃！冲上去！布特查卡斯将受到可怕的惩罚……

为了进行凶杀，我必须以十分快捷的动作悄悄行事，只有我那复仇的激情和妒忌之心才能做到这一点。实际上，我应该抽出剑后随即把它藏在衣服下面。这第一步行动特别要不让会受惊的加露琪卡发现。她是我会向其泄露残酷打算的最后一人。可她的眼睛从没离开过我。我抽出剑后，我还应当把它悄悄塞在那两把椅子间，这要恰好在登上滑板的布特查卡斯像流星一样猛撞向我们的那一刻。由于天差不多全黑了，他不会及时发现这把剑，于是就会受到致命的伤害。

我应当预先分散追寻我每一动作的加露琪卡的注意力。于是我假装爬向她去抢夺小球。我那坚决的姿势让她吃惊，她在我们之间放了一把椅子，我把头塞进了椅子的横档中，我马上就感到自己成了这个陷阱中的囚徒。我们谁也不动、相互在昏暗中对视着，这种昏暗掩盖了她面孔的细节、她微笑的酒窝、她肘部和膝盖的小窝。在远处，军乐声微弱了，一只猫头鹰孤零零地持续歌唱取代了它。加露琪卡借口给我看小球，把她的上衣全解开了。披散的头发盖住了她那嘴角上闪耀着一点唾沫星的面孔。我想接近她的各种努力，只使我卡在椅脚横档间，拖着椅子朝她那边挪动了几厘米。束缚在这个陷阱中，我的两胁受了伤。加露琪卡带着动人的温柔，把小球送到我嘴边，

接着又小心地把它收回去。我被卡住的尾骨痛得很厉害，加露琪卡又把小球送过来，可又非常残忍地把它拿走了，我为此流出了泪水。她差不多纹丝不动地呆在那儿，她那被染成金黄色的、神圣的椭圆形面孔上，只有调皮的微笑。然而，我看到这微笑极迅速地消失了，只有能观察到花朵瞬间即逝的生命的高速电影放映机能同它相比。我愤怒地前进着，最终会咬到藏着我的小球的那一把纪念品的欲望完全把我弄得发狂了。加露琪卡把这珍贵的东西贴在我贪婪的嘴上，在尝到纪念品中小刀的味道同时，我也尝到了我自己受伤牙龈的金属般的涩味。

布特查卡斯正好选择这个时刻向我猛撞过来。我的头猛地被抛向地面，砂石把我的脸颊擦破了。我痛苦地喊叫着，朝我的敌人抬起头来，他那因妒忌涨得通红的面孔，像鸡冠一样难看。他后退着闪开身子，重又向斜坡攀登。但他改变了主意，回来踢了我一脚。加露琪卡也被我的椅子撞了一下，倒在离我一米远的地方。她的额头上出现了一块血迹，呆呆地望着我。她那双半开的腿，不知羞耻地摊在那儿，我第一次发现她没穿长裤。像梦一般，一片柔和的暗影淹没了她那混淆在裙子的深黑色中的大腿根。尽管她的身体消失在一团黑暗中，我仍然能依稀感到她里面是完全裸露的。她朝我微笑，我站了起来。这回，我的复仇不可动摇了。在我们旁边，那名军人同两位夫人聊着天，丝毫没注意我们。多亏了隔开我们的一棵法国梧桐，没有人能看到我抽出剑来。用一条手帕缠住手，好使它不受伤，我将这把剑藏在背后，用鸭舌帽盖住闪光的剑柄头。第一步行动成功了，我把这雪亮的兵器偷偷放在衣服下，以便在恰当的时刻照我的心愿把它对准布特查卡斯滑下来的方向。

我这些准备工作还没全干完。我默默地计算着布特查卡斯牺牲的各种细节。我应该加强我充满爱情的目光的力量，让加露琪卡能呆在原地不动。在受到那一击后，她一直像怕冷似地蹲在那儿，我让她不动的方式使她瘫痪了，我一秒一秒地感到成为了她至高无上的主人。

留给我的只是不移动我的剑，等待布特查卡斯下一次滑过来。完全出乎意料，他来了，这次没想撞击我，他从滑板上下来，不敢注视我，走过来问道：

“她在哪儿？”

我没回答，他很理解这种情况，绕过法国梧桐，他姿势笨拙地站在那儿不动了，久久地凝视着加露琪卡，加露琪卡仿佛没看到他，只是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的眼睛。

“如果你把达利的侏儒猴给我看看，我就不再那么干了。”他对加露琪卡说。

她打着寒战，紧紧地把我珍贵的小球贴在胸口上。

他再次说道：“我们一起玩吧。”

“玩什么？”

我的回答使他相信我原谅了他。他怀着一种令人讨厌的感激之情注视着我。

“我们玩小偷与国民卫队的游戏吧。”

“很好，我们玩吧。”

我们握着手，但我永远用左手抓着剑柄头。

他问道：“由谁开始？”

“我们两人中个子高的那位。”

他一下子就同意了，因为他知道自己个头高。

我们靠着法国梧桐树干，量出两个标记，他赢了。该我和加露琪卡藏起来了，他登上斜坡，给我们留出必要的时间。一旦到了高处，他应当尽快用滑板滑下来。迎合着他的自尊心，我坚持他要这么做。布特查卡斯走上斜坡，我注意到他用不雅观的步子登上去，极瘦的长裤紧绷住他的屁股，渐渐地，我感到我的良心又恢复了平静（因他那种假和好引起的内疚感，曾刺激着我的良心），我赶紧校正我血腥计划的最后一些细节。布特查卡斯的身高标记留在了法国梧桐树上，因而我能算出剑刺入他咽喉的确切位置。我把那些椅子放稳，它们将成为我武器的支点。

“布特查卡斯就要下来了。”我对加露琪卡说。

她走到我身边，迫使我停止那些准备工作。为了转移她的目光，我请她盯住布特查卡斯，布特查卡斯已经准备从那边的高处下来了。我温柔地把她紧紧抱住，并用那只自由的手臂，几乎不动地准备好那把剑。在夜色中，勉强能看到这把兵器，它闪耀着正义之神的全部冷冰无情的高贵光彩。布特查卡斯滑板全速前冲的撞击声已经响了起来，快逃吧！

我们混杂地奔向那群散步者，就像盲目的蝴蝶一样在不情愿地慢慢散开的人流中撞来撞去。一首双步舞曲的最后几小节在夜幕里沉寂下去。我们停在了我看到那匹马立即死亡的地方。在人行道上，一大滩血迹勾勒出一只展翅飞翔的黑鸟的形象。天气突然非常冷了，我们身上的汗水让我们发起抖来。我们浑身是土，脏得要命。我们的衣衫褴褛不堪。我擦伤的脸颊，伤口痛得灼人，使我的心狂跳。我抚摸着布满肿块的头，这些肿块让我感到一种惬意的忧伤。加露琪卡面无血色。她前额上的那块血迹犹如淡紫色的光环。

那么布特查卡斯呢？他的血在哪儿？我闭上了眼睛。

第五章 童年的真实记忆

我闭上了眼睛，在记忆中寻找那以最自发和最直观的方式显示给我的事物。我看到……我看到两棵柏树，两棵与我高度差不多的大柏树。不过左边那棵略矮一些，它的树冠向另一棵倾斜过去。另一棵则与它相反，就像字母 I 一样直立着。费格拉斯修士会学校继承了特拉依代尔先生有害的教学经验，我从该校一班教室的窗户里看到它的这两棵柏树。

这扇框住我视野的窗户只在下午打开，可从这一刻起，我就全身心地投入到观看活动中。我追寻着落在这两棵树上光与影的脚步，恰好在日落前，右侧柏树尖尖的顶端显出一种暗红色的光彩，就仿佛浸在酒中一样，而左侧的那棵柏树，则完全被阴影笼罩住，只不过是一大团黑色块而已。晚祷的钟一下又一下地敲响了，全班同学站起来，齐声重复着合掌的修士会长低声念诵的祈祷经。在午后的天空中，柏树如同两只慢慢烧尽的大蜡烛，是唯一让我能感觉到上课时间过去多少的东西。因为就像在特拉依代尔先生那儿一样，我经常在这个新班级中缺席，唯一不同的就是从此我必须同修士会成员的良好意愿做斗争，他们热忱地，有时甚至是残忍地试图吸引我的注意力。但我不希望有人接触我，跟我说话，“打扰”出现在我头脑中的念头。我继续着在特拉依代尔先生处就开始的各种幻想，猜测到它们遇到了危险，我用更大的力量紧抓住它们，我的指甲就像抓住救生圈一样牢牢地抓着它们。

晚祷钟声响过后，柏树没入黄昏的阴影里，虽说它们的影像消失了，可我仍然知道它们呆在什么地方，我继续注视着它们所在的地方。这时，右边通向教室走廊的灯亮了起来，透过玻璃门，我能观察到挂在墙上的那些油画。从我的位置，我只能看到其中的两幅：一幅表现一只狐狸从洞穴中伸出头，嘴里叨着一只死鹅。另一幅是米叶《晚祷》的摹本。

《晚祷》在我心里引起了一些不安，同时也带来了神秘而又微妙的快乐，这种快乐像一把刀的银白锋刃，在我内心的恐慌中闪闪发光。在我等待下课钟声的那些冬日漫长黄昏期间，五名可怕的、崇高的、忠实的卫兵总是保护着我的想象，他们是左边的两棵柏树，右边的《晚祷》中的两个身影，面前的钉在一个黑木十字架上的黄色基督像，它代表上帝，这个黄色基督像就竖立在修士的桌子上。救世主膝盖上有两处可怕的伤痕，它们是用闪光的珐琅惟妙惟肖地仿作出来的，从伤痕处可以看到肌肉下面的骨头。基督的脚很脏，孩子们平日的触摸，使它染上了一种油腻的灰色；因为我们每一个人，吻过要离开的修士会长那满布汗毛的手后，都必须用沾着墨水的黑手指触摸受难耶稣这双带伤脚，然后再划十字。

修士会的修士们注意到我固执地望着柏树。于是，他们给我换了个位置，可毫无效果，我继续越过墙张望，好像我还能看到它们似的。通过这种拚命不失去它们的努力，我的想象终于重建了那已消失的景象。我对自己说：“现在要开始讲授教理了，那么在右侧的柏树上，阴影必定到达那个烧焦后变成棕红色的小洞了，从这个洞中伸出一根干枯的枝条，它上面缠着块破白布。比利牛斯山脉应当变成淡紫色的了。也就是在这一刻，像我几天以来观察到的，远处的维拉伯特朗村的一块窗玻璃会闪闪发亮起来的！”于是，这鲜明的光芒一下子在我脑海中放射出真正宝石的光彩，我的头脑正因为突然禁止我看那珍贵的盎浦当平原而备受折磨。这块平原此后必定要从它那极为稀有

的地质中孕育出达利风景哲学的全部审美观。

人们很快就明白了改变我的位置并不像他们所希望的那么有效。我不留心听课的情况极为顽固地体现出来，他们开始对此感到绝望。在一次晚餐期间，父亲极为沮丧地高声念着我老师们的一份通知书。如果说他们称赞我遵守纪律、文静、在文娱活动中很聪明的话，那么与此相反，他们在结束这份通知书时，却说我受到“使我在学习上完全无法进步的根深蒂固的懒惰心理”的控制。我记得那一夜母亲哭了。在修士会学校的两年，我没学会同学们在这期间生吞下的知识的五分之一，我被迫留级了。我变得经常离群索居，我甚至装作不懂那我尽力以及几乎是不由自主学会了的东西。就这样，我漫不经心地无规律地写着什么，使练习本布满了斑斑墨迹。可我学会了把字写好。一天，有人给了我一册练习本，柔软光滑的纸页激发了我的热忱，动手前的一刻钟，我心跳着，用舌头舔着笔。我写好了一页极精采的字，整洁清楚，使我获得书法一等奖。甚至把我这一页放在玻璃板下。

这突然的显示，在我周围引起一派惊异，它鼓励我走上故弄玄虚和装假的道路。故弄玄虚和装假成为我与社会接触的最初方式。我感到修士就要讯问我，为着逃避，我一下子站了起来，突然把书抛掉；一小时以来，我一直装做读这本书，可实际上我连一行也没看。好像抱着一种不可动摇的决心，我登上长凳，站在上面，随后又跳下来，感到一阵疼痛，我用手臂护着脸，仿佛受到一种危险的威胁。这场哑剧使我获得批准，一个人到花园去散步。回到教室后，有人给我喝了一杯散发着冷杉精气味的热汤药。我的父母，他们无疑对这些幻觉的假象怀有成见，向学校的负责人建议，对我本人增加完全特殊的照料，一种特别的气氛包围着我。不久，人们甚至不再想教给我什么东西了。

他们经常带我去看一位医生，有一天，我气得打碎了他的眼镜。经过飞快地上楼下楼后，我感到真正头昏眼花了。我动不动就会流鼻血，我会定期因咽峡炎而卧床休息。一天的发烧会使我得到带着点微烧的一周休养，于是在我自己的房间里大小便。这之后，为着驱除臭味，点燃了一些亚美尼亚纸和糖。我喜欢得咽峡炎，我焦急地等待着休养的天堂。

我的老奶妈露西娅所有下午都来陪伴我，我祖母有时带一些客人来，她们一起坐在房间的角落里。于是，在用一只耳朵听露西娅的故事的同时，我用另一只耳朵监听那些大人们持续的有节奏低语，它们就像不断燃烧的火焰一样。如果我的体温升高了，这一切就都混合成一种模糊不清的现实，它抚慰着我的心，使我陷入半醒半睡的状态。露西娅和祖母，是我所见过的两位最干净、最多皱纹和最精明的老人。第一位个子很高，像位教皇；第二位非常瘦小，像个小小的白线轴。我崇拜老人！在这两位皮肤干瘪多皱的童话中的人物与我班上的那些皮肉坚实紧绷的同伴之间，对比是何等鲜明啊！我曾是，而且继续是反浮士德的活化身。不幸，浮士德在获得老人那至高无上的学问后，竟然为消除额头的皱纹和重新恢复肉体的青春，把灵魂出卖掉了！愿有人能用我生命的烙铁在我的额头上烙出纵横交错的皱纹吧！愿我的头发变白吧！愿我的步履蹒跚吧！只要我能保全我灵魂的智慧，只要我能学会别人无法教给我的那一切、那唯有生命才会留给我的一切就够了！

在露西娅或祖母的每一条皱纹上，我认出了往日生活乐趣的忧伤的总和镌刻下来的那种天赋学问的力量。这深不可测的、隐藏的、使大量葡萄卷须弯下来的、胜过一切的米涅瓦的力量！

当然，我对数学一窍不通，不会减也不会乘。与此相反，九岁时，我本人、萨尔瓦多·达利就不仅发现了拟态现象，而且还发现了完全能解释它的一种全面的理论。

在卡达凯斯，我已观察到一些生长在离海边很近地方的小灌木。从近处看，能发现它们上面有一些不规则的小叶子，支撑这些叶子的茎极为纤细，一丝微风就会使它们抖动。有一天，我感到其中的一些叶子被某种独立于其他叶子的运动推动着；发觉它们在移动，我真是惊愕不已啊！我抽出一片叶子，把它翻了过来。这是条昆虫，只有在一种能露出它那些几乎看不见的、乱动乱舞的、细小的足的情况下，才能分辨出它是昆虫来。发现这一鞘翅目昆虫，把我惊呆了。我觉得刚揭开了大自然最重要的秘密之一，这种拟态的显示对偏执狂形象的结晶产生了影响，这些偏执狂形象以幽灵般的存在出现于我目前的大部分绘画中。

为我的发现感到自豪，我试图哄骗我所接近的人。我声称我有一些神奇的天赋，能使这无生命的东西获得生命。事实上，我拔下一片小灌木叶，用它掩盖一条叶虫。随后，我用一块当成魔棒来展示的圆石子，使劲敲打桌子，以便使叶子获得生命。大家相信小叶子动弹不过是由于用小石头使劲敲打桌子的缘故。于是，我渐渐减弱敲打的劲头，直到完全停止。大家发出一阵赞美和惊奇的呼喊：叶子仍然在移动着。我多次重复我的试验，特别是当着渔夫们的面。大家都知道这种植物，可谁也没注意到那些虫子。

后来，当 1914 年战争开始时，我看到第一艘伪装的船穿过卡达凯斯的天际线之际，我在私人日记中写了如下的话：“今天，当我看到一列凄凉的伪装船队通过时，我得到对我的 *mor-ros de con* 的解释，但是我那以伪装掩饰的虫子，能用什么自卫呢？”

在我的童年，伪装是我最强烈的热情之一。我收到的最美的礼物之一，就是我已谈过的国王的服装，它是住在巴塞罗那的舅父们送给我的。那天晚上，我对着镜子，戴上我的白色假发和王冠，把白鼬皮披风随便地披在肩上，身体的其余部分全都裸露着。我紧紧把生殖器夹在大腿间藏起来，以便尽可能像个少女。我已经欣赏三件事了：软弱、老年和豪华。

但凌驾于我向往的这三种表现之上的，是对极端孤独的迫切需要，伴随着它的是另一种可以称为是其“环境”的感情，也即是对“高度”、对“顶峰”的感情。母亲总问我：“心肝，你想要什么？心肝，你想要什么？”我明白我想要的：给我住宅顶楼的洗濯间。洗濯间给了我，允许我随心所欲地在那儿弄个画室。给我的是两处洗濯间中的一处，它改变了用途，被当成堆放杂物的地方。女仆们搬光了堆积在那儿的所有东西，第二天我就能占有它了。它很小，水泥洗衣槽几乎占据了整个房间。这种大小有助在我身上重新燃起我提过的那些子宫内的快乐。我把椅子放在水泥斗形座内，上面平放了一块木板当作工作台。天气十分炎热的那些日子，我就脱掉衣服，打开龙头，在斗形座内灌满齐腰深的水。水来自邻近那个暴露在太阳下的贮水池，所以总是温热的。斗形座与墙壁之间那留出来的整个狭窄空间，用来安排各种乱七八糟的物品。墙壁上挂满了我画的画，它们是画在从卡塔莉娜姑妈帽店偷来的帽盒上的。坐在我那斗形座上，我专门画着两幅画，一幅表现约瑟与他的兄弟们相会；另一幅带点儿抄袭的意味，是从《伊里亚特》获得灵感的，它描绘的是特洛依的海伦在凝望远方。我给后者加了个自撰的题目：《海伦

沉睡的心中充满了回忆……》。实际上，我加3个塔楼，那上面显出一个小小的身影，这当然是我自己。我也用粘土仿作了一尊《米罗岛的维纳斯》，从中我得到一种真正的情欲满足。

我把全部“戈旺艺术”收藏带进了我的洗濯间，这是父亲给我的礼物，他不会料到这件礼物会那么有力地影响了我的命运。我完全懂得从童年起就熟悉的“艺术史”中的所有形象。那些裸体格外吸引我。在我看来，安格尔的《黄金岁月》和《泉》是世上最美的图画。叙述我坐在斗形座内，面对洗衣板所体验到那一切，将会是没完没了的：可以肯定的是，我幽默中最初的一粒粒胡椒和一撮撮盐就产生在这奇特的盥洗盆里。我朦胧地体会到我正装成变为了天才。呵，萨尔瓦多·达利！你现在到底明白了这一点！如果你装成天才，你就变为了天才。

父母不倦地回答来访朋友们的询问：

“萨尔瓦多怎么样？”

“萨尔瓦多在顶楼上，他说在旧洗濯间布置处画室，他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单独在那儿玩，就在那上边！”

“就在那上边！”这是最美妙的词！我整个一生都受到这种对立——上与下——的控制。从童年起，我就拚命地力求呆在上方。我呆在了上方，而既然呆在了这儿，我就要在这儿呆到死。

逃离父亲的客厅，像疯子一样爬到我的屋顶下，把自己锁在我那陋室中，这是何等令人心动的神奇情景啊！在这儿，我的孤独感到自身是不会被攻破的。从那上边（父母的住宅是费格拉斯最高的一处住宅），我高居于整个城市之上，视野一直伸展到罗萨湾。我也看见那些少女走出芳济各修女会学校，当我在街上与她们交错而过时，她们使我感到难为情。而从我呆的地方看她们，我再不会感到害羞了。然而，我有时会痛苦地后悔没跑到街上去参加夜晚的那些刺激性欲的娱乐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我似乎听到了少男少女们快乐的叫喊。这些喧哗声一直传到我这儿，用一支箭刺着我的心。家啊！不，不，绝对不！我，萨尔瓦多，应当呆在我的斗形座内，与围绕着我令人讨厌的个性的那些难看的、被激怒的怪物呆在一起。此外，我已经那么老了！为着向自己证实这种情况，我用力地把伴有白色假发的王冠戴得很低，把前额都弄伤了，因为我不愿承认头围随着我的发育增大了。黄昏降临了，我走到阳台上，燕子平静而又敏捷的飞行，已同蝙蝠颤抖晃动的飞行交织在一起。王冠变得那么窄小，勒得我两鬓生疼，可为了让那令人舒服的快活时刻能晚点儿到来，我没摘掉这个王冠。我来回走着，重复着“再等一会儿，再等一会儿”，同时试图借助某种崇高的思想来延长我那些沉思的过程。在这些被痛苦弄得烦恼的时刻中，我保持着一些充满激情的浮夸讲话，它们以一种对我本人的天才来说是多情和着迷的温柔浸润着我。

我的讲话自动地相继涌出，最经常的情况是，我的言词丝毫不配合我觉得是触及了崇高的那些思想过程。不时，我感到发现了每种事物的谜、起源和命运。城市的灯光和天空的星星一个一个地亮了起来。每出现一颗新星，就有一只长笛响在田野里。蟋蟀和青蛙富于节奏的鸣唱，与展现着对逝去春天的最甜美回忆的黄昏苦闷交融在一起，令我深为感动。突然出现的月亮把我的陶醉推向了顶峰，而纷乱的狂妄自大感也达到唯我独尊的地步、我自认处在那些最难接近的群星中。我的自恋感情变为了宇宙之梦，直到一滴智慧的泪水沿着我的脸颊流淌下来，我心灵中的纷乱才平静下来。从某个时刻起，

我感到自己手里抚弄着一个奇怪的湿润的小东西，我惊奇地看到：这是我的生殖器。

我终于摘掉了王冠，心情舒畅地摩擦着额头上的伤痕。是到餐厅去的时候了。我并不饿，但我难看的脸色让父母担心。母亲用目光讯问我：“你怎么不饿？我的心肝缺什么？我无法理解这个小心肝！他的脸色不是黄的，而是绿的啊！”

管它绿还是不绿，任何理由都有利于我再登上阳台，甚至有一天，我登上了小洗濯间的房顶，在这儿，当我体会到与虚空交融在一体时，我首次体验到了眩晕感。我不得不俯卧着呆了好几分钟，闭上眼睛去抵御虚空那几乎不可抗拒的吸引力。

我不再重复这种经验，但是呆在屋顶下的斗形座内，我喜欢回忆这种眩晕感，它只呆在我之上，而洗濯间的大花板则保护着我，把它隔在我之外。我只觉得我这个水泥宝座更高、更有特权。

高是什么，完完全全就是低的反面！它就是眩晕一个精采的定义！低是什么？如果不算混沌、团块、杂乱、集体、儿童、人性黑暗疯狂的共同基础、无政府主义，低就是左。高则是右，在这儿有着君主制、等级制、圆屋顶、建筑、天使。所有诗人都只寻找天使。但是，那已成为他们天赋的否定态度，败坏了他们的趣味，于是他们只寻找坏天使了。画家们，他们的脚踏在大地上。正是通过眼睛，一种远远高于诗人的灵感降临到他们身上。为着发现和展示真正的天使（这种天使就像奥林匹斯神拉斐尔笔下的天使），他们也不必在诗人那种令人生厌的精神错乱中打滚。至于我，我越发狂，我的眼睛就越敏锐。

总之一句话，现在，在我九岁开始之际，我这个坐在水泥斗形座内的、经常流鼻血的、孤独的孩子、我这位国王，就呆在最高处，呆在屋顶上啊！而在下方呆着的则是那炮灰，那一堆与生命有关的东西，如鼻毛、蛋黄酱、陀螺、炼狱中的灵魂、知晓人们一切希望的痴孩、煮熟的鱼，如此等等。我从不下到精灵之街来学任何东西。

我曾是坚韧不拔的人，现在我还是这样的人！某些病理方面的暂时缓和，加深了我的孤独癖。我急于跑到那个屋顶下的心情变得格外强烈，每顿饭一结束，我都借口肚子疼，跑去把自己关在小房间里，使自己感到处于“独自一人”呆一会儿的状态中。这些逃避减轻了吃饭的刑罚，为着爬上我神秘的洞穴，我不得不等待吃完饭。

在学校里，我变得好斗了，不能容忍别人来打扰我的孤独，不管他们是有意还是无意的。那些越来越难得的试着接近我的孩子，得到的都是一种极度仇视的目光，这使他们不会再接近我了。然而，这个纯洁无瑕的孤独世界，有一天必定很自然地受到一个女性形象的搅扰。

这是一位少女。放学时，她走在我前面，我看到了她的背影，她的身材很瘦，很挺拔，使我时刻担心她会断成两截。两名女朋友簇拥着她，抱住她的腰，抚爱着她，用无数微笑讨好她。这两位朋友不时回头看后面。而中央的那位则继续往前走，一直没向我显示她的面容。我看到她那么高傲，那么笔挺，就知道她与其他人不一样，她是位女王。曾体验过的对加露琪卡的那种爱潮又在我身上涌流起来。她的朋友以一种最热情的口吻喊她杜丽塔，我回到家里，始终没能看到她的面容，也没产生设法看到它的念头。就是这个杜丽塔；杜丽塔！加露琪卡！加露琪卡·何地维瓦！

我直接登上屋顶。我觉得我的耳朵，那窄小海军帽的囚徒疼痛起来。我让它们露出来，晚上的清新空气美妙地抚摸着它们。爱情控制了我，这一次，它是由耳朵开始的。

从那时起，我只有一个欲望，这就是杜丽塔突然来到洗濯间上边找我，向着我走过来。我知道这种情况必然会不可抗拒的发生。但怎么发生？何时发生？我精神病似的急躁情绪得不到任何缓解。一天下午，我出了大量鼻血，不得不把医生找来。我仰着头，用浸了醋的毛巾压紧鼻子，就这样呆了好几个小时。女仆在我背下面放了一只冰凉的大钥匙，现在这钥匙无情地在我皮肉上留下了痕迹，可我那么虚弱，就连动一下都不能。关起的百叶窗，只能透进来一道道光线，那些缝隙就像一架摄影机的镜头那样工作着，在天花板上映出一些皮影戏。我因此能部分地追寻街上的活动、人和车辆的往来，我把它们当成了天使。我想到，如果杜丽塔和她的两位朋友经过这儿，我就能在天花板上看到她们。这不大可能，因为她们不太会走过我这条街，不过既然存在着可能性，那就没什么关系。这微弱的光线使我陷入一种混合着骄傲、快乐、期待和幻觉的烦恼，有两个想法让我苦恼：

1. 如果她在天花板上经过，那么在低下的就会是我。
2. 如果她头朝下，那么她就会跌在虚空中。

我总是从背后看到她，看到她那像瓷制蛋杯一样准备碎成两半的纤细身材。她不能登上屋顶，这是她应得的，但在最后一刻，我会拯救她……在床上一动弹，就会让我想到背部存在的痛苦。我全部的爱，我全部的对杜丽塔·加露琪卡·何地维瓦的爱都倒流回疼痛的颈背上。

第二天，父母决定把我送到乡下去，在距费格拉斯两小时路程的皮朝特家的一处花园住宅休养休养。这处住宅名叫“塔楼磨坊”。我还没见过它，可我觉得这名字美妙极了。我接受了，以更为坚忍的精神动身去那儿，一个塔楼的形象对我具有微妙的吸引力。

我呆在“塔楼磨坊”的日子，将成为对杜丽塔的报复。我希望呆在那边能找回自己的孤独，与这位少女相遇影响了它。

我与皮朝特夫妇以及他们十三岁的养女朱莉娅一起乘轻便马车出发了。皮朝特先生自己驾车，他的胡须和长长的鬃发，像黑檀木一样乌黑油亮。他只要轻轻动下嘴，马就热情地奔跑起来，他在这方面是个专家。

我们恰好在日落后到达。“塔楼磨坊”在我眼里宛如一处奇境。它就像是让我继续做白日梦而修建起来的。顷刻间，我确信自己的身体好了。一种疯狂的快乐冲击着我，赶走了最近那些天的烦恼忧郁的疲劳，不断的满足感，使我久久惬意地轻微颤抖，就像你刚到达一处你确信是“为你”创造的、而你也是为它存在的地方，并且你还确信它对你无限忠诚时那样。

第二天，太阳在一处充满昆虫声响的绿色田野上兴起，五月冲击着我的太阳穴。对杜丽塔的爱变成了无节制的泛神论，它蔓延到每一事物上，变得如此无所不在，以致她真正出现的唯一可能性会让我深深失望。我宁愿在孤独中、在从没有过的可怕孤独中去崇拜她！

磨坊的机器引不起我什么兴趣，但它单调的嘎吱嘎吱的声音很快就与我的想象交织在一起，很快我就把它当成一种不在的事物的连续召唤了。塔楼，正如人们已根据我的趣味猜测到的那样，变成了一处圣地、一个圣体柜、一座奉献的祭台。此外，正是在这塔楼上，我将做出我的祭献……以后，我会在感情允许的范围内叙述它的细节。在登上那“高处”前，我要等上两天，

因为某个人得把钥匙拿来。终于，第三天早晨，有人给我开了通向上层平台的门。这高处超出了我全部的想象。我俯身向着深渊吐了一口吐沫。我的吐沫消失在野生灌木丛中，在那儿，显露出一个残存的旧鸡舍。远一点的地方，能看到一条小溪。更远的地方，一个个菜园划出了自身的范围，但风景并没延伸到云彩笼罩的山峰那边，那些云彩美妙地点缀着卡塔卢尼亚的天空。如果杜丽塔出现了，我就会迫使她尽量俯身向下，让她感到巨大的恐慌，但我不会让她掉下去。

接下来的那些日子，我决定有条理地安排每天的日程，因为我觉得如果不想让我的热情在同时产生的各种矛盾的欲望中消融，我沸腾的生命力就需要一些秩序。事实上，我希望同时存在于各处。我很快就明白了，由于我那种贪食者的混乱无序，我无法深刻地品味任何东西。此后成为我的光荣的达利式的系统化，在这时就已体现了出来。因而我制定出一个详细的计划，把一切都事先考虑好，我的那些事务和我要从获得的感受，全都考虑到了。这个计划的反常表现和强制的纪律构成了我的系统，我将最严格地执行它。

我懂得这一基本原则——要使我大量的欲望具有一种“形式”，就需要探索。我本人发明了一种只供我的精神使用的探索。这大体上就是我在“塔楼磨坊”的那些日程的大纲。

起床时刻，要有一个暴露癖的仪式。为了让这个举动很成功，我应当在朱莉娅进入我房间为我打开百叶窗之前醒过来，这真是件可怕的酷刑，在经过那些令人筋疲力尽的白天活动后，我太需要睡眠了。然而，靠着毅力，我终于准时在朱莉娅来到前一刻钟醒了。我利用这个时刻，品味着从我的展示中获得的情欲，特别是利用这个时刻来发明每天各异的配合我强烈欲望的姿势，这欲望就是以我觉得最会令朱莉娅和我本人心慌意乱的姿势展示我的裸体。我试着那些姿势，直到听到她的脚步声时才停下来。该做出决定了，这困窘的最后时刻才是最美妙的一刻。门打开的那一瞬间，我一动不动，装出睡得很熟的样子，其实，如果这时细心看我一下，就会发现我全身在剧烈地抖动，我得咬紧牙关，才能不让牙齿格格作响。朱莉娅打开了百叶窗，走近我床前，用我故意踢开的一条被单盖住我的裸体。在这个年纪，我理想化地认为自己很漂亮，发觉别人注视自己，会获得极为强烈的快感，因而我在重新穿上衣服之前，至少总要有一次不太听话。每天早晨，我都要找出个新借口：“朱莉娅，那上面没了扣子！朱莉娅，给我大腿根涂点碘酒！朱莉娅……”

在这之后，餐厅中为我一个人举行了早餐的仪式：两片涂蜂蜜的烤面包和一杯滚烫的加奶咖啡。由于餐厅的墙上挂满了油画和版画（这要归功于派皮多的弟弟，当时住在巴黎的拉蒙·皮朝特的天才），我的早餐意味着向我介绍印象主义。事实上，在我一生中，这个流派是给我留下最深刻印象的流派。它代表了我与一种反学院派的革命美学观的初次接触。我的双眼忙不迭地观赏着这些绘画不规则的厚涂色块，它们以最为随意的方式把画面理想化了，直到后退到一米远的地方，或是眯起眼睛来时，这些杂乱的景象才奇迹般地显示出生动的形。空气、距离、瞬间的光线，整个外部世界从混沌之中涌现了出来。皮朝特先生最早的一幅画让人想到图鲁兹-劳特列克的风格。1900年流行的那些文学暗示中的色情因素，使我的嗓子眼里发烧，就像被一口烧酒呛了一下。我特别记得一位正在打扮的街头卖艺的舞女：她有一副病态的邪恶面孔，腋下长着红毛。

我心里充满了对这些绘画的最强烈赞美，它们是用大胆采纳了点彩派原

则的印象主义手法画成的作品。桔黄色与紫色的系统化并置，在我身上引起了一种错觉和一种情感上的喜悦，它同用棱镜看到的、染上了彩虹颜色的那些东西带给我的感觉十分相近。在餐厅里，恰好有一个水晶长颈大肚瓶的瓶塞，通过它，一切都变成印象主义的了。我把它放在口袋里，随时拿出它来，以“印象主义的”角度看各种事物。这些清晨的无声凝视耽误了我的时间，我不得不匆忙对付那碗加奶咖啡，结果液体淌到了我的下巴和脖子上，把胸膛弄得湿淋淋的。感觉到热咖啡在皮肤上干了，留下一块粘糊糊的令人舒服的痕迹，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快感。我甚至喜欢起故意这么干了。我迅速地扫了一眼，确信朱莉娅没注意，于是我就把一点加奶咖啡倒在衬衫里，它一直流到我的肚子上。有一天，我正在犯罪时，被皮朝特先生当场发现了。有许多年，他和他的妻子一直在讲这件事，正如他们喜欢讲述收集的大量关于我令人不安的个性的奇怪小事那样。他们总是用同样的一些词句开始：

“你们还不知道萨尔瓦多干的那件事吧？”

于是，所有的人都龇起耳朵来听我那些让人穷于应付的怪事中的一件怪事了，这些怪事至少具有使人开怀大笑的价值。只有我父亲不笑。一片阴影掠过他的面孔，他为我前途担心。

早餐后，我奔向一个用石灰刷白的大房子，这儿的地上晾晒着一穗穗玉米和一袋袋谷子。皮朝特先生好心地把这个房子给我当画室用，他这么决定，是因为整个上午都有阳光照射进来。我有个大油画箱，我用它立刻动手画我挂在墙上的那些画和素描。我那卷画布很快就用完了。于是，我决定利用一扇拆下来的没用的旧门板。我把它横放在两只椅子上，决定只画中央的那块面板，把周围那些有线脚装饰的地方当成我作品的外框。有好几天，我热切地画一幅表现一堆樱桃的画。我把满满一筐樱桃倒在桌子上，太阳通过窗户烤着这些摊在那儿的樱桃，用大量的光焰鼓动着它们。随后我只用从锡管中挤出来的三种颜色涂抹我的画。我用左手紧握着两管颜色，一管朱红色用来表现樱桃被阳光照亮的部分，另一管大红色用来表现阴影的部分。接下来，我动手进行工作，我开始画那些樱桃，在每粒樱桃上摆上三个色彩笔触，卡嗒、卡嗒、卡嗒……明、暗、反光……卡嗒、卡嗒、卡嗒……明、暗、反光……磨有规律的吱嘎声把它的节奏传给了我的工作。卡嗒、卡嗒、卡嗒……我的画变成了一种迷人的戏法，重要的是更好地表现每一个新的樱桃。事实是，我感到自己的进步是惊人的，模仿是完美的。我不断增长的熟练，使我把这游戏弄得复杂了。“再搞得难一点儿！”不再像现有的那样成堆地表现樱桃，我开始一个一个地画了一些樱桃，一会儿在这个角落里、一会儿在那个角落里。但是，为了跟随磨的断续节奏，我不得不亦步亦趋地从放倒的门板的这端跳到那端。这么一来，我就像跳着一种神秘的舞蹈或是受到一种令人迷惑的咒语的控制。卡嗒、跳到这儿，卡嗒、跳到那儿，卡嗒、又跳到这儿……卡嗒、卡嗒、卡嗒、卡嗒，随着磨的每一松扣声，无数朱红、大红和白的火焰，在我那临时充当的画布上点燃起来。我就是绘画编年史上这种独一无二方法的大师、主人和创造者。

这幅画令大家吃惊。皮朝特先生为它画在了那笨重得不便操纵的、而且还有许多地方受到虫蛀的门板上深感遗憾。农民们张大着嘴，呆立在这些真实得让人想伸手抓的樱桃前。人们只提醒我一点：我忘了画那些水果的梗。我拿起樱桃，开始吃它们，每吃完一个，就把梗贴在画上。这些拼贴使我的作品具有了一种惊人的浮雕感。至于那些蛀咬门板并使我的色块出现了孔洞

的虫子，人们简直就会把它们误认为是门板上真樱桃里的虫子。热衷于追求一种更伟大的写实主义，我开始用一个大头钉调换它们。我拿起门板上的一条虫子，把它放在一粒樱桃里，而把刚从这粒樱桃里挑出的一条虫子，贴在门板的一个洞中。当我发觉皮朝特先生在场时，我已经成功地完成了一些这类的奇特疯狂的蜕变了，无疑，他呆在我身后已有一会儿，而我却没看到他。他并没有像通常面对我的荒谬举动时那样笑起来。这次，我反而听到了如同深思后的轻轻自语：“这小子是有天才的。”接着他就悄悄地走掉了。

我直接坐在地上那些被太阳晒热的玉米棒子上，想着皮朝特先生的话。它必然深深地印在我的心中。我确信自己真地能完成一些“非同寻常”的东西，比这件作品还要杰出。总有一天，全世界都会为我的天才感到震惊。而你也如此的，你、杜丽塔、加露琪卡·何地维瓦，你也会比别人更感到震惊的！

同玉米棒子的接触，使我觉得非常舒服，于是我换了个位置，想找一堆更热的玉米棒子。我梦想着光荣。我想戴上我那顶王冠，可要这么做，就必须回到我的房间去找它，而我却觉得坐在玉米上很好。我拿出瓶塞，透过它注视樱桃，然后再注视我的画和地上的一穗穗玉米。后者引起我一种无法形容的忧郁之情。一种深长的懒惰控制了我，我脱掉裤子。我的皮肤应该直接接触灼热的玉米。我把一袋谷子倒在身上，直到我肚子和大腿上堆起了一座金字塔。我相信皮朝特先生出去做上午的远足了，只有到午饭时才会回来，我会有足够的时间把玉米放回袋子里。当皮朝特先生突然出现在门口时，我正在倒第二袋。如此好享受的姿势被发觉，我认为自己会羞死了，可他目瞪口呆地看着我，一言不发，转身走掉，再也不来了。一小时过去了，太阳已不再晒热我临时的床。我感到关节都僵硬了，得把玉米粒放回袋里去。用手当勺，我开始了一场仿佛永无止境的累人劳动。我好几次都不想干了，可强烈的负罪感迫使我继续干下去，最后十把可真是酷刑，我觉得最后一粒玉米太沉重了，我简直不相信能把它从地上拿起来。干完我的活儿，我松了一口气。我几乎没力气登上餐厅的阶梯，在这儿等待我的是一种预示着什么的静默。人们刚刚谈到过我。皮朝特先生用严肃的语调对我说：

“我决定告诉你父亲，请他给你找个绘画老师。”

“不，”我激动地回答，“我不想要绘画老师。我是个印象主义者。”

我并不怎么理解“印象主义者”这个词的确切含义，可我觉得我的回答具有不可抗拒的逻辑力量。皮朝特先生笑着喊道：

“看看这个孩子！他竟然向我们宣告他是个印象主义者！”

我胆怯了，继续吮着我那只童子鸡的骨髓。皮朝特先生跟别人谈论着该从下周末动手采集椴树花。这次采集必然会对我产生一些不可估计的后果。但在讲述这一有趣而又残酷的故事之前，我首先想向你们讲完我在“塔楼磨坊”这处难忘的花园住宅的日程安排；要给随后发生的令人眩晕的爱情场面提供活动的环境，这是不可缺少的。我请大家能谅解我，如果我宁愿用少量文字先概括一下我如何利用时间，以后再重新讲述那些略去的细节的话。

十点钟：怀着暴露癖醒来。面对拉蒙·皮朝特的印象主义进行美学的早餐。倒在我衬衫里的热加奶咖啡。十一点到十二点半：在画室里这是用来从事我绘画创造的时间，重新创造印象主义、重新确定我美学上的狂妄自大。

午餐：用两耳倾听经常充满着皮朝特委婉措词的谈话，这对调整我的日程和据家里的工作来预测我孤独中的乐趣（这些乐趣时常是难以防止的）来

说，是必要的。因为“塔楼磨坊”的所有事件，农业方面或其他方面的，都能成为创造新神话的借口，正如它们把新的人物带进了它们的自然背景中，这些新的人物是割草人、耕田人、采摘水果或收集蜂蜜的妇女。

下午：几乎完全献给了那些动物，我把它们养在用铁丝网围住的一个大鸡舍，铁丝网很密，我甚至可以把蜥蜴关在那儿。我收集的动物包含有两只豪猪（一只很大、一只很小）、一些蜘蛛、两只可爱的鸟、一只乌龟、一只小家鼠。这只小家鼠原来养在磨坊的面粉中，现在则住在一个白铁饼干筒内，人们会意外地发现饼干筒上有一幅表现一排小家鼠啃饼干的图画。我用纸板盒为每个动物建造了专门的笼了，这种材料使我沉思的体验变得容易了。我最后收集了二十只左右的动物，沉湎在对它们的惊人观察中。

我的动物园中的怪物是一只两条尾巴的蜥蜴，它的一条尾巴很长，另一条则是个胚胎。对我来说，它已经象征了分叉的神话，况且它还呈现在一个柔软的活的生命上，这就更加令我困惑不解。分叉的形早就引起我的兴趣。每当见到一个不论是矿物质的叉状物还是植物质的叉状物，都使我陷入梦想。分叉的线条，还有分叉的物体，这个问题究竟意味着什么呢？从中产生了实用的一面，可我却完全不能把握它。这是一种为生与死、推与压服务的东西：“既决定着内容又被内容决定着武器与防御、威胁与爱抚。”谁知道呢？谁知道呢？梦想着，我用手指抚摸两个尾巴分开的部位，把只有我疯狂的想象有一天会填补的这个空虚留在它们之间。我打量着我的手和手指的四个分叉，想象不管怎么样，我可能总会伸展着它们，直到死，直到无限。可谁知道呢？这是肉体的复活吗？染红天空的傍晚把我从梦想中拉回来，什么都不能让我忘掉这个梦。

落日意味着跑去吃饭的时候到了，吃饭就是为了挤出那被夜晚原罪的微风侵占的人间花园中的有罪汁液。我嚼着一切：甜菜、甜瓜、如同新月一样的嫩洋葱。为了避免厌烦，我只用牙咬一口。如果我不是从一种水果或蔬菜跑到另一种水果或蔬菜的话，我的各种欲望就会被贪吃削弱，在我的味觉器官里，它们的味道就像开始在矮树丛中亮起来的萤火虫的光一样转瞬即逝。有时候，我拿起一个水果，吻着它或把它紧贴在我发烫的面颊上，这对我就足够了。我喜欢感觉到如同狗的口鼻一样柔软凉爽的李子皮贴在我皮肤上。我找理由在菜园里一直呆到黄昏过掉一半。然而，我在支配时间时，考虑到对规章会有所违背，特别是如果收集萤火虫（我用这种活动结束对花园的造访）有可能大获成果的话。用一根丝线穿透它们，我想用它们制作一条戴在朱莉娅脖子上的效果独特的项链。但是她很快就会害怕这件东西的，那我就能把它送给我的小杜丽塔了。我想象着她站在那儿，配戴着这条项链，完全沉醉在骄傲之中。

黄昏的结束不可抗拒地把我引向那个塔楼，我从远处一直凝望着它，目光中闪耀着期望和忠诚。我低声地喃喃说道：“我来了。”尽管太阳已经落下去了，塔楼仍然兴奋地染着玫瑰色。在它上方，有三只大黑鸟在飞翔。从远处着，我到塔楼上面参观就是一天中最庄严的时刻。可就在我登上去的那一刻，我极为焦急的心情中永远混合着一种让人动心的恐惧感。有一次，在我的塔楼上，我久久地望着那些山峰，尽管它们只是一团黑暗的东西，但是借助在天际显示出太阳沉落的一条猩红和金黄的带子，借助被透明的纯净空气弄得明确而又富于立体感的整个风景，仍然能辨认出一个接一个的起伏山峦。从塔楼的最高处，我能够重新获得我那些最壮丽的梦幻、我那些费格拉

斯家中的梦幻。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具有了更确定的社会与道德的内容，哪怕其中固执地存在着始终是自相矛盾的混淆和含糊的因素。一会儿，我把自己想象成嗜血成性的暴君，仅仅为满足我各种最奢侈的怪癖，就把当代所有的人都变成了奴隶；一会儿，我把自己想象成只不过是印度的贱民，在最为浪漫的死亡中牺牲。从残酷的半神到低贱的工人，经由天才的艺术家，我总是重新回到……萨尔瓦多、萨尔瓦多、萨尔瓦多！我不倦地重复我的名字。我知道不可避免的牺牲，在夜的阴影中，我怀着令人厌恶的卑劣心情，注视着我的四周，因为我已经确信了一件事：牺牲者将不会是我本人。

经过塔楼上大量的雄辩之后，在光线暗淡的餐厅里吃晚餐，就成了一种美妙的休养时刻。睡眠就坐在邻近的椅子上，等待着我。有时，它甚至用脚在桌子下面触碰我，于是我就听任它向我身上侵袭了。一天，晚餐结束时，我在昏昏欲睡的状态下，从一阵含混的低语声中，听到皮朝特先生宣布后天要开始采摘椴树花。这一天终于到来了，现在就是你们等待许久的故事了：

拐和采摘椴树花的故事

灼热的太阳和暴风雨的故事，爱情和恐惧的故事，椴树花和拐的故事；可以说在叙述这个故事的过程中，死亡的幽灵将不会离开我。

说好的那天，早上我比平时都起得早，我、朱莉娜和两个女仆，我们一起登上了塔楼的阁楼，去找采摘用的梯子。这个阁楼，又大又暗，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在这之前，我都没能参观过它。从我一进去，我就发现了两件东西，它们的“个性”立即就从别的无名破烂中清楚地显现了出来。第一件是顶沉重的镀金桂冠，它挂着两条丝带，上面用我不懂的语言题着词。“个性”让我激动的第二件东西是一根拐。我还从没见过拐，它那特别奇特的形状令我惊异。我马上抓住它，并明白了我再也不能跟它分开，可我无法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它是权力和威严的顶峰，立即就取代我原来的权杖（那是一个旧的皮掸子把，我把它掉在了墙后面，从而已失去了它）。应当把胳膊窝依在它那包着磨坏了的、带有焦味的上等细呢绒的支撑部上；我依在它上面，懂得了可以愉快地把我细嫩的面颊和沉思的前额贴在它上面。一只手挥舞着拐，我又走回花园。这个东西赋予我从没有过的自信和傲慢。

人们刚在高大的椴树下矗起了三架开合式梯子、地上已经铺了白布，用来接最初那些带花的沉重枝条。在这些梯子上，站着三位不认识的妇女，其中两位非常漂亮，并且长得很相像，有一位尤其显出了美妙的胸部，两个极为好看的乳房高高耸起，人们能辨认出紧裹在白色亚麻上衣内的每一个细节。第三位妇女很丑，颜色像蛋黄酱的牙齿从肿胀的牙床上呲出来，她好像在不断地笑。除了这三位妇女，还有一个十二岁左右的小姑娘，站在下面仰望着她母亲的动作，我马上就喜欢起她了，我相信她有点儿弯曲和扭转的后背（这是她的动作造成的）立即就使我想到了杜丽塔。由于没看到她的面孔，我很容易地把这两个女孩混同起来，正如我已经把杜丽塔和加露琪卡·何地维瓦混同起来一样。我用拐碰了下这个小姑娘的后背，她向我转过身来，我以一种坏脾气的专断语气对她说：

“你将是杜丽塔！”

她那黝黑的面孔具有天使般的美。它占据了杜丽塔面孔的位置，于是我梦幻中的三个形象合成了一个形象。我对这个形象的热情扩展到了无法抗拒

的程度。这个新面孔的现实，使我的爱情获得了新生。我利比多的焦虑，几年来一直受到惶惶不安的孤独的抑制，现在结晶成一块琢成四面体的宝石，我终于能在它上面看见我三次没得到满足的爱情联合在一起了。我能确定这不是杜丽塔本人吗？我试着在这个乡村女孩被太阳晒黑的面孔上找出加露琪卡苍白的痕迹，随着时间一分一分地逝去，她越发像加露琪卡了。

我的声音因激动变得嘶哑了，我重复着：

“你将是杜丽塔！”

她吃了一惊，向后退去。我暴君似的样子肯定从这个孩子身上清除了她全部天真的信任。当我走近她时，她爬上梯子的横档，朝她母亲靠拢，我来不及用拐触摸她的头，向她表明我感情中牧歌似的温柔。如果她知道了留给我们未来的那一切，而这一切不过才刚开始的话，那么美丽的杜丽塔确有充分的理由怕我！我自己已无法不怀着恐惧注视我古怪的性格中某些冲动的发展。有多少次，独自在田野漫步，追寻着某种梦幻时，我都感到自己有种不可抗拒的要求，这就是想从大墙或峭壁上跳下去。我闭起眼睛，往空中一跳，虽然只不过有点儿昏昏然地升高起来，可我的心却轻松了。于是，我对自己说：“今天的危险总算过去了。”这使我对重新发现的四周的现实产生了一种狂热的兴趣。

认识到初次接触后我无法骗取杜丽塔的信任，我就走开了，并向她投去一股温柔的长久目光，它讲着“没什么可怕的，我还会回来的”。

我接着在花园里闲逛，在正常的情况下，这时我本该在画室里专心画画。可是这天的一切都是那么不寻常，使我获得了违反一次规定的权利。随之产生的苦闷和负罪感是那么沉重，仅是感觉到它们就已使我的心灵备受折磨，我只绕了半圈，便回到画室，把自己关在那儿。可在画室里，我的不幸毫没得到缓解。我本来很想在别的地方成为另一个我，我在花园的另一些角落随意漫步着，打算不受外部干扰地想她并拟定我们下次相会的方案。可是，杜丽塔的种种诱人形象不停地侵袭着我。无形的仇恨在蓝大中向刚毁掉了我的自恋殿堂并扰乱了我在塔楼磨坊重建的孤独的她轰鸣起来。我应当斗争，而为了斗争，就要工作，如动手画我想给我的动物画的写生画。应当去找会成为最好模特儿的小家鼠。我能用表现樱桃的那幅画的风格创作一幅写生画，代替表现同样的美学因素，我要无止境地重复不同的各种姿势。小家鼠也有尾巴，我将可以重搞一个拼贴。其实，我并不太相信这件新作品，也没受自己的狂热的欺骗，不过，使杜丽塔的幻影在我身上引起的那种烦躁为我的计划服务，为我想表现小家鼠的兴奋的这幅画服务，这还是可能的。于是我跑到鸡舍去找它，它陷于悲哀之中，它那非常瘦小苗条的身子胖得圆了起来，如同一个灰色的毛球。它一动不动，可呼吸却很急促。我像抓樱桃那样，抓住尾巴拿起它来，事实上它就像一粒灰色的樱桃。我小心地把它放在它那盒子的底部，可突然它猛烈地抖动着跳了一下，撞到了我脸上，随后又筋疲力尽地跌下来。这一跳来得那么突然，我的心好半天才恢复正常的节律。难忍的不舒服迫使我又扣上了盒盖，仅仅留出一条透气的小缝。还没从这种激动中恢复过来，我就又发现了同样令人不舒服的事情。我本以为逃掉了的、已经一周不见的刺猬，突然出现在鸡舍的角落里，它死在一堆砖头和荨麻的后面。我满怀厌恶之情走近它。一群闻所未闻的蹩脚的疯狂虫子垫在它长满刺的背下。而那聚集在它头上方的这种蹩脚，令人忍不住要说是种腐败的真正大喷发。我的腿软了，背上起了一阵阵寒战。尽管我极为反感，但受到这污

秽不堪的球体的诱惑，我仍走了过去。我得近近地看它，一股无法形容奇臭使我退缩了。我逃出鸡舍，跑向那些采集的妇女，她们深深地呼着起净化作用的椴树的香气。然而，我抗拒不了回到死刺猬旁边的念头，哪怕在观察它时可能会停止呼吸，因而我好几次跑到那个动物处，又好几次跑回那些让我感官中充满香气的椴树花。每一次途中，我都借机把我目光的阴暗之水倾泻在杜丽塔无比美丽的眼睛照亮的井中。这些来往变得那么狂热、那么歇斯底里，使我渐渐感到无法控制自己的行动了。在接近刺猬时，我冲动地干了一件无法补救的事，扑向它并触摸它。同样，每次接近杜丽塔时，我都无法摆脱这样一种难以抗拒的念头：搂住她，在她那像一个新伤口般张开的嘴里吸饮她那乡村的胆怯天使的灵魂。在一次令我头晕的回到刺猬的过程中，我无法使盲目的奔跑停下来，于是决定从它上面跳过去。我差点儿倒在那堆蹿动的虫子上面。这种蠢事引起我的反感，可也引起我用拐触摸刺猬的欲望。以前，我至少试过投石头，但如果我终于能移动这个发臭的球的话，那激动就会更强烈了。于是，我拿着拐的最末端，把它向前伸去，用它的支撑部抵在刺猬身上。就这样干下去，最后我都不知道是刺猬勾住了拐，还是拐勾住了刺猬。接着，我使劲晃动把手，翻过这腐败的尸体，我几乎要昏了过去。在它的四只爪子间，我发现了一大堆东西，这就像是由乱动的由子形成的拳头，这些虫子把刺猬皮的薄膜弄破之后爬满了一地。恐惧控制了我，我丢掉拐，逃向椴树。好半天我才从这次打击中恢复过来，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接触虫子弄脏了我心爱的物品，这样我就刚给它判了刑，有益的吉祥物变成了死亡的象征。

可我无法忍受放弃拐的想法，从早晨新发现它那一刻起，我对它的崇拜之情一直在增长着。我找到了一种解决办法，经过某些仪式后，我能收回我的财产。应当把它拿回来，然后在小溪的清水中，在水流非常急的地方浸泡它。在经过长久的浸泡后我再把它放在椴树花中晒干，随后再把它拿到塔楼的高处，用我后悔的夜晚、黎明和露水来完成它的净化。

我这么做了。我的拐已经安放在花下，可在我已经平静的心灵中，我仍然感到死亡的黑球在动弹。

吃完安静的午餐，已经是下午了。我走进花园，漫不经心地看着人们采集椴树花。杜丽塔目不转睛地盯着我，完全与加露琪卡一样。她的目光一刻也不离开我，我确信今后她会像奴隶那样服从我。对此，我毫不怀疑，这使我提前品尝到了这种完全是爱情的奢侈中所包含的各种乐趣。大家全都毫不在意她注视他们，而一个多情的生命却呆在一边，这时每一分钟都是神圣的。只有邪恶才能赋予我们无视这个生命、差不多把它当狗来看待的力量，哪怕我们都知道不久之后我们本身就准备像狗一样对它俯首贴耳了。

我由此明白了杜丽塔已被牢牢拴在我引诱的黄皮带的一端，我转而注视着别的地方。特别是注视那位乳房高耸的采椴树花妇女的腋窝。在被一簇黑毛围绕的闪耀着珍珠光泽的动人皮肤上，这个腋窝展示出一处极为芬香的小坑。我的目光从这个窝向那对过分丰满的乳房移去，我觉得这对乳房的非凡体积重重地压在我的眼脸上。呆了一会儿，摆脱掉麻木状态，我感到有种疯狂的想法控制了我。这就是萨尔瓦多现在想干的事呵！我想把拐从它的花朵之墓中挖掘出来，用翻过刺猬的那同一支撑部去轻轻触碰这位农家妇女被太阳晒热的双乳，用它那光滑柔软的弧形卡住它们。

我整个一生就是由这类心血来潮的举动组成的，随时随刻，我都准备为

了与上述哑剧同样幼稚的哑剧放弃最豪华的印度之行。然而，这样的事情并不像表面上看的那么容易。我的经验使我深信没有这回事，我在头脑中拟定了无数计划，我的力量、我的计谋和我的歇斯底里开始在其中发挥作用，以便获得这一惊人的成功。这之后，我的拐就会变为我的国王的权杖了！

太阳落下去了，花朵金字塔已建成，杜丽塔躺在了上面。用我的拐触碰那位妇女乳房的欲望变得那么强烈，我已感到要放弃它还不如去死。最好立即行动，最好从现在起我就扮成国王。那我就盛装走下来，躺在只能感到为爱情而死的杜丽塔身边的花朵中。我跑进我的房间，披上反浮士德的假发，再戴上王冠。我一生中从没发觉过自己像这天下午那么漂亮。尽管受到风吹日晒，蜡一般的苍白仍侵袭了我眼圈发黑的面孔。我怀着下去的念头，离开了房间，在二层楼，我需要顺着前厅走过去，它有一个朝阳的开向花园的小窗子，在它的天花板上，用绳子吊着三只已成熟的甜瓜。我停了一下，观看着它们，像闪电一样，我突然有了一个解决和实现我那难应付的奇想的主意。尽管窗子很小，前厅仍然伸展在半明半暗之中。如果那位妇女把梯子放在十分靠近窗扇的地方并登到相当的高度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窗户框住了她的乳房，而身体的其他部分则被隔在其外。我就能看到一切，而不会因被她看到而感到害羞了。在我看到那对乳房时，我会用拐的支撑部轻轻挑起挂在天花板上的一只甜瓜。我觉得这个行动远远比最初的计划令人神魂颠倒，因为这只甜瓜现在象征了我欲望的全部成熟的重力，另外，这只水果当然是香甜的，正好配合了我想象中的这位农家妇女隆起的乳房。我不仅会用拐轻触这只甜瓜，而且还会接着啃它。

难题的一部分就是怎么使这位采椴树花的女人来到窗户旁。我只找到了一种办法。我爬到上层楼，让我的空竹掉下去，使它挂在爬满建筑物立面的蔷薇丛上。我用一根竿杆把线跟枝条绞在一起，要解开它们就得费点儿时间。接着我跑到花园，假哭着恳求这位有夺目乳房的妇女用梯子帮我钩空竹。同时，我从花堆里把拐找出来。在“塔楼磨坊”，所有人都得到命令要满足我的各种怪念头，此外，这位妇女可能也高兴停会儿工作。虽然手臂紧钩住梯柱，她仍以极度优美的姿势从梯子上下来了。从她露出的腋窝里滴下来一颗汗珠，它打在我额头上，仿佛是顶示夏天暴风雨的一大颗温热的雨珠。杜丽塔帮着她把梯子拖到住宅的墙下，小心地立稳它，这要费些时间，我就利用这段时间跑到我的房间里脱得一丝不挂。我发现自己过于漂亮了。那两位女人必定也这么看我。但受不了过分突然地暴露自己，我把白鼬皮斗篷披在肩上。然后我走到前厅。那位妇女已爬在梯子上，她的身体就嵌在窗子中。我的计算准确无误。下部的窗台把她大腿根以下的部分隔在外边，上部的窗缘把她的头留在了外边。在我眼前，她的身体展示着，使已昏暗的前厅更加黑暗了。热得令人窒息，我让白鼬皮斗篷从身上滑落下去。被我经心地弄得乱糟糟的线紧缠在蔷薇丛中，在她解它时，我有足够的时间满足自己的欲望，当她下来之际，我已躲到了墙边。这时，我轻轻地把拐的支撑部放在一只甜瓜上，满含感情的泪水使我的视线模糊了。果肉超出了我的期望。它熟透了，结果拐陷了进去。我把目光转向那对乳房，我只能在逆光中看到它们，可是两个球形团块的模糊不清本身更加强了我的欲望。在把一种节奏传给了我的拐时，我加重对甜瓜的压力，它裂开了，粘糊糊的汁液流到我身上，先是一滴一滴，接着就变成一场真正的喷射。我张开嘴接受带有阿摩尼亚味道的甜汁。疯狂的干渴支配着我。我的目光从甜瓜移向乳房，又从乳房移向甜瓜，

这移动的跳跃节奏太快了，不久我就意识不到自己的动作了。拐捣碎了甜瓜，它变为一滩糊浆，最终掉在了我头上，恰恰在这时，这位有着夺目乳房的妇女终于解下了空竹，从梯子上走下来。我扑到地上想躲起来，却跌在浸透甜瓜汁的白鼬皮斗篷上。我筋疲力尽地喘着气，等待这位在前厅中发现我裸体的农家妇女重新登上一级梯子来证实她没看花了眼；但她无疑并没看到我，因为她消失了，我白等了一场。西斜的太阳代替她登上了墙，一直爬到两只未被触动的甜瓜的高度。我不再想跟它们玩了。魔力消失了，再也不会重现。极度的厌倦使我浑身发软。两只甜瓜的影子不再让人想起采根树花妇女的那对乳房，恰恰相反，它们让人不祥地想起两只腐烂刺猬发臭的球。我打着哆嗦，走上去重新穿好衣服，躺到床上。夜晚又回到房间与我相聚了。

我必须抓紧时间利用塔楼顶上的最后光明。我手里拿着拐，走上平台，去发现一个星光闪烁的天空，这天空沉沉地压在我的孤独上，我都没勇气进行我习惯的任何一种久久的梦想了。在平台中央，有一个小水泥座，它上面有一个洞，可能是用来在各种节日插国旗或彩旗用的。

我把拐插在洞中，它十分细的柄在洞里呆不太牢，向一侧倾斜去，同完全直立的位置相比，我更喜欢这种位置。我离开了塔楼，梦想着要是我半夜突然醒来，就会因为想到亲爱的物品在上边替我守夜，用它的庇护掩盖我而放心了。可我会醒来吗？铅一般沉重的睡眠已在我脑袋里嗡嗡作响，经过安排得这么满的日程，我只想睡觉了。我像个梦游者，撞着墙，每次都重复着“你将是杜丽塔，你将是杜丽塔”，走下了楼梯。

第二天，仍然进行着采摘。杜丽塔在场。太阳升到中天，那位采摘女用一些白布单收集着椴树花，她的那对乳房像昨天挂在天花板上的甜瓜一样沉甸甸的，但是它们的吸引力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就连要在我心灵中找到它的一丝痕迹都不可能。相反，当我再想到它们时，我就会被真正的反感控制住。我不再觉得被甜瓜汁弄脏的白鼬皮斗篷和这对乳房有同样的美学功效，我感到不能把哪怕一点点感伤的诗意送给它们。相反地，我现在受到杜丽塔身材的诱惑，她那身材比我昨天感觉的还要苗条，随着太阳渐渐升高，地上的一切阴影减弱消失后，她的身材就显得更苗条了。

我什么都没向我的加露琪卡·何地维瓦说，但我想：“今天我将把整个日程献给她。”于是我开始抖空竹。我玩得非常熟练。让它上下左右翻转滑动，接着我把它抛向空中，抛得那么高，简直令人不能置信，随后再用扯开在两根短棒上的线接住它。杜丽塔看着我，我猜她在欣赏我。意识到她的目光，我创造出一些极漂亮的动作。最后，我把空竹抛得太高了，结果这回我没接住它。她跑过去抓住它，犹疑了一下，把它交给我，问我她能不能跟我一起玩。我没搭理她，继续着我的活动，把空竹越抛越高。当我没接住它时，杜丽塔就跑去寻找它，我生气地试图阻止她这么做。她温柔地笑着，听从了我。甚至不能答应她的请求所造成的悔恨，很快就变成了仇恨。她竟然愿意独自去玩，而不来赞赏我！我把空竹高高抛向晴空，这回我又没接住它，它落在很远的地方。杜丽塔以伤人的方式大笑着，跑去捡它。我随她这么做，因为掌握着那对短棒，我是唯一能玩的人。她没把空竹给我拿回来，于是我向她走去，眼中闪着愤怒的光。这次她明白了我的意思，在我前面奔跑着，似乎准备抗拒我。我们在花园里跑了好几圈，直到她扑倒在一堆椴树花上。人们刚把这堆椴树花与其他的花分开来，因为它们是枯萎的。当我接近她时，我同情起她来了。可是杜丽塔翻过身，想把空竹藏得更好。她的背部、她隆

起臀部的圆形，都美得出乎意料。用一个膝盖顶住她，我轻轻用双臂抱住她。

“把空竹给我。”

“不。”她用流露出恳求的口吻说。

我更紧地搂住她。

“把空竹给我。”

“不。”

我越来越紧地搂住她，抽泣使她浑身抖动，她听凭藏在胸前的空竹掉下来。我拾起它走开了。她站起来，没看我，重又回到她母亲站在上面干活的梯子那儿。靠在防止两个支柱移开的粗索上，她开始哭起来，但是她哭得并不难看，而是带着一种让我愧疚的高贵优美的神态。我想避开这不友好目光的视野，专心于某种特殊的活动，例如爬上塔楼，从那上处用全力把空竹抛到空中。如果它掉在平台外，我就会失掉它，那就算了！这时，朱莉娅叫我去吃饭。可在吃饭前，我必须至少试一次抛掷。飞快跑上平台，把空竹抛起来，它落下时有点儿偏外了，我俯身在护墙上，一半身子伸到了空中，用一种神奇的灵巧把它接住。这种危险的疯狂举动，使我感到非常眩晕，我不得不直接坐在石板上恢复平静。护墙和斜立在洞中的拐杖都在我周围旋转起来。下面，有个声音喊了我好几次。我像个晕船的人，跌跌撞撞地走下去。我吃不下饭，发觉皮朝特先生的状态也不比我好，由于偏头痛，他的头上绑了条奇怪的白头带。在保证不再用生命冒险的条件下，我匆忙转向自己的游戏，我立刻就为杜丽塔在场感到懊丧了，她妨碍我全身心地投入我极为有趣的活动。不过我要在黄昏时分再回到塔楼来。

耐心点，萨尔瓦多，在这个夜晚，你将是这一生中最激动人心场面之一的见证人。等一等吧！等一等吧！

午餐结束了，皮朝特先生亲自关上百叶窗，并吩咐整所住宅都要这么办。他认为暴风雨就要来了。我看到的天空就像一片静水那样蔚蓝光滑。可是皮朝特先生把我引到阳台，让我注意天边的小小积云正在天空中升起。

“你看到这些‘旋转的云团’了吗？在领略它之前，我们会看到闪电，或许还有雹子。”

我一直抓住阳台的栏杆，欣赏突然让我想到特拉依代尔先生教室天花板的霉斑的这些云朵。我觉得在它们那儿重新看到了童年所有混乱的奇想，这些奇想已掩埋在遗忘里，可又奇迹地在光线转瞬即逝的积云泡沫和肌肤的光辉中复活了。一些长着翅膀的马匹鼓起它们的胸膛，我欲望中的所有的乳房、甜瓜和空竹从中盛开了。一朵像长着人头的大象的云彩，分裂成两片更小的云彩，随后它们又变成两名巨大的满脸胡子的角斗士，他们身上隆起一块块肌肉。一瞬间他们分开了，接着又迅速地靠近了。震动是吓人的。我看到两个身体相互渗透、混合形成了一个混乱纷繁的团块，可它立即又变为另一个形象：贝多芬的胸像。忧郁地俯向原野，这位作曲家的胸像增大起来，上面布满了同石膏粉很相似的暴风雨的灰色。没多久，贝多芬的整个面孔就被他巨大的前额吞没了，变为一个沉重的头顶。一个闪电撕裂了它，从裂缝中闪现出一角天空。一声雷鸣隆隆地传向我，使“塔楼磨坊”的玻璃震得直响。一阵迅猛而又令人窒息的旋风把椴树的花与叶掀了起来。燕子掠过地面，发出尖厉的叫声。儿滴沉重的雨犹疑地落了下来，预示着在花园上空爆发并鞭打它的大雨。土地已经干渴了两个月，这是近似情欲的动物性干渴。在雨下，土地散发出它所有潮湿苔藓和新鲜花朵的香气。

整个下午，风暴和大雨持续着，它们仿佛是要在我与杜丽塔之间演出的戏剧的同谋，这出戏剧将发生在以自然力和我们自身灵魂的爆发为标志的一天结束之际。

为了得到庇护，她在房间重又来到我身边，我们心照不宣地登上塔楼顶部的阁楼，躺在那几乎完全被一派黑暗统治了的地方。阁楼低矮的顶棚、永久的阴影和孤单的状况，会造成我们危险的亲密。呆在这儿，我感到恐惧消失了，现在由杜丽塔陪伴着，我觉得她孤零零地，一切都听凭我的热情摆布，外面的倾盆大雨完全驱散了这个地方阴森的特点，使它成了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之一。闪电穿过关着的护窗板，摇动着我们的阴影，使我留下深刻印象的那顶著名的镀金桂冠闪闪发光。

我的新杜丽塔、我的加露琪卡·何地维瓦跨过这个桂冠，闭上眼睛，像死人一样躺在阁楼的中央。一种预感紧紧地压在我的心上，仿佛在我们两人之间就要发生某种可怕的事情了。我跪在她面前，怜惜地凝望着她。习惯了黑暗，我能分辨出她面孔上的所有细节。我更靠近她，直到我的头碰到了她的头。她睁开双眼，向我说：

“我们玩碰舌头吧！”

她的嘴唇张开来，把伸直的粉红色舌尖伸向我。我被一股强烈的困窘淹没了，突然站了起来，同时极其愤怒地推着她，结果她的头咚咚地撞在了桂冠上。我的姿势变得那么可怕、那么坚决，她流露出一种听人由命的神态。她那屈服的目光，她那讨好的样子，增强了我想伤害她的欲望。我一跃，就跳到她身后，她显出害怕的姿势，可仍然勇敢地坐在桂冠中间。一个闪电划破了黑暗，我一瞬间就看到她苗条的背影、她的细腰，如同大白天一样清楚。我扑到她身上，紧紧搂住她，就像这天早晨在花堆中做的那样。她无力地抵抗着，我们的搏斗减慢了速度。杜丽塔认为这是一个体贴的征兆，她用温柔的双臂抱住我。越来越有气无力的搂抱使我们紧贴着倒在了地上。在这期间，我计划好了想对她干的事。我必须把她转过来，因为我想弄痛的正是她背上娇嫩的突起部，这可能就是让桂冠的金属叶刺入她细嫩的皮肉。为了更好地让她一动不动地呆在地上，我用目光寻找某个笨重的东西。我的眼神落在一个破旧的衣橱上。我能把它翻倒吗？一阵风吹开了阁楼门，雨停了，我们看到一个新的青灰色天空。

“我们上塔楼去。”我说着，放开她，跑向楼梯。

杜丽塔没马上听从我。她想向我表示她因我们的抚爱突然停止而伤心吗？一直没看到她来，我愤怒地走下来，扑向她，像野兽一样狂暴地扯住她的头发。我成功地拉起她，把她拖了三四级台阶。当我停下来喘口气时，她挺起身来，跑向平台。现在她再无法摆脱我了！我怀着超自然的平静态度，走完最后几级台阶。费格拉斯的梦实现了。即使杜丽塔不算是在我的洗濯间里，至少她登上了我塔楼的平台。多辉煌的胜利啊！我想慢慢地品味它，用了很长的时间才登上这些最后的台阶。我终于到达了平台。在平台中央，我那个拐，拖着不样的影子，满是雨水浸泡的痕迹，微斜着立在那儿。在它一边，我的中央部分紧箍住一个金属环的空竹在闪闪发光。淡紫色的云消逝了，彩虹用它的双臂环绕着一片深蓝色的天空。坐在护墙上，杜丽塔擦干了泪水。我用在我一生中那些最重要时刻从不缺少的歇斯底里态度向她道：

“如果你不再歪坐在这个护墙上，我就把空竹送给你，你会跌下去的。”

杜丽塔跑去拾起空竹，转回去斜依在那儿，欢呼着：

“呵，多漂亮呵！”

一抹嘲弄的微笑，使她的面孔焕发着光彩。她相信我刚才被她的眼泪打动了，可我做了个受惊的动作，用手蒙住了眼睛。正如我预料的那样，这种情况激发了她的娇态，她坐在矮墙上，双腿悬在空中。

“等一下，”我说“我去给你拿另一件礼物。”

于是我拿着拐，假装离开了，可我又悄悄地踏着脚尖走回来。现在我来了！我静悄悄地拿着拐的支脚向前走去。杜丽塔把掌心按在石头上，来回地晃动她的双腿，凝神望着铅灰色天空中一大块形同鳄鱼的云彩。夜就要降临了。

我怀着无限的小心，把拐的支撑部移近杜丽塔那么苗条的身躯上方。我非常紧张，浑身颤抖，我不得不咬紧嘴唇，一丝血流到了我下巴上。我打算干什么？

杜丽塔无疑猜到了我的动作，她转过身来，一点儿不感到吃惊，她本人向后斜依着，让拐的支撑部紧箍住她的身子。她的面孔变成了世界上最美的面孔，她的微笑变成了一个与我的微笑相交的彩虹。我垂下了眼睛，把拐插在两块石板的缝隙间。接着我走近她，从她手里抢过空竹。

“不给你，也不给我！”

我把它抛向空中，它消失了。

祭献终于完成了。

从这时起，这个拐对我来说一直是死亡和复活的象征。

第二部

第六章

青春期———蚱蜢———被中学开除和 欧洲战争的结束

青春期是最初的毛的出现期。在罗萨湾一个夏日的清晨，向我显示了这种现象。我刚刚裸露着全身，与另外一些孩子洗了个澡，在太阳下晒于自己时，我怀着可以同纳尔西斯相比的得意心情注视着我的身体，我看到一些细毛，虽然稀稀落落但却很长，它们不同程度地覆盖着我的阴茎并爬上了我的肚脐。

我费劲地从这些毛里拔出一根，惊叹地打量着它的长度。它怎么在我毫无知觉的情况下长出来的？我不是了解自己身体的所有秘密吗？逆光拿着它看，我觉得它是金褐色的，一条彩虹在它上面流动。我玩弄着它，把它做成一个圆环，随后用唾沫弄湿它，让环内拖出一层透明的薄膜。这样，我的毛碰巧就变成了一个理想的单片眼镜，透过它我能凝望发出虹彩的海滩和罩着一层纱幕的天空。我不时用阴茎的一根未受损伤的毛弄破这层唾沫的薄膜，并没意识到这么做时我已经模拟了童贞全部的谜。

我青春期的标志，就是有意识地强化从我童年就开始显露的天才的所有天赋、怪癖和神话。我丝毫不想改正自己身上的任何东西，也不想把自己变为其他人。此外，我还具有以无论什么手段夸耀我的存在方式并使人接受它的意志。在用日益增长的激烈态度显示我的个性时，我的个性很快就升华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和无政府主义的倾向，而不再继续满足于一种原始的自恋。“孩子王”变成了无政府主义者。原则上，我反对一切。从童年起，我已经做得完全“不同于别人”，但这种情况是我想不到的。而从青春期开始，我有意这么做。要我回答“白”，别人只需说“黑”就够了，要我吐唾沫，别人只需尊敬地鞠躬就够了。我连续不断地需要感到自己不同于别人，这使我气得大哭起来。我不停地重复着：“我是独一无二的！我是独一无二的！”在理想地题着这几个字的旗帜的影子下，受到我那些精神的堡垒和苦闷的大墙的保护，我确信我的孤独直到暮年也不会动摇。

我避开那些少女，从塔楼磨坊那罪恶的场面发生后，我觉得对于我面对暴风雨显得如此脆弱的灵魂来说，她们是最大的危险。尽管如此，我仍然通过选择一位在邻近城市街头擦肩而过的、当然不会再见到的少女，来设法永远地陷入恋爱，不过以这样的方式，我注定决不会碰到向往的对象。

这些愈加不现实和未能满足的爱情，使我轻松摆脱对一个又一个少女形象的感情。而这种情况就处在我灵魂最恶劣的风暴之中。我从中获得了对连续性和女性再生的确信，仿佛我仅仅爱上了完全受我全能的意志支配的同一个有着成千面孔的生命。

正如在特拉依代尔先生教室上课时，我能照我的欲望在卡塔卢尼亚天空的云彩上看到“我所想的一切”，我同样也成为我的感情生活的完美魔术师，因而形成了我最初的同一律。爱情服从于想象，一切都转向了加露琪卡。

我更大声地讲出了我的超级个人主义表现为各种反社会的倾向。从我着手准备中学会考时起，这些倾向就采取了一种追求时髦的形式，它是绝对的、

故弄玄虚的、矛盾的。机遇负责使我最微小的行动具有戏剧性的效果，从而为我本人的神话做出了贡献。

在基督教的学校接受修士会的教育后，我进入了主母修士会的学校，这儿能提供中等的教育。这时，我声称我在数学领域做出了一些惊人发现，它们能使我获得金钱。我用一些十生丁的硬币买了一些五生丁的硬币。大家无法理解这种必然会异致破产的游戏。我花掉了钱，我装出在一个秘密存折中存了钱，我把它珍藏在口袋里。这么干了之后，我满意地搓着手。

“再来一次，我已经赚了。”

于是，我从临时的柜台处站起来，装出一种我并不想流露出来的，但却不由流露出的快活神情，它仿佛在说：“傻瓜们，我刚才骗了你们。”我的同学们喊着：“他真是个疯子。”我高兴地体会着这句话。

再次想让同学们吃惊，在傍晚离校之际，我发明了那些“袭击”。受害者一般是些比我弱小的孩子。首次“袭击”是对一个十三岁的男孩发动的，他正傻呵呵地吃着面包和巧克力，吃一口面包，再吃一口巧克力，一口接着一口，这种规律性从一开始看到时，就惹我生气。另外，他很难看，巧克力的质量也很差，我看不起他。装出埋头阅读克鲁泡特金亲王的一本书（21），我悄悄走近这个孩子。我的牺牲者看见我走过去，但是毫无防备，继续咬着他的点心。我赶快准确地移到我想站的地方，看着他用那种令我发火的可憎方式吞咽。紧接着，我突然使劲打了他一个耳光，他的面包和巧克力飞到了半空中。我极为吃惊，好半天才明白刚刚发生在他身上的事情，而我早就飞跑到老远的地方了。这个孩子并没追赶我，他弯下腰捡起他的点心，继续吃起来。

我的这一击没受到惩罚，这种情况刺激了我的野心。我再也不能放弃这些袭击。仇恨和轻视不再起任何作用，吸引我的只是一种极度的不安，它跟实现我的行动和由此产生的各种曲折联系在一起。

这些袭击中的另一次的受害者，是位我几乎不了解的学小提琴的学生，而由于他的艺术爱好，我更倾向于钦佩他。他个子高高的，又瘦又苍白。他有病的样子，使我猜想他没什么自卫能力，我不会有遭到强烈反抗的危险。我跟踪了他约有一刻多钟，一直找不到下手的时机，因为他始终跟另外几个学生在一起。终于，有一会儿，他离开了同伴，蹲下来系鞋带。他的位置再好不过了，我像闪电般迅速跑去，突然在他屁股上狠狠踢了一脚；在这之后，我双脚并在一起跳到他的小提琴盒上，把它踏成碎片。几下子，我就跑远了，可我的受害者，虽然吃了一惊，但很快就恢复过来，满腔愤怒地在我后面穷追不舍。这个男孩腿比我长，一秒一秒地，我们之间的距离渐渐缩小了，终于我感到完全不可能逃掉了，我停下来，疲塌地跪倒在他膝下，恳求他原谅我。我甚至打算向他建议赔他二十五个比塞塔，只要他不碰我。但或许是真的，他的愤怒太强了，他根本不准备原谅我。于是我用双臂遮住头保护自己，可这并不足以避开猛力一脚和好几个耳光，这顿拳打脚踢使我瘫倒在地上。他的气愤并没因此而减轻，他从我头上扯下一络头发。我发出了一声疯狂的惨叫，浑身颤抖得十分厉害，这个男孩停下手来，轮到他惊恐了。

一群同学在我们周围围成个圆圈，经过这儿的一名文学教师走过来，询问发生了什么事，于是我的受伤的头脑中立即就冒出了一个惊人的谎言。

“我刚才压碎了他的小提琴，终于无可辩驳地证明了绘画优于音乐！”

一阵深深的沉默迎接着我的回答，接下来就是一些模糊不清的低语和大

笑。这位教师愤怒地问道：

“究竟是怎么搞的？”

“用我的鞋子！”

这次，在我们周围掀起了一片吵嚷声。这位教师用一个手势让大家安静下来，他差不多就像是位慈父，以责备的声调补充道：

“这什么都不能证明，而且也毫无意义！”

我一板一眼他说：

“我很明白，对大部分同学，甚至对大部分老师来说，这没有意义，与此相反，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鞋子并不这么认为。”

在我四周，产生了一种不安的沉默，每个人都期待着对我蛮横无礼的言语的斥责，可是这位教师突然沉思起来，让大家惊奇而又失望，他只是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使人们明白他认为这件事到此为止，至少是暂时到此为止了。

从这天起，围绕着我的个性开始形成了一个大胆的光环，接下来的那些事很快就成为了神话。同学中的任何一位，决不敢用我刚刚证实过的那种放肆的口气回答一位教师。大家一致说这种放肆的口气使我的对话者喘不过气来。这种勇气有效地突出了我的家徽，我疯疯颠颠的交易活动和其他怪诞的行为曾有点儿影响了它。我成为人们辩论的一个主题。他疯了还是没疯？他仅仅是半疯吗？他会成为个杰出而又不正常的人吗？最后这种见解，得到了我的绘画老师、书法老师和心理学老师的赞同。相反，数学老师则确信我的智力处在远远低于常人水平的位置上。

一般而言，那满足于不正常或与众不同的一切表现都自然而然地属于我。我越“唯一”和“独特”，我就越变得显而易见。我终于十足地炫耀着我的孤独，就像戴满咄咄逼人的珠宝的女主人那样为它感到自豪，我对我自己的特有敬意就是这样的珠宝。

博物学课用的骨架上的颅骨不见的那天，人们非常怀疑我，竟然砸碎我的课桌来查看我是否把它藏在里面。人们太不了解我了！骨架过去使我害怕，现在还使我害怕，我绝对不愿去碰它。它消失后的第二天，人们找到了罪人，一位教师把这颅骨带回家去研究了。

一天早上，在惯常的咽喉炎发作使我好几天没到校之后，我正重新向学校走去，我看到一圈学生激动地破口大骂。他们围绕着一面西班牙国旗，焚烧它，抗议昨天报纸刊登的一些威胁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者的政治消息。当我走近他们时，大家的狂奔乱跑令我吃了一惊。以为我的到来是他们奔逃的原因，我独自一人呆在现场观看冒烟的国旗残片。在远处，那些奔逃的人怀着恐怖和欣赏的心情注视着我，对此我越发感到莫名其妙。我根本没看到一队士兵的出现，他们意外地经过这里，马上开始寻找这场反爱国主义行动的罪犯。我多次声明我在场纯属偶然。可没有什么用。我受到控告，被带到法庭上，鉴于我年少，宣告释放我。然而这一事件，在经过一次次嚼舌的放大后，再次为增加我的光荣做出了贡献。每个人都在讲述士兵来时我不但没逃跑，反而显示出革命者的坚忍精神和令人钦佩的镇定态度的风范。

我让头发像少女的头发那样长起来，在镜子前打量自己时，我喜欢摆出拉斐尔自画像的姿势和忧郁的目光。我焦急地盼望最初的细软胡须出现，我可以刮掉它，但我仍留着某些特别喜欢的细毛，让它长下去。我应该用我的头创造一件杰作，我应该装扮出合适的表情。我经常冒着被抓获的危险，进

入母亲的房间，从她那儿偷一些香粉和一支眉笔，我用后者描黑自己的眉毛。在街上，我用力舔着双唇，使它们显得更红，我喜欢行人们好奇的目光，他们碰到我时，低声说道：

“这个男孩是公证人达利的儿子，就是他烧了一面国旗！”

把我造成一位身不由己的英雄的那些看法，使我十分反感。首先是太多的同学接受了它们，其次是当地的这些爱国主义冲动让渴望着伟大的我感到可笑。我觉得自己是个无政府主义者，虽然这是一种纯属个人的、反多愁善感的无政府主义。我只把这种无政府现象设想为一个王国，我是它至高无上的捣乱者和绝对的君主。我创作了好几首颂歌，盛赞达利式无政府主义君主制的光荣。

同学们全部知道我的歌，他们试着仿效，但没有成功。我对他们可能发挥的影响开始引诱着我，“行动”的念头一点一点地在我心中产生了。相反，我这个年纪男孩们通常有的那种孤独的乐趣却延迟了。我听到了充满言外之意的谈话的片断，尽管我做了种种努力，仍然难以理解它们。我从不大胆地问应当怎么做“这件事”，因为我非常害怕人们发觉我的无知。一天，我终于得出结论，“这件事”可以单独干，而要最快地决定，也可以

两个人或更多的人共同干。我看到我的两个朋友心照不宣地交换了一下眼神就走掉了，这眼神使我好几天都心绪不宁。他们走出去躲了起来，回来时，我觉得他们的行动改变了他们的面貌，他们显得更漂亮了。整整有好几天，我陷入了沉思，对我这个年龄来说，这些沉思的幼稚是不正常的。

我不好不坏地通过了第一年的考试，不过没有一门不及格，要是不及格的话，我就会因为不得不在夏天学习而糟蹋掉它。我的每个夏天都是神圣的，我总是发狂地期待着它们。

我的假期从圣约翰日开始，此后我永远记得在地中海沿岸一个用石灰刷白的小村庄卡达凯斯度过的这一天。从童年起，我就怀着一种几乎是奇怪的忠诚之情崇拜这个地方。我了解它的各个角落和隐蔽之所。我记得它的小湾、它的岬角、它的峭壁的形状。我在这儿留下了我整个感情和爱情生活的印迹，独自体验到一天之中影子的变化过程，从它们在峭壁上痛苦的前进到月亮蜡黄色光线的出现。我在散步中留下了一些标记，大部分情况下，这是在最后的阳光恰好照到的地方放置一枚橄榄，它摆在一块软木上，接下来，我跑向近处的泉水去解渴，眼睛盯着我的橄榄，在预定的时刻，它闪耀着樱桃似的光彩，我喝的清凉的水也是构成这个奇怪仪式的因素之一。仪式之后，我把橄榄塞在我的一个鼻孔里。随后，奔跑着，我感到急促的呼吸冲撞着橄榄，最后把它赶了出来。我只好捡起它，洗净后放到嘴里，它在嘴里散发出一股哈喇油的味道。

好了，这就是我最喜爱的风景！我很了解你，萨尔瓦多，我知道如果它不真正是世上最美丽的风景，你是不会这么爱卡达凯斯的风景的，而它现在的确是最美丽的，难道不是这样的吗？正如人的面孔上只有一个鼻子，而没有百来个朝四面八方生长的鼻子；同样，地球上稀有的东西就是仅仅存在于地中海沿岸的风景，而不是其他什么，这风景是奇迹般的难以估量的环境的成果。最令人奇怪的就是风景中最美丽的、最有灵性的、最卓越的地方，位于卡达凯斯一带。由于一次绝无仅有的机会（我赶快承认这件事），卡达凯斯恰好成为了萨尔瓦多·达利自最初的童年时期起就定期度过他夏天的审美历程的地方。卡达凯斯风景的美丽和卓越有赖于它的构造。每一处丘陵、每

一块岩石就像是列奥纳多亲手描绘的。除了这构造外，什么都没有，就连蔬菜也很少见，只有一些橄榄树用它们银色的发环绕着那些丘陵的沉思的额头，若明若暗的羊肠小道在这些额头上划出了一条条皱纹。曾遍布在山坡上的葡萄树，受到根瘤蚜兵的侵袭，已经消失不见了。这种荒凉进一步强调着山坡的构造。往日的葡萄树的挡土墙，如同大地的测量线，勾划出一些不规则的梯段：通过这些梯段，山仿佛庄严地降入了大海。在那些怀旧的拉斐尔式或帕拉第奥式的山峰中，这些微笑着的、沉默着的、被酒神般的感情弄得兴奋的梯段在水边重又繁盛起来。化身为并人格化为古代文化的所有已不在的血与酒的宁静而又芬芳的幽灵，它那两只巨大的赤足今天仍然歇息在这块悲哀的、凹凸不平的、贫瘠孤独的土地上。

当人们最少想到它时，蚱蜢跳起来了！再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永远是同样的情况。在我全神贯注的沉思中的那略感凉意的一瞬间，蚱蜢跳了起来。那吓人的跳跃使我呆住了，它在我受到震动的生命中激起了一种心惊胆战的狂跳。这邪恶的昆虫！这萨尔瓦多·达利生活中的恶梦、受难和引起幻觉的疯狂。

今天，这种恐惧仍没减轻。它甚至可能增加了。如果我站在深渊旁，如果一只大蛛螭跳到我脸上，那么我宁愿跳入承受着这个可怕东西的虚空中去。在我的一生中，这种恐惧始终是个谜。童年时，我极为喜欢蚱蜢，姑姑和妹妹陪同我一起捕捉它们，这是为了随后打开它们的翅膀，它们的微妙色彩变化，使我想起了卡达凯斯黄昏的天空。

一天早晨，我抓到了一条很粘的小鱼，人们称这种鱼为“流涎鱼”。我用手紧紧抓住它，防止它滑掉，这时它小小的头伸了出来，我凑过脸去想仔细看看它。可我发出了一声恐怖的喊叫，把这流涎鱼抛得老远。父亲发现我满面泪水，走过来劝慰我，试图了解我恐惧的原因。

我说：“我刚才看到了流涎鱼的头。它的头完全与蚱蜢的头相同。”

鱼和蚱蜢的结合，标志着我对这种昆虫害怕的开始，蚱蜢意外的出现，引起我发出一阵阵耸人听闻的神经质地喊叫，为此，我的父母禁止别的孩子向我扔蚱蜢，因为他们不停地这么干，从我的恐惧中得到乐趣。父亲不厌其烦地重复着：

“真是怪事了！他过去那么喜欢它们。”

一天，我表妹故意在我脖子上压碎了一只蚱蜢，我直接感到皮肤上有股与鱼相似的粘性。虽然被压碎了，这个昆虫仍在动弹，它带齿的爪子那么有劲地抓住我的脖子，与其说它松开了这些爪子，不如说它让它们扯掉了更确切。我有一阵子处于半昏迷的状态中，在这之后，父母成功地从我身上把这可怕的东西弄下来，但整个下午我都在海水里冲洗着自己，以便除去那种难以忍受的感觉。就在写下这几行的这个晚上，我背上仍然起着阵阵颤抖，我的嘴痛苦地裂着。

我真正的受难在费格拉斯等着我，人们发现了我的恐惧。父母没能在那儿保护我，同学们怀着他们那个年龄所有的全部残酷尽情享受着我的恐惧。他们只想捕捉一些蚱蜢使我奔逃，事实上，为着逃避它们，我像个疯子一样狂奔起来，可永远逃不掉。那半死的丑陋蚱蜢终于落在了我身上。还有一次，我翻开书的时候，发现里面有一只蚱蜢，它被书页压坏了，可那些爪子仍在动来动去。我总担心看到蚱蜢跳到我身上来。这种恐惧太强烈了，结果有一天早晨上课时，我把书本抛到了门上。玻璃的破碎声打断了数学教师的讲课。

我不得不离开教室，我担心父母会了解这种情况。

在学校里，我对蚱蜢的恐惧终于占据了我全部的想象。我到处看到它们，甚至在没有它们的地方也看到它们。我尖厉的喊叫让同学们感到快活。有人抛在我颈背上的一只单纯的橡皮球，就会让我跳起来，浑身抖个不停。这种神经质的状态变得那么骚动不安，结果我想出了一个计策，它即使不能让我摆脱恐惧，至少也能让我摆脱其他孩子的残酷。我创造出一种反蚱蜢的东西，这是一种单纯的白纸折成的鸡，我声称它会比蚱蜢更让我害怕。我恳求大家别让我见到它。当有人挥舞一只蚱蜢时，我尽最大努力控制住恐怖，把喊叫声留给那些白色的纸折鸡。这种假装的恐惧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制作纸折鸡对他们来说要比捉蚱蜢更容易。多亏这个计策，我差不多摆脱了那些昆虫。显然，我的装假本身要付出代价，因为我不应忘记装出恐慌的样子；不这样做，我就会被戳穿。随之在课堂上出现的那些混乱变得太惊人了，就连老师们都感到不安了。他们决定处罚那些给我看纸折鸡的学生，说加重我的神经质状态是有罪的行为。然而，大家并不赞同这个如此善意的体谅。一天下午，当修道院长视察我们班时，我在鸭舌帽中发现了一只白纸折鸡。我知道大家都在等待着我的反应，为了不让他们失望，我发出一声恐惧的喊叫。老师一腔愤怒，命令我交出那东西。我拒绝了。他催促着我：“绝对不能不交出来！”我突然灵机一动，碰翻一个墨水瓶，纸折鸡被染成了深蓝色。于是小心地用大拇指和食指拿着它，我把流淌着墨水的它丢在老师的讲台上。

我说：“现在我可以听您的话了。它不再是白色的，我不会害怕他了。”

这次达利式的新冒险使我被学校开除了……

我对1914—1918年战争的种种回忆都是令人愉快的。西班牙的中立给这个国家带来了安乐和经济上的迅速繁荣。一个新富人的粗野圈子发展了起来。流传着关于他们的大量轶闻，我并不是最后一个发明和贩卖它们的人。在各地举办了一些怪诞的盛会。夫人们学会跳阿根廷探戈和在吉他伴奏下唱德国歌曲。和平像炸弹一样爆裂开去。停战在整个亲法的卡塔卢尼亚地区是一种普遍欢乐的标志，这个地区只保持着对拿破仑征服的金黄色记忆。协约国的胜利是富于感染力的。大家都想利用它，人们在费格拉斯街道上组织了一次公众游行，周围乡村的人也来参加。一列队伍举着国旗和横幅彩带，络绎不绝地行进着。人们跳起萨尔达那舞。学生们组成了一个“学生团体”，它得选举一个委员会来讨论有关参加胜利游行的事宜，它的主席来找我，请我致开幕词。

他对我说：“你是唯一能做这件事的学生。但你特别要做到热情洋溢、富于气势，要成为你自己。你有二十四个小时做准备。”

我接受了，立即着手写演说词，它大约是这样开始的：“刚刚实现的生命的大牺牲，唤醒了所有被压迫民族的政治觉悟……等等、等等。”我对着镜子研究情节剧式的动作。但是随着我演说的进展而扩散开来的胆怯之情暗暗地破坏了我的信心。我首次公开演说不能让熟悉有关我的传说的听众失望。要是我幼稚的胆怯在最后关头让我倒下了，那就太可耻了！我决不敢装病，更何况在我的勇气减少的同时，我的演说却因那些灿烂的修辞花朵和最富独创性的哲学观念而膨胀了起来。孤零一人，虽然已熟记注我的结束语，但一切都在我眼前变得模糊不清了，我终于再也抓不住失去的思路了。不，我不能这样！不能这样啊！我死命地跺着脚，捂住面孔，因无法控制自己而感到屈辱。当夜，到田野散步也不能使我镇定下来；何况在回来的路上，我

还发觉与一群事先就嘲笑过我的演说的学生混杂在一起

第二天，我醒过来，致命的痛楚沉沉压在我心上，早餐时，我什么也吃不下。我拿起演说稿，把它卷成一卷，用橡皮圈套住它。精心梳妆打扮好了，我走到“共和主义者中心”，这是我们开会的地点。我觉得这段路程是种苦刑。我提前一小时到了，因为我想利用这段暂时的休息使自己习惯大厅和听众，可这些听众慢腾腾地走进来，并没有让我一下子感到面对一群热烈的听众。刚一进门，我就感到脸红得厉害，不得不坐下来。有人给我拿来一杯水。微微恢复了点镇静，我就恐惧地注意到一些大人物在场，甚至还有一些非常吓人的少女也来了。共和国的旗帜环绕着讲台，讲台上三只椅子在等着我们。中间一只注定属于我。我右边是主席，我左边是秘书。当我们坐下来时，一些讽刺的笑声（它们像烙印一般烙在我皮肤上）迎接着我们。我把头埋在两手间，仿佛在审视演说词。我以一种突如其来的惊人自信的态度打开了文稿。秘书站起来，开始就会议的主题进行长篇陈述，那些把我们当笑料的人不断用插科打诨打断他的陈述。我摆出好像完全把注意力放在自己演说稿上的样子，可我没漏掉一点挖苦的言词。秘书草草地结束了他的报告，在简短介绍我在焚烧国旗事件中表现的英勇精神后，就请我发言了；大厅里变得无声无息了，这是一种感人的安静，我明白人们主要是为我而来的。第一次，我体味到这种成为“整体期待”的对象的快乐，此后这种快乐重复出现过许多次。我慢慢站起来，仍然不知道我将会做什么。神经是如此紧张，我连演说开头的话都找不到了。一秒钟一秒钟过去了，大厅里越来越安静，而我却没有开口。要爆发什么事情了？怎么搞的？血涌上我的头，我用一种轻蔑的姿势举起手臂，拼命高喊：

“德国万岁！俄国万岁！”

这么做过之后，我一脚把桌子踢到前几排听众席上。几秒钟，混乱就达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但是与我的期望相反，人们不再注意我了。大厅内的听众分成好几个阵营，相互打斗、辱骂和争论着。我恢复了镇静，不受注意地溜了出去，跑回家中。父亲问我：

“你的演说怎么样？”

“很好。”

这确是真的。我的宣告刚刚造成了一个伟大的独创性的政治结果。马丁·维拉诺瓦，这位当地的鼓动家之一，用他的方式承担起解释我奇怪的态度工作：“再没有协约国，也没有战败者了。德国正在爆发革命。它与战胜者有同样的权利。由于更强的理由，俄国革命是这场战争最有希望的果实。”他又进一步解释踢在桌子上那一脚的目的，就在于要使理解我政治思想太慢的听众受到震动。

第二天，打起一面德国国旗，我随着列队一起游行。马丁·维拉诺瓦挥舞着另一面旗，它上面题着苏维埃共和国的缩写字母：U.E.S.S.这当然是西班牙最初的这类东西。早些时候，维拉诺瓦小组决定用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的名字命名费格拉斯的一条街。他带着一条巨大的横幅布匹，要我用漂亮的美术字写上下述题词：“费格拉斯市向自由和弱小民族的捍卫者伍德罗·威尔逊致敬！”我们登上屋顶，把这个横幅布匹钩在四个平时张挂布制品的环上。我答应立刻动手干，以便在第二天及时准备好一切。第二天早晨，我醒了，被后悔折磨着，因为我还什么都没干。哪怕马上动手，油漆也干不了。我自认找到了另一种解决办法：如果我在扯平的布上切割出字母来，那

么这个题词就会映在蓝天上。当我想进行这项工作时，我发觉布料太厚，用剪子无法剪开它。接着，我用的那把厨房的大菜刀只能做到在它上面弄出个大洞。经过这些失败后，我发明了一种同样疯狂的新技术，这就是首先在布上大体烧出字母的形，然后再用剪子把字母弄光整。我准备了不少桶水，以防万一布着起火来。自然，我只能弄出一块不规整的烧痕，我费了好大劲才把它弄灭了。经过两小时的折腾，结果似乎只是一场灾难。布上有了两个洞，小的一个是用菜刀切割出来的，另一个大的是烧出来的。一切都完了。我再没时间干任何事了。泄了气，又累得要死，我只看到在四个挂钩间拉紧的这块布形成了一个很舒服的吊床。我伸展开四肢躺在它上面，它的摆动那么让人感到惬意，我很快就想睡觉了。不过我记起父亲让我当心太阳。在不遮挡的情况下睡觉，容易脑充血。我脱掉衣服，放了一桶水在那个布洞的下面。趴在我临时的吊床上，我可以把头伸进那个烧出的洞，让自己凉快凉快。这个洞不幸地扩大了，要是我不能用脚钩在菜刀弄出来的另一个洞上，那我就有整个掉下去的危险了。只有把一条腿收回来，我才能再站起来。一切如我最初希望的那样进行着，当我正想用脚支撑身体向上时，我的体重把布扯裂了。我的头深深陷进桶里，结果它被卡住了，我处在一种不仅可笑而且致命的状况中，无法从桶里出来。我手脚乱动地挣扎着，可只能使吊床无效地来回摇晃。如果马丁·维拉诺瓦不来解脱我，那我就要在这种荒唐的状况中窒息而死了。不明白我与横幅标语发生了什么情况，他跑到家中来了解耽误的原因，才发现萨尔瓦多·达利就要淹死在费格拉斯的屋顶上的一只桶里了，在这同一屋顶上，孩子王几年前就了解到今人陶醉的眩晕感。

从桶中被解救出来，我过了一阵子才恢复知觉，缓过气来。怀着不安的心情，马丁惊愕地问我：

“你全身赤裸，头扎在桶里，到底在这儿搞什么名堂？全体民众已经等了半小时了，告诉我你干了什么！”

我再次有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巧妙回答：

“我正在发明反潜艇。”

当晚，马丁·维拉诺瓦负责在街道上的散步者中间宣传我的故事。“这个达利真伟大啊！当我们和政府官员及乐队等待之际，他却全裸着呆在屋顶上，把头扎在一桶水里，正在发明反潜艇，幸而我及时赶到了，否则他就会淹死了。这个达利可真伟大！他真伟大！”

第二天晚上，人们在威尔逊总统街跳着萨尔达那舞，我终于成功地涂抹成的横幅标语穿过街道在飘动。人们还可以在它上面看到两个阴森森的洞，可是只有我和维拉诺瓦才明白它们配合着萨尔瓦多·达利的颈和脚。生气勃勃的达利本人就在那儿。

他还会经历另一些奇遇，不过请耐心一点。一切都会按时发生的。在这次战斗后，他已经被中学开除了，不得不到学院继续学习，他感到内疚，逃避着少女们，爱着那永远存在的加露琪卡。他还不了解“这件事”。他的毛长了出来。他是无政府主义者、君主主义者和反卡塔卢尼亚主义者。有人已经为亵渎爱国主义向他提出控告了。在一次会议中，大家全是协约国的支持者，而他却高喊“德国万岁！俄国万岁！”最后，他在发明反潜艇时差点儿死掉。他真伟大啊！看看这个萨尔瓦多·达利多伟大啊！

第七章
“这件事”——哲学研究——未满足的爱情
——技法的经验——我的石器时代——种
种爱的结局——母亲去世

我长大了。在卡达凯斯皮朝特先生的花园住宅里，种在庭院中央的丝柏也长大了。我脸颊的一半已布满了像一条排骨的颊须。我只穿柔软的黑色天鹅绒服装，嘴里叼着一只海泡石烟斗散步，这只烟斗的锅上描绘着一个露出全部牙齿大笑的阿拉伯人。有一回，到盎蒲利亚的废墟去远足，当地博物馆馆长送给我父母一枚铸有希腊妇女侧面像的银币。我用别针把它别在领带上，永远配戴着它，断言这是特洛依的海伦像。我总是带着一根手杖出门，我拥有这样一批收藏，其中最漂亮的一根带有双头鹰形状的金柄饰。我长大了。我的手也长大了。“这件事”一天晚上在学院的厕所里发生了，我感到失望……一种负罪感控制了我：我曾以为“这件事”是另一种情况！尽管我感到失望，可在向自己保证这将是最后一次的情况下，我又重新干起了“这件事”。三天后，诱惑再度出现了。对我来说，能抗拒它一天一夜的情况是很稀罕的。于是我总是重干“这件事”……“这件事”还没有完结呢！

我养成了用全部生命的热情和专心来画画的习惯，这种态度的产生，是因为我需要摆脱干“这件事”的悔恨之情。每天晚上，我都到正规的绘画学校去学习。我的老师努耐斯先生是一位非常醉心于美术学院的优秀画家，曾获得过版画罗马奖。他把我带到他家里，向我解释明暗的奥秘，也向我解释他拥有的一幅伦勃朗版画原作中非常不合常规的线条的奥秘，他怀着深深的崇拜之情抚摸着这件作品。我从努耐斯先生家中走出来，兴奋激动不已，那些最伟大的艺术抱负使我脸颊发烧，心里洋溢着对艺术的一种类似宗教般的敬仰之情。我回到家里，把自己关在厕所中，干了“这件事”。每天，“这件事”都变得更加美妙，一种心理的技巧使我能越来越长的间隔期干“这件事”。现在，我不再声称这是最后一次了，相反我允许自己每星期天干“这件事”。一想到将会得到的乐趣，就冲淡了我那些色情的欲望，我在等待星期天中找到了精神上的满足。我越等待，“这件事”就越美妙，行为本身就夹杂着最舒服的眩晕。

在学院，我依然是个平平常常的学生。大家都劝我父亲让我从事绘画。坚信我天才的努耐斯先生，比一切人都更主张这样，可父亲并不想决定什么。画家的职业使他害怕，然而他却尽一切力量使我受完艺术的教育，他给我买我需要的那些书、杂志和用具。

他说：“等他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时，我们再决定吧！”

我自己早就决定了！在此期间，我不是阅读，而是贪婪地吞食我父亲图书室中的那些书。两年内，它们就被榨干了。伏尔泰的《哲学词典》给我留下了最深刻的印象，而《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却让我觉得还不如我本人能写的东西。我偏爱阅读我毫不理解的康德的著作，这让我心中充满骄傲和满足。我喜欢迷失在他各种论证的迷宫中，这些论证就像天国的音乐在我耳边回荡。写出如同康德著作一样重要和无用的哲学的人，只能是位大使！我阅读不理解的东西的顽强精神，必定是受到强烈的精神饥渴的驱使。正如某些机体性缺钙会导致儿童刮墙上的石灰和石膏来吃一样，我的精神也同样需要这种绝对命令，我在一些年间一直反复思考这种绝对命令，可始终没能吞下

它。然而，有一天，我终于吞下了它。门打开了，我明白了。我从康德走向令我激动的斯宾诺莎。此后，笛卡尔帮我建立了我后来那些研究的方法论基础和逻辑学基础。先前我是为了笑而读哲学的，现在我却是以哭结束读哲学的。一本小说或一出戏无法办到的事，在我读懂一个奇妙的同一律定义的那一天发生了，我目前已经记不清当时是在读谁的著作。哪怕是在今天，在我对纯哲学几乎不再感兴趣时，一个思辨力的例子，不管它是属于谁的，仍然会使我双眼满含热泪。

在学院，晚上七点至八点，一位教师安排了一些额外的哲学课。它们是选修课，可我马上就报了名。我们经历了一个特别可爱的春天，献给柏拉图的那些课围绕着一棵挂满常春藤的松树在露天进行。许多少女也来了。我不认识她们，但我感到她们很美。我选择了其中的一位。我们的目光碰到一起，她也挑中了我。这种情况太明显了，我们并没商量，就站起来走了出去。我们非常激动，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我们狂奔到山坡高处，为着呆在开阔的郊外。我们一直跑着，来到两块麦田间的一条小路，这个少女朝我投来火热的目光，她不时笑着，仿佛在鼓励我。气喘吁吁的，不能讲话，我只好指着倒下的麦子中的一处类似壁龛的地方表示：

“那儿！”

她冲向那儿，伸直身子躺下来，我突然觉得她远比我想象的大。她满头金发，乳房非常美，轻轻触摸她的紧身短上衣，我感到这对乳房在我手下像受惊的鱼那样动着。我久久吻她的嘴。当地张开嘴时，我双唇紧贴在她的牙上，直到我都感到疼了。她患着很厉害的感冒，手里拿了块小手绢，不停地用它擦鼻子，可手绢太湿了！我没有手绢给她，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她徒劳地抽着鼻子，但很快鼻涕就又出现在鼻孔边上。她感到害羞，转过头去，用裙子的下摆擤鼻涕。我又冲上去拥抱她，向她表示我并不感到讨厌，再者这也确是实情，因为她的鼻涕，又稀又白，更像眼泪。此外，她连续不断地抽鼻子，也使我产生了她在哭泣的错觉。

我对她说：“我不爱你，我不能爱任何一个女人。我将永远单独生活！”

说这些话时，我感到这个女孩干了的鼻涕弄得我脸颊不好受。我又恢复了平静。同时，我拟定出我的计划，我以极为冷酷的态度盘算着它，以致我觉得自己的灵魂都冻结了。用这么少的时间，我怎样才能重新成为自己的主人？与此相反，我的少女越来越感到局促不安了。显然，她的感冒使她产生自卑感。我亲切地用双臂抱着她，我脸颊上的干鼻涕使我刺痒难忍，为了摆脱它，我装出把我的头靠在她肩上抚爱她。当我们狂奔时，她已流了汗，于是在她的腋下闻到一股很妙的气味这种气味混合了天芥菜、母羊、炒咖啡豆的味道。

“那你明天晚上不再来了？”

扶她起来，我向她保证：

“明晚当然来，而且五年内都要来，但不会再多一天。”

我有我的五年计划。事实上，不算我在卡达凯斯度过的那些夏天，她做了我五年的情人。在整个这段时间内，她一直对我抱着近似神秘主义的忠诚。我只在晚上的不同时刻见她。当我想独自呆着的时候，我就打发街头的一个小女孩给她送个便条。为着我们的相会，她必须使用许多诡计，得到她那些由男孩陪伴的女友的协助。可这使我不高兴，我们设法几乎总是单独呆在田野里。

这五年的牧歌使我得以开发我的反常感情的所有资源。首先，我使她强烈地需要我，接着，我厚颜无耻地逐渐增加我们会面的次数、增加我们谈话的内容、增加我硬说我做出了种种发明的谎言。每一天，我对她的影响都在扩大。这是一种有系统的、进行包围的、歼灭性的、致命的诱惑，当我感到它“恰到好处”时，我开始要求祭品了。她不是不停向我重复准备为我死吗？好吧，就让我们看看这是不是真的吧！

有的读者可能把这种感情的成功归因于我那些唐璜的品质，为了让他们理解，我必须补充一句，五年间，我与这位少女间什么也没发生过。我们接吻、我抚摸她的乳房、我凝视她的眼睛，仅此而已。她的自卑感无疑来自我们那第一天相会和让她非常局促不安的感冒。她渴望在我面前恢复声誉，我越显得冷淡，她的热忱就越刺激她的爱、就越发使她那些不安的渴望变得崇高和不现实，这使她陷入了歇斯底里的状态中。

自从有了这次经验以来，我觉得未满足的爱情是感情神话学中最引起幻觉的主题之一。在我看来，特利斯坦与伊索尔特就是未满足的爱情悲剧之一的人物原型，就像在交尾时吞食雄性配偶的螳螂一样，这种爱情在感情领域是凶残的食人肉者。

我们两人都很清楚，那注定使我情人的爱情得不到满足的我的精神折磨大厦的拱顶石，就是我并不爱她的这种感情；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而她也明白我自己明白她明白我不爱她。我的孤独保持着完好的状态，之所以我仍然能保持如此美的生命状态，因为就是在这种美学的形式上实验我各种“感情活动的原则”。我确信，如我崇拜我的加露琪卡·何地维瓦、我的杜丽塔那样，爱是另一回事，是对所有感情的彻底毁灭。与此相反，在现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情人把我当成目标，我能尝试以后对我大有益处的机智。爱情更在于接受箭而不是射出箭。正是在这位少女的肌肤上，我体验到了圣赛巴斯蒂安的敏感性，它可能潜伏在我自己的体内，我希望能像蛇蜕皮那样摆脱掉它。即使我现在有了一位有乳房和唾液的活生生的情人，她对我的爱使我昏昏然，我把她紧紧抱在怀里，但明白了我不爱她，我就能怀着一种理想的、至高无上的、拉斐尔前派似的爱去崇拜我的杜丽塔、我的加露琪卡和别的何地维瓦了。那永远潜伏着的登上塔楼顶的愿望，从没有因如此人间、如此现实的她而出现。激情越折磨她，她的脸色就越不好，我就越觉得她不配登上塔楼。我想她可能会断气的。当我们躺在草地上时，我有时就对她提起这件事：“你就当你死了那样做吧。”她把双手交叉在胸前，停止了呼吸。她一动不动，有时这会拖得很久，使我相信她死去了，非常慌乱地拍打她的面颊。

她越来越狂热地给我写信，我难得回复它们，如果我回信，那总是为了悄悄塞进一点毒液，让她中毒、变黄，像夏末的蜡一样。

我到卡达凯斯一次度假期的最后几天，雨下个不停。我把上衣放在室外，近黄昏时，发觉它完全淋湿了。散步时，带在身边的情人的信全被水浸透，蓝墨水几乎都泡掉了。我回到皮朝特先生空荡荡的花园住宅，面对着一株我心爱的柏树，一年时间，它已长高了一米。我机械地把这些信团成球，我把它们捏得很紧，我发现自己不自觉地模仿了柏树的球，这些球上面的裂缝跟头骨上的那些顶骨一样。这一模仿太完美了，于是我决定用我的纸球替代柏树的两个果实。这么干过之后，我重新到海边散步，我在这儿呆了一个多小时，一直到天黑，浪花把我打湿了。我嘴唇上的海盐味，在我心中唤起了跟

不朽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神话。回来的路上，我在黑暗中摸索着前进，这时，我浑身颤抖着，把手放在心上，就像有人刚咬了我一口似的。我刚才差点儿撞在皮朝特先生的柏树上，两个白球在黑暗中像死人的两只眼睛一样发着微光。我的脑海中闪过一个不祥的预感：“她死了？”我一身冷汗，匆忙跑回住所，我发现她新来的一封信：“我胖了，大家认为我气色很好，可我只对你再见到我时会怎么想感兴趣。我无数次吻抱你。我永远念着你……”这个傻瓜！

父亲心软了。我了解这一点，准备着中学会考后当一名画家。这还要三年光景，可大家已经在谈马德里美术学院，要是我能得奖，或许还能去罗马的美术学院。入校正规学习的念头以我的反叛开始，我想成为自由人，谁也无权干涉将出现在我头脑中的东西。我已设想出跟我的老师们的一场死战，我要干的事，应该在没有目击者的情况下发生。

当时唯一的目击者努耐斯先生，因为我而永无安宁了。每天，我都使他震惊，迫使他承认我有理。我处在发现技法的盛期。它们都有同样的源头：反教师之道而行之的意愿。

有一天，我们在画一位留着漂亮的雪白卷毛胡子的老乞丐。努耐斯先生提醒我，我的素描用铅笔涂得过分了，效果不好，没有表现出胡须的细丝。我应当在一张新画纸上重画，要珍惜白色的效果，只用一只软铅笔轻轻在画纸上涂几下就行了。这位老师走了。我继续变本加厉地用铅笔把面部涂得越来越黑、越来越腻。我投入那么狂热的激情干这件事，结果所有同学都围在我身边了。我借助对比的作用，在预定的时刻，终于创造出这个模特儿的形象，然而我并不满意，继续加黑，使我的素描只不过是一堆结构松散的黑色斑块的组合体。第二天，努耐斯先生来指正时，他绝望地喊了起来：

“你做的正好跟我告诉你的相反，看看这结果！”

我连一秒钟的不安都没有，我回答我立刻就有解决的办法。我用墨涂抹掉我的素描。

“你想弄个负片。”努耐斯先生说。

“我只想做什么明白的。”

“如果你认为能利用粉笔，那你就错了，它在墨上住不住。”

他摇着头离开了。一劳永逸地，我拿出小刀来开始刮纸。最闪耀的白色开始出现在素描上。乞丐的胡子带着惊人的写实性从我素描的黑暗中显露出来。当我希望这些白色模糊些时，我就在要弄模糊的地方吐上点唾沫，再加上磨擦，于是我便得到了一些浅灰色的擦痕。掸掉纸沫，我完美地模仿出了这名乞丐胡子的如丝细毛。我的作品完成了，我让斜射的光线照着这幅素描。

当努耐斯先生看到我的作品时，他首先一言不发地呆在那儿。他的困惑影响了他表示自己的赞赏之情，但是他抱住我，紧得使我喘不过气来，他对我重复着与马丁·维拉诺瓦相似的话：“看哪！这个达利可真了不起！”

这次经验使我久久地思考光线的种种特性和再现光线的种种可能性。我的探索持续了整整一年，终于得出如下结论：只有精心地堆在画布上的色彩本身的起伏，才能对眼睛产生有效的作用。这正是我父母称之为“石器时代”的那个时期。例如，我利用石块来获得一种非常明亮的云彩。我把那些石块粘在画布上，随后给它们涂上所希望的颜色。我最为美妙的这类成果之一，是一幅满天彩霞的落日图。天空中布满了各种大小不一的石块，有一些像苹果那么大。这幅画长久挂在家中餐厅的墙上，我记得，在饭后夜晚的宁静气

氛中，一块脱落的石子掉在石板地上时的突然声响，常常让我们受惊。母亲停下了针线活，父亲永远用以下的话宽慰她：

“这不过是刚从我们孩子的天空中落下的一块石子。”

他很自然地又添了一句：

“这个想法很妙，可谁会买一幅注定要消失的，注定要用石子塞满整个住宅的画呢？”

对费格拉斯人来说，我的绘画探索是一个无尽消遣的源泉，人们暗暗地重复着：“瞧，现在小达利又往他的画上堆石子了！”但在石器时代，人们仍然要求我准备几幅画参加当地的展览会，共有三十来位艺术家参展，一些人甚至是来自赫罗纳和巴塞罗那。我的作品最引人注目。两位最著名的批评家卡洛斯·科斯塔和普依戈·包亚德斯宣称我未来的艺术生涯是光辉灿烂的。

首次对我光荣的认可更加激起了我情人的热情，我利用这种情况，使她永远成为更受我任性摆布的人，我绝对不许她有女友或男友。她必须把自己整个留给我，留给报纸极力称颂的独一无二、举世无双的我。一旦了解到她刚认识了某个人，一旦她向我讲某个人的好话，我马上尽力在她的思想中毁掉这个人。我总是获得成功，找到恰当而又无情的挖苦话。她的感情必须照我的欲望调整，不多也不少。任何违抗我无情法则的举动都要受到流出苦涩泪水的惩罚。我这方面的一个轻蔑的词就会让她想死，由于得不到爱而绝望，她至少也想得到我的重视。她把整个生命都投入了我现在越来越难得答应她的那半小时的散步中。尾声临近了，美术学院的殿堂及它的楼梯、它的三角楣、它的光辉的圆柱在天际显出了轮廓。我向我的情人说：

“再享受一下吧，你只剩下一年时间了。”

为着我们相会的那几分钟，她把全部生命用在使自己显得更美上。画在她脸上的健康让我生气，通过每次都使她哭，我尽力纠正这种情况。在散步的过程中，我给她看了一些我订的《新精神》杂志。她虚心地尽全力在立体主义绘画的复制品上理解点东西。当时，我对我夸张地称为“胡安·格里斯神秘主义的绝对命令”的事物抱着一种热情。我的情人毫不理解我那些谜一般的意旨，我对她说“光荣，这是一种像打开的剪子一般闪光的、尖锐的、锋利的东西”。她全神贯注地听着我讲话的每一细节，并试图用心记住它们。

“你昨天怎么说那打开的剪子来的？”

在我们散步的途中，我们时常远眺“塔楼磨坊”令人肃然起敬的巨大体块。我喜欢坐下来，凝望它。

“你看，”我对她说，“那边有块白点的地方，就是小达利坐的地方。”

她望着我，没注意我指给她看的地方。我用手捏住她的一个乳房，从我们相会时起，她年轻的胸脯已变得像石头一样坚实了。

我命令道：“让我看看它们。”

她解开上衣，向我展示她美丽的乳房，它们有着柔和的白色。乳头就像两个醋栗，上面环绕着一些非常细小的绒毛。当她打算扣上上衣时，我有点激动地命令她：“别扣上！再来一次！”她让手臂垂在身体的两侧，低下了眼睛。她的胸脯急促地起伏着。当我允许她扣上钮扣时，她重整好衣服，无力地微笑了。满怀柔情，我握住她的手，于是我们重又上路了。

“你知道，我到马德里后，就不再给你写信了。”

又走了十来步，她哭了起来。我发狂地拥吻她，感到她像棒子一般大的泪珠烫着我的脸颊。

在我的脑海里，光荣像打开的剪子一样闪着光芒。萨尔瓦多，工作再工作吧！你具有残酷的天赋，同样也有工作的天赋。这种能力唤起一切人的尊敬。从早晨七点起床后，我的头脑整天都不知道休息。就连我和这位少女的散步也参与了我的计划：这是诱惑的上作。父母不停地说：“他从未去消遣消遣！他一秒钟都不停！”并对我说：“萨尔瓦多，你还年轻，要享受这个年龄的时光。”可我想的与此不同：“你快点儿变老起来吧！你现在太青太涩。”我怎么才能摆脱掉青春期这种孩子气的弱点呢？

首先，在学素描时，我应当搞立体主义。但这并不能减轻我对能动性的渴求。我想成为发明家并想写完一年前就动手的一部哲学大作《巴别尔塔》。我已经写了五百页，而这只不过是序言。我的性骚动让位给哲学骚动，我全部的身心都被后者占据了。《巴别尔塔》以对死亡现象的长篇论述开始，据我看，这种现象是以想象的构造为基础的。作为神人同形同性论者，我不认为我是活着的，而是认为我正在从我的那些起源的“无智力的不定型状态”中复苏过来。在大家看来，那在《巴别尔塔》下面的，是易理解的生命，可在我看来，它只代表着死亡和混沌。与此相反，那在上面的，别人觉得是混乱的，在我眼里，却是“逻各斯”和复活。不断为肯定我的个性而斗争的我的生命，时刻都是我的“自我”对死亡的一种新胜利，而在我周围的人中间，我只看到了死亡和连续不断的妥协。我拒绝与死亡做交易。

上一年，我母亲的死是最令我绝望的事。我崇拜她，对我来说她的形象是无与伦比的。我了解她那远远高于人间的一切的圣洁心灵中各种美德的价值，我不能忍受失掉这样一个我认为会使我心灵中不可告人的缺陷消失的生命。她是那么好，我不由会想：“这对我也就足够了。”她怀着非常绝对非常骄傲的爱喜欢我，这使她不会搞错。我恶毒的言行必定也是一种惊人的事情！我觉得这一死亡是命运之神的一次凌辱。人们既不能对她、也不能对我做这样的事。我心头回荡着各种复仇的念头。紧咬着牙，我发誓要从死亡和命运的手中把我母亲拉回来，我应当运用这些光之剑，有朝一日，它们会在我的光辉的名字周围闪射出残忍的光芒！

第八章 光荣的学艺期——被马德里美术学院除名——纨绔子弟的作风——监狱

面对着涌向家中的大量文章，父亲决定打开一册大本子，他想把有关我活动的东西都贴在里面。为此，他写下了一个无疑是留给后代的前言，下面就是完整的原文：

萨尔瓦多·达利·依·多门耐克，学艺的画家

“经历过二十一年的照料、焦虑和努力之后，我终于能看到我的儿子有可能给自己提供生存的必要条件了。一个父亲的责任并非如人们认为的那样轻松。一次又一次让步，我不时会完全听任他超越和拒绝我希望的一切。不管怎样，我们，他的父母，不希望他完全投身于从童年起他就显示出命中注定要为之而生的艺术。我继续确信艺术并非谋生的手段。它不过是我们闲暇时能沉湎的一种精神错乱。我要补充一句，我们，他的父母，相信要成为一名一流的艺术家是极其困难的事。我们懂得一事无成者的种种苦涩、悲哀和绝望，我们尽全力使我们的儿子相信从事他所选择的自由职业是错误的。然而，在他中学会考后，应当承认这一事实：他想当画家的志向比一切都强烈，我不认为有权阻挠如此坚定的志向，此外还有一个更有力的理由，既他在其他一切领域都表现出‘智力的迟钝’。鉴于我们面临的情况，我向我的儿子提出了一个妥协的办法：他进马德里美术学院，在那儿学习所有必要的课程，以获得绘画教师的资格证书。具有这个资格，他就能申请一个可以使他免受各种物质困苦的大学里的职位。那时，他就可以完全投身于艺术了，而我也就会为他的生存放心了。最好，他能过着艺术家的生活，而没有那种令一事无成者变得十分乖戾的经济麻烦。这就是我们面临的处境！我本人将信守我的诺言，让我的孩子获得他一切的物质需要，能完成他的艺术教育。这一努力是十分巨大的，因为我并不拥有私人的产业，我所花费的一切都出自我公证人的收入。每个人都知道费格拉斯的公证人们并不常做黄金生意。目前，我的儿子在他的学校里上课，虽然有一些障碍，但这并不由于他，而是来自我们那些教育中心讨厌的安排。校方认为他学习的进展状况是良好的。他已经学完了两级的课程，并得过两次奖赏，一次是艺术史的，另一次是色彩学的。我写了‘校方’，这是因为他作为学校的学生会做得更好，但在那儿，他对绘画的热情影响了他学习校方的课程。他把大部分时间花在为自己画画上，随后他把画好的作品送到展览会上去。他在展览会上获得的那些成功，超出了我的预料。显然，我宁愿这些成功来得晚点，来在他获得有保障的教师职位时，这样他就不会想收回他的诺言了。尽管写了这些行，如果我声称我儿子的成功让我不快的话，那我就是在撒谎了。即使我的儿子最后不能当教师，围绕着我的所有这些东西也足以使我十分确信他的艺术方向不是一种错误。任何别的一种职业都有可能是场灾难，因为他只感到自己有绘画的天赋。

“这本册子同样包含着一些关于他中学时代、他被开除和他在监狱中度过时光的有用资料，对任何一位想判断他是否是个够格的公民的人，这些资料或许是有益的。我每天收集记录，只要今后能了解到与他有关的东西，

不管是好是坏，我都会长久地继续这么做下去。翻阅这些页东西，我的儿子作为艺术家和公民的真正价值就会显示出来。那些能有耐心看完这一切的人，会对他做出公正的判断的。”

公证人萨尔瓦多·达利
1925年12月31日于费格拉斯

我同父亲和妹妹一起动身去马德里，美术学院的入学考试包括照古代艺术品画一张素描。我的模写对象碰巧是雅各波·桑索维诺《巴库斯》的复制雕像。我有六天时间来描画它。我的工作遵循正常的程序进行，第三天，看门人跟在院子里等我们出来的父亲闲聊，宣称他担心我考不上。

“我不讨论你儿子素描的艺术价值，”他说，“不过他没有遵守考试规则，规则上说得很清楚，素描要具有安格尔用纸的规格，可你儿子画得那么小，人们绝不会把那些空白的地方当成四周的白边的。”

从这时起，我的父亲就像死了一般。他不知道怎么劝我好：是重新画还是不顾一切继续画下去。在此后散步期间和晚上在电影院期间，父亲不停地重复着：“你觉得有勇气重新画吗？”长久的沉默后，他又说：“你还有三天！”我从折磨他获得了某种乐趣。然而，他的苦闷也传染了我。我们躺下睡觉前，他又一次跟我说：

“好好睡吧，别愁这件事。你要做决定，明天就应当保持最佳的状态。”

第二天，我大胆地擦掉了一切，重又变白的纸张使我呆住了。在我周围，别的对手已处在工作的第四天，他们开始涂阴影。再有一轮，只要认真润色一下最后的细部，他们就会画完了。我凭着毅力，重新动手工作。一个小时，我还没能匆匆打好这幅新素描的大轮廓，它这么差劲，我必须重新把它擦掉。父亲等在出口处。

“怎么样，你做了什么？”

“我全擦掉了。”

“新画的进行得怎么样？”

“我还没动手呢，我只不过是擦掉和确定下比例。我希望对这次画的更有把握！”

“你说得对，”他对我说，“可用两小时确定比例，这有点儿太过分了！你只有两天了，我本应该阻止你擦掉它的。”

这天，我们俩谁也吃不下饭去！每次吃饭时，他都坚持着：

“吃吧！吃吧！如果你想明天精力充沛，那就要吃东西。”

我们忧心忡忡。我的妹妹脸色也不好。父亲一秒钟都没睡，始终受着不该擦掉那幅素描的想法的折磨。

第二天，我动手工作，甚至都没看一眼我已记熟了的那个模写对象，这一轮结束时，我只感到把它画得太大。我的画纸上画不下脚了。这比留出过多的白边还要糟。我又把一切都擦掉

在出口处，我发现父亲焦急得脸色都变白了。

“怎么样？”

“太大了。”我答道。

“那你打算怎么力？”

“我已把它擦掉了。”

他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里涌现出两滴泪珠。

“我们走吧，”他说着，仿佛是要让自己放心，“你还有明天的整整一轮呢，许多次你都是用不到两小时就画好一幅素描的！对吧？”

可我知道这非人力所能做到的，因为至少要一天打草稿，再有一天涂明暗调子。父亲也知道这一点。我这个费格拉斯最优秀的人，得满含羞愧地回到那儿去了！努耐斯先生肯定我的素描哪怕只能算我最一般的作品，我也会轻而易举地被录取的。

“要是你通不过这次考试，”父亲说，“这就是我和那个看门的傻瓜的错误，他搅合什么？如果你素描画得好，大小又有什么关系呢？”

他的白发绺，现在它像个尖尖的角那样竖起来，表现出他全部的痛苦。第二天，天亮了，这是个处死刑的阴沉日子。我准备好了一切。结局只能是同我们上一天经历的那些时刻一样糟。从这轮一开始，我就动手工作。用一个小时，我便画完了一切，包括那些最微妙的阴影处。最后的时刻，我用欣赏我作品的优美和成功，这时我又发觉我画出了一个大小的东西，比第一幅素描还要小！

在出口处，我看到父亲正在读一份报纸。他不敢问我，期待着我第一句后：

“我完成了一幅精采的素描。”

停了一下，我又补充道：

“很不幸，它比第一幅还小！”

最后这句话的效果如同投了一枚炸弹。考试的结果同样富于戏剧性。美术学院录取了我，评语如下：“虽然此素描并非按照规定尺寸画成，但是它极为完美，评委会对它表示认可。”

父亲和妹妹离开了，我独自留在学生公寓一间十分舒适的房屋里，要被这儿接纳，必须有极有力的推荐。西班牙最好家庭的儿子们居住在这儿。不久，我就开始到美术学院上课。我把时间全用在这上面。我既不在街上闲逛，也从不去公寓的影院。我很少拜访同学们，一回来就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继续独自一人工作。星期天早上，我去普拉多美术馆，画各个流派绘画作品构图的分析示意图。从公寓到学院，来回的路只需一个比塞塔。一个月又一个月，这一个比塞塔就是我唯一的开销。父亲通过校长和诗人马奎纳了解我的情况，后者受父母委托监护我；我的这种苦行僧式的生活甚至使父亲也感到不安了。他多次写信劝我到郊外游玩、去看戏、跟朋友在城里散步，消除点工作的疲劳。毫无作用。从学院到房间，再从房间到学院，我只花费每日的这一个比塞塔，一个铜子也不多花。我的内心生活自给自足，任何一种消遣只会是种不快的事。

在我的房间里，我画了我最初的立体主义油画，它们有意识地接受了胡安·格里斯的影响。在这个时期，我只运用黑色、白色、赭石色、橄榄绿色，以反抗我前些年的丰富色彩。一顶大的黑毡帽再配上从不点燃的一只烟斗，补足了我的奇装异服。由于讨厌长裤，我开始穿短裤加中筒袜，有时还加上一副绑腿。一件几乎拖到地上的防雨斗篷，在下雨天保护着我。今天我认识到这种奇特的服装曾具有“神奇的效果”。人们经常当面低声议论它，每次我进出房间，一些好奇的人便会聚拢来，看我趾高气扬地走过去。

虽然一开始我充满热情，但很快我就对美术学院失望了。那些教授，尽管有着年纪和勋章，可却不能教给我任何东西。其实，他们虽然“已经”是

教授了，但仍然向“新鲜事物”敞开着怀抱，远非躲在学院的惯例中。在我期望从他们那儿得到各种限制、严格和技法时，他们反而向我提供自由、懒散和不明确的东西。这些老人刚从西班牙的具有典型性的必然范例中隐约看到了法国的印象主义……索罗利亚是他们的神。而我本人“已经”在反对他们经过几代人后才能隐约看到的立体主义了！我向我的教授提出一些让人忧虑的问题：应当如何调合油？用什么来调合？怎样才能得到一种持久结实材料？要获得这样的效果应遵循何种方法？被我的问题弄得目瞪口呆，我的教授支吾搪塞地回答：

“我的朋友，每个人都应当找到自己的方式。绘画无法则可言。请表现吧……抛开你所懂的去表现吧。把你的心灵放进去。绘画是由气质决定的！气质！”

我忧郁地想着：“由气质决定，我能把它转卖给你，亲爱的教授，不过请告诉我混合光油的比例是怎么样的吧。”

“大胆点，”他重复着，“大胆点，当心，别去管细节。单纯点、再单纯点，既不要想规律也不要想限制。在我的班上，每个学生都应该根据他特有的气质画！”

绘画教授啊！教授啊！真是白痴！需要多少次革命，多少次战争，才能回到“严格”是每一等级制的首要条件和“限制”是形式的铸型本身这样一种特别相反的真理呢？绘画教授啊！教授啊！真是白痴！

在马德里，很不合乎常理，我是唯一搞立体主义的画家，可我却向教授们要求素描、透视和色彩的正确技巧。我的同学们把我看成是反对进步的敌人。他们自称是革命者和革新家，因为这样一来，他们想怎么画都成，他们竟然把黑色从他们的调色板上赶走，而用紫色代替它！他们声称不存在黑色，一切全是由光造成的彩虹色，阴影本身都是紫色的。这种印象主义的革命，我十二岁时就搞过了，就连在那时，我也没犯过把黑色从调色板上赶走的错误。只要瞄一眼巴塞罗那某处收藏中一幅雷诺阿的小小作品，就足以使我明白一切了。在若干年间，他们一直停滞在他们消化不良的污浊彩虹色中！上帝啊！人能变成兽吗？

大家都嘲笑一位老教授，他是唯一彻底了解他的职业并具有真正职业良心的人。我本人常后悔当初没充分听取他那些劝告。霍塞·墨雷诺·卡巴涅洛那时在西班牙是很有名的。他从《堂吉诃德》获得灵感的某些油画，至今仍为我喜爱，这种喜爱甚至超过了当年。他穿着礼服来了，领带上嵌着一颗黑珍珠，带着白手套改我们的作品，而手套却一点没弄脏。他只用木炭画两三笔，就奇迹般地把素描拾掇好了。他有一对像梅索尼埃那样把一切都摄下来的通灵的小眼睛。学生们等着他离开，以便擦去他做的种种改正，根据他们的“气质”重画他们的素描。能够与他们的懒散相比的，只有他们那既无缘由也无光荣的自负，这是一种平庸的自负，它无法降到常识的水平，也无法升到骄傲的顶峰。美术学院的同学，你们真是一群白痴！

一天，我带了一本关于乔治·布拉克的专题论著，谁都没见过立体主义的绘画，美术学院的任何一位学生都没想过认真对待这种绘画。只有比别人更具科学精神的解剖学教授请我把这本书借给他。他承认从没看过立体主义的作品，可他正确地认为应该尊重人们所不了解的东西。既然这样一些作品被明确无疑地印了出来，其中必然有某种充足的理由。第二天早晨，在读完序言并弄明白了之后，他把这本书还给我。为了向我证明这一点，他对我引

证了往日的好几种非具象的和明显几何性的作品。我回答他事情并非如此，立体主义保持一种非常明显的再现性素描。解剖学教授向他的同事们介绍了我美学观的智慧和独创性。大家开始把我看成是个不可思议的家伙。

对我的存在的这种注意，有利于唤醒我童年时代就有的暴露癖。既然他们完全无法理解我，我想我本人能向他们解释“个性”是什么。虽然存在着一些诱惑，我们继续保持一种典型的好品质：从不旷课、永远恭恭敬敬、无论画什么题材，都做得远远快于和优于班上最好的学生。然而，教授们并没决心把我看成是位“艺术家”。

“他很认真，”他们说，“很熟练，做他想做的事做得很出色。可是他像冰一样冷，他的作品缺乏热情，因为他没个性。这是个从事理智的脑力活动的人，无疑很有知识。可从事艺术得有心！”

等一等，等一等！先生们，你们就要明白我的个性了！最初的闪光出现在国王阿尔丰沙八世正式参观皇家美术学院期间。当时，他的声望已经在下降，这次参观把学院分成了两派。许多人都想那天不来，校方预料到会有捣乱活动，不得不颁布一些严厉的命令，强迫大家到场。提前一周，有人就开始清扫一直是肮脏和破旧的学院。制定出了一个精明的措施，用来向国王掩饰我们那么稀少的人数。随着参观的进展，学生们得跑过一些内部的楼梯，去填满新的一些大厅，他们要背对国王呆在那儿。平时在马德里街头拉客的一些漂亮姑娘，代替了那些校方只付给极少工钱的骨瘦如柴的可怜的裸体模特儿。墙上挂上了老画，窗户上装上了窗帘，几乎处处都是镶金银线的花边彩带。为国王参观日做好了一切准备，在官方随员的围护下，国王驾临了。我本能地（哪怕只是要与普遍的感情背道而驰）发觉他的面容很和蔼可亲。人们派给他的那种身心衰弱的征兆，我反而觉得是使周围平庸之辈相形见绌的高贵的沉稳风度的可靠标志。他轻松自然的态度是那么完美，不能不说他是从委拉土开兹一幅高贵的油画中活生生地走下来的。我感到他立刻在同学中注意到我。我特殊的打扮、我少女的长发、我的颊须肯定被认为是了不起的东西，而且我们之间受到一种不可抗拒的本能的影响。有人把我当成了一位学生代表，于是我和十来名同学陪伴着国王，从一个班级走到另一个班级。我完全被一个想法吞没了：国王有可能发现学院为给他留下良好印象而耍的花招，这使我感到一种致命的拘束。好几次，我都想揭穿在我眼皮底下演出的这个喜剧，但我终于忍住了。

参观结束了，要拍一张国王与学生们的合影照。有人吩咐去找一把安乐椅来，可他阻止这一行动，以世上最自然的态度坐在了地上。接着他拿下没吸完的香烟，用食指和拇指轻轻一弹，把它抛进二米外的一个痰盂里。这一具有马德里小流氓特色的动作，引起一阵热烈的欢笑。国王刚才肯定迎合了学生们的感情，特别是在场的佣人们的感情，这些佣人从不敢当教授的面这么做，甚至也不敢当我们的面这么做。正是在这一刻，我证实了国王对我另眼看待。事实上，他迅速向我投过来一眼，想看到我的反应。这尖利的目光，显示出他怕有人会在他的举动中发现某种蛊惑人的讨好意味，我对此确信不疑。我脸红了，国王重新注视我时，必定会看到这种情况。

拍完照片，国王跟我们一一道别。我是最后跟他握手的人，也是唯一怀着尊敬之情，一膝着地向他致敬的人。当我抬起头时，我发觉他激动了，几乎令人难以觉察地抽动着他那波旁家族著名的下唇。我们彼此认出了！

两年后，他本人签署把我从美术学院开除的决定时，肯定不会料到被开

除者就是给他留下尊重他的深刻印象的那名学生。

从到马德里时算起，已经过去四个月了，我一如往日，过着勤勉好学的的生活，既有条理，又有分寸。说得更确切点，上述品质在我身上甚至发展为苦行了。我宁愿生活在一座监狱中，要是我生活在那儿，我决不会为我仅有那么一星半点自由感到后悔。我画上的一切变得越来越朴素。我制作了一些画布，上面涂着一层厚厚的胶色底子，居住在马德里的最初四个月内，我在这些石膏般的表面上画了两幅重要的作品，它们像火刑一样给人们留下强烈的印象。这些作品本身就是火刑，因为配制的胶开裂了，我的画一块块掉下来。然而，在它们毁灭之前，有人发现了它们，又通过它们发现了我。

学生公寓分成一些团体和一些小组，这些团体中有一个自称是文学艺术的先锋派团体，它不属于因循守旧的人。战后的那些灾难性腐败气息已经在其中发酵了。这个团体刚继承了另一个文学家和画家团体的否定性的和反常的小小传统；后者自称是“极端主义的”，运用从欧洲模糊的反光中产生的各种“主义”中的一种主义。它们或多或少都与那些“达达主义者”有联系。学生公寓的这个团体中，有佩班·贝略、路易斯·布努艾尔、加西亚·洛尔卡、佩德罗·加菲亚斯、欧仁尼奥·蒙代斯、R.巴拉达斯和另一些人。当时，我只想认识他们中间两位将达到顶峰的人：在诗歌和戏剧领域内的加西亚·洛尔卡，在心灵和智力阶梯上的欧仁尼奥·蒙代斯，前者是格拉纳达人，后者是圣雅克-德-孔波斯代尔人。

一天，我不在时，女佣没关我的门，佩班·贝略从走廊经过，看到了我两幅立体主义的油画。他立刻把他的发现告诉了只熟悉我面孔的这个团体的成员。我不过是挖苦开玩笑的对象，一些人把我称为“音乐家”或“艺术家”，另一些人把我叫作“波兰人”。我极少欧洲味的奇装异服让他们轻视我，把我当成平平常常的浪漫主义残渣，或多或少是肮脏的。我勤学的态度、我丝毫不带幽默的面孔，在他们看来，都表明我是十分欠缺智慧的人，充其量也不过是个怪人罢了。再也没有什么能比我的天鹅绒上装、我的大花结领结、我的绑腿跟他们的西服套装和英国式高尔夫球裤形成更强烈对比的了。他们的头发剪得很短，而我则留着少女般的长发。特别是，在我认识他们的时候，他们正着迷于一种结合了优雅和犬儒主义的情结，他们像老练的纨绔子弟一般运用着它。一句话，他们使我感到手足无措，我一直怕他们进入我的房间，这种担忧几乎达到了会昏倒的程度。

从佩班·贝略发现我的画时起，他们都来看我，以他们惯有的赶时髦作风，夸张地表达他们的赞美之情。他们的惊异无边无际。他们思索着我的每一件东西，但并没想到我是位立体主义者！他们推心置腹地向我招认了他们讲过的话，作为补偿，他们向我提供了他们的友谊。我不如他们豪爽，仍然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因为我自问是否自己真有什么吸引他们的东西。然而，不到一周，我就让他们强烈感到我远胜过他们，很快这个团体的全部成员都开始重复：“达利这么说……达利这么画……达利回答……达利认为……这像达利……这是达利式的。”我很快就明白了他们会从我这儿获得一切，却什么也不会给我。他们有的东西，我已经大量地具有了。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人，只有加西亚·洛尔卡。在他本人混乱的、带血的、粘糊糊的、崇高的、为大量黑暗的地下火焰而战栗的血肉之躯中，仿佛每一种物质都准备找到它独创的形态；他全部的存在都只体现着惊人的诗的现象。我进行抵制，对“诗

的宇宙”采取一种敌对的态度，确信什么都不能处在无限定的状态中。可以为一切事物确立一个“轮廓”、一种“法则”。并不存在人们不能“吃掉”的东西（当时这已经是我喜欢用的表达方式了）。当我感到伟大的费德里柯诗歌的煽动性和富于激情的火焰变成无法控制的冲天烈焰时，我就拚命控制它，用我反浮士德的早熟老年的橄榄枝熄灭它，我已经准备好了我先验的缺乏诗意的烤架，当白天来临，洛尔卡的火焰只残留一些炭火时，我就要在这烤架上烧烤我思想的蘑菇、排骨和沙丁鱼了。在预定的时刻，把一切适时地趁热摆到干净的台布上，这些台布就是你们正在阅读的这些书页。一下子，我就长久地平息了我们时代的精神的、想象的、道德的饥饿。

我们这个团体越来越倾向于反理智的作法，这显然诱使我们只频繁地出入一些咖啡店，会见一些知识分子，在这些咖啡店里，在烧焦的油的浓重气味中，未来西班牙的文学、艺术、政治的前途烧熟了……加橄榄的双份苦艾酒，给英雄主义的嬗变、背信弃义的嬗变、劣质优雅的嬗变、酸性消化力的嬗变、反爱国主义的嬗变提供了一滴滴不好掩饰的多愁善感，这大大有助于使战后产生的混乱凝聚起来。注定要取得进展的、注定要每天开设新的长期赊销分店的、到内战的第一声炮响才停止的、牢固确立起来的一种深刻仇恨，把一切都混合在了一起了。

我的嗓门比整体团体还要大，这个团体刚刚接受我并承认我是它的一名成员，可它什么也不能教给我。我很清楚这不完全是真的，因为他们至少也教会了我一件事，我将一直记得这件事。他们教会了我“弄炸弹”……

我应该给你们详细讲讲这件事。一天下午，这个团体把我带到马德里一处优美的地方水晶宫吃茶点。刚一进门，我就明白了一切。我或许大大地变了样。朋友们把我看成一个远比我本人果断的有自尊心的人了（我无边的骄傲阻止任何东西伤害我），朋友们一心要捍卫我的奇装异服，甚至勇敢地坚持要我穿戴它们。他们准备为此献出一切，反陈规的态度促使他们为我取火。迎接我进入这高雅茶室的目光，显然使他们感到受了冒犯，虽然这些目光是暗暗的、小心翼翼的。他们愤怒的面孔仿佛在说：“怎么！我们的朋友难道像只下水道里的老鼠不成？就算这样吧！可他是你们从没见到的最重要人物，要是你们哪方面有一星半点不敬，我们就打烂你们的脸。”

他们中间最壮实有力的布努艾尔，特别审视着大厅，寻找打架的口实。每个时机都对他有利。但这次他没能发觉它。在出口处，我向我的卫队说：

“你们为我干得很好。不过我根本不想再坚持下去。明天，我要像大家一样穿戴！”

全体成员为这个决定激动万分。一旦接受了我的奇装异服，他们就珍惜它，并准备捍卫它。从苏格拉底接受当弟子的面饮下毒芹汁那一天起，在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内还不曾遇到这种同样的激动之情呢。大家试图劝我改变主意，仿佛剪掉长发和改换服装，我就有可能失掉个性似的。

我的决定不可更改。其实，我坚持它隐含着一个主要的原因，我想讨那天刚在茶室中发现的优雅女人们的欢心。可优雅的女人是什么样的呢？这就是轻视你的、腋下无毛的女人。在我的生活中，我刚刚首次看到剃掉腋毛的腋窝，它白中微透着一点蓝味，显得如此美妙，让我觉得这仿佛就是堕落在豪华的极限。我打算“深入地”研究这些问题，就像我对待任何一件事那样！

第二天，我由开始部分着手，这个开始部分就是我的头。我不敢照朋友们的推荐直接去利兹的理发店。我首先需要一位大量修剪的“批发商”，然

后再去利兹的理发店让人精心修饰。整个下午，我在马德里游荡，寻找一家理发店，可每次我都怯生生地不敢跨过店铺的门槛。多次犹疑后，我终于选择了一个理发师，他用布单围住我的脖子。脱落下来的最初几缕头发吓坏了我。参孙的情结是不是真的？照着镜子，我相信看到一位坐在宝座上的国王，代替披在肩上的白鼬皮斗篷的是一条白围巾。极度的痛苦把我压垮了，我一生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在几分钟之内我就丧失掉对自我的信仰。我觉得我那个孩子王的形象一下子变成了一个无法忍受的病例：生理有缺陷的虚弱体质与不结果实的早熟智力之间产生失调现象的病例。我跟别人一样，也是个白痴吗？

我付过钱，走向利兹。踏在这家理发店的门槛上，我感到最后的担心烟消云散了。我毫不后悔，在利兹，我不觉得是在一家理发店，而是觉得像在一处酒吧。

“给我来杯鸡尾酒。”我吩咐侍者。

“先生，您要哪种鸡尾酒？”

我甚至不懂有几种鸡尾酒，于是抱着碰运气的态度回答：

“随便哪种都成，只要是最好的就行！”

我觉得它太可怕了，可五分钟一过，我就把它想象得十分美妙了。我放弃了理发的念头，又要了一杯酒。这足以使我明白一件令人惊愕的事：我首次旷课了，可我丝毫不觉得这有什么不好。恰恰相反，我认为我的勤奋期结束了，无疑我不会回学校去。我的生活中出现了新事物。

在第二杯鸡尾酒底部，我发现一根白发。这个可爱的象征物，使我感动得流出了眼泪。好像是酒精产生了作用，各式各样的想法以不寻常的速度一闪即逝，生命突然更快地燃烧起来。我重复着：这就是我第一根白发啊！我喝着鸡尾酒，酒劲太冲，我不由闭上了眼睛。它是我“长生”的仙酒、老年的仙酒、“反浮士德精神”的仙酒。坐在我那冷清的角落里，我大声说出这最后的话，幸而并没听到我讲话。我独自呆在酒吧里，再有就是站在柜台后的侍者和一位白发的干瘪老头，这个老头抖得很厉害，他必须极为当心才不会在拿酒杯时把它碰翻。我多想以这么优雅的风度颤抖啊！

我的目光转向杯中的那根白发。

“我要贴近了注视你，因为我生活中还不曾有过你，我没有机会用手指拿起一根白发来观察，来找出它的秘密。”

随后，我把食指和拇指伸进酒杯，可是我的指甲太短，够不到这根头发。这时，进来了一位优雅动人的女子，她穿得很少，肩上披了件皮大衣。她跟侍者亲切地交谈着，后者很快就给她摇好了鸡尾酒，并迅速地瞥了我一眼，紧接着，她又向我瞥了一眼。他们在议论我。为了不显出观察我的样子，她装作在大厅里寻找什么人，可她的目光又一次停留在我身上，仿佛只是出于偶然。侍者等着她看完我，好再跟她讲话。他讲话时，脸上挂着一种并非善意的讽刺的微笑，那位女子更随便地望着我。这些窥视的眼睛激怒了我；笨拙地抓不到白发，也激怒了我，我把一个手指伸进杯子，紧贴内壁用力按住它，缓缓地把它往上弄。这根白发死赖着不动，我的手指却火辣辣地痛起来，我随即抽出了手指。它上面一处割破的伤口大滴大滴地淌着血。为了不让桌子沾上血迹，我重又把手指伸进鸡尾酒中。并无白发，那是玻璃杯上一长条闪光的裂纹。我伤口的血流得愈发厉害了，那位女子目不转睛地观察着我，同时酒也变成了粉红色的。我确信侍者向那位女子讲过角落里这名孤独的酒

徒是个外省人，由于无知才撞到了这儿，竟然天真地点了一种“只要好的就行”的鸡尾酒，而不管它是什么样的！我发誓现在就可以在他的嘴唇上看出这一切！

我继续流着血。我用两条手绢紧裹住手指，止住血后，我把这只手插进口袋。我打算走了，可这时一个达利式的念头涌上我心头，使我走近柜台，把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纸币递给侍者，这个家伙忙着找给我二十二个比塞塔的零钱时，我制止他说道：

“别找了！”

我从没看到过比这更惊异的面孔。这让我想起了我搞那著名的十生丁换五生丁的交易时中学同学们的脸色。这个窍门对成年人同样有效。金钱具有何等至高无上的权力啊！我在酒吧里立刻就明白了这个道理。还没完呢！已经把我的羞怯驱散掉的酒精，使角色颠倒过来。我恢复了自信和大胆。

我说：“我想买个樱桃。”

一只托盘上放满着各种蜜饯水果。侍者殷勤地把这只托盘推向我。

“先生，您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好了。”

我只拿了一个，把它放在柜台上。

“多少钱？”

“先生，这没什么。真是不算什么！”

我又掏出一张二十五比塞塔的钞票，交给他。

他觉得受到侮辱，拒绝接受这张钞票。

“那么，我把樱桃还给你吧！”

于是我把樱桃重新放回托盘里。侍者坚持着把托盘推给我，请我拿起樱桃并停止这场玩笑。我的脸色一定是变得极为苍白和严厉，他马上就照我说的办了。

“要是先生仍坚持送我这份礼物的话……”

“我坚持这么办！”

他带着害怕的神情拿起这二十五个比塞塔。他不是在同一个疯子打交道吧？他朝那位单独一人的夫人迅速递了个眼色，这位夫人正惊愕地注视着我的伎俩。整个场面发生期间，我没注意她，仅仅就像她并不存在一样。然而就要轮到她了。

“夫人，”我对她说，“请您把帽子上的一粒樱桃送给我当礼物吧。”

“我很乐意。”她带着活泼的娇态说。

她低下头时，我走过去，抓住一粒樱桃。很幸运，自从我出入卡塔莉娜姑姑的帽店那时起，我就对这些人造樱桃的秘密了如指掌了。我没扯下它来，而是把茎梗弄弯，喀嚓一声，细铁丝断了。我用仅有的那只没受伤的手极其熟练地完成了全部工作。

我用牙一下子咬住人造樱桃，一点白色棉花露了出来，于是我拿起蜜饯樱桃，用一截铁丝把它与前者连接在一起。借助一根麦秆，我从这位夫人的杯中抽取出一些奶油，小心地放了点奶油在真樱桃上，从而完成了要造成的效果。它们太相似了，谁都无法分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侍者和少妇默默地看着我的每一个动作。

“现在，”我补充道，“你们将看到一切中最重要的了。”

转到我的桌子那儿，我拿起我那杯血红的鸡尾酒，再回来把它放在柜台上，随后我小心地把两个樱桃放进了鸡尾酒中。

“好好看一下这杯鸡尾酒，”我对待者说，“你再认不出它来了。”

我极其平静地走出利兹，想着刚才做的事，它就像当初耶稣发明圣餐那样令人激动。那位侍者怎么解决这杯与他给我的鸡尾酒完全不同的红鸡尾酒的难题呢？他会品尝它吗？我离厅后，他们两人会向自己讲些什么呢？这些沉思被一股疯狂的喜悦取代了。马德里的天空异常的蓝，淡玫瑰色的砖房向我许诺大量的光荣。我是非凡的人。

我要乘的有轨电车站太远了，我开始在街上飞奔起来。行人几乎不注意我。不满他们这种冷漠的态度，我在奔跑中加上一些越来越狂热的弹跳。我一直都是个非常优秀的跳高跳远运动员，我创造出这样一些奇迹，使得行人终于惶恐地望着我，更何况我每跳一次都喊着“血比蜜甜”，而且喊“蜜”这个词时声音特别大，就仿佛战斗口号一般震响着。当我感到两脚着地时，一下子正落在美术学院的一位同学身旁，他显然从没见过我处在这样的兴奋状态中。我利用这个机会让他更惊异，靠近他耳朵，好像要告诉他什么机密，接着我就用尽浑身气力向他大喊一声“蜜”。有轨电车过来了，我跳上去，把我这位惊呆了的同学丢在人行道上。第二天他定然会在全校重复说：

“达利像头山羊那样疯狂！”

我还没结束让他们吃惊呢！早上，我很迟才去上课。我刚刚从马德里最贵的服装店里买了一套最漂亮的西装。我穿上一件天蓝色绸衬衫，它袖子的链扣是蓝宝石做的。我花了三个小时用一种特殊的发网束住头发，并用绘画光油把头发擦得光可鉴人，它变成了一种均匀坚硬的膏状体，极为光滑，仿佛在我头上浇铸了一个唱盘。如果我拍打头发，它就会发出金属般的声音。一天之内发生的这种变化令美术学院所有学生感到震惊，而我明白了我距穿戴得跟大家一样还远着呢，尽管我在马德里最漂亮的商店购买了一切，我仍然是个独特的人。我用如此惊人的方式成功地把一切结合在一起，使得人们在我经过时全回头张望我。纨绔子弟作风的年代就要开始了。仰慕而又羞怯的好奇心将接替讽刺的态度。我给自己买了一根手柄包皮的柔韧竹手杖。

坐在列吉纳咖啡馆的露天座位上，喝着三杯加橄榄的苦艾酒，我开始打量那群密集的我未来的观众，他们散开在那些如此聪明、如此充满马德里精神的街道中。接近一点钟时，我重又在一家意大利餐馆的酒吧找到了团体的成员，又就着帘蛤喝了两杯苦艾酒。我付钱给侍者时，留给他极多的小费，一股骚动迅速传遍餐馆，侍者们都急于向我大献殷勤。我清楚地记得我那天点的菜：各种冷盘、马德里肉冻、干酪丝通心面、一只鸽子。大家都灌了许多西昂蒂红葡萄酒。咖啡和白兰地更加刺激了我们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尽管我们只不过是五六个人，可却已分裂了。多数人显示出赞成总有一天会变成斯大林主义工具的自由社会主义的态度。我本人则认为幸福或不幸只是一件完全属于个人的事，与一种社会结构（在其中，人民在获得新政治权利的同时，生活水平也得到改善）毫无关系。相反，应当通过系统地破坏一切来增加危险和集体的不安全感，以便传播苦闷，根据精神分析学，苦闷是快乐的本源。如果幸福是个人的事，那么这就是宗教的问题了。政府应当把自身约束在以最大权威行使权力上。从这种作用和这种反作用中，会出现一种精神的结构或形式，而不是出现一些理性的、机械的、官僚主义的机构，它们只能导致丧失个性、只能导致平庸。还有另一种可能性，尽管这是空想的，但却是诱人的可能性，即产生一位“无政府主义的至高无上的国王”的可能性。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并非这方面一个很差的例子。

论战使我的思想具有越来越清晰的形式。它决没有修正我的各种观念，恰恰相反，它总是证实着它们。我要求朋友们同我一起从社会和政治的观点出发审查瓦格纳和他的帕西发尔神话的案例……

我考虑了一会儿，仿佛我有些需要克服的疑问，我招呼那位正受到我们充分展示的无上智力腐蚀着的侍者，他一字不漏地听我们辩论。

“侍者，”我考虑了一下后说，“给我再拿点儿烤面包和红肠来。”

他马上去了，我不得不朝他喊道：

“还要点儿酒！”

从政治和社会观点考虑帕西发尔的案例，从我这方面说，需要一些养料……

离开意大利餐馆，我回公寓去拿了些钱。我早上放在口袋里那些钱不知道怎么就不见了。要有钱，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事了。我去银行取出钱，签了收据。

重新镀过金，我又去同团体的成员会面，不过这次是在一家供应黑啤酒的德国餐馆。我们吃了百来个煮螃蟹，剥去壳的螃蟹特别有益于围绕帕西发尔展开的辩论。很快下午就过去了，我们得转移到广场去喝干马提尼酒。这是我们第一次喝不甜的酒，从此我一直拥护这类饮料。炸土豆片从我们的餐桌上飞快消失，速度令人眩晕，侍者陆续装满那些盘子。很快又提出要到哪儿吃晚饭的问题！无论如何，不能到公寓特有的令人讨厌的食堂去。根据我的提议，全体一致决定回到那家意大利餐馆去。我们打电话定了个房间。

我们的包间十分迷人，玫瑰色蜡烛照亮着一架黑色钢琴，墙上有一大块酒渍。我们吃什么了？要说我还记得，那我就是在撒谎。喝了大量的红酒和白酒。辩论变得十分激烈，我不得不进行调解。于是我坐钢琴边，用一个手指弹贝多芬的《月光》。在我想创造左手的一个卓越的伴奏部分时，有人把我从钢琴这儿拉起来，我们动身去广场的雷克脱尔俱乐部，这是马德里最漂亮的场所之一，大家能在这儿喝一点香槟酒。“一点”是种措词的方式。我知道我们会喝许多，于是我决心一醉方休。

但布努埃尔（他碰巧成了我们实际的司仪）首先决定我们开始时先喝威士忌并吃点餐前点心，然后于睡觉前再畅饮香槟酒。这个主意显得极妙，于是我们马上开始边争论边吃喝。我们全衷心赞成应当进行革命，但怎么进行呢？以何种方式着手呢？为了什么？一切都并不像乍一说那么清楚了。在此期间，我们要了份冰镇薄荷酒，以便耐心等待下一份威士忌，既然并不存在任何在今夜爆发革命的危险，那么我们当然还有时间吃喝争论。第二份威士忌终于来了，接着第三份、第四份，直到大家问布努埃尔：

“那么香槟酒呢？”

凌晨两点了，已经太迟了，我们饿得很难受，得有点东西送香槟酒。我要了意大利面条，别人要了冷子鸡。我立即羡慕起他们来了，可却极力拒绝接受他们那方面的任何东西。正在燃烧的、比大量淌出的香槟酒还要热情的辩论，现在以“爱情”和“友谊”为主题了。

“爱情，”我断言，“就像顶示晕船的胃部感觉一样，它还伴随着颤抖和不适，这是很奇特的；人们从而不再明白自己是在爱还是要呕吐。不过，我确信要是我们重新回到帕西发尔的问题，我们可能对此认识得更清楚。”

大家都表示反对，他们受够了帕西发尔。

“很好，以后再讨论这个问题吧，不过在我们离开前，还是给我留块鸡

翅膀吧。”

凌晨五点钟，雷克脱尔俱乐部要关门了。我们感到在一切进行得如此美好之际，必须回去睡觉真太残酷了！我们拔掉新一瓶香槟酒的塞子，朋友们眼含热泪。黑人乐队很优秀，那切分的节奏令我们内心激动不已、无片刻宁静。钢琴师带着神圣的痴迷神态弹奏着，在一些极其抒情的时刻，他断断续续的呼吸声，听起来比伴奏部分还清楚。用全部热情的生命吹着萨克管的黑人乐手，就要倒下去起不来了。我们刚刚发现爵士乐，坦白说，它当时给我留下相当深刻的印象。我们多次把钞票折放在信封中抛过去。这些不寻常的礼物使黑人们每次都站起来，在头头的带领下向我们致敬感谢，这时他们便露出了全部的白牙。我们送给他们一瓶香槟酒，远远地跟他们干杯，因为规定禁止他们坐到桌边来。

我们不再考虑钱。我们的慷慨同我们处置父母的比塞塔的态度一样惊人。最后一瓶香槟酒使朋友们达成了一个庄严的协议，我们全发誓保证遵守这个协议。它的内容就是十五年后在同一地点再次共同聚会；无论我们生活中遇到什么事，无论我们的政治见解和物质困难是什么样的，哪怕远在外国，我们都要做到这一点；万一广场毁掉了，那就在它占据过的原址上共同聚会。

辩论停留在这样的问题上：在我们相会的前夕或前些年，大厦是否有可能遭到轰炸；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究竟应当怎么办。我对这种盯着细节要弄明白的态度不感兴趣，就去注视我们周围那些缀着珠宝的美妙肌肤，它们使我心里很痛苦，它真的是那件事吗？或只是一种轻微的呕吐感，就像我一小时前扮演犬儒主义者时所说的那样？我没什么胃口地吃着给我留到最后的鸡大腿。为着我们达成的一致，少不了最后一瓶香槟酒。由于我们共有六个人，我们就把题着雷克脱尔俱乐部名称和桌子编号（我确信这是个8字，因为曾讨论过这个数字的象征价值）的一块纸牌分成六份，每个得到一份，上面有六个人的签名和日期。香槟酒为协议盖了印。

我们定为重聚日的那一天，内战在马德里不可避免地激烈进行着，看过我们金色青春的广场大厦已经变成了一座血淋淋的医院。请设想一下我们的聚会以及这六位朋友（他们被时间、也被顽固而又狂热的仇恨分开了，但是他们超越他们的激情，忠于许下的诺言重聚了）中每一位的历险记，会是一部大有教益的小说的多么美妙的题材吧！我不知道这空想的一餐进行了没有。我能向你们私下讲的唯一一件事，就是我没在场。

正如世间万事都有结束一样，我们在雷克脱尔俱乐部度过的夜晚，在一间酒吧里结束了；这个酒吧挤满了赶车人、守夜人和有在不现实的时刻乘火车怪僻的人。我们在这儿喝最后一杯茴香酒。黎明最初的微光邀请我们去睡觉。我们去睡吧！我们去睡吧！今天就到此为止！别急，我们等等再说。明天，我将开始我真正的“帕西发尔”。

我的“帕西发尔”是以迟至中午才起床开始的，接着就是五杯加橄榄的苦艾酒。二点钟，用于马提尼酒、生火腿、鲷鱼来消磨时光，等待团体成员的到来。除了我最后咽下的五杯查尔特勒甜酒（它们使我回忆起在卡达凯斯父母家中某些次进餐的结束时刻）外，我已记不起还吃了什么。我为此哭泣了！下午五六点钟左右，我又在马德里郊外一家农庄的餐桌边坐下来。这儿有个小小的内院，它朝向瓜达拉玛山脉的壮丽景色和黑色的橡树林。团体成员再次与我聚到一起，我们准备吃点东西。我吃了一大盘浇番茄汁的鳕鱼。坐在旁边一张桌子那儿的一些赶车人，使我懂了应该用刀吃鳕鱼。刀的金属

味与鳕鱼味混合在一起，给我一种极为柔和和极为高贵的感觉。吃完鳕鱼，我要了只山鹑，因为我不顾一切地想吃美味的东西。可惜，没有山鹑。作为补偿，老板娘建议我吃回锅洋葱兔肉或鸽子。我说不喜欢任何回锅的东西，选了鸽子。可老板娘恼火了，坚持要给我回锅兔肉，而我则坚持要鸽子。唯一的烦恼就是再过二三个小时，又该吃晚饭了。

“好吧！把兔肉也给我端来吧！”

她真有道理！多亏我精于享受的灵敏味觉器官，我立即就明白了这盘回锅菜肴的奥妙和秘密。沙司具有令人难忘的弹性，它贴在嘴角，使我的舌头砰然作响。请相信我，这种乏味的嘭嘭声（很像香槟酒瓶塞蹦起来的嘭嘭声），正是那很难理解的事物的声音，即满意的声音。一句话，吃这份回锅兔肉是种乐趣。

我们乘坐两辆豪华车离开了农庄，我当时只注意这两辆车。一旦回到马德里，我们那只用少量午夜冷餐的设想立即无影无踪了。食品的幽灵以惊人的现实性站立在我们面前。

“先喝点什么吧，”我说，“我们没什么忙的，呆会儿再想吃什么好了。”

这是必要而又合理的，因为农庄的酒不好，我吃回锅兔肉时，喝的是水。于是我喝了三杯干马提尼酒，明白我真正的“帕西发尔”要开始了。幸而我有个计划，借口上厕所，我坦然地走向出去的门。

在外面，我使劲呼吸自由的纯净空气。轻松的微颤使我振作起来。终于独自一人了！我坐上一辆出租汽车，它把我带回公寓，在那儿等着我。要是我想为我的“帕西发尔”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的话，那么我就得花一小时。我洗了个淋浴，把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用绘画光油涂抹头发，不顾它会造成的不舒服。不过对我的“帕西发尔”来说，怎么华丽都不会显得过分。接下来，我用铅笔粉涂黑我的眼圈。这样，我就有了令人无法抵御的迷人神态，仿佛是鲁道夫·瓦伦蒂诺的“阿根廷探戈舞演员”，当时我觉得这种演员就是男性美的原型。至于服装，我选择了一条浅浅的乳白色长裤和一件灰色上衣，衬衫是用薄得透明的生丝制成的，透过它能辨认我胸毛形成的皇帝的鹰。可我突然觉得这件衬衫太新太干净了，我立即拼命弄皱它。加上一个洁白的硬领，那效果显得十分惊人。

出租汽车一直等着我。

“司机，去佛罗里达，但先要在花店停一下。”

在花店里，我买了朵框子花，把它别在我的扣眼里。佛罗里达是家时髦的舞厅，我还不了解它，可我知道马德里的时髦人物经常光顾它。我想一人在这吃夜宵并极精心地在最优雅的女人们中间选了个位置。要不顾一切地实现这件疯狂的不可抗拒的事，这件虽不算人听闻但却充满沉重色情内含的事，这件从昨天就被我称为我的“帕西发尔”的事，女性材料是绝对不可少的！！

由于不知道佛罗里达在哪儿，每当出租汽车一放慢速度，我就想下去，心跳得很厉害。我用全部气力唱“帕西发尔”。上帝啊！会是怎样的一个夜晚呢？它使我变老十年！三杯干马提尼酒造成的醉意消失了，我恢复了严肃认真的思考。开胃酒减弱了我的恶意，从理论上讲，我已成为禁酒主义者，因为酒精搞乱了一切，听任最引人同情的主观主义和感伤主义自由泛滥。随后。人就什么都记不得了，而要是人能记起来，那就会更糟！人在醉酒状态中想的一切，似乎都是有才华的，接着人就会为此感到羞愧。醉酒使一切平

等、划一、无个性。只有平庸的生命能因酒精而提高。恶毒和有才华的人承受着已使他本人头脑兴奋的他老年的酒精。然而，在出租汽车里，我自问是否用酒精去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管怎样，我今夜的行动几小时前就牢固确定了。随着在我脑海闪过的每一构想，我精心地推敲细节，一想到它们，我的心就感到发慌。为了以完美的方式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什么都不能阻止我这么做），我需要五名优雅的女人和第六位能协助我们做一切的女人。不论是我还是其他人，都不必脱掉衣服。我甚至希望她们戴着帽子。重要的是其中四位的腋窝是要剃掉毛的，相反，另二位则要保留着腋毛。

我身边有很多钱，足以令人相信我的诱惑力将是不可抗拒的。我终于很早就到了佛罗里达，我背靠着墙（28），坐在一张桌子边，从这儿可以观察到一切。同一个问题继续纠缠着我。要不要喝点儿什么？酒精肯定会在我提出要求的关键时刻帮助我。可我怎么做呢？应当马上留住其中的两位，邀请她们到一间特殊的客厅，以便她们随后再去找另三位并由她们自己来处理一切吗？另一方面，要是我为克服羞怯在开头几分钟就喝了酒，那我随后就要很快醒过酒来，这才能目光有神，同时看到一切。从我的“帕西发尔”一开始，我的全部清醒的意识、我最富探索力和最恶毒的目光，就不足以对我们无疑近乎让人倒胃口的处境的荣耀和痛苦进行判断、定罪和裁决了，但是这场“帕西发尔”的七名主角是那么令人渴望、那么美丽、那么谦逊，我将成为这场“帕西发尔”的乐队指挥，一直到黎明、一直到公鸡啼唱，这啼唱将使令人脸红的羞愧之情从我们七个已厌烦了最强烈的种种乐趣的想象中突然涌现出来……

“先生要点什么？”

侍者领班站在我的桌前，等着我的胡思乱想结束。

“一份洋葱兔肉……不过要回锅的。”我脱口说道。

最后，我吃着一个很差劲的鸡骨架。当我对付翅膀时，用晚餐的人开始大批拥进来，把大厅塞得满满的，在这之前，这儿只有我一人以及侍者领班和侍者们，再就是乐队和一对专职的舞蹈者，他们显然使场面活跃了。只看了一眼，我就勾销掉目光落到的第一位女人，问题可能并不在于她是否适合我的“帕西发尔”，而在于她太美了、太健康了，而且毫不优雅。可话说回来，我一生中从没碰到过一位优雅的女人是漂亮的。从定义上讲，这两种品质是互不相容的。优雅的女人身上，应减弱的丑与应“增强的”美之间永远存在着一种高明的折衷，事情就是这样。优雅的女人可能而且应当不需要一副完美的面孔，这种完美的面孔永久的光彩会像不断的军号声那样刺激神经。如果优雅的女人能大胆地显露某种疲倦和某种精神失衡的话，那么作为补偿，她就绝对需要一种鲜明夺目的手、臂膀和腋窝。乳房没肩“什么意思。要是它们好看，那当然不错，否则，也就算了。身体的其余部分，我只需要一件让女人优雅的东西：这就是形态非同一般的髌骨，它在什么衣裙下都会显得突出而咄咄逼人。肩部的线条只要适合她的需要就成，匀称与否倒无所谓。我决不会因它让我为难就感到懊丧。眼神十分重要，它应当极为聪慧或“显得很聪慧”，优雅的女人有愚蠢的眼神是不可思议的，相反，愚蠢的眼神却适合十足的美人。《米罗的维纳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明显例证。优雅的女人的嘴可能难看并令人讨厌，但只要在某些特定的场合，它微微开启时，能像奇迹一般，流露出一种难以分辨的天使般神情，那么它就同样是合适的。优雅的女人的鼻子……优雅的女人没有鼻子。唯有漂亮的女人才有

鼻子！头发要很好，这甚至是优雅的女人身上唯一应当好的因素。最后，她应当受珠宝和衣裙的约束，它们是她存在的主要理由，她的精神完全消耗在集聚它们上，这使她的爱没有激情、她的情感冷酷而又挑剔。只有一种露骨而又贪婪的、精致而又冷漠的情欲适合同她的豪华相配。不管她的身体带给她什么，她都对之抱轻蔑的态度！

这就是我终于想要些优雅的女人的原因，她们对淫荡采取的厌倦的轻蔑态度，是实现我的“帕西发尔”不可缺少的因素。我必须在这夜找到能严格服从我的六位倨傲的优雅女人，六张非常令人愉快的冷淡面孔。

我睁大双眼，在四周焦急地寻找，但始终未发现想要的对象。虽说一直不见优雅的女人，可并不缺少漂亮的女人，很快我就要让自己有所妥协了，因为佛罗里达现在已挤满人，别的女人不会再来了。第一次，我觉得自己能搞的这场“帕西发尔”只是“差不多的”。可是那“差不多的”优雅的女人有吗？或许这只是同样的一种欺骗行为？正如有人告诉你吃药，而这药却“近似于”美食那样。

终于进来了两位优雅的女人，巧得很，她们就坐在旁边的一张桌子那儿。我还缺四位。不过我觉得最初这两位恰恰是我想要的。她们的手是非凡的，它们交插着，带有一种冷漠的大儒主义的意味，使我直打哆嗦。要不是我知道她们的脚并不好看，我真会以为它们跟手一样绝妙呢。

第二瓶香槟酒刚使我有点儿醉意，一直到那时，我的注意力始终分散在我计划的各个常规中。只有上帝才知道有没有这些常规！看看吧，你是达利，抑或你不是达利？继续下去吧，认真点儿，否则你会糟蹋了你的“帕西发尔”。这手腕优雅吗？是的，不过应该把它同另一个嘴配合起来。要是能这么联结那些人就太好了！那么试着像唯一的主人那样行事吧！看看这会怎么使你愉快吧！你已经发现了三处优雅的腋窝；去找一下嘴、找一下冷淡的眼神吧。可别忘了一处令你难忘的腋窝……既然你看清了它，那就认真开始吧：腋窝、手、眼神，眼神、手、腋窝。再快点儿，腋窝、手、眼神……嘴、腋窝，腋窝、嘴，嘴和眼神，眼神和嘴……就是她吗？

那个头终于转向我，强烈的呕吐感控制了我。可这次，我不能把它当成爱情的痛苦。我非常想呕吐，像受训一样突然站起来，有礼貌地请一名穿路易十五侍从服的卖烟女告诉我盥洗室在哪儿。她向我做了个我不明白的手势，我进了一间房间，在它中央醒目地摆着一个摆满信件和打字纸的办公桌。我用手撑着桌子，吐了许多。第一股喷涌过去后，我仍呆在那儿。我知道事情还没完，我那类似礼拜仪式要把一切呕吐出来的工作尚有待完成。穿路易十五侍从服的卖烟女跟在我身后，默默站在门槛上看着我。我给了她五十比塞塔，恳求她：

“让我吐完吧！”

我把门在身后锁上，重新庄严地转向桌子，仿佛我要剖腹自杀似的。我接着又呕吐起来，朦胧地意识到我的灵魂就要跟我的内脏搅拌在一起了。这恰似两天的大吃大喝全部又回到我身上，不过却是颠倒地来的，它就这样重复着基督教的宣判：“最前的将成为最后的。”一切都重现了：回锅兔肉、两处剃掉毛的腋窝、嘴、眼睛，以及再一次的回锅兔肉、无政府主义、鯉鱼、君主专制政体、帘蛤、苦艾酒、胆汁、胆汁、胆汁、帘蛤、回锅兔肉、胆汁、腋窝、胆汁、胆汁……

什么都不存在时，我擦着额头的汗水和顺脸颊淌下的泪水。一切都过去

了。一切，甚至包括君主专制政体都过去了，而我的怀旧的和令人惋惜的《帕西发尔》也历尽苦难。

接下来的一天，我躺在床上喝柠檬汁，又过了一天，我回到美术学院，紧接着下午我就被除名了。

其实，我一到校，就发现一群学生争着比比划划，没完没了地讨论着什么，我似乎有种预感，就要发生什么事了，我想必回忆起费格拉斯烧毁国旗的场面。我将第二次成为我本人神话的牺牲品，好像我生活中的那些事件也根据某些主题发展着，这些主题很简洁，但却非常有特点，互不相同。当随着一粒樱桃或一只拐在我身上发生某件事时，请相信这种情况不会就此终结的。另一些事件将随着另一些樱桃和拐产生，直到我死的那天为止。要是我在第一次被除名时就明白这种情况，我就能预见到还会有另一次，我就能预见到这并非孤立的单纯事件，我就能全心地相信它，而无须偏执狂灵感的启示。

我来到在学校迎接我的同学中间，立刻了解到他们反抗的原因，他们提议我做的事，恰好就是当他们反叛行动的旗手。为了任命一位新的绘画教授，学院准备了一次竞赛活动。竞争者人数众多，因为这个班级特别有名。教授候选人每人完成两幅画，一幅是命题创作，另一幅是自选创作，刚刚在学院内部展出了它们。可是一切似乎都极平庸，只有达尼埃尔·瓦斯凯兹·狄亚兹那两幅是例外，这两幅画的风格跟当时被称为“后印象主义”的风格相似。我的种子落在肥沃的土地上，最积极最有才气的学生中，有些人已经迷恋上瓦斯凯兹·狄亚兹了。瓦斯凯兹·狄亚兹还没达到立体主义的阶段，但他的影响力足以使大家接受我的某些东西，而如果这是我说的，大家还不会加以考虑。合乎逻辑地，我应当成为瓦斯凯兹·狄亚兹的支持者。不幸，学生们了解到由于一些卑鄙的阴谋，瓦斯凯兹·狄亚兹将被排斥，取代他的是某个家伙，此人根本不配获得竞争的教授职位。我跟同学们一起来到展览厅。不可能再有什么怀疑了。我第一次同意他们的看法，尽管在我内心深处，我偏爱任何一位懂得调色的老学院派画家。可是这类画家几年前就完全灭绝了。我选择了瓦斯凯兹·狄亚兹。下午，最后一位竞争者简短陈述了他的教学法。接着评审团退场进行评议，他们回来宣布任命另一个人教授。在主席致结束语前，我悄悄站起身走掉了，我的团体的朋友们正参加由后来成为西班牙共和国总统的曼努埃尔·阿萨尼亚领导的一次知识分子会议，他们在等我。

第二天，我回到学校，同学们一派恐慌，有人告诉我，由于昨天的事件，我被除名了。我没把这当回事，自认平静的离开不能成为开除的理由。但重要的并非这件事，而是因为在我沉默的抗议之后，学生们开始辱骂评审团的成员，并恐吓和痛打他们。结果这些院士不得不把自己锁在学院大厅里，要是骑警没赶到校园，大家就会用长凳撞开大厅的门，把这些院士赶走。造反的头头只能是发出信号的我。我徒然为自己辩白，但无济于事。我被皇家美术学院除名了一年。此后没几天，我就回到了费格拉斯。国民卫队到这儿拘捕了我，把我关进该市的监狱。一个月后，我被移解到赫罗纳监狱，随后因找不到任何受理这一案件的充足证据，无法长期拘押我，终于释放了我。我回到正处在革命高潮中的卡塔卢尼亚。未来的长枪党创始人霍塞·安托尼奥的父亲普里莫·德·里维拉将军，用强有力然而又是仁慈的方式，在起义一开始时就把它镇压了下去，我费格拉斯的每一位朋友都是革命者和分离主义者。我的父亲，通过他公证人的职位，必定在选举时目睹了法院某些滥用职

权和行私舞弊的行为。至于我，我不停地谈论无政府主义、君主专制政体，尽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使精神的普遍混淆达到完善的境地。

我坐牢这件事增加了我的光荣。对我来说，这尤其是种乐趣。把我与政治犯混在一起，他们的朋友和父母塞给我一大堆礼物。每天晚上，我们畅饮香槟酒。我写了《巴别尔塔》的续篇，借助想象重温马德里最后的那些日子，我现在能从中得出有益的经验。我同样高兴能重见我那盎浦当的风景。正是在从赫罗纳监狱的铁窗凝望它时，我明白了自己终于成功地变老了一点。这就是我向往的一切，我从马德里生活中获得的一切。在重返监狱那一刻，最好能感到自己更老了些。对精神来说，这是多么轻松啊！

第九章

重返马德里——永远被美术学院开除—— 巴黎之旅——会见加拉——独一无二爱情 史的艰难牧歌的开端——被家庭驱逐

一天下午，我获释离开赫罗纳监狱，晚餐时回到费格拉斯。当晚我去看电影。我自由的消息已传遍全城，我进入放映厅时，受到热烈的鼓掌欢迎。几天后，父母带我到卡达凯斯，我重又在这儿过起了苦行的生活，完全投入绘画和读书中。忆起在马德里的大吃大喝，更增强了这种狂热的学习之情，因为我现在知道，用手抓住一种心醉神迷的新经验的气喘吁吁的鸟儿后，我再回到首都时，我还能重过那种生活。在此期间，重要的是变老；要在这场征服我灵魂的十字军运动中获得胜利，我就得集聚所有的智力和体力，得工作、得斗争，从而也就变老起来。

到了夏末，我只剩下副骨架了，仿佛是腓力二世十分喜爱的杰罗姆·博施笔下的怪物，一个没有身躯、仅有一手一眼一脑的怪物。

我家里习惯在午饭后喝咖啡、饮半杯查尔特勒红酒。我尊重这个传统，只有一天例外，我心不在焉地倒了满满一杯酒，饮料甚至溢出一点在桌布上。父亲惊慌地喊道：

“你在那儿干什么？你很清楚这酒劲很大！”

我解释我分心了，把一半酒倒回瓶中。父亲会因安睡而变得温和起来……可我究竟在想什么？但恰似我的“帕西发尔”的情况，最好我保持着一些秘密！这会对本书以后的一些版本有很大好处。要是为了满足同时代人的好奇心，我提供自己撕碎的身心是正常的话，那么我为自己的未来利益着想，利用这次机会，有分寸地开始替以后的书做广告，当然也是正常的。

受的处分一取消，我当即重返马德里，团体的成员在这儿焦急地等待着我。他们说，少了我，就再不是“同一回事”了。他们饥饿的想象需要一些念头，而这只有我能带给他们。大家欢迎我，照顾我，疼爱我。我成为他们的神，他们力我做各种事，给我买鞋、为我定制特殊的领带、替我在剧院里定座位、帮我整理箱子、关心我的健康、服从我所有的怪僻、像骑兵团一样冲向马德里去战胜妨碍实现我最荒唐奇想的种种实际困难。有了上一年的经验，父亲每月只给我很少一点钱，这虽足够我维持生活，但却远远无法应付我打算过的那种狂欢式的生活。与此相反，他一如既往，继续为我支付发票，这不是一回事嘛！另外，团体的全部成员在这时也给我经济援助。我每一位朋友都有办法在预定场合得到一笔我们需要的钱：一位把家庭的礼物、一枚镶名贵钻石的戒指送到了蒙一德一皮埃特；另一位奇迹似地成功抵押了一处尚未属于他的大产业；第三位买掉了他的汽车，用来在二三大内支付我们惊人的花销。我们也利用我们富家子弟的声誉，向最不可靠的人借钱。列出了有关人士的表册后，我们就抽签，随后我们中的两个人便跳上出租汽车，或是直接到这些人的家里去，或是到咖啡馆去，跟他们借钱。白天过去之际，我们就这样成功地聚集起一笔可观的款子，它们往往超过我们的设想，满足了我们那难以满足的贪欲。不时，我们还钱给那些借给我们钱最多的人，而这不过是为了再向他们借钱。信任重又建立起来。它消失的那天，我们的父母扰收到了一大堆他们难以应付的帐单。我们行为的真正受害者是借钱给我们的那些最老实的朋友，他们不仅相信我们富有，而且钦佩我们，我们却以

卑鄙的态度可憎地利用了这一点。我们向他们施舍了几分钟的谈话，他们却为此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这么干过之后，我厚颜无耻他说：“我们被偷窃了！仅仅是我向他们说的关于写实主义和天主教的话，就值五倍多的价钱。”而我真就大胆地相信是这么回事。

一大晚上，我不得不听一位真诚赞美我作品的艺术家讲心里话。他悲伤地诉说着自己精神和物质上的困境。他认为我会同情他，然后就跟我借钱吗？我毫不清楚，尽管最后他满眼含泪，难以忍受我无动于衷的长久沉默，对我说：

“这就是我的情况，你的怎样？”

“我？我让自己付出了更昂贵的代价。”

他拿一块干净得令人生疑的手帕捂住脸，轻声哭了。我刚刚为自己的纨绔作风牺牲了一位新受害者。一瞬间，我突然涌起一股怜悯之情。我应当用力顶住，不做退让。我亲切地把一只手放在他肩头，补充道：

“你为什么不试试上吊……或从塔楼上面跳下去呢？”

这一年内，我结识了好几位优雅的女人，从她们身上，我在口头上和情欲上满足了我最充满仇恨的欲望。我也开始躲避洛尔卡和团体，这个团体越来越变成“他的”了。这是他那无法抗拒的影响力的顶峰期，这是我一生中唯一隐约感到妒忌折磨的时期。有时，我们沿着拉·卡斯特拉纳林荫道散步到一家常去的咖啡馆。我知道洛尔卡在这儿会像一颗光芒四射的钻石闪闪发光，于是我一下子就跑掉了，三天没再露面。谁都无法从我口中探出这些躲避的奥秘，而我也不想再揭开它们。

我喜爱的游戏之一，是把钞票投入威士忌中等待它们解体。我喜欢当着那些半上流社会的女人面于这件事，我往往怀着精明的吝啬跟她们讲价钱。放纵了一年后，有人通知我被学院永远开除了。国王在1926年10月20日签署的决定正式登在公报上。我在我牺牲事性自画像中报道了造成这次开除的偶然事件。我能补充评论的，就是我对此既不惊奇也不愤怒。不论什么评审团都可能理由这么干的。

我本人曾希望这样，我深深希望这个最终的惩罚结束掉我放纵的生活。我想回费格拉斯努力干一年，然后再说服父亲我应当去巴黎继续学习。一旦到了巴黎，我就要夺取政权了！

我独自一人在马德里度过我最后的一天，整个下午走遍了百来条我忽略的街道，这些街道深刻地体现着平民和贵族把他们的命运融会在同一历史中的这座城市的本质，在十月明亮的光线下，马德里像一块脱离肉体的大骨头，微染着血的各种粉红色调。夜晚来临了，我去了雷克脱尔俱乐部，坐在我心爱的角落里，与平时的习惯不同，我只清醒地喝了两杯威士忌。我独自在这儿呆到黎明，在出口处，受到一位衣衫褴褛的矮小老妇人的纠缠，她浑身发抖，不停地向我乞求。我全不顾她，继续走我的路，一直来到了西班牙银行，这儿有位很美的姑娘在卖梔子花。我给了她一百比塞塔，买下整整一大束花，随后我突然转向跟在我身后的那位矮小老妇人，把它当礼物送给了她。我走了几步，转过身来看她，在黎明的漫射光线中，她茫然失措地站在人行道边上。她手臂里的一篮梔子花形成了一团白色块。

第二天，我带着那些懒得装满的空箱子离开了马德里。我回到费格拉斯，使我的家庭感到沮丧。被开除了，而且连件换的衬衫都没有！我的未来将会怎样啊！为了安慰他们，我不断重复着：

“我向你们发誓我认为已整理了箱子，不过我必定把它同两年前动身那次弄混淆了。”

我的父亲垮了。这次开除毁掉了他看到我从事官方职业的全部希望。我那时最成功的一幅石墨素描，是以他和妹妹为模特儿的，从他面部的表情上，能觉察到那些天来侵蚀他的悲怆的苦涩之情。在画这些具有严格古典主义风格的素描同时，我越来越渴望把我的立体主义经验与一种传统结合起来。马德里和巴塞罗那的大画廊展出了我一些油画。达尔茅（他的外貌像格列柯笔下的人物）在他那被认为是最前卫的店里举办了我的个展。人们就这次展览谈得很多。出现了一些论战，但我一直对此毫不关心，只在费格拉斯的画室里发奋工作。但巴黎听到了悄悄的传言，说在西班牙刚刚发现一位新画家。毕加索路过巴塞罗那，看到我的《背面的少女》，讲了一些高度赞美它的话。就这个问题，我收到一封保尔·罗森堡的信，向我要一些照片。我凑巧没寄。我知道在我到达首都那天，把它们装在袋子里了。

我由姑姑和妹妹陪同，首次在巴黎呆了一周。它以三次重要的参观访问为标志：凡尔赛、格雷万蜡像馆、毕加索。曼努埃尔·盎格罗·奥蒂兹把我介绍给毕加索，奥蒂兹是格拉纳达的一位立体主义画家，我是通过洛尔卡认识他的。我到达拉鲍埃蒂街毕加索住所时，我极为激动，心中充满敬仰，仿佛在受教皇本人接见。

“我先到你家里来，以后再参观卢佛尔宫。”我对他说。

“你做得对。”他答道。

我带给他一幅细心包装的小画《费格拉斯少女》。他打量它有一刻钟的光景，但没做任何评论。此后，我们登上顶层，毕加索让我看了大批的油画。他来来去去，拖着靠在画架上的一幅幅大画，他在乱糟糟的画室里寻找着想给我看的那一切，为我一人全心全意地忙碌着。面对每一幅画，他都向我投来非常聪明和活泼的一瞥，使我激动地微微颤抖。我没发表什么评论就离开了。在门口，我们交换了一下眼神，这意味着如下的含义：“懂吗？”“懂！”

这次旅行之后，我在达尔茅画廊举办了第二次展览，并向马德里的伊比利亚艺术家沙龙送去了一些油画。我的名声最终确立了。

有一天，我收到胡安·米罗拍来的一封电报；胡安·米罗在1926年左右就已成名，他通知我他要和他的画商彼埃尔·罗柏一起到费格拉斯来。父亲深受影响，开始相信更长久地呆在巴黎对我将是必要的。米罗喜爱我最近的画，非常热心地保护我。相反，罗柏面对我的作品直爽地持怀疑的态度。在罗柏与我妹妹谈话的预定时刻，米罗把我拉到一边：

“这些巴黎人，”他说，“比我们认为的还要蠢得多。你到巴黎后，就会发觉这一点的。事情并不像外表上那么简单啊！”

事实是，一周后我收到彼埃尔·罗柏的一封信，他并没向我提出一份辉煌的合同，而是逐字逐句对我说了如下的话：“别忘记让我了解你活动的情况，不过你目前所做的太混乱了，而且也缺乏个性。工作，再工作吧！要等待你不可否认的才能的发展。我希望能有照顾你的那一天。”

几乎在同时，父亲收到米罗的一封信，对他解释到巴黎去的好处，最后他说：“我绝对相信您儿子的未来是光辉灿烂的。”

这时，路易斯·布努埃尔向我阐明了他想导演的一部由他母亲提供经费的影片的观念，我觉得他的观念平庸，有种肤浅的先锋派意味：一份包含着从各种社会新闻到喜剧片段的热闹的报纸。最后一名咖啡店侍者把这份报纸

从人行道上扫掉了。我感到这是廉价的感伤主义的东西，于是回答他这个脚本一无价值。我可有个好得多的脚本，又简短又才气横溢，与当代的电影完全不同。这是真的，这个脚本甚至已经写好了。布努埃尔极其兴奋，打电报告诉我他要到费格拉斯来。我们共同动手修改影片的微小细节，这部影片题目是《安达卢西亚的狗》。布努埃尔带着我们的作品到巴黎去了。他负责导演、分镜头和剪辑。再晚些时候，我也来到了巴黎，我能在旁边注视这部影片的进程，每天晚上，我同布努埃尔不停地谈论着，他自然地接受了我所说的一切，就这样，我参与了导演工作。

不过距这次动身还有两个月呢，我利用这段时间，忙着做各种准备工作，并借助围绕着《艺术之友》杂志组织起来的一个巴塞罗那小小的智力核心来磨练我的战斗方法。我随心所欲地控制了这个团体，从我在费格拉斯的洞穴，我就使巴塞罗那的艺术界发生了重大变化。在着手征服巴黎之前，这种经验证明是有用的，在检验我那些极不同和极矛盾的“手段”的效能方面，它特别有用。这些积累起来的“手段”与“历史”混合在一起了，我总是具有轻松地控制我周围人反应的天赋。感到所有那些就要堕入炼狱而对此并无觉察的人，毕恭毕敬地站在自己周围，这是一种真正的快乐。

我到了巴黎，忆起一本在西班牙读过的小说的题目：《不做凯撒，就成粪土》。我叫住一辆出租汽车，问司机：

“你认识上等的窑子吗？”

“先生，请上车吧，请上车吧，别担心，我认识所有的窑子。”

我没看所有的窑子，但我参观了不少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窑子，我特别喜欢其中的一些。我觉得沙巴耐是最欢乐的地方。我欣赏它这儿的色情的安乐椅（这是法朗梭瓦一约瑟大让人制作以满足他各种欲望的）、雕成天鹅形的浴缸和装饰着第二帝国镶镜和金银边饰的、好像是用浮石制造的颇为奇特的楼梯。要是我得在世界上选择三处给我留下最深的神秘印象的地方，我就会说沙巴耐的楼梯是最神秘最丑陋的“色情”场所，维琴察的帕拉第奥剧院是最神秘最神圣的美学场所，埃斯库里阿的西班牙国王陵墓入口是最神秘最美丽的墓地，因为照我的看法，色情应当总是丑陋的，美学是神圣的，而死亡是美丽的。

如果说窑子的内部装饰迷住了我，那么与此相反，我觉得那些窑姐同它极不相称。她们的粗俗和平庸，并非我需要的，无法满足我淫荡的幻想。我不会去碰她们，只能指望看她们三三两两接着出现，无精打采，惶惑不安，就像有人刚在休息时突然抓住她们似的。唯一的可能性就是利用这个环境和气氛，或者还能作为“帮助”，得到那些照章纳税的“克里奥尔女人”中的一位。不过得去别处找这种女人和把她们带走。无论如何，这次参观还是有用的：在我整个一生中，我都能用看到的难以置信的小道具维持我那些色情的梦。

参观完这些窑子，我去胡安·米罗家拜访他。我们一起吃午饭。他不讲话，起码也讲得很少（30），到了晚上，他向我宣布他打算把找介绍给玛格丽特，我认为他指的是比利时画家列耐·玛格丽特，我把这位画家看成是我们时代最复杂难解的一位艺术家。由于我一开始就把这位画家想象为一个女人而不是一个男人，这使我不安起来，事先我就打算爱上她，哪怕她并不是很美、很美的。

“她很优雅吗？”我问米罗。

“啊，不！她很朴素。”

我焦急得不得了。管她朴素不朴素，我要把她带到沙巴耐去。在发头上插了几根黑白相间的羽饰，我终于打扮好了。晚间，玛格丽特来到图拉克街米罗画室接我们。她是位高大瘦弱的少女，不大的面孔上神情变幻不定，仿佛是个神经质的死人头，我立刻抛开全部色情的计划，让这个比米罗还爱不爱讲话的人迷住了。我们在毕加尔广场的一家餐馆吃了份肥肝、喝了一种相当不坏的酒。无疑，面对着这两位哑巴宾客，这是我一生中最安静、最令人困惑的一餐饭。米罗唯一的一句话就是问我有无尾常礼服。我觉得他的声调显得非常担心似的。

我试图根据他们令人困惑的作品来重构他们所想的事，他们的怪癖，正如他们内心和意识形态的流露一样，对我来说似乎全是深不可测的谜。我离开他们时，米罗对我说：

“你应当做件无尾常礼服，我们需要在社会上露面。”

第二天，我去一家裁缝店为自己定制了一件无尾常礼服。我住在维维埃纳街的维维埃纳旅馆。我后来了解到这条街劳特亚蒙居住过。我有了无尾常礼服，米罗带我到达托公爵夫人家吃饭，她是在马德里街头被暗杀的保守派部长的未亡人。大批来客中，我差不多只记得库埃瓦斯·德·维拉伯爵夫人，儿年后她成为我的好朋友。她很熟悉马德里所有精神运动的情况，我们谈到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显然使大家发烦。米罗穿了件像盔甲一样凸起的上浆衬衫，他变成这件衬衫的囚徒；他仍然保持着沉默，但他观察着一切并像他那马赛人故事中的猫头鹰一样思索着。饭后，我们去醉舟喝香宾酒。在这儿，我发现了一个名叫雅各比的人，这是个幽灵般的、闪着磷光的、绝无仅有的、夜间活动的生命，我在随后的生活中必定会看到他，在所有新夜总会的半明半暗的光线中碰到他。我在巴黎摆脱不掉的东西之一，就是雅各比苍白的面孔，可我从来无法弄清其中的原因。这绝妙的雅各比，真是只萤火虫啊！

米罗以令我羡慕的随便态度付了帐单。我们俩单独走回去，他终于下决心讲话了。每说一句，他都用力收紧嘴唇：

“这对你将是严峻的，但你不要泄气。别说得太多（于是我理解到他的沉默或许是种策略），要锻炼身体。我有位老师，每天晚上我都练拳击。明天我们去拜访特利斯坦·查拉，他是达达主义者的头。他有威望，可能会请我们去听音乐会。要拒绝。我们得把音乐当鼠疫来提防……生活中重要的，就是要固执。我想表现的东西没体现在我的画上，我就把头在墙上撞得流出血来……”

他喊着：“再见！离开了我。一瞬间，我在想象中看到那面血迹斑斑的墙。这是与我的血相同的血。米罗的作品在这时已开始成为我所想的一切和我崇拜的东西的对立面了。没关系，反正血在那儿！”

第二天，我们在彼埃尔·罗柏家吃饭，陪客是他培养的半打新手。他们全受着合同的支配，享受着令人快慰的小小光荣，这种光荣刚一出现，就要消失了。这群从我记忆中被抹去的人中，唯一有个性的人就是画家巴维尔·柴里切夫。我出来后，他是世上第一位把我带到地铁的人。我无论如何也不想挤进地铁里，柴里切夫看到我害怕的神情，开心得笑出了眼泪。他告诉我他要在我头一站下车，我抓住他求他别丢下我。

“别这样，”他说，“这很简单，下一站你下去后，会看到出口两个大字的。你只要登上几级台阶，就会到外面了。此外，你只要跟着那些同你一

起下车的人走就行了。”

如果没人下车呢？我终于到了站，登上台阶，走了出去。经过地铁压迫人的恐惧感之后，我觉得一切都很容易。柴里切夫刚给我指出了地下的道路和我成功的正确公式。后来，我总在生活中利用外人难解的精神的隐藏地铁。我那些最亲密的朋友多次寻思我在三四个月里变成了什么样子。

“达利呢？他在哪儿？他在干什么？”

达利在他的地铁里旅行，并在最意外的时刻突然从那里出现：“我到了、我上去了、我出来了。”地铁把半窒息的我留在上面，重又疯狂地呼啸而去，它不倦地单调重复着：“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我来了、看了、征服了……”

虽然初次乘地铁成功了，可我仍然避免重复这同样的危险经历，而是乘坐到处等着我的出租汽车，为此我花掉了一大笔令人难以置信的小费钱。

我来了！我来了！是时候了。布努埃尔开始拍摄《安达卢西亚的狗》。彼埃尔·巴切夫恰好具备符合我的男主角的理想体貌。他已经在服用麻醉剂，不断嗅着乙醚。我们的影片刚刚完成，巴切夫就自杀了。《安达卢西亚的狗》是部青春和死亡影片，我打算把它当作匕首，刺入优雅的、有教养的、富于才智的巴黎的心脏。欧仁尼奥·蒙代斯在1929年就此题目写道：“布努埃尔和达利刚刚坚决地站在了被称为趣味高尚的、漂亮的、令人愉快的、风行的、法国式的那种东西之外。伴随着这部影片的一台同步留声机放送着特利斯坦。但应当放送的是《波里卡扎的霍塔舞曲》，这是不愿成为法国式的，而想成为阿拉贡西班牙的、埃布罗河的、伊比利亚半岛尼罗河的（阿拉贡，你是个埃及，你在死亡之上树起了霍塔舞的金字塔）阿拉贡式的东西。月亮野蛮的本原之美，‘血比蜜甜’的荒原之乡，终于重现在世界上。不，别去寻找法国的蔷薇。西班牙不是花园，西班牙人也不是园丁。西班牙是颗行星，这儿的蔷薇是腐烂的驴子。那么也就不存在风趣，不存在装饰；西班牙，这就埃斯库里阿，而非精致，因为无法篡改它。西班牙不能涂抹乌龟，也不能用水晶薄膜打扮驴子。在西班牙，十字架上的基督流着血，人们把它们抬到街上游行时，两排国民卫队护送着它们。”

蒙代斯以下列话语结束：“在电影史上，这是一个时期，一个以血为标志的时期，就像尼采希望的那样，就像西班牙总在做的那样！”

影片获得了我所预期的结果。一个晚上，它就搞垮了战后的装成有知识的先锋主义的十年。被称为抽象艺术或非只象艺术的这种卑鄙的东西，倒在我们脚下，奄奄一息了，而在我们影片一开始时，它看到被剃刀割裂的少女的一只眼睛后，就再也无法恢复过来了。在欧洲，再也没有蒙德里安先生那些古怪的小小菱形的立足之地了。电影制片厂的制片主任们一般是感觉麻木的人，什么都不会让他们吃惊。我们的制片主人承认，看到我们为这么短的影片向他提出所需物品的清单时，他认为这是在做梦，这份清单包括：一位两臂下各夹着一块熊皮的裸体女人；巴切夫用的一个无嘴面具和另一个嘴部用毛来替代的面具，这些毛要使人想到腋窝的毛；四头腐烂着的驴，要把它们陈列在四架三角钢琴上；一只真的切下来的手，母牛的一只眼睛和三个蚂蚁窝。

拍摄腐烂驴子场面的那天，我要说那景象真值得这么花力气。我把大瓶的粘糊糊胶水倒在它们身上；来替它们的腐烂化妆。我掏空它们的眼球，再

用剪刀把它们扩大。我同样地剪开它们的唇，让牙齿更好地露出来。我还在上面加了个额外的颌骨，以便加强效果。这些驴子似乎要在另一些颌骨上方呕吐出它们自身的灭亡，这另一些颌骨不过是一些钢琴键盘，一些有五十个棺材的最凄惨的黑色钢琴。

《安达卢西亚的狗》把我从尘世的生涯引向胡安·米罗希望传授给我的那种生涯。我对他说：

“我喜欢从腐烂的驴子开始。这更紧迫。其他的随后会顺利地出现的。”

我没搞错。一天晚上，我在圆顶酒吧碰到了罗贝尔·德斯诺斯。他带我到他家里去。我像平时一样，臂下夹着一幅给人看的画。德斯诺斯想买它，可他没钱。他当然明白我放在这幅题为《春之初》的油画中独创的东西。我在这幅画中，用惊人的客观态度描绘了各种淫荡的乐趣。

他对我说：“这与大家在巴黎做的完全不同。”

这么说过后，他就怀着恶梦般的激动情绪，以不自然的无穷无尽的抒情口吻谈论起罗伯斯庇尔，他不停地谈着，使我不由想睡觉了。正如每次听人长谈法国大革命那样，第二天我就犯了咽喉炎，而且还挺厉害。以往，我一旦略有发烧，便会看到有人围绕在我身边，给我无数过于隆重的关怀和照顾，可我现在浑身无力，不得不躺在床上，孤零一人呆在旅馆的房间里。突然之间，我感到这家旅馆太可怜了，它的整洁更成问题。当天夜里，我不得不起来，我发现天花板上贴着三个虫子，是蟑螂还是臭虫？我把枕头朝它们扔去，可我很虚弱，打不到它们。我又沉重地倒在床上。耗尽了气力，我睡了个仍然焦躁不安的觉。醒来时，我注视着上方，缺少一个，它一定是落到我床上了。我感到恶心，开始抖床单和被子，可没找到它。突然，我吓得喊出声来，我把手伸向后背时，在只能用指尖碰到的地方，我觉得这个虫子叮在我皮肤上。我无法弄下它来，越想弄下来，它就叮得越紧。我跳下床，站在镜子前。扭动身体，我能看见贴在我皮肉上的虫子，它圆圆的，吸足了我的血。这准是壁虱。我愤怒地用两个手指捏它，可无法把它弄下来。这只壁虱那么深深地嵌入了皮肤，仿佛与我本人合为一体了。我始终不能弄掉它，好像它变成了连体双胞胎吓人的胚胎原基。我的害怕和厌恶太强烈了，我不得不做出一个野蛮的决定；我用剃刀片着手割皮肤上的壁虱，四面八方都割破了，才终于把它挑了出来，一股血流从背上涌出。我刚造成的这样一场失血，使我陷入半昏厥的状态中，我勉强挪动到门口，向女佣呼救。地板上留下了长长一串鲜红的血迹。我用一条床单缠绕在上半身，试图扎住伤口，防止大量出血。布上渗出了一大块血迹，我得转向盥洗室，但水流只是增加着大量的出血。女佣并没来。我发狂地掀着铃。我的房间仿佛变成了屠户的肉案子，床上、地毯上、墙上、衣柜的镜子上都是血。女佣终于出现在门口，她发出一声尖叫，接着就跑掉了。楼道里一遍嘈杂声向我宣告有人来了，这回同时出现了好几个人，为首的是旅馆经理，他问我出了什么事。

“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可这时我还不知道怎么用法语讲壁虱这个词。经理慈父般地用眼神鼓励我。他显得极为有人情味，极为想了解一切……“这是一个咬着我的臭虫！”

医生终于来了，我已经明白根本没有壁虱或臭虫叮在我背上，那不过是一个我完全了解的“痣”。医生对我说，自己做这样的手术太危险了。我向他解释把这个痣当成一个寄生虫了，但白费劲，他并不相信我。

“我懂得这样的一块斑点长在脸上，有人会想消灭它，可就是那样，触

动它也是荒唐的事！而长在后背上，这又能把你怎么样！”

我很快站了起来，又虚弱又沮丧，仿佛再不会恢复以往的健康了。我的眼前一片漆黑。《安达卢西亚的狗》还没跟公众见面，我觉得它全搞砸了。如果我做得到的话，我就会把它毁掉。还缺半打腐烂的驴子，演员们很糟糕，脚本不少地方也缺乏足够的诗意。

除了影片，我还能做什么？我的某些粗话证明是无用的。我的羞怯妨碍我出风头，使我对自已不满。卡米尔·戈曼答应跟我订份合同，但签约一直拖延着。

我没能成功地找到一位优雅女人，也没有人会接受听从我色情奇想的摆布。我像头发情的狗跑到街上，可什么也没找到。奇迹偶然出现时，我的羞怯又妨碍我接触它。多少个下午，我跑遍大道，坐在街头的咖啡座上向异性使眼色，我觉得街头散步的所有女人理所当然地具有与我相同的欲望。可并非如此！满怀沮丧，我开始虐待一位丑陋的女人，我一分钟也不放过她，用热情的目光盯着她。每当她上了公共汽车，我就坐在她对面，用膝盖轻轻触碰她。她站起来，换了个座位。我不得不下车，在这充满敌意的、忽略我的大道的人流中，重又混入女人堆里（我只看见了女人）。然后呢？你想把整个巴黎放进去的袋子在哪儿？你真是大蠢货！就连丑女人也吸引不了。

回到旅馆乏味的房间里，双腿疲劳不堪，心中满含苦涩的悲哀。所有那些刺痛我眼睛的无法接近的女人占据了我的想象。面对带镜衣柜，我试着尽量延长时间，回忆一个又一个白天见到的形象，迫使她们向我显露她们身上我极为渴望的东西，从而实现了我孤独的祭献。令人疲惫不堪而又致命的长长一刻钟过后，我用紧握的手的全部野性力量，夺得了同灼热的辛酸泪水混合在一起的无上快感。巴黎有那么多的女人大腿，而在我不知不觉独自躺倒的床上，却没有一个来找我的。入睡前，我从不会忘记与天主教的简短交谈。

我经常去卢森堡公园，坐在长凳上，我哭了。一天晚上，我未来的画商戈曼带我去塔巴林舞厅，他让我注意由一位穿着闪光金属片连衣裙的女人陪伴着进来的某个男人。

“这是超现实主义诗人保尔·艾吕雅，他在巴黎举足轻重，而且他也买画。他的夫人在瑞士。跟他在一起的这位女人是他的朋友。”

我们走过去同他们见面，喝过好几瓶香宾酒后，我们就熟识了。我觉得艾吕雅是位传说中的人物，他静静地饮酒，出神地凝视着我们周围的那些漂亮女人。我们离开前，他答应来年夏天到卡达凯斯来。

第二天晚上，我到奥塞站乘火车回西班牙。天空中的所有天使似乎都相约到车站餐厅陪伴我。我在餐厅仅仅吃了一盘细面条。从上回犯咽喉炎以来，我首次感到饿。

“萨尔瓦多，你现在不再需要生病了，既然你不再非要‘把巴黎放在袋子里’了。”

经验告诉我，每次人们想把某个东西放在袋子里，但又无法做到这一点时，人们就会生病。那些掌握局势的人，决不会是病人，哪怕他们的机体越来越弱并出现故障。于是我把我的疾病挂在奥塞站的衣帽架上，仿佛它是件在我将开创的夏天里无用的旧大衣。如果下个冬天需要大衣，我就去弄件新的。再见吧！

次日清晨醒来时，已是在卡塔卢尼亚了。我们穿过我亲爱的盎浦当平原，从“塔楼磨坊”前经过。机车呼啸着、鸣响汽笛，很快就进入了费格拉斯车

站。

经过在巴黎的疾病后，我体验到“最透明的”健康时期，它就像暴风雨过后的纯净天空一样。我说“透明的”，因为这恰似我透过自己的身体“看到”重又兴盛起来的解剖学的所有粘稠小机械的完美功能。一种膝陇的预感在我心中渐趋明显了。这只能是在某一位女人躯体中复活的加露琪卡。

一旦我回到卡达凯斯，我立刻就被童年的记忆包围了起来。在我的青春期和我两次居留巴黎期间所发生的一切，全被我总是无法确定它们出现的明确时间，可却坚信我在童年时期确实见过的那些形象淹没了。我看到一些遍体是绿色的幼鹿在我狂喜的眼前经过。只有它们的角是赭石色的。这或许是些拓印画，但它们的轮廓似乎是那么明确，我很容易重新画出它们来。另一些形象大批涌来，它们时常更为复杂难解：一个兔子头，上面的眼睛就像叠印的鸚鵡眼睛；一条鱼的嘴上长着只蚱蜢。如果我划船荡桨的话，那么我就能看到在我周围突然涌现大量五颜六色的小小女式阳伞，这使我一天的其余时间都有种无法形容的喜悦之感。

好几天，我都听任自己完全沉迷在追随这些形象的乐趣之中，此后我决定依照它们出现的时间顺序，用尽量忠实再现它们的方式完成一幅画。我决不把个人的好恶掺入其中。它将成为一幅超现实主义能靠它壮大声势的最真实作品之一。它首先将是不寻常的，远远不同于达达主义者“凭经验”摆布成的诗意的拼贴作品，而且同契里柯的形而上绘画是对立的。人们将不得不承认它的原生物特色，这与抽象画家们诗意的软弱也是对立的。我会是超现实主义仅有的独一无二的画家，无论如何恰如这一运动的首领和教宗安德烈·布列东声称他希望的那样。然而他看到我的画时，在某些粗俗的因素前踌躇了许久，因为前景上，能看到一个背影，其短裤上沾满粪便。这种因素中不自觉的方面，在全部精神病理学的图像志里是如此有特色，应当能使他满足。可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说这只不过是模拟粪便的东西。从我的观点看，这种自身如此理想主义的狭隘精神，正是超现实主义第一阶段的基本“智力缺陷”。人们在并不需要等级制的地方建立了一些等级制。一处粪便和一块水晶石，两者都是从潜意识中产生的，它们的价值相等。相反，这些超现实主义却都否定了传统的等级制！

日出时分，我醒了，没洗脸也没穿衣，就坐在房间中面对床的画架前。早晨最初的形象就是我画布上的形象，同样它也将是我入睡前看到的最后形象。为了能在睡眠期间保持住它的图形，我用眼睛凝视着它，通过这种方式，我尽力使自己入睡，好几次，我深夜起来，在月光中注视它一阵子。有时，在两次打盹期间，我打开电灯，凝视这件缠住我不放的作品。整个白天，我坐在画架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它，好像一位通灵者那样，要从中看到我自己想象的各种因素突然涌现出来。那些形象恰当地出现在这幅画上时，我立即抓住时机把它们画下来。可有时看不到任何东西出现，我就得等待几个小时，闲着无事可干，握在手中的画笔一动不动。我也有些虚假的形象，它们在消失前，令我气急败坏，犹疑不决，我思忖着：“那么，她是在洗澡吗？”我攀登在岩礁间，躲开一阵阵微风，让自己被晒热，然后一下子纵身跳入湛蓝的海水中，这深深的海水比我从塔楼磨坊高处隐约看到的那些海水更加深不可测。我裸露的身体抱住了我的灵魂，一边抚摸她一边向她重复：“等一等，她就会来的！”可我的灵魂不喜欢这一类的拥抱，以青春的过于激烈的冲动方式试图挣脱掉。“别这么抱紧我，”她说，“你很清楚她是来找你的！”

这么说过后，我的灵魂不再洗澡了，她坐在阴影下，完全就像我童年时的奶妈那样跟我说：“去，去玩吧！你累了时，再回来找我，我们一起回家。”

下午，重新面对画布，我一直画到黄昏时分。满月使我灵魂中母性的潮汐涨了起来，并用它平淡的光照耀着我那穿着夏天连衣裙的加露琪卡非现实的身体，从我童年的虚假记忆以来，她跟我一样，也长大了。我的整个灵魂都在渴望她。她走过来，但随着她越来越接近我，我尽力使那给人极大快感的期待多延长些时间。我对自己说：“享受吧，享受这一美妙的时刻吧！她还没来到这儿呢。”于是，我把枕头套都咬透了，这时我再一次从我的身体中得到了那比蜜还甜的孤独快乐。哎唷，哎唷！我的灵魂喊叫起来，她喊过之后，我就睡着了，没敢碰一下伸直身子躺在我旁边的、静默无声的、无知无党的加露琪卡。

她在我之前就醒了；太阳升起时，我才睁开眼睛，我发现她站在画旁，在守护着。我请大家谅解我在动手证明这个“灵魂”是一个寓意时会有的粗略。不过这是在我当时的幻想中占据着相当明确位置的一个熟悉的寓意。我之所以向大家指出这一点，这是因为下述故事本身就是一个真正的幻觉，我一生中体验过的唯一真正的幻觉。我要最准确地叙述它，以便不使它同我其他的从没达到这种视觉强度的幻觉混淆起来。

那是个星期天，平常这天我总是起得很迟，大约在十二点半左右，由于要大小便，我才醒了过来，走出房间到二楼上厕所。在楼梯的平台处，我碰到父亲，跟他讲了会话，似乎有一刻钟光景。由于这件事，排除了我上厕所是个梦的可能性。我清醒了。我回到房间，打开门，我看到在窗前坐着一位非常高的女人，她穿了件类似长睡衣的服装，以侧四分之三的方式坐在那儿。尽管这位女人从肉体上说是绝对真实的，但是我还是立即就明白我产生了一个幻觉，而出乎我的预料，我对此竟然毫无印象。我重又回到床上，以便最舒服地审视这个惊人的现象。为了更好地看到她，我始终坐在床上，可我想整理下背后的两个枕头，还不到一秒钟，在我转过头来时，她就不见了。她并不是慢慢地融化的，而是突然消失的。

这个幻觉使我希望还有别的幻觉。可幻觉不再重复出现了。然而每当我打开门，我就感到有可能看见某个不正常的东西，不过在那时，我实际上也并非“正常”的。有各种可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确定“正常”与“非正常”的界限再也不是基于活的生命。如果我说1929年在卡达凯斯我不正常，这只是同我写这本书的今天比较而言的。无可争辩，通过适应现实，我在这方面取得了几乎无法置信的进展。在我有最初的幻觉时，我热衷于我身体中种种不正常症状，竟然达到要去激发它们的地步。每天早上，我都要浇灌一下我疯狂的植物，这只是因为在他长出将吞噬我自己生命的花与果之际，我了解到应当用脚跟踏碎这个植物，让它回到地下并重新征服我的“生命空间”。听到“为荒谬而荒谬”的口号，我应当在年底换上已经成为天主教精华的“征服荒谬”的口号。荒谬给我留下了它的各种秘密，我通过奋力进行我的毁灭性的征服，通过试图把整个超现实主义团体拖向我，从而小心地保护了这些秘密。

在1929年，这时已因此成了男子汉的我，住在用石灰刷白的卡达凯斯，住在这个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村庄。我是个男子汉，我每天都尽力变得更疯一点儿。就在这时，我开始染上大笑的毛病，它发作的太剧烈了，我随后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我为什么笑？几乎没什么理由。例如，我想象着三

位很矮小的神父一个接一个地走过一座像皇村中日本式花园里的罗锅桥，他们之中最后一位也是最矮小的一位神父刚要走过桥的那一瞬间，我死命从后面踢了他一脚。他像只遭围捕老鼠似的停了下来，调转方向飞奔着逃掉了。我从后面踢他时，这位矮小的神父脸上流露出的惊恐表情，让我觉得是世界上最可笑的。我只要回忆一下这个场面，就会捧腹大笑，根本无法停住和忍住，而且我在任何场合下，都会因想到这件事而大笑不止。

大量例子中的另一个例子是，我喜欢想象跟我谈话的人或我认识的任何一个人的头上立着一只小猫头鹰。而在这只猫头鹰的头上，醒目地摆着一滩粪便。猫头鹰是雕刻出来的，而粪便则是我拉出来的。这只托着屎的鸟儿并没有在这些人身上产生我所设想的那种效能。在某些人看来，它的喜剧效果达到了顶点；而在另一些人看来，这根本没有喜剧效果。我必须更换猫头鹰所呆的人头，但经常我找不到恰好能配合我想法的人头。当我找到它时，我注视着那位并没注意到我刚才在其头顶上放了东西的人的面孔，注视着这只鸟儿的凝固的眼光，我的快乐达到了顶峰，什么都无法与之相比。我的阵阵大笑是那么强烈，伴随着它们而来的便是一阵阵痉挛。人们从楼下的花园听到我的笑声，父亲停止了一会儿手头的活计，他正在浇灌晒得枯萎的光秃秃的蔷薇。

“发生了什么事？还是这孩子还在笑。”他高兴而又有点儿担心的说道，不过仍继续于起活儿来。

这时，我收到我的画商卡米尔，戈曼的一份电报，我跟他刚签订了一个协议，根据该协议，他付三千法郎后将独家拥有我夏季的作品。下一展览季节，他要在他画廊里展出我的绘画作品，我将得到自己那份提成费。不管怎么说，他用三千法郎，成了我三幅由他挑选的油画的所有者。父亲觉得这条件很公道。至于我，我还没能对钱有确切的概念呢。我确信五百法郎的硬币应当比一千法郎的钞票更耐花。对读者来说，这似乎太不像真事了，不过当时了解我的那些朋友的证言或许能打消他们的怀疑。

于是戈曼打了电报，来到我这里。他对远没完工的《阴郁的游戏》满怀热情。几天后，列耐·玛格丽特及其妻子也来了，接下来是路易斯·布努埃尔。保尔·艾吕雅写信通知我他要来。

一些天，我首次被一群超现实主义者包围着，这些人刚发现一位个性奇特的人，他们受到该人的吸引，纷纷跑了来。他们确实是为我而来的，因为卡达凯斯无法提供任何一种乡间度假地的舒适，而我则是住在父亲家里的。

我大笑的毛病让大家感到吃惊。看到他们惊异的面容，我又爆发出一阵阵大笑。那些天晚上，在海滩上乘着凉，人们正极为严肃地谈论着，我涌起想插一句的欲望，而当我刚开口的那一刻，一阵无法平息的大笑爆发了，我浑身乱颤，连眼泪都流了出来。我终于完全静下来，不再想笑了。我那些超现实主义的朋友以容忍的态度接受了我的大笑，把它当成我所流露的天才中不可分割的众多缺陷之一。

“不值得向达利征求意见，”他们说，“因为他很自然会大笑起来，而我们将要为此耗费足足一刻钟！”

一天又一天，我大笑的毛病发作得更频繁了。从他们的眼神和低语，我明白我的状态开始让他们担心了。我觉得这件事同样很有趣，因为我了解我大笑的原因，我终于向他们解释：

“要是你们看到我所想象的东西，你们全会比我本人笑得更厉害。”

感到困惑，他们想了解更多一点。

“想象一下吧，比如，一位相当可敬的人……”

“是的，讲下去……”

“现在请想象一只小小的猫头鹰，它的身子是图案化的，而它的头却是真的猫头鹰的头。你们明白我指的是什么吗？”大家非常认真地尽力想象我刚向他们描述的情景。

“是的、是的，讲下去……”

“那么，想象一下这只猫头鹰头上有一滩粪便，而这并非随便谁的粪便，它是我的粪便！”

大家等待着，谁也没笑。

“怎么，我讲完了，就是这件事啊！”

这回他们笑了，不过很微弱也很勉强。我很清楚他们这么做是出于礼貌。

“不，不，”我说，“你们并没像我这样看待此事；要不然你们会笑弯了腰，瘫倒在地上的。”

我笑弯了腰的一天早上，一辆汽车停在我的住宅前。保尔·艾吕雅和他的妻子走下来，长途旅行使他们非常疲乏，他们刚到瑞士拜访了列耐·克利维尔。他们很快就离开我们，到米拉玛尔旅馆去休息，他们约我们五点钟到这家旅馆见面。我觉得加拉·艾吕雅的面孔显得十分聪慧，但是她似乎脾气不太好，仿佛不高兴到卡达凯斯来。

五点钟，我们这群人动身去找他们，我们全呆在法国梧桐树荫下的露天座位上。我喝了杯法国的绿茴香酒，又犯了大笑的毛病。有人向似乎对此颇感兴趣的艾吕雅解释这种情况。显然，所有其他的人都克制着不向他说什么：

“等等，这没什么，你就会明白的！”

晚上，散步途中，我与艾吕雅的妻子加拉讨论了好几个严肃的问题。我严谨的推理令她吃惊，她向我承认，刚才在法国梧桐树下，她因我用发蜡抹得油亮的头发，把我当成了一位讨厌的、无法忍受的家伙。这样的头发使它具有职业阿根廷探戈舞蹈演员的神态。事实上，马德里时期留给我爱好华丽打扮的习惯。要是我在房间里经常裸体的话，那么一旦必须到乡村去时，我便会花上一个小时精心修饰自己，非常认真地粘头发，刮胡子。我穿上洁白的长裤、新颖的便鞋、丝绸的衬衫，戴上人造珍珠项链和手镯。晚上，我穿上由自己手绘的领口开得很低的灯笼袖丝绸衬衫，这使我完全具有了女人的神态。

我们散步归来的路上，我与艾吕雅谈着话，很快我就明白他是洛尔卡那类的诗人，一位非常伟大的诗人，而且也是一位最真正的诗人。我焦急地期待他对我赞美卡达凯斯的风景，但是他“还没看”它。随后我试图在他头上放只小猫头鹰，可我没看到它，接下来我又试图在洛尔卡头上放一只，但也没成功。我再试着用别的诗人做同样的事，不过笑声一直没出现。而对以往一直受此事有效影响的一切人来说，情况也是同样的。终于，我想象出我的猫头鹰头在下方，粪便把它的头粘在人行道上。这使我笑得很厉害，我都走不动了，呆在那儿捧腹大笑。

我们陪送艾吕雅夫妇回到米拉玛尔旅馆，约好次日十一点在海滩相聚，一起去洗海水澡。

第二天早上，我在日出前就醒了，一种深深的痛苦使我喉咙发紧。想到我的朋友们，尤其是艾吕雅夫妇十一点会在海滩上，而出于礼貌我必须守时，

要比平常早一个小时中断工作。这个念头让我恼火，它提前毁了我这个早晨。我很想使太阳停止运转，把它再抛回它出现的海中，以便无限期地撤离我预感到的那场战斗。

不过这是场什么样的战斗呢？这天早晨如同所有别的早晨一样阳光灿烂，或许唯一不同的，就是还有一种重大事件发生前的轻微宁静。家里的生活同往日一样，女仆来了，在用钥匙开厨房门的锁，渔夫盎利克的桨拍打着海水，一群母山羊和它们的那只公山羊从我窗下走过。这一天跟所有别的一天没什么两样。然而……会发生什么事呢？我再也无法继续坐在画架前了。我试着戴上妹妹的项链，但没戴，这件首饰不适合洗澡戴，而我想成为艾吕雅夫妇眼中最爱打扮的人。为什么不蓬头散发赤身裸体呢？既然他们昨晚已看到过我粘的头发，那么他们今天晚上还要再看我这样吗？我想，他们来时，我要把手上的调色板放下来，脖子上挂一串珍珠项链，披散着头发。这么做，再配上我那阿拉伯人似的棕黑皮肤，会产生一种引人注目的效果。最终离开了画架，我动手把我最漂亮的衬衫乱七八糟地割破，让下摆不超过肚脐的位置。第一下，我在肩部撕了个大洞；第二下，胸部弄了个洞，露出我的黑毛；第三下，乳房上方开了个洞，展示我棕色的乳房。可领子呢？我应当敞着它还是合上它？非此非彼，一剪子，我除掉了它。最后一个有待解决的问题是：我觉得游泳裤太多体育运动的味道了，无法与我制作的具有异国情调的社交服协调起来。我把它翻过来，露出它的白棉布里子，由于腰部的氧化作用，白色的里子染上了一些铁锈色斑点，显得脏兮兮的。我能用别的来点缀这个不得不接受的浴装的主题吗？可这只不过是开始，我剃掉了腋毛，但由于我没有在马德里的优雅女人腋下看到的那种理想的蓝味，我拿了点洗衣物用的蓝色，把它与香粉混在一起，涂在腋下了。有很短一阵子，这非常漂亮，可最后汗水使这种化妆品顺着我的身体流淌成一条又一条蓝微微的痕迹。我擦着腋窝，想把它们洗掉，我看到皮肤变成了暗玫瑰色。这并不比蓝色好多少。于是我明白了需要红色。这之前，我剃毛时微微割破一点皮肤，右腋出现了一小块凝固的血迹，我用吉列剃刀很贴近地重新刮着，结果两个腋窝很快就鲜血淋漓了。我只好等血凝固起来，我故意使到处都有点儿血迹，这在我膝盖上造成了一种十分美妙的效果，我不禁饶有兴致地再弄出个小伤口，来完成这种效果。多么迷人的工作啊！可还没完呢，我又在耳后插上一朵红色天竺葵。现在我该洒点儿香水了。我的古龙香水让我恶心。那用什么呢？坐在他那只画凳上，萨尔瓦多·达利开始陷入沉思。啊，如果他能洒上每天清晨走过他窗下的公山羊的气味，那该多妙！注意，达利刚刚突然站起来，脑海里已有了个天才的想法……

我刚发现了我的香水！我点着搞腐蚀版画用的炉子，用水煮开鱼胶。我知道住宅后放着好几袋母山羊粪，它的气味只能使我得到一半满足，我跑到房后，抓了一把粪，回来把它投到开水里。然后用一支画笔搅拌我的混合剂。一会儿，鱼的气味占了上风，一会儿，又是母山羊的气味，可我知道，只要耐心点儿，这种混合剂将是完美的，特别是如果我再把一瓶蝮蛇油倒几滴进去的话。啊，真是奇迹！这恰恰就是公山羊的气味。让它冷却后，我便获得一种膏状物，我把它擦在身上。我准备停当了。

为谁准备的？我走近朝向海滩的窗户。她已经在那儿了啊！她是谁？请别打断我！我说她已经在那儿了，而这就应该让你们满意了。加拉，艾吕雅的妻子。就是她！加露琪卡·何地维瓦！我刚辨认出她裸露的背。她的身体

有儿童般的体质，她的肩胛和腰部肌肉有青春期那种略显不自然的强健张力。相反，背部的凹陷处却是非常女性化的，与富于活力的躯干优美地结合起来，并自豪地展示出十分美妙的臀部，这使她的细腰更加令人着迷了。

我怎么能同她度过昨天整整一个下午而又了解她呢？而又什么都没猜到呢？我刚才制造那不可思议的婚礼装束，正是为了她！我在身上抹母山羊粪并弄伤了腋窝，也正是为了她！既然看到她在海滩上，我就再不敢这么出现了。照着镜子，我觉得自己很可怜。

“萨尔瓦多，你像个野蛮人，这让人厌恶。”

我脱去衣服，极细心地冲洗起来，要使自己摆脱掉身上散发出的令人窒息的气味，只保留了珍珠项链和减掉一半的天竺葵。

我走向海滩跟朋友们相会，可在我正要向加拉问好时，一阵大笑使我浑身乱颤，我感到一个词都说不出来了。每回她跟我讲话，我想回答时，这个毛病就会重新发作。那些持忍受态度的朋友似乎在估计：

“果然不出所料，我们要为此把这新的一天全浪费掉了。”

于是，他们愤怒地向水中抛石子，来打发时光。布努埃尔尤为沮丧，因为他来卡达凯斯是想跟我一起搞个新电影脚本，而我却越来越把精力花在克制疯狂上，我的各种考虑、思想和关怀都集中在加拉身上。由于无法跟她讲话，我极为周到地照顾她，给她拿来坐垫和一杯水，把她安排在能饱览风景的地方。要是我能做到，我就会为她脱一千次鞋、穿一千次鞋。要是在散步途中我能摸她的手，哪怕只摸一秒，我的所有神经就会颤抖起来，我就会听到四周落下一阵绿色的水果雨来，仿佛我没触摸她的手，却过早摇晃了我的仍很纤细的欲望之树。加拉，凭着她那世上无双的直觉，明白了我全部“细小反应”的含义，她看到的就是我发狂地爱上了她。我清楚地感到她的好奇心在增长，而这种好奇心的指向是毫不含糊的。她看出我是个半疯的天才，能体现出一种巨大的道德勇气。而由于她渴望成为了不起的人，渴望有关于她的神话，她开始认为我是唯一能替她创造出这种神话的人。

我的画《阴郁的游戏》开始深深吸引着我的朋友。溅满粪便的短裤是用极为得意的写实手法描绘的，使得所有人都在暗

自思忖我食粪还是不食粪。我染上这种讨厌毛病的可能性，终于使他们得了一种会恶化的真正疾病。决定结束这个疑问的人是加拉。她向我宣布打算跟我谈一件相当严肃的问题，请我同意与她交谈一次。我成功地做到了不笑出来，回答她这并不取决于我，要是她讲话时我突然笑起来，那也不妨碍我认真听她讲话和严肃地回答她。加拉忧虑的声调差点儿又让我再次大笑起来，我只好尽力克制它。约会定在第二天晚上，我将到旅馆找她，然后我们到悬崖处散步。我吻了她的手，离开了她。

她几乎还没转过身去，我就捧腹大笑起来，结果我被迫坐在门口，等这次发作过去。回来的路上，我碰见了卡米尔·戈曼和他的妻子，他们已注意我一会儿了，停下来跟我谈话。

“你要当心，”他对我说，“一些时候以来，你太神经质了，你工作得太多了！”

第二天，我去找加拉，我们动身到那像行星般忧郁的卡亚尔悬崖散步。我等着加拉开始预定的谈话，可无疑她感到为难，不知如何启齿。我必须用暗示帮她一下。她感激地接受了，同时使我明白她根本无需我的帮助。下面大致就是我们的谈话的情况：

“要谈的就是你这幅题为《阴郁的游戏》的画。”

她沉默了一会儿，使我有足够的时间抢在她前面讲话和进行猜测。我差点儿就要回答了，可我还是宁愿等待，以防还有另一些事物。

“这是件很重要的作品，”她继续说下去，“正是为这，所有朋友，我和保尔，我们都想了解你画中的某些因素到底配合着什么，你似乎赋予它们特殊的重要性。要是这些‘东西’配合着你的存在，那我就与你根本的分歧了，因为我觉得对我的生活来说这是可怕的。不过这只涉及你自己的生活，而我的生活不该同它混在一起。相反，要是你为了你认为是天才的一种怪癖的利益，想利用你的各种形象传播信仰的热忱，那么照我们的看法，这可能会大大削弱你的作品，把它缩减成仅仅是种精神病理学文献。”

我想用谎话回答她。如果我向她承认我像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朋友们相信的那样是位食粪者，这就会使我在他们眼中显得更与众不同、更有趣。然而加拉如此清楚明确的口吻、她绷紧的面部表情、她高傲的绝对诚实，迫使我说真话。

“我向你发誓，我不是食粪者，我同你一样讨厌这类精神失常的表现。可我认为那些涉及到粪便的因素是令人恐怖的，同血或我对蚱蜢的恐惧是一样的。”

我等待加拉听到我的回答会流露出宽慰的情绪，可她仍保持着一种忧虑的神态，仿佛这还只是伤及她那如此优美的黄褐色皮肤表面的另一个问题。我差点儿跟她说：“那么你呢？怎么回事？有什么人们不再谈起的吗？”可我沉默了。这如此不真实的，如此同我的肉体接近的肉体，妨碍我讲话。脸上那种体弱多病的美并不是这个身体上唯一优雅的地方。我注视着她挺胸的身姿，这是那胜利女神似的步伐造成的，怀着已有几分审美性幽默的心情思忖着：“那些胜利同样也有因心情恶劣而变得忧郁的面孔，不应当碰它。”然而我要碰她，我要在加拉用手拉住我的手时，搂住她的腰。这是大笑的时刻，我神经质地大笑起来，比以往更厉害，在这种时刻，这笑声会使她分外恼火。可加拉并没感到这笑声伤害了她，反而因此得意洋洋。她以超人的努力，更用劲地握住我的手，而不是像每一位别的女人可能做的那样轻蔑地让它耷拉下去。她通灵的直觉使她能了解我笑声中的确切含义，可别人对此却难以理解。我的笑跟大家的笑不同，它不是“快活的”。它也不是怀疑的或轻佻的，而是狂热的、灾难的、深渊的和恐怖的。但所有笑中最恐怖、最灾难性的笑，就是我现在抛在她脚下让她听到的笑。

“我的小宝贝”，她说，“我们再不分开了。”

她将成为我的前行者格拉狄瓦，我的胜利，我的妻子。但为此，她必须治愈我。多亏了她的爱情不可征服和不可思议的威力，她才治愈了我，这爱情的思想深度和实际灵巧胜过了那些最为雄心勃勃的精神分析法。我们最初的关系，以一种永久的病态不正常和一些明显的精神病理学征兆为标志。我的笑从欣快的变成了令人难以忍受和使人发怒的，它跟歇斯底里的状态很接近，连我都开始不安起来，尽管我仍为这些大笑感到得意。我变得幼稚的情况更加强着如下事实：我觉得加拉就是我虚假的记忆中被我称为加露琪卡的那位小姑娘，加露琪卡也就是加拉的爱称。眩晕的幻觉（36）重又出现，但显得更加鲜明强烈。在我们多次远游克鲁斯海岬的悬崖峭壁期间，我无情地强求加拉跟我一起爬上所有最危险也是最高的悬崖。从我这方面说，向上攀登包含着一些明显的犯罪意图，特别是在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巨大的玫瑰色花

岗岩的那天，这块巨大花岗岩的顶峰倾斜着，仿佛是飞翔在深渊上的雄鹰展开的双翼。从鹰上下来时，我想到把一些大花岗岩块推到虚空中去，它们像瀑布似的落入了海里。我怕把加拉当成一块岩石推下去，不得不离开这个始终让我感到危险和极度刺激的地方，要不然我是决不会厌倦这种游戏的，我对杜丽塔的那种仇恨，开始在我心中产生作用。加拉终于暗中破坏和毁掉了我的孤独，而我却对她横加指责，反复跟她说她妨碍了我的工作，她对我的影响使我丧失了个性。此外，我认为她伤害了我，于是如同突然被恐惧扼住脖子，我对她说：

“尤其不要伤害我！我也决不会伤害你！我们应当从不伤害对方！”

接着我向她建议，到大家认为是卡凯达斯最令人赞叹的风景之一去散步。

我们来到此处观赏风景的最佳地点。读者们，我想用它来给你们标明一个时期。请像我这样凝视此处风景吧！凝视这一我们散步的最高场所、这一我们生活的最高场所吧！攀登是艰苦的，我们都很疲劳。这一章已进入后半部，我们应该休息一会儿，然后用熟悉路线的人的从容步伐，沿着最悲哀的那些小路走下去。在我们身体休息时，请允许我讲述一个我从奶妈露西娅那儿听到的故事，来使你们的心灵激动不安吧！通过它，你们不仅会认识少女时代的加拉，而且也会从国王身上认识我本人。下面就是这个故事，题目是我为你们加的。

糖鼻子蜡人

从前有一位国王，他的爱很古怪。每天，王国中三位最美丽的少女，应邀来浇灌他花园里的石竹，从城楼上，他观察她们好几个小时，挑选其中一位少女到国王的床上过夜。这张床的四周点燃着最珍贵的香料，这位被选中的少女穿着华丽的长裙，戴着最美的珠宝首饰，她躺在国王身边，应当整夜睡着或装作睡着，国王并不碰她，仅仅满足于注视她。到了黎明，他军刀一挥，砍掉她的头。

国王向三位少女中的一位打招呼，这就表明了他的选择。他从城楼的围墙探出身来，对这位少女提出永远不变的同样的问题：

“我的花园里有多少石竹？”

这位少女就这样明白了他的选择，同时也明白了死亡判决落到了她身上，她应该不变地、调皮地回答：

“天空中有多少星星？”

这么做过后，国王就离开了，而这位少女则跑回父母家中，把她可怕的婚礼告诉他们，并穿上最华丽的服装。许多年过去了，直到有一天，国王选中王国里一位最美丽也最聪明的女子做他的未婚妻。她非常聪明，一旦国王提出问题并得到预期的回答后，她立刻就回到家里，照她本人的形象，制作了一个蜡人，她在这个蜡人上粘了个糖做的鼻子。她来到亮着无数蜡烛的新房，趁新郎国王没来，巧妙地把这个糖鼻子蜡人放到豪华的被子下面，她自己躲到了床下。国王来了，开始脱得一丝不挂，躺在假人旁边，他像往常一样，整夜凝视着它。到了黎明，他拔出佩剑，从蜡人肩上砍掉它的头。这一下太有力了，使糖鼻子掉下来，弹到了国王的嘴里，它的甜味使国王大吃一惊；嚼着它，国王后悔地喊道：

生中的甜蜜，
死里的甜蜜。
若早认识你，
怎让你死去！

这位狡黠的美女听到了一切，趁机出来，向国王揭开她的计策。犯罪的错误得到了纠正，他娶了她。

这一故事的阐释

现在让我们借助我们自己的精神分析法，通过探究来阐释这个故事吧。我们从这一系统中的普遍因素开始：这就是蜡人。蜡，由于它那富于特色的苍白颜色（37），是最适合仿造活人的材料，而这是用最令人痛苦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方式进行的。出于不同的原因（不仅是由于与蜜同质），它并不令人反感，人们甚至感到它很甜蜜。它没有异电性。蜡在受热过程中熔化，而别的可塑性材料，如粘土之类，遇热则易于变干变硬。除了蜡所召唤来的死者是甜蜜的、决不令人反感的这一点以外，这种液化跟尸体的腐烂是相同的。处在我各种假设的使人头昏目眩的大斜坡上，有必要想象一下被替代死者气味的点燃的蜡味撩拨起来的恋尸之情。烧光了的大蜡烛，既无汗水，也无生命的怪味，它同死者的真正气味混合在一起，并为死者提供了一种热烈的迷失方向的短暂假象。因而我觉得蜡以其对死者的理想化再现，阻止了我们向跟“堕落者欲望”共存的食粪性幻影让步，适于为恋尸的冲动和渴望准备一条捷径。

为了回到我们的故事上来，我们将观察到国王的恋尸感情导致他先让一种适于展开和促进他“未满足的爱情”的仪式出现，然后他再挥动那最后的一剑。事实上，牺牲者应当整夜处于一动不动的状态中，她应该睡着，或是假装睡着，一句话，就是应当装死。国王的古怪念头，进一步要求她穿上最迷人的长裙，像死者一样安息在“床单”上，蜡烛要把一切照亮，像为死者一样。神经官能症似的开端显然别无其他目的，只是要用一系列有关死亡的幽灵，把他的不正常病状理想化地展示出来。国王想象着他的牺牲者死了，这恰恰是在达到最高潮的那一刻之前，到了那一刻，处于最终实现他欲望的情况下，他真正用剑杀死了他一夜的配偶。而这达到最高潮的事件终于满足了他的乐趣，在他失常的状况下，这一乐趣必定配合着他射精的那一瞬间。

正是在这个时刻，这个故事让我们明白了狡黠美女的表现同现代最精通精神分析法的行家的表现是一样的。她实现了一种近似魔法的置换，从而肯定治愈了她的丈夫。蜡人作为死者中最真实、最美丽的女人出现在国王面前。这个假像是完美的，也可以说是超验的。要是鼻子仅仅是掉下来，它很可能只在国王的心灵中掀起悔恨之情。可实际上，作为潜意识的食粪恋尸吃人魔，他仅仅寻求品尝死者的秘密滋味，但他的各种抑制妨碍以别种方式实现这一点，他只能通过人为的不自然方式，也就是通过蜡人的假眠和阴森的环境来实现它。带糖味的鼻子只能令他吃惊，只能深深地骗了他并让他觉得非同寻常。这位国王想吃尸体，但他没尝到自己期待的那种味道，却碰到了糖。这就足够治愈他了。他不再想吃尸体了。在我的故事中，糖另外还发挥着更微

妙的作用。如果国王感到失望，那这只不过半失望，首先因为涉及的是糖，其次因为在这一瞬间，国王得到了乐趣，这种乐趣立即就使现实恢复了。糖的味道替那想从死过渡到生的渴望搭了座“桥”，国王全部淫荡好色的射精都固定在生的这一瞬间；生的这一瞬间，以预料不到的方式，取代了死的那一瞬间。

生中的甜蜜，
死里的甜蜜，
若早认识你，
怎让你死去！

国王后悔杀了人，从而证实了狡黠美女的预见。

就是这样，又一次一下子实现了神话，实现了我思想的、美学的和生活的主题：死亡和复活！糖鼻子蜡人只是从颠狂中诞生的那些“客体生命”之一，它是由一位女人的热情创造的，这女人就是故事中的女主角，就是格拉狄瓦，或者就是加拉，她们用这些客体生命使疯子的敏锐清醒突然从心理的黑暗中涌现出来。

我的疯狂和我的清醒的最大难题，就是我虚假记忆中的加露琪卡（她是空幻的，并多次死在我对绝对孤独的渴望之中）和真实的加拉（她的实体性在我当时的失常状态中显得难以实现）之间的界限问题。在我奶妈的这个故事中，这些界限是装扮成一种真正“超现实主义的物品”（38），摆在了蜡人结束、糖鼻子开始的地方，并由詹森的《妄想与梦》中的人物佐埃·贝特朗（39）提了出来。全部困难、全部进退两难的窘境，恰恰在于如何确定这些界限。

既然我的读者已了解这个故事以及对它做的精神分析的阐释，那么就该重返我们的道路和重建我本人的病例与国王的病例间的对照了。我和加拉的故事的续篇将会得到阐明。你们全都了解，我本人也是个国王。在我全部的童年，我一直装扮成国王生活着。我的青春期只不过是用绝对的君主专制政体意识来证实和发展我的精神。我同样决定我爱的形象应当装成在睡觉。每当这个形象试图动一动时，我都向她喊到：“死过去！”而这无形的虚幻形象也就“装死”了。仅有少数几次，加露琪卡的形象具体化了（例如，化身为杜丽塔），这种奇遇有可能走错方向。危险包围着我，我就要犯罪了。恰似故事中的国王，我反常地喜欢尽可能久地延长那令人不安的等待，这种等待包含着“未满足的爱情”的伟大神话中全部折磨人的精神上的满足。我也……

可这个夏天，我明白了它！现在化身为加拉的加露琪卡的再生的形象，再服从一个简单的专横命令，躺在我脚下”装死“了。我即将接受我生活中的大考验——爱情的考验。而我的爱情、一位半疯者的爱情，不可能像别人的爱情。牺牲的时刻越临近，我就越怕想它。有时候，离开站在米拉玛尔旅馆门口的加拉，我发出一声深长的叹息；“这太可怕了，”我思忖着，“这太可怕了！不过为什么？你把你的生命花在渴望那发生的事情上，再者，这就是‘她’。既然那时刻临近了，达利，你会怕死的！”我大笑的毛病和歇斯底里的毛病变得更加强烈，我的精神获得了符合防御机制的柔顺和灵活。用各种躲避和“卡皮亚”，我正跟我生活的中心难题斗着。我的欲望这头公

牛将不时站在我前面，催促我去杀死它或被它杀死。

加拉开始重复地影射会在我们之间“不可避免地”发生的“某种事情”，某种对我们的关系很重要很关键的事情。可她考虑我的神经状态吗？它不但远没恢复正常，相反却以疯狂的所有最鲜艳装饰来炫耀。此外，我的状态感染了她，同时也损害了她的平衡。我们漫步走在油橄榄林里，一句话也不说，共同陷入沉思之中。我们走了很久，也没能制服我们受压抑的、被激怒的感情。人不会如其所欲地那样耗尽精神。只要那些本能一直痛苦难耐地得不到满足，那么肉体 and 灵魂都不会有休战的时候。这些散步是两个疯子漂泊不定的写照。有时，我扑在地上狂热地亲吻加拉的鞋子。在这一刻，为我的悔恨采取了这种精神错乱的形式，我的灵魂中刚发生了什么事？一天夜里，我们正在散步，她吐了两次，痛苦地抽搐着，这是曾在她青春期压垮她的一场长久的心理疾病的后遗症。正是在这时，我画了《欲望的调节》。在这幅画中，那些狮子吓人的头代表了各种欲望。加拉对我说：

“不久你就会知道我想从你那儿得到什么。”在借助一些可怕的形象，尽力提前习惯那显示的启示时，我想这不会同我那些狮子头有多大差别。在加拉身边，我从不坚持要她匆忙吐露爱情，相反，我等着，仿佛那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判定，一旦命运决定了，我们就再也不能从它面前后退一步。在我一生中，我还没做过爱。我觉得这种行为有种跟我的体力不相称的令人受不了的粗暴性质……“这与我无关”。只要我能做到，我就会向加拉重复说：

“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商定从不伤害对方！”

到了九月份，超现实主义团体的所有朋友都已重返巴黎了。艾吕雅也回到了巴黎。于是只有加拉独自留在卡达凯斯。每一次新相会仿佛都在对我们说：“该结束了。”狩猎期开始了，回荡在山间的断断续续的枪声不时打断我们的散步。继八月宁静明洁的天空之后，出现的是遍布着秋天一块块正在成熟的云彩的黄昏。我们热情的葡萄收获季节来临了。加拉坐在一处干燥的石墙上；吃着紫葡萄。每吃一粒，她就变得更美了。葡萄园变温和了，我觉得加拉的身体像是用金闪闪的麝香葡萄颜色做成的“肌肤的天空”。明天呢？我们不断地想到它。拿给她几串葡萄，我让她挑选：白的或是紫的。

决定的那天，她穿了白色的衣服，一件非常薄的连衣裙，这使我在小路上一看到她在我面前，就开始打哆嗦。风很大，我便趁机改变了我们的路线，把加拉带到面对大海的地方，在不受风吹的岩石处凿出的一条石凳上坐下来，这是卡达凯斯一处最荒凉的地方，九月给我们在这儿添加了一弯银色的新月，它高悬在我们头上。一种哭泣的欲望堵在我们的喉咙里。可我们并不想哭出来，我们想结束。加拉脸上露出一种坚决的神情。我用胳膊抱住她：

“你想让我做什么？”

她感情激动，说不出话来。她试了好几次，但都没有成功。泪流在她的脸颊上。我多次坚持着。于是，她张开口，用儿童的

细微噪音向我说：

“要是你不想闭口不谈它，那么你再不要跟谁说了。”

我吻着她微微开启的双唇。我还从来没有这样地深情拥吻过，我没注意到人们能这么做。所有我色情的“帕西发尔”，受到我长久被束缚的肉体欲望的冲击，突然一下子觉醒了。我们牙齿碰撞、舌头交缠的这一初吻，仅仅是促使我们咬啮和吞食自身骨髓的那种饥饿的开端。这时，我吃了这张嘴上的血，它已跟我嘴上的血混合在一起了。我消失在这无限的吻中，它像令人

眩晕的深渊一般在我下面展开来，我想过把我的各种罪全抛入这个深渊，我现在感到准备好了让它吞没我……

我扯着加拉的头发，使她的头仰起来，并歇斯底里地命令她：

“现在告诉我我希望我为你做什么吧。但要看着我的眼睛，用能使我们两人最丢脸的、最露骨、最猥亵的词句慢慢跟我讲这件事！”

我打算利用这一揭示的所有细节，打算睁大双眼看得更清楚，更好地感觉到要死于欲望。而这时加拉的面孔上闪耀着最美的表情，人的面孔上从不可能具有这样的表情，加拉使我明白了我们什么都躲不开。我的爱欲激情此时达到精神错乱的地步，我再次重复着：

“你、希、望、我、为、你、做、什、么？”

她的面部表情改变了，变得严厉和专横。

“我希望你使我断气！”

世上什么解释都无法改变这一呼唤的意义，它准确地说出了所要说的东西。

“你会这么做吗？”她又问了一次。

她傲慢的声音已透露出她的怀疑，我怕让相信我所有疯狂举动和勇气的加拉失望，骄傲地镇定下来。我把她紧抱在怀中，庄严地回答：

“当然会！”

而内心里却有个声音不断重复着：“不，我不会杀死她的！”于是我重又发狂地拥抱亲吻她。多亏了我温柔的伪善，这一犹大的吻使加拉又复苏了并拯救了我的灵魂。加拉开始细致向我解释她这种欲望是因何产生和如何产生的。可她越向我解释，我就越感到怀疑重新出现了。我思忖着：“我终不会做她要我做的事；不去杀她，这可还没谈妥啊！”任何道德秩序的顾忌都无法阻止我这么干。我们在这点上是一致的，而且这一罪行很容易伪装成自杀，特别是如果加拉想到给我留下一封信，把她想死的想法显示出来的话。她现在描述着从童年时代起就折磨她的对“死亡时刻”的恐惧心理。她希望这件事干净利落地发生，不感到最后时刻的害怕。我的脑海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要是我把她从托莱多大教堂的钟楼顶上抛下去呢？由马德里时代一位最美丽的女友陪同着，我曾登上那儿，当时我就这么想过一次了。可加拉不欣赏这种想法，她担心在长久的跌落过程中会非常惊慌。另外，我怎么辩解我跟她一起在那上面的情况呢？我也不欣赏服毒这种过于简单的办法，我总是要回到我那涉及深渊的坏事上来。我有一刻梦想到非洲，我觉得它的环境特别适于这类罪行，但我也放弃了这个想法。那边太热了！因而我放弃探求我的各种谋杀计划，把注意力转到加拉身上。她想在生命中意外而又幸福的一刻被杀死的欲望，并不像人们可能认为的那样，是出于一种浪漫的奇想。一开始，我就了解，同上述看法相反，这对她来说是生死攸关的。她的狂热不应让人对这个主题有任何怀疑。加拉的想法就是她精神生活的理由本身。她独自一人就能揭开她的决定中的那些真实理由。尽管得到她的允许，我仍拒绝揭开她存在的隐密。在这本书中，将只有一个唯一的活人解剖模型，而这就是我。我这么做，既非出于性虐待狂，也非出于受虐待狂，而是出于自恋。

我刚看到加拉当我面被活活地剥掉皮。我只觉得她更美、更高傲、更神气十足了。我再次对自己重复着：“她必定有道理，还不能说我不会去这么干……”

九月使酒变得更加醇厚，使五月的月亮更加明亮；九月的月夜使我情味消尽的暮年之春平添醋意……受到卡达凯斯钟楼的庇护，我青春期的痛苦在我心灵的新石头上刻下了以下的词句：“利用她、杀掉她……”我想到了她把爱传授给我，我想到了此后我又会如我一直希望的那样，重又是孤单一人。她希望这样，她希望这样并要求我这样。然而，我的热情并非没一点毛病的。“达利，那你怎么办？有人把犯罪当礼物送给你，可你竟不再想犯罪了！”

加拉，这童话中的狡黠美女，用她吐露爱情的军刀，敏捷地一下子就砍下了从童年时代起就守在我孤独的床上的蜡人的头，而那死的鼻子刚弹入我初吻的狂乱的糖中！加拉使我摆脱了犯罪并治愈了我的疯狂。谢谢！我要爱你。我将娶你。

仿佛中了魔法，我歇斯底里的症状一个接一个地消失了，我重又能控制我的微笑、大笑和各种动作了。新的健康像一朵蔷薇那样在我头脑中生长起来。陪伴加拉到资格拉斯车站乘火车回巴黎后，我磨擦着双手，欢呼道：

“终于独自一人了！”

因为如果说我童年那些致命的眩晕得到了治愈，那么要治愈我对孤独的渴望，则尚需一些时间。

“加拉，你是现实的！”

在把她同我那些虚假爱情的理想化形象相比较时，我经常想到这句话，她是个有血有肉的造物。我拚命嗅着一件保留了一点她气味的毛料游泳衣。我想了解活生生的真实的她，可我也需要不时独自一人生活。我觉得这新的孤独比以前的孤独更真实，因而我也就更加爱她了。一个月内，我把自己关在费格拉斯我的画室里，又过起那修道般的生活。我完成了保尔·艾吕雅的肖像和两幅大油画，这两幅大画中有一幅变得极为著名了。它表现一个蜡般苍白的大头，面颊是玫瑰色的、眉毛很长。巨大的鼻子紧贴在地上。一只蚱蜢代替了它的嘴，这只蚱蜢腐烂的肚子上爬满着蚂蚁。这个头的下部是用1900年风格的装饰画形象来表现的。这幅画的题目是《大手淫者》。

我把完成了的作品交给费格拉斯一位细木工，他照我的要求，非常认真地把它们包装好。这个人肯定要记录在我那些无名牺牲者的名册上。我动身去巴黎，我的展览将从11月20日到12月5日在巴黎的戈曼画廊举行。一到巴黎，我想干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加拉买些花。我进了一家花店，要它最好的花。有人向我推荐红玫瑰。一只花瓶中插着一大束红玫瑰。用手指指点着它，我打听价钱。

“先生，三法郎。”

“你给我弄十束同样的花。”

店员似乎被这个要求吓了一跳。他不知道能否有这么多同样大的花束。可我坚持着，于是在我给加拉写卡片时，他迅速地盘算了一下。付款时，我看到收据上写着三千法郎。我手头没这么多钱，便请他向我解释这价格的奥秘。我指点过的那束花由一百朵玫瑰组成，而一朵就要三法郎！可我以为一束三法郎。

“那么给我二百五十法郎的花吧！”

我身边一分钱都没有了。整个上午我在街上荡着。中午我喝了两杯法国绿茴香酒。午饭后，我来到戈曼画廊，我在这儿碰见了保尔·艾吕雅，他告诉我加拉在等我，她感到奇怪，我竟然没跟她约定个时间见面。实际上，我打算拖延几天，单独享受等待的那种令人舒服的乐趣。晚上，我终于去拜访

加拉并呆下来用晚餐。加拉只有一小会儿流露出气恼的情绪，我们一起吃饭，面前摆着一排几乎难以让人相信的最不同的酒瓶。在马德里喝过的酒开始在我味觉器官的坟墓中站起来，仿佛是拉撒路的干尸，我命令它：“前进。”而它就前进了，令大家感到害怕。这一复活使我恢复了口才。我向干尸说：“讲话！”而它就讲话了。这是一种发现，它证实了我绝非一个傻瓜，不单只会画那些画。我也懂得讲话，而加拉怀着忠诚坚定的狂热态度，负起了说服超现实主义朋友们责任，让他们相信我同样能写一些哲学深度超过团体成员全部设想的文章。实际上，她在卡达凯斯就收集了一些混乱而又费解的文章，她成功地赋予了它们一种便于传播的“形式”。这些笔记已经相当成熟了，我修改它们，把它们融入一册理论和诗的文集中，这本文集应当用《有形的女人》的题目问世。加拉显然就是我第一本书中的“有形的女人”。将在其中阐明的那些观点，就是我用刺向不信任我的、甚至有时是敌视我的超现实主义团体心脏的最初武器。为了让我的观点至少能受到朋友中对我最有好感的那些人的注意，加拉必定也进行了别的战斗。所有的人已经下意识地猜到我用他们特有的武器（但更可怕、更锐利）毁灭他们的革命尝试。从1929年这一年起，我已在反抗由战后的这些艺术爱好者的焦虑所引发的“全面革命”。在怀着跟他们相同的激情投入那些最具破坏性和最为疯狂的思辨中的同时，我已经以怀疑论者不择手段的方式为永恒传统将临的一个历史阶段准备好了结构的基础。我觉得超现实主义者们是仅有的这样一些人，他们组成了一个团体，它的种种手段有助于我的活动。照我看来，他们的领袖安德烈·布列东的那显而易见的领袖作用是他人无法替代的。至于我，我将试着去统治，不过我的影响将是看不见的，机会主义的和反常的。在这期间，我意识到我的位置和我的各种弱点；我也意识到我的朋友们的各种缺陷和各种才能，这是因为他们是我的朋友。我摆出一副公理在身的样子：“要是你决心为你自己的胜利而战，那你就毫不留情地毁掉那些与你最相似的人。整个无个性的同盟。整个共同意味着埋葬掉你的那一切。你去把集体当作经验来享用吧，然后再打，使劲地打吧！只剩下独自一人。”

我只剩下独自一人，不过经常有加拉陪伴。我的爱情使我傲慢而又大度。我的脑子里塞满了各种开战的计划。我觉得它们一下子提前成熟了。恰恰在我在世界艺术之都巴黎的首次展览开幕前两天，我决定同加拉一起去蜜月旅行。这样一来，我甚至无法看到我这次首展作品悬挂起来的情景。我甚至得承认，在旅行期间，我和加拉，我们是那么关注我们的身体，我们几乎没有一点时间考虑我的展览（它已经成为“我们的”展览了）。我们真纯温柔的爱情展开在巴塞罗那，接着在附近的一处海水浴疗养地斯蒂热丝，在地中海冬日的阳光下，它荒凉的海滩闪闪发光。

一个月以来，我没给父母写过一行字，于是每天早晨我心中就有种轻微的负罪感。我也向加拉说：

“这不能永远持续下去。你知道我应当独自一人生活。”

加拉把我留在费格拉斯，她回巴黎去了。在熟悉的餐厅里，起了一场风暴。一场我朝着微微抱怨的父亲挥舞着闪电投枪的风暴，他因我对父母的态度日益傲慢而感到悲伤。我们谈到了钱。事实上，我同戈曼画廊签订了一份两年的合同，而我就连这份合同的期限都记不住。父亲让我试着把它找出来，我回答这不忙，能慢慢来，不管怎么说，我当时太忙了。我也补充说，我花光了戈曼预付给我的所有钱，这令全家感到震惊。于是我在口袋里摸索着，

把它们翻过来，从中一张张地抽出团得几乎不能用了的一些钞票。我把所有占地方的小额硬币都扔在车站前的广场上了。最后，我在桌上整齐排列出旅行剩下来的三千法郎。

第二天，布努埃尔突然来到费格拉斯。他从诺埃尔子爵那儿收到一份“合作的股金”，用来拍摄一部会在我们脑海中闪现的影片。购买了我的画《阴郁的游戏》的也正是这位诺埃尔子爵！我在戈曼那里展出的全部作品都卖掉了，售价从六法郎到一万两千法郎不等。我动身去卡达凯斯，我的成功再加上开始搞《黄金岁月》，使我心情激动。照我的想法，这部影片应当传达受到天主教神话的辉煌创造浸润的爱的暴行。在那时，我已经赞赏天主教的伟大和它的各种大事件，并对此念念不忘。

“就这部影片而言”，我对布努埃尔说，“我希望有许多大主教、骸骨和圣体显供台。我特别希望大主教头戴绣花的主教冠，在克鲁斯海岬多岩石的洪水中洗澡。”

布努埃尔，以他那阿拉贡人的固执和天真，把整个这件事都变成了一种肤浅的反教权主义。我必须不停地制止他奔放的热情，对他说：

“不，不，别让人发笑！我喜欢这些大主教，我甚至很喜欢他们。我非常希望有某些亵渎宗教的形象，但应该加上当时的狂热，就像一次真正的读圣行为那样！”

布努埃尔带着脚本回巴黎去着手搞分镜头了。我独自留下来，呆在卡达凯斯。我每餐就着酒吃三打海胆和六块放在葡萄嫩枝上烤的排骨。晚上，我品味鱼汤、番茄鳕鱼或炸茴香狗鱼。

有一回吃午饭时，我正切开一只海胆，我突然看到面前的海边有一只白猫，它的一只眼睛放射着奇异的银光。我走近它，这只猫并没有逃走。相反，它久久地凝望着我，眼睛一眨不眨，于是我发现它这只眼睛被一个大鱼钩刺穿了，鱼钩的尖从扩大了流血瞳孔中露出来。这看起来太可怕了，无法抽出鱼钩而不把眼眶掏空。我朝它扔了些石头，想赶走这恶梦般的景象。可随后一些天，每当我弄开一个海胆时，我就看到这猫的形象重又出现了，我吓瘫了。我终于相信这只猫是个预兆。事实上，过了几天，我就收到父亲的一封信，向我宣布我被家庭无可挽回地驱逐了。此刻我也无法揭开引起这一不和的奥秘。这只涉及我和父亲。而我不想再碰疼这个使我们六年间都非常痛苦的旧伤疤。

我收到这封信时，最初的反应就是去理发。可事实上我做得更妙，我剃了光头，接着把被牺牲的头发与中午吃的海胆空壳一起埋到地下。做完这件事，我登上卡达凯斯一处能够俯视整个村庄的丘陵，我花了两小时凝望沉思我童年、青春期、成熟期的全貌。

夜晚，我定了一辆出租汽车，让它第二天把我送到边境，以便乘直达巴黎的火车。早饭时，我饮着卡达凯斯的烈酒，吃了一些海胆。我光头的影子在墙上显出清晰的轮廓。我迷恋起一个海胆的壳，向它立正敬礼。

威廉·泰尔？

卡达凯斯到波尼山口的道路蜿蜒曲折地渐渐升高起来。每一转弯处都重新展现着村庄和海湾的景色。在最后一个转弯处，从童年时起，我就转过头再一次把我内心深处的这个风景填满我的双眼。可这天，我坐在出租汽车里，

没有回头收集我最后的图像、反而继续看着前方。

第三部

第十章

初入社交界——拐——贵族——
卡利—勒—鲁埃城堡旅馆——
丽第娅——利加特港——发明——
马拉加——贫穷——黄金岁月

刚刚到巴黎不久，我就急于离开这儿了。我想马上继续进行在卡达凯斯考虑过的那些绘画探索，从家中被赶出来这件事中断了它们。我打算画一位“无形的男子”。确实就是这件事！可无论在哪儿都应当做这件事，或许在乡下。我也打算带加拉走。想到我的房里现在能有一位真正的女人、她有乳房、汗毛、牙床，我就觉得这非常诱人，我都不敢相信能真正实现这件事了。加拉准备跟随我，我们只需选择一处要去的地方。出发前，我在超现实主义团体内提出了某些大胆的口号。等我回来时，我就会看到它们产生了多么挫伤士气的效果。我说：“卢塞尔对韩波，现代风格的物品对非洲的物品，欺骗眼睛对造型美，模仿对阐释。”所有这些将足够养活他们几年了。我有意不做什么解释。我仍不是一位“健谈的人”，所以只想提出注定会缠住大家的那些本质的言词。我病态的羞怯使我每当该开口讲话时就会体验到可怕痛苦不安。我以西班牙人特有的狂热和露骨的方式，表达受压抑的口才在长久沉默中集聚起的一切。我想论战的急躁心情忍受着献身法国式谈话的一百零一位殉道者，这种谈话点缀了如此多的机智和见识，从而时常掩盖了它缺乏骨架的毛病。我终于向那不断跟我谈论“题材”、谈到库尔贝的“题材”和他如何操纵他们“题材”的艺术批评家问道：

“你吃过它吗？一堆无价值的大粪，我更喜欢夏尔丹的题材。”

一天晚上，我在诺埃尔家里吃饭。他们的住宅令我胆怯，我看到我那幅《阴郁的游戏》挂在墙裙葱形饰处，在一幅克拉纳赫作品和一幅华托作品之间，我感到极为得意。同桌进餐的人由形形色色艺术家和社会名流组成。我很快就明白了我是大家等待的对象。我也确信我的羞怯令诺埃尔全家很感动。每当饮料总管凑近我耳朵悄悄跟我讲话并以谈知心话的语调提到酒的名称和年份时，我都以为要谈的是某些严重的问题，以为加拉被出租汽车压了，以为一位愤怒的超现实主义要揍我一顿。于是我面色苍白地惊跳起来，打算离开餐桌。但并非这类事，什么都没发生。饮料总管带着一种最静止不动的尊重态度，提高声音再一次向我证实：“沙托奈夫—杜—帕普，1923年。”我一口就喝干了这种让我害怕的酒，我希望借助它大大克服我的羞怯并重获说话的能力。我总是欣赏那种人：他并无什么惊人的事情可谈，但却能在二十个人的晚餐中成功地照他的意图左右谈话，在让大家听到他谈话时，并不会因此而停止吃喝。他甚至会做得更妙，吃喝得胜过任何人，并以优美的方式打断谈话的中心，可却让人毫无感觉，使别人认为不礼貌的是他们自己。

初次在诺埃尔家吃晚饭期间，我发现了两件事。第一件是贵族（当时这样称呼那些“上流社会的人士”）远比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更受不了我那类思想。事实上，上流社会的人士还保持着讲究高雅和文明的返祖性因素，而资产阶级和倾向于社会主义的一代则刚刚怀着欢乐之情献身于具有集体主义倾

向的各种新观念。

第二件事，就是发现了一些野心家，他们是被成功的狂热吞噬的小狗。他们坐在所有摆满着最美丽的水晶玻璃器皿和最华贵的银器的桌子旁，来炫耀他们的男女私情和讲闲话的聪明。

那天晚上，我决定利用这两类人，使上流社会的人士从经济上支持我，让野心家用妒忌的蠢话和中伤替我打开盛名之路。我从不害怕闲话，听任它们形成。所有野心家都为此忙得满头大汗。闲话一形成，我就看着它，研究它，并总能终于找到让它对我有利的最佳方式。心怀恶意者们的活动，像风一样吹起来时，是一种能独自使你的胜利之舟行驶的力量，重要的是你一秒种也不要放松掌舵。野心对自己并没兴趣，它感兴趣的是获得名誉地位。从我到达奥赛车站那一刻起，我就获得了既无人知晓、又无行李和护照的光荣。必须回去寻找它们和雇些“搬运工”。也必须让人在我的文件上签字。这些步骤和这成堆的文件可能会吞没掉我的余生。于是我开始打量周围，寻找那些可能替我搬运行李的人。我找到了他们，很快就把他们弄得筋疲力尽。我行李太多，而且我去的地方对他们来说也太远。在极不同的环境下，我选了另一些人，允诺把他们引到等待着我的光荣那儿去。我本人已谈过它了，我不想到达，我将要到达。别的人要依赖我。

什么是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就是这样一些人：他们不用两脚直立，而是像红鹤那样用一条腿保持平衡。这种有意做出来的贵族姿势显示了他们想除了接触最起码的生活必需品外不再接触世上各种琐事的意愿。这种自我中心的姿势，很快就让人疲倦不堪了。上流社会的人士也需要支持，他们把一群一条腿的人聚集到他们身边，这群一条腿的人，在诸如艺术家、鸡奸者、吸毒者之类的五光十色外表下，用“人民阵线”的最初的那些忙乱来向他们提供支持和保护。这可以理解，我就加入了一群残废人，以他们赶时髦的态度来支持尽力捍卫传统的贵族的没落姿势。不过，我并非空手到达的，我手中带着拐到达的，以使整个这件事像是直立着的。我创立了“悲他的拐”，我童年最初罪恶之拐，作为战后的象征性支架。一些拐支持着染上了脑髓病的畸形发展的某些头颅，另一些则使一些稀罕的优美姿势或舞蹈动作固定下来。拐、拐，到处都是拐。我甚至发明了一种极小的用于面部的拐，它是用黄金和红宝石制作的，配合着嘴并支撑着鼻子。这是件令人羞愧的无用之物，准备提供给某些优雅的女人用，这些女人的优雅具有明显的罪恶特征。

我象征性的拐说明并配合了（现在还配合着）我们时代各种潜意识的神话。它远没有让人厌烦，而是越来越迷住了大家。我把拐放在各处，人们便会寻思：“为什么有这么多拐？”我结束了最初的试验，而贵族也由于我大量的拐保持直立了，这时我想坦率地通知贵族：

“现在，我要朝你们的腿狠狠踢上一脚了。”

贵族又收缩起一点已经抬起的脚，英勇地咬紧牙关防止喊出声来，他们答复我：

“踢吧！”

于是我用尽浑身气力，死命地朝贵族的腿肚子上踢了一脚。贵族并没跌倒。拐因而也仍牢牢地固定着。

“谢谢！”有人对我说。

“没什么可怕的，我会再来。凭着你们仅有的一条腿和我智力的拐，你们比知识分子制造的革命还要牢固。你们老了，失去权位，疲惫得要死；但

你们的那一只脚同大地紧紧连接的地方，就是传统。要是你们万一死了的话，我便会用我的一只脚踏在你们的足迹上，像红鹤那样蜷缩起另一条腿。我能够做到，也准备以这种姿势不倦地呆下去，变得老起来。”

贵族制度总是我的热情之一，这时我已在寻找一种方法，使这类精英对他们在从将临战争中诞生的极端个人主义的欧洲中注定要扮演的角色重新有种历史意识。当时人们很少听到我对我们这个大陆未来的种种预言，而我本人也不太把我就集体主义和群众所说的话当回事：这种集体主义和群众有可能吞噬掉民主政体，发动一场大动乱，从这场动乱中会产生出一个变得贫乏的欧洲，通过大主教的、贵族的，或许是君主制的个人主义传统，这个欧洲才会获得拯救。

在等待这些预言实现时，在超现实主义者们消化我提出的口号之前，在野心家们伤害我和上流社会人士开始祝愿我之前，我动身去了天蓝海岸。加拉了解一处不会有人发现我们的旅馆。我们租了两个房间，其中一间用来当我的画室。走廊里，堆着一些供我们壁炉烧的木柴，以便不会有人以送木柴为名来打扰我们。我安置好一盏灯，它的光线只能照到我的画布上，并使房间的其余地方处在它永远隔绝的遮板的阴影中。我们通常让人把饭菜送到我们的房间来。只有难得的几回，我们下楼到餐厅去。两个月内，我们从没离开过旅馆！作为我们生活中最激动最疯狂的日子，这两个月一直深深刻在我和加拉的记忆中。在这自愿的“封闭”期，我怀着工作时那样的思辨狂热认识了爱情、享受了爱情。《无形的男子》完成了一半。加拉用纸牌算命，看到一个对我们两人是艰难的历程。我盲目地相信她向我预言的那一切，它们会驱赶开威胁我们幸福的种种不安。加拉预告了有一位栗色皮肤或褐色皮肤的先生的一封信，以及钱。来的信签着诺埃尔子爵的名字。戈曼画廊要破产了，他提出要给我经济上的帮助。为了使我不摆脱全部焦虑，他建议我去拜访他。他会派车在我希望的那天来接我。

这封信让我们决定首次去散步，一路上我们能审视下形势。在户外，冬天的灿烂阳光晃得我们眼光缭乱。我们的面容就像囚犯的一样惨白。温暖的阳光使我们觉得格外舒服，我们露天吃了午饭，一顿有酒的午饭，我们在这两个月已经戒了酒。在咖啡馆，事情决定下来：加拉去巴黎试着收回画廊欠我们的钱，我去诺埃尔子爵在依列斯的圣贝尔纳城堡拜访他。我会提议给他画一幅重要的画，他要预付给我两万九千法郎。有了这笔钱和加拉收回的钱，我们将到卡达凯斯去，让人在那儿为我们建造一所供我们两人居住的小房子，我能在这里工作并不时从巴黎消失。我只爱卡达凯斯，所以拒绝看别处的风景。

我们又重聚了。她带回画廊的一点钱，我带着诺埃尔子爵刚给我的支票。我记得我整整一个下午都在看这张支票，它首次使我懂得钱是一种重要的东西。

我们再次动身去西班牙。在那儿，我一生中最浪漫、最严酷、最紧张的时期开始了。我觉得所有令人喜爱的机遇突然停止了。我相信能避免的战斗首次出现了。我只怕成为我自己想像的那样的一些障碍。从我愿为之发狂的那种爱情开始，我曾享有各种机会。可一下子，我到了卡达凯斯，但不是作为公证人达利的儿子；我不过是遭到家庭驱逐、蒙受耻辱、没结婚却同一位狡黠女人同居的儿子！我们能指望的只有一位独一无二的人物，“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娅。丽第娅是位农村妇女，一名有着平静蓝眼睛的正直水手南

多的寡妻。欧仁尼奥·多尔斯二十岁时，在丽第娅家中度过了夏天，丽第娅是天生具有诗的倾向的人，受到卡塔卢尼亚知识分子难以理解的谈话的赞美。多尔斯由南多陪同去海边时，他时常会向他拿水来的丽第娅喊：

“看这个丽第娅，她多么键壮啊！”

下一年冬天，他出版了他那本杰出的书《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娅立即说：“这是我！”她记熟了这本书并开始给多尔斯写一些充满奇特象征的信。当然，他没回信，可是在他那时为一份报纸《卡塔卢尼亚之风》定期撰稿之际，丽第娅认为欧仁尼奥·多尔斯的专栏文章就是对她信件做出的虽然是想象的但却是详尽的回答。她断言这是怪诞的，但却是唯一的通信方式，要不然她的一位情敌（她称其为“我八月的圣母”）就会夺去那些信。她解释说，很显然，多尔斯被迫用隐晦的方式回答她，并借助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意思。除了我的头脑，我确信从没见过像丽第娅这么惊人的偏执狂头脑，丽第娅能以最大严密性把一切都连接到困扰着她的事情上去。而这牺牲了她的余生，她以一种可怕而又近于可信的精妙方式，围绕着这些游戏安排了她的余生，哪怕人们知道这些胡思乱想一开始的荒谬。她能在词语的巧合和游戏中用那么多的一系列观念来解释一篇艺术批评文章，人们不得不赞叹这个心灵的永久混乱了。

多尔斯有一天写了篇题为《普桑与埃尔·格列柯》的文章。当天晚上丽第娅来了，从老远便能看到她挥动着那份报纸。她卷起裙子坐下来，这种仪式表明她有许多话要说，时间会持续很久。

“他用我信的结尾部分开始他的论文。”她俯在我耳边低声对我说。

事实上，在她最后的那封信中，偶然性曾使她影射了卡达凯斯的两位著名人物。一位外号叫“普萨”，另一位是希腊血统的潜水员“爱尔·格列柯”。相似之处很明显，普萨与爱尔·格列柯，这就是普桑与埃尔·格列柯啊！而这种相似还仅仅是开始，因为丽第娅把多尔斯从美学和哲学角度对这两位画家的比较当成是自己的东西，这简直是天才了！

晚上，丽第娅回到她家里，戴上眼镜，坐在她两个儿子（他们是克鲁斯海岬的朴实渔夫，正在修补鱼网）面前，用笔蘸着墨水，在卡达凯斯出售的最好的横格纸上，给她称为“老爷”的人写了封新的信。一般她总是用以下句子开头的：

“七次战争和七本蒙难者名册使卡达凯斯两处泉水干涸了！身强体壮的女人死了！普萨和爱尔·格列柯把她杀了，最近成立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和牝山羊的协会也把她杀了。你打算来远游时，请用你的日报文章使我清楚地了解这件事吧。我需要提前一天知道它，好让人到费格拉斯买肉。夏天这个时候，在这儿不提前是买不到好东西的，等等、等等。”

有一天，她来神秘地跟我说：

“多尔斯前天应邀出席了费格拉斯的一次宴会。”

确信这是不可能的，我问她怎么了解这件事的。

“可是，”她对我说，“这写明在报纸刊登的菜单上了。”

她指给我看一篇文章中的菜单，这份单子上写着：“冷盘。”

“奥尔斯（Hors 是冷盘一词 hors-d'oeuvre 的一部分，跟 d'Ors 这个名字相似，这种地方中译文难以表达，特略加说明——译者），我很希望这就是他，可俄沃（oeuvre 有‘作品’之意，亦为冷盘一词的组成部分——译者）是指什么呢？”

丽第娅思索了一下，接着答道：

“俄沃，这就像人们说‘不知道’。即是不知道的多尔斯。他不希望人们知道他。”

就是这样，她生活在一个从精神角度来说高于村里其他人的世界中。可她仍然是脚踏在大地上的，那些讥笑她的“多尔斯老爷和身强体壮女人”故事的人都会补充道：

“丽第娅并没疯。不信你就卖给她一磅臭鱼或把手指放到她嘴里试试看！”

她像每个人那样做米饭龙虾、洋葱汁当托斯鱼，这是真正荷马式的菜肴。她用当托斯鱼，发明出一种配得上阿里斯托芬的烹调术。

“要成功地做洋葱汁当托斯鱼，”她说，“需要有三种不同的人：一个疯子、一名守财奴和一位浪子。疯子烧火，守财奴倒水，而浪子加油。”

如果说丽第娅还用双脚接触大地的话，那么与此相反，她的两个儿子就是真正的疯子了，后来他们终于被关进精神病院。他们确信在克鲁斯的外海发现了数公里的矿藏，一个又一个月光照耀的夜晚，他们都在运土掩盖他们珍贵的矿脉。我是他们唯一相信的人，有一天，他们对我承认他们发现的是镭！

丽第娅的儿子在一处叫“利加特港”的小海湾有一间屋顶已穿孔的破旧木板房，从卡达凯斯沿着墓地走到这儿，大约要用一刻钟。利加特港是大地上的一处最枯燥乏味的地方。这儿的清晨具有一种野蛮粗鲁的悦目感，下午时常在开始之际变得像黄昏一样沉重。一天之始，微风就造成一些像微笑那样浅浅的小波浪，随后它就沉寂下去，风平浪静的大海仅仅反映着天空中的戏剧。

在卡利—勒—鲁埃度过的两个月内，我唯一收到的信就是丽第娅寄来的，我把它们当作第一流的偏执狂文献加以分类和研究。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钱时，第一个想法就是买下丽第娅儿子的小板屋，在这块我最喜爱的地方把它布置成能居住的房间。加拉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我们给丽第娅写了信。她马上就回了我们的信，向我们保证这说定了，她等着我们去。她的儿子向我们揭示了他们镭矿的重要情况。

我们在严冬到达卡达凯斯。米拉玛尔旅馆站在父亲那一边，借口施工，拒绝接待我们。我们被迫住进一处很小的公寓，这儿一名我们家以前的女仆，想尽办法让我们住得舒服。我觉得重要的、希望与之保持良好关系的人，仅仅就是利加特港十余名渔夫。他们生活在那儿，完全不受卡达凯斯舆论的束缚。如果说他们那方面开始时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么接下来他们就完全被加拉流露出的无法抗拒的关怀以及我的魅力迷住了。渔夫们知道报纸谈到我，于是他们说：“他很年轻，他不需要父亲的钱，他可以像他理解的那样去自由地安排自己的生活。”

我们找了个细木工，我们共同决定一切，从台阶的级数到最小的窗子，巴伐利亚路易二世为他任何一座宫殿操的心，也只有我们为这处小木板屋操的心的一半。一间约十六平方米的房间要当餐厅、画室、入口和卧室，有几处台阶通向一个淋浴间、一个厕所以及一个小得转不开身的厨房。我们从巴黎的房间带来一些镍制和玻璃制的房间用品。我们有限的财力只允许我考虑这个两人的窝。唯一怪诞的装饰品，可能就是一颗牙，这是一颗像麦粒般洁白透明的小乳牙。它在我的下颌中活动了，于是我决定在它脱落的那天，给

它钻个孔，用线把它吊在天花板上。这颗牙让我忘记堆集在我们周围的所有实际困难。

“别再想这些问题了，”我对加拉说，“别再想引水、用电和女仆住房的问题了。你看到用一根线把我的牙吊在天花板上的那一天，你会跟我一样狂喜的。特别是我们决不会有花、有狗，恰好只有我们贪婪的热情和使我们过早变老的智力。总有一天，我会写一本关于你的书，你会变成神话中的一位贝阿特丽丝。”

全部改造木板屋的细节一经确定，我们就动身去巴塞罗那。关于巴塞罗那，农民们喜欢重复这么一句话：“交易所好，巴塞罗那就好。”由于预付给卡达凯斯的细木工一笔款子，我们身边什么也没剩下。我必须到一家银行提取诺埃尔子爵那张两万九千法郎的支票款。来到营业窗口时，我惊奇地听到有人喊我的名字。我还不了解自己在巴塞罗那的名声，银行职员的这种亲热态度让我疑惑。

“他，他认识我，”我对加拉说，“可我并不认识他。”

这些孩子气的表现使她很生气，说我永远是个卡塔卢尼亚的农民。我在支票背面签了字，接着在最后时刻，当银行职员伸出手来，我却拒绝把支票给他。

“不，他把钱给我时，我再给他支票。”

“可你想他用这支票干什么呢？”加拉用她那最令人信服的声调说。

“他会吃了它的！”

“为什么他要吃了它？”

“要是我处在他的位置上，我肯定会吃了它的！”

“不过就算他吃了它，你也毫不会丢掉你的钱啊！”“这个我懂，然而今天晚上我们就不能去吃 tords 和 rovellons`a llanna 了。”

我们稍微离开点营业窗口，银行职员惊愕地望着我们，他不知道我们讨论什么问题。加拉终于说服我交出支票，我深深叹了一口气，这么办了：

“那么……. 拿去吧！”

我一生中，事实上一直难于习惯我接近的在世上非常普遍的那些人令我困惑的“正常状态”。我总在想，可能发生的事一点儿也没发生。我无法理解人类会那么缺乏个性，总会最严格地遵照习惯的原则行事。把事情看得像让火车脱轨那样简单吧！遍布五大洲的数千里长的铁路是那么多，而脱轨的现象却那么少。喜欢脱轨和引起脱轨的人的数量跟喜欢旅行和热情得满足这人的数量相比，是极其微小的。在匈牙利，抓住马罗什卡的那天，火车脱轨了，这是一桩独一无二的惊人事件。我无法理解人竟然那么不会幻想；公共汽车司机竟然不会不时地想撞破商店的玻璃橱窗，迅速抢一些送给家人的礼品。我不理解，也无法理解抽水马桶制造商竟然不会在他们的器皿中放一些人们拉动拉链就会爆炸的炸弹。我不理解为何所有浴缸全是一个形状；为何人们不发明一些比别的汽车更昂贵的汽车，这些汽车内有个人造雨装置，能迫使乘客在外面天晴时穿上雨衣。我不理解我点一份烤螯虾时，为何不给我端来一个煎得很老的电话机；为何人们冰镇香槟酒，却不冰镇总是那么温热发粘的电话听筒，它们在堆满冰块的桶里定会舒服得多。那么，为何不把冰镇的电话机配上绿薄荷，做成螯虾的形状，套上给妖艳女人穿的貂皮，里面加进一只爱德加·波用的死老鼠，把它放在那儿，或固定在一只活乌龟的背上……

总是干和重干那些相同的事，人类的这种糊涂令我惊异不解，这正如银行职员不吃支票，我之前从没有一位画家想到画一只“软表”使我惊异不解一样……

自然，我顺利提取了支票上的钱，晚上我们大吃了一顿，喝着香槟酒，吃了两打 tords。整个晚餐期间，我们什么都不谈，只谈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第二天，加拉患了胸膜炎。我陷入深深的不安，首次感觉到隐蔽的地震动摇了我的利己主义大厦。我会终于爱上她吗？

加拉患病期间，马德里时期的一位朋友请我到马拉加看望他，我接受了这一邀请。他为我提供在那儿的生活费用，同时也答应买我一幅画。于是我们计划一旦加拉恢复健康，我们就去安达卢西亚，而且我们也商定诺埃尔子爵的这笔钱一个子儿也不动，因为这笔钱是用来建造利加特港住宅的，它是神圣的，被锁在我们在巴塞罗那旅馆的保险箱里。为着加拉恢复健康，我花了好几个小时安排庆贺活动和购买礼物。胸膜炎使她变得非常虚弱，她似乎成了拉斐尔·基什耐尔笔下的仙女中的一位。那些仙女在呼吸了一个巨大梔子花的气味后，仿佛衰竭得要死了。我感情中新出现了一股柔情，它左右着我。加拉的每个动作都让我想哭泣。有时候，这股柔情还伴随着一定程度的虐待狂。我站起向她喊着：“你实在太美了！”我吻她的全身，用双臂紧紧搂住她。我越用力搂紧她，我就越感到她无力地想挣脱我过于热烈的拥抱，而我也就越想揉搓她。我感情的表露把她搞得疲惫不堪，可这种情况本身只不过刺激着我的游戏。加拉终于哭了起来。于是，我猛烈追击她的面孔，从各个方面无数次地吻她的面孔，吮她的鼻子，紧贴她的面颊，压扁她的鼻子，吸她的嘴唇，使她忍不住撅嘴蹙眉，或是紧抱住她使她的耳朵靠向面颊。我怀着一种近乎精神错乱的疯狂，拼命揉搓着这个小小的面孔，仿佛我在揉一块面团，要用它做面包似的。打算安慰她时，我又把她弄哭了。

一天晚上，我强迫她首次出门，把她拖进一辆汽车，去参观巴塞罗那国际博览会。双眼紧闭，她登上一条长扶梯，我搂着她的腰，她非常虚弱，我们不得不每上四五级台阶就停下来歇一会儿。我们终于到达一处平台，从这儿能看到整个展览。

“现在看吧！”我对她说。

她朝着一个美妙的世界睁开了双眼。近景处，一些巨大的喷泉水柱向空中喷射，高得令人几乎不敢相信，随后在高高的空中散成一朵朵水花，不断地变幻着形色。焰火在天上划出一道道闪光，加拉赞叹不已的样子胜过任何一个孩子。

“你完全明白为我做什么，”她向我说，“你让我不停地哭。”

距我们不远，一个管弦乐队演奏着萨尔达那舞曲。一群陌生人在过道上懒散地缓步走着。谁也没哭！

过了两天，我们动身去马拉加。在加拉病后，这漫长的三天旅行进行得太早了。她一直动也不动坐在我们的二等车厢里，头靠在我肩上。我从不相信一个唯一的分量仿佛只是表情的头竟会这么沉重。据说在这小小的头颅内充满了铅。我想象它又洁白又干净，还有耀眼和辉煌的整齐牙齿，仿佛每一颗牙齿都是映照粉红舌头的镜子。我把这些上下颌及颅骨与我的进行比较。事实上，我已经有一个老人的嘴，任何一名牙医也根本无法弄明白我的一口牙齿的情况)。没有一颗牙是长在它该在的位置上。我少了两颗臼齿，它们从没长出来过。1930年两次切割下颌还是为了乳牙。我失掉了它们，而它们

从没再长出来。

我想到我们的两个死人头，加拉的头是那么洁白，而我的头则已经腐烂，是赭石色的，它的眉弓大得惊人。车厢里在我们对面，不顾苍蝇的打扰，另一些头颅打着盹，这是一列死亡与睡眠的火车，它驶往被帝王般威严的非洲炎热笼罩着的马拉加。我们的出租汽车司机走近一个搬运工，这个人正在门口墙角的

阴影下睡觉，司机用脚碰了几下这个搬运工，想把他弄醒。可这个搬运工用懒洋洋的手势回答：“今天不成！”在这座城市里，为耶稣受难日准备着游行，到处是大量的鲜花。一名有轨电车司机在一间酒吧旁停住车，让人给他拿来一杯茴香酒，随后唱着歌重新上路。在街上，我们碰到好几个耳后插着朵石竹花的毕加索。他们的眼睛，闪耀着敏锐而又亲切的机灵光彩，盯着来往的人群。有人宣布了盛大的斗牛活动。晚上，在太阳落下去时，一股突如其来的热风取代了凉爽的微风，这是真正的非洲沙漠的风。西班牙人喜欢这个时刻，他们选择这个时刻做爱，石竹田在这个时刻散发出最浓荫的香气，而西班牙文明的非洲雄狮也在这个时刻发出了怒吼。

我们在托列莫里诺斯租了一处渔夫的房子，托列莫里诺斯是距马拉加十五公里的一个小村庄。一块石竹田正好从我们的住所伸延到海边。这些天是我们热烈的结婚纪念日。我们变得像渔夫一样黝黑。我们的床十分坚硬，仿佛填满了干面包。虽然不适合睡觉，可这床却有使我们腰酸背痛、使我们想到自己有肉体 and 裸露着身子的长处。像一个被太阳晒黑皮肤的顽童，加拉袒露着胸部在村子里散步。我也戴上了项链。托列莫里诺斯的渔夫没有羞耻感，他们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脱掉裤子大便。这一时刻似乎是他们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之一，能看到他们成群地蹲在沙滩上，大声讲着令人难忘的下流话，叫着鼓励他们的小孩打架。当这些战斗变成扔石块的场面时，总会出现一些打破了的脑袋和一些流血的面孔。于是，感到积怨苏醒了的渔夫们中断了排粪，提上裤子，整理好他们总是漂亮的健壮生殖器，为了孩子相互动手打起来。有人抽出刀子，那些总是穿着黑衣服的妇女跑了来，她们披散着头发，双臂伸向天空，祈求耶稣和纯洁无暇的圣母保佑。既没有什么悲哀的，也没有什么是卑鄙的。那些愤怒是欢乐的，像大小便一样爆发出来。说到渔夫的粪便，它们总是干净的，其中嵌着一些没消化的麝香葡萄粒，像被吞下去之前那样新鲜。

这个时候，我对橄榄油产生了热情。我处处用它。从一大早起，就拿烤面包和鳀鱼蘸它。剩下的我就喝掉或滴在我的头和胸上，擦我那疯长的头发。

我一到这儿，就重新动手画在卡利一勒一鲁埃开始的《无形的男子》，同时也写《无形的女人》的那篇定稿。我不时接待来访的超现实主义知识分子小团体的朋友，他们之间已开始相互仇恨并听任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联合的蠕虫咬啮自身了。我立即明白了，到这些蠕虫具有真正蛇的身躯的那一天，残酷壮观的内战就会爆发的。

一切都很顺利时，有一天我们收到了大量的坏消息。拖延一个多月没付钱给我们的戈曼画廊破产了。布努埃尔独自在拍摄《黄金岁月》，从而实际上把我从这件工作中排挤掉了。卡达凯斯的细木工寄来份帐单，费用超过他预算的两倍。最后，我们那位马拉加的富裕朋友走了三周，可却没给我们留下地址！我们的钱实际全花光了，我们只剩下四天的生活必需品。加拉建议让人把我们存在巴塞罗那旅馆保险箱里的钱送来，可我拒绝这么办，因为这

笔钱已经不够付细木工的帐单了。利加特港的住宅是神圣的。唯一的指望是打电报到巴黎，用我将带回去的画作抵押，借一笔钱。三天过去了，毫无回音。我们数着剩下的那点儿硬币，想最后找到两个比塞塔。非常幸运，一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这大来看我们。我求他给巴塞罗那的旅馆拍份电报，让人把钱汇给我们。一旦收到汇款，我就把他花的钱归还他。两天过去了，无一点音信。要在房中找一小块面包都不可能。我们的困境是因为我固执地不听加拉劝告造成的。没过多久，我就觉得这种处境仿佛只是一场悲剧的开始。非洲的太阳烧烤着海滨，使我把一切都看成红与黑这两种颜色。更糟的是，邻近的一家有一个半疯男孩用钳子打死了他的母亲，当天夜里，宪兵们开始朝一大群燕子开枪。加拉试着让我明白我们的处境虽令人烦恼可并非悲剧。尽可以住到马拉加一处旅馆中，在那儿等待巴塞罗那的那笔钱，它没能寄到是由于星期六和星期天都休息的缘故。自从碰到我生存中各种最初的困难以来，我一定要看看在悲剧的一天内发生的一切，这时我怎么能听她的话呢？我不愿接受这命运的凌辱，命运想迫使我达利这个人中断构思《无形的女人》，而因为我们没钱了，我的加露琪卡竟落到一种有损名誉的地步，既无女仆也无面包。高脚杯装满了，我本人的不耐烦全流了出来。

我走出住所，满怀悔恨地听任加拉在那儿整理行装。我穿过石竹田走到海边，我愤怒地拿着一根木棍，把带血的花朵打得七零八落，就像卡尔帕乔画中被斩首的头颅。在海滨，有一些黄褐色皮肤的茨冈人生活在布满洞穴的岩石山嘴处。他们用大锅烧着鱼，锅里的油劈啪作响，发出一阵阵嘶啦嘶啦的声音，就跟我愤怒的蝗蛇一样。几秒钟内，我荒唐地想让人从加拉处把装着新事物的箱子取来，生活在这些茨冈女人中间，她们裸露着乳房，在一种无法改善的污垢的色情环境中给她们的孩子喂奶。我跑到一处荒凉的角落，呆在这儿有助回忆这些乳房和正在火边烧菜的一位女人的大屁股。我怀着疯狂的热情沉湎在我青春期孤独的快乐中。我灵魂的全部疯狂化为了这些绝望的姿势。我的腿弯曲了，双膝跪在坚硬锐利峭壁上，仿佛是里贝拉笔下的那些出神隐修士中的一员。用我自由的手，我抚摸着我的身体并抓住它，好像要抱紧它似的。一种有节奏的断续愤怒，使我的肌肉直颤动。我的口袋空了，可我还能花这个！我让自己珍贵生命的温暖硬币掉在地上，我觉得它是从我自己的最深处、从我的骨髓中出现的……

这个新的、无用的费用用光了。由此增加了我沮丧的情绪。我觉得我的货币状态更加难以忍受了。全部的愤怒都转向自己，我发狂地用拳头捶打自己，终于弄断了我那颗活动的小牙齿。我把它吐出后收起来。这是命中注定的：以牙还牙。

回到住外，特别激动、特别快活，我把紧握的拳头伸向加拉。

“猜猜是什么！”

“一只萤火虫吧？”

“不，是我的牙，我的小牙。我们应当用根线把它吊在利加特港。”

这颗牙又小又透明，中央有个小白点。要是用显微镜放大这个白点，或许会看到一个卢尔德圣母的光环显现出来。

我们在第二天坐公共汽车去马拉加，向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画家借钱。我们剩下的钱仅够这趟单程旅行的。要是我们找不到他，就没法回托列莫里诺斯了。经过大量奔走后，我们终于找到了他。

我们的朋友对我发誓他在我们上次相会的那大晚上已发了电报。他没有

五十个比塞塔，但他能为我们借到这笔钱。我们坐在一家咖啡馆的露天座上等他。最后一班公共汽车发车的时间临近了，而我们始终没看到他回来。终于在最后一分钟，他出现了，气喘吁吁，满脸通红。

“快上车吧，一切都办妥了。我就来。”

在我们身后，他付掉饮料费，然后到公共汽车上找我们。他一边用一只手擦额头上的汗水，一边用另一只手握我的手，把一小张折了四折的钞票放在我手心里。

“再见，再见。”

“很快就会还给你的，这不再会拖延的！”

汽车发动了，他还在向我们保证听我们吩咐。我觉得手里这张折起来的钞票具有世上的种种魔力。对萨尔瓦多·达利和加拉·达利来说，它意味着三天的生活。这可能是我们生存中最辉煌的三天。我慢慢松开手，想更好地看看这美妙的象征物，我呆住了，我并没看到什么五十比塞塔的钞票，而是一张电报的收据。出于讽刺和嘲弄的目的，我的超现实主义的朋友把这张提醒我们欠他的债的纸塞到我手里，他无疑不打算让我们再欠他一笔债！我们没有钱付公共汽车费，加拉扯住我的手臂，让我克制自己。她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会陷入多么疯狂的愤怒。要是售票员走近我，我就会把他一脚踢下车去！而在收票员按铃停车时，我已经站起来，准备应付那场我都不知道会是怎么个情景的大爆发了。我认为他猜到我的意图，我打算扑到他身上，恰好在这时，我们那位同情共产党的超现实主义者，脸上挂着人世间最为抱歉的神情，突然出现在公共汽车中，递给我五十个比塞塔。他搞错了口袋里的这张纸，可立刻就发觉这个错误，于是叫了辆出租汽车来追我们。我们平静地重又动身去托列莫里诺斯。在这儿等待我们的，是好几封带来喜讯的信和一份让我们到马拉加领钱的通知。我们吃着番茄鳀鱼，一整个下午都在大睡。我醒来时，一轮红色的月亮就像摆在托列莫里诺斯高脚果盘中的一片西瓜；窗户框住这幅静物，我那还有点儿昏昏沉沉的精神状态把它看成与毕加索各种立体主义窗户相似的东西。我挺直身子躺在床上，思考着艺术视觉的这些问题，这时我得意地挖着鼻孔，从中抠出一团很大的东西，简直不能说它是干鼻涕。审视着它，我发现它只是电报收据的一块，我先前怀着惯有的好奇揉软了它，并照我一生中那时特有的癖好把它塞进了鼻孔里。

加拉打开她的皮箱，把一切全拿出来，显然这是要呆在托列莫里诺斯，因为我们已有钱了。

“不，别弄了，我们要去巴黎。”

“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还可以在这儿享受三天。”

“不，不。那天下午，我砰地把门一关走掉时，我看到天空中有一缕金光穿透一片云层。就在那一刻，我正在消耗着我的生命之液。就是在我弄断我的小牙之后，我刚刚在我的肉体上发现了一个‘宏伟的神话’、狄安娜的神话。我想去巴黎，在那儿打雷、下黄金雨！正是在巴黎，我们将挣到建成利加特港住宅所需要的钱。”

我们只在马德里、巴塞罗那和卡达凯斯停留了必要的一点儿时间，用来再看看我们的家。这个梦实现了。加拉实在而又敏锐的个性通过我不充分的颠狂在这儿体现了出来。还只有四堵墙和一个门，但这却具有英雄的精神。然而真正的英雄精神在巴黎等着我们。为了保卫我们的个性，我们将无法回避更艰苦、更紧张、更骄傲的斗争。围绕着我们所有人卑鄙地背叛了。随着

我的名字成为社会内部的一个癌，这个社会不想听人谈到它了，实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困难。据说所有反对我智慧的魔力和我破坏了他们基础的各种观念的人，使我沾染上了咬啮他们

全体的这种病：操心金钱。我宁愿把这种病留给他们，我知道我是可治愈的。

布努埃尔刚完成了《黄金岁月》。我极为伤心。这部影片只不过是各种观念的一幅漫画。在这部影片中，以幼稚的、毫无诗意的方式攻击了天主教。然而这部影片，特别是那不成功的爱情场面（当不满足的伴侣痛快地吮吸大理石阿波罗像的大脚趾时）仍然获得惊人的效果。布努埃尔匆忙前往好莱坞，他认为那儿有一些神奇的合同在等着他，他没参加这部影片的首映式。在一群对超现实主义感兴趣的人中挑选了观众，可实际并没出什么事。有些笑声，有些抗议，但观众席中全体一致的掌声很快就将它们压下去了。可两天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人们在这部影片中看到一部豪华轿车停下来，穿制服的司机打开门，从里面拿出一个圣体显供台，把它突出地放在人行道上，这是个大特写镜头。接着，两条非常美的女人腿从轿车中伸出来。出售保皇党报纸的人选择这个时刻把黑墨水抛到银幕上。在“打倒德国佬”的叫喊声中，这些年轻人朝空中放了几枪，投掷了一些气味难闻的球状物和一些催泪瓦斯瓶。放映被迫中断了。《法兰西行动报》的支持者们痛打着观众。玻璃窗炸得粉碎。28 电影试映室的休息室里布置了一个超现实主义的书展，它被洗劫一空。我的画只有一幅保存下来，这是由于一名女引座员把它藏在厕所里，而其余的都悲渗地成了一块块碎片。警察来得太迟了，灾难早已结束。

第二天，这场丑剧在巴黎的新闻界引起了轰动。好几天内，各种日报就我影片的主题展开论战，这部影片终于被警察局禁演了。我担心在某个时刻会把我驱逐出法国。幸而一部分舆论也支持我。然而大家都染上一种该死的恐惧病，怕接触任何与我有关的事。《黄金岁月》的丑闻像达摩克勒斯剑一样悬挂在我头上，我也决心绝不再跟任何人合作。我还承担了读圣的责任，其实我并无读圣的意图。我觉得有那么多更值得在公众中传播的破坏性观念，却因反教权主义引起公愤是荒谬和乏味的事。没有人能理解我的不赞同态度。既然我刚创作了《黄金岁月》，我现在就能用绘画赞颂梅索尼埃了。由于他人难于注意到我观念和作品中弄虚做假的方面和真实的方面，人们很快习惯了容忍我的一切，他们说：“这是属于达利的。”没什么关系，因为在这期间达利刚说了他要说的，这件终于讲出的事很快就会吞掉人们不敢说那一切。人们把我看成是所有人中最疯狂、最具破坏性、最狂暴、最超现实主义、最革命的人。他们的黑暗只是使属于我的白天和天空更明亮，我要在这天空中树立起古典主义的天使和大天使的等级制纪念碑。此外，这天空永远比《黄金岁月》中的理想地狱更狂暴更真实，我的古典主义比他们的浪漫主义更有超现实主义的精神，我反动的传统主义比他们流产的革命更引起纷纷议论。战后整个现代的努力就是不自然的，它应当死亡。传统在绘画和一切事物中都是必不可少的；否则的话，无论什么精神活动都将献身于虚无。谁也不再懂得画油画、画素描或写作了。一切都在国际化下变得单一了。懒惰把丑和不定型奉为了神明。画室只能听到咖啡馆的谈话。灵感的缪斯离开了普桑的巴尔纳斯山，来到街头拉客，听任大众乱摸她们的脸蛋和屁股。艺术家和政客亲如兄弟，讲着机会主义的蛊惑人心的语言，并借助他们资产阶

级化的疯狂和野心，重新跟在既无悲剧又无灵魂的幸福泥塘中打滚的、醉心于怀疑主义的大众相聚！这样的人就是像一只狗那样不停工作的我的敌人！

第十一章

我的战斗——参与超现实主义革命和我的位置 ——同说梦相抗衡的超现实主义物品——偏执狂批判的活动 ——反对自动性我的战斗

我的战斗

反对的：

单纯

单一

主义

集体

政治

音乐

自然

进步

机械

抽象

青春

机会主义

菠菜

电影

佛

东方

太阳

革命

米开朗溟罗

伦勃朗

野蛮的物品

非洲现代艺术

哲学

医学

高山

幻影

女人

男人

时间

怀疑主义

赞同的：

复杂

多样平均

等级制

个人

玄学

建筑

美学

持久

梦幻

具体

成熟

马基亚弗利式的狂热

蜗牛

戏剧

萨德侯爵

西方

月亮

传统

拉斐尔

维米尔

超级文明的 1900 年的物品

文艺复兴

宗教

巫术

海滨

幽灵

加拉

我本人

软表

信仰

我一到巴黎，就体会到我在戈曼画廊举办的展览很成功，它的主要后果是给我带来了一群敌人。这些敌人是谁？差不多是所有的人。现代艺术向大众发出动员令，反对一种狂暴大胆的、不可思议的、不和谐的、破坏性的作品。总之，这不是现代“年轻的”艺术。人们刚刚一下子理解了我厌恶我的时代。《艺术手册》必定到最后一分钟还无视我的存在，而那些套着虫蛀的护腿、胡子上沾着鼻烟、上衣上配戴荣誉军团勋位玫瑰花形徽章的老先生

则拿出他们的单柄眼镜，更仔细地看我的画，并产生想带走它们，把它们挂在他们餐厅的梅索尼埃绘画旁边的念头。五十年来，这些不倦地爱着绘画的老人喜爱上了我，也理解了我。他们感到我在这儿是来保卫他们的。实际上，他们并不需要保卫，因为他们已经是股力量了，而我不过是站在他们一边，站在将成为胜利者的传统这一边罢了。

我到达巴黎时，知识界受着柏格森主义已经衰落的有害影响的侵蚀，柏格森主义歌颂本能和生命冲动，它导致了过高评价一些粗劣的美学观。非洲野蛮地奔涌在巴黎的智慧之上。人们崇拜黑人艺术，这要感激毕加索和超现实主义。在看到一幅拉斐尔作品的继承人们落入这些反常的现象中，我羞愧和愤怒得满脸通红。我必须找到解毒剂，找到对抗这些精神上的奴化、糊涂、恐惧的产物的旗帜。为了对抗野蛮的物品，我打算大力推广那些“现代风格”的、欧洲的、文明的、颓废的物品。我永远把1900年时期看成是希腊罗马颓废时期的心理病理学的后果。我暗想，既然这些人拒绝听人提美学而只热衷于生命冲动，我就要向他们指出在一件1900年物品最小的装饰细部中，怎么会比他们野蛮丑陋的偶像有更多的神秘、诗意、色情、疯狂、痛苦、夸张、伟大和生命的深度。有一天，正好是在巴黎，我发现了一些1900年的地铁出入口，不幸人们正在折毁它们，要用一些无特色的可怕建筑物替代它们。摄影家布拉赛拍了一系列关于这些柱廊装饰构件的照片，谁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现代风格”竟这么像超现实主义的。人们开始到跳蚤市场寻找1900年的物品。没花多少时间，1900年的影响就让人感觉到了。请人把餐馆现代化的马克西姆餐厅停止了施工。那个时代的一些歌曲重又在扮成1900年样式的杂志中流行起来，人们对1900年腐朽的过时方面打起了注意，把它用在一些天真和幽默的影片中让我们享用。几年后，艾尔莎·夏帕列里达到了它的顶峰，她成功地使人们接受了高盘在颈后的发型。

我就是这样用自己的眼睛注视着巴黎按照我的命令发生的变化。但是同以往一样，我本人的影响大大超越了我，我无法使任何人相信它源于我。几年后发生了同样的现象。我第二次到纽约，发觉大部分大商店的玻璃橱窗从我首次推广的超现实主义的资料中获得了启示。我的影响的持续不断的戏剧就是它逃脱了我的掌握，而我既无法疏导它，也无法享用它。我感到自己生活在一个服从我命令的巴黎中。我读到一篇反对实用建筑的文章时，我就明白这源于我。要是某人在不论什么场合谈起：“我担心这会造成现代感。”这仍是源于我。公众还没下定追随我的决心，可我已经毁了他们的信念！现代艺术家确有理由仇恨我啊！

我不断地被窃，无法利用我的各种发现。我发起的“现代风格”，我只能到街上去了解它的传播情况：花边、影片、夜总会、鞋子都配合着它。大批工匠靠制造它们谋生，而我却漫步在巴黎，什么都不能干。大家都能这样实现我的想法，而我却不能！我甚至不知道怎么找人帮忙和到哪儿找人帮忙，在耗用数百万元和大量明星拍摄的1900年的那些影片中找到一个群众演员的位置，而人们竟连想都没有想到这件事！

这是我那些发明的令人泄气的时期。我绘画的销售跟现代艺术的共济会发生了冲突。我收到诺埃尔子爵的一封信，使我预感到最坏的情况。我必须换个方式谋生。我拟了一份自信是绝对有效的发明清单。

我发明了：

配有能照自己的小镜子的人造指甲；

橱窗用的透明人体模型，在它们的体内注上水，水中游动着一些模拟血液循环的鱼；

根据顾客印模浇铸的电木家具；

旋转的电扇雕塑；

供穿过令人厌烦的景色之际用的、安装在汽车上的万花筒眼镜；

新闻记者使用的摄影面具；

可除去面部各种缺陷的多功能化妆品；

便于行走的弹簧鞋；

触觉电影，借助一种极其简单的机械装置，使人能触到所见的一切，如纺织品、皮毛、牡蛎、肌肤、沙子、狗等等；

满足肉体和精神最隐秘乐趣的各种物品，其中一些应能引起强烈的反感，使买主把它们抛到墙上摔得粉碎，而另一些则使买主愤怒得把牙咬得咯咯响，就像一把餐刀使劲刮擦大理石时人们所感到的。受到极度刺激的神经，会使买主随即把一件物品抛到墙上，在粉碎时它会发出非常动听的声音；

人们不知摆放在何处的各种物品，它们造成一种不满足感，直到人们摆脱掉它们时才会终止。受虐狂有可能使这些物品大为畅销；

各种连衣裙，它们配有人为的附件和形体的垫料，这些附属物聪明地放在裙内，用来创造某类女性，她们配合着男人最色情的想象；

添加在背部的假乳房，它们很可能在一百年内使时尚发生革命性的变化；不同形状的浴缸，甚至还有水人为落下去的无浴缸的浴缸；

一份供汽车用的种种流线型形状的目录，十年后所有高级轿车车体制造商全会采用这些形状；

这些发明是我们的受难。尤其是加拉的受难，她怀着狂热的献身精神，在午饭后，胳膊底下夹着我的计划出发，开始了一场令每个人都难以忍受的旷日持久的十字军远征。她在晚上回来，脸色发育，累得要死，受难使她变得更加美丽。我问她：

“事情不顺利吧？”

她极为耐心地对我讲了一些，连最微小的细节也不略过。我们常常哭泣，随后到住宅区内的一家影院去，在那令人头脑麻木的黑暗中排解我们的烦恼。永远是同样的故事：开始时，他们觉得我的发明荒诞离奇而且没有商业价值；随后，在加拉尽力坚持，成功地使他们相信了发明的实际利益时，他们又反驳她说，哪怕这东西确实有利可图，那也无法实现，因为要付出的代价太大了。这令人沮丧，我们必须放弃这个计划，再重新开始。

“要是人造指甲不顺利的话，那就再试试触觉电影、万花筒眼镜或流线型汽车吧！”

加拉匆匆吃完午饭，没忘了使劲在我嘴上吻一下，跟我说：“勇敢点！”然后就出门进行她那乘公共汽车的十字军远征了。而我则整个下午呆在家里，画我的不合时宜的、反现代的画，这期间我的头脑中闪现着无数难以实现的计划。

然而……然而我的各种计划或迟或早地都被别人实现了，它们一般总是搞得那么糟糕，使我再也不会想到它们了。一天，我们了解到有人刚抛出了一些夜晚用的人造指甲，另一天，我们看到了在街道上行驶着一些流线型的汽车。一天早晨，我在报纸上读到了：“有人刚刚在橱窗里摆放了一些当作活鱼缸的透明人体模型，这很像一件达利的作品。”这又是一次提到我的好

时机，因为不少人断言我在自己的绘画中抄袭了他人的观念！一些无名者借口干得更好，把我的观念弄得毫无新意，从这时起，人们才喜欢了我的观念。可怕的法国人的见识控制了我那很快出名的名字，使它变成一种有如吓麻雀的稻草人的东西。“噢，达利！是的，他很惊人，不过他是个疯子，这是行不通的！”只要我这么想，这就行得通！我想从这个赞美我害怕我的社会夺到一点金色的糠，好使我和加拉能生活下去，不再受需要钱这个使人心力衰竭的幻影的威胁，这种威胁从托列莫里诺斯那时起一直存在着。虽然说我不挣钱，可加拉却用我们所有的那一点点钱成功地创造了奇迹。耳朵肮脏的、拖着蹒跚的长长脚步的、披着积满污垢被单做成的斗篷的波希米亚人的生活，从没进入过我们的家庭；我们既没认识回锅的炸土豆片，也不用担心受煤气电力公司职员轻视，这些人手里拿着收据，在空荡荡的厨房门边拼命按铃。我们从不向日复一日的平庸乏味让步。多亏了加拉精明的安排，一切都成为使我们两个心灵更亲密的机会。由于没什么钱，我们吃得有节制，但却很好。我们不外出。加拉自己缝制她的连衣裙，而我本人则奋力工作，花的时间比任何一位平庸的画家都要多上百倍。我为响应某些难得的同志，投入了全部的心血，准备一些新的展览。加拉有时责备我为太低的报酬工作，我回答她有这样一些同志存在是更加美妙的事情，既然我是一个天才，而天才注定是要饿死的。

“如果说我们生活得适度，这是由于你和我利用一天的每一分钟做着不间断的超人努力，多亏了它，我们终于初露头角了。

在我们周围，有一些今天已被遗忘的艺术家，他们通过把达利的观念“庸俗化”，生活得极为宽裕。如果说完整的达利显得像一种加了过多胡椒、难于吸收的食物，那么作为补偿，常用的办法就是在最差的冷菜中撒一点儿达利。撒一点儿达利在云彩上、在风景中、在忧郁里、在幻想中、在谈话里，但仅仅是“一点儿”，因为这使一切都有了种有刺激的诱惑味道。随着纯粹的达利变得更狂暴、更吓人、更非商业化，这一切就变得更商业化、更挑逗人了。我暗想：忍耐点儿吧，要坚持下去。加拉跟我一样固执，毫不妥协，在她鼓励下，我不仅没后退一步，反而前进了五步。到了成功的那一天，各种各样的老鼠、各种各样脏耳朵的波希米亚人、各种各样的轻松生活的粉红面颊的人就会爬到我们脚下！生活的艰辛和节制完成了赋予我们一种形式的任务，而其他的人则在便利中解体了！这儿是可卡因，那儿是海洛因，处处是一些酒精；处处是酒精和鸡奸，可卡因、海洛因、酗酒、鸦片、鸡奸变成了昙花一现成功的当然工具。罪恶共济会的会员抱着一种感情上的忠诚相互支援，反抗对孤独的共同恐惧。大家生活在一起，流汗在一起，撒尿在一起，直到第一位垮掉的人伸直后背让一把友好的匕首刺进去。

我们的力量、属于我和加拉的力量，就在于合乎卫生学地生活在这个杂处的环境中，不抽烟、不注射麻醉剂、不吸毒、不睡大觉，永远只是两个人，就像我在童年和青春期那样。我们不仅与蒙帕纳斯的艺术家、共产主义者、疯子、资产阶级保持着距离，而且还与他们保持着等距离。我们处在中央，呆在这儿，保持着我们的清醒。

我们也注意为自身永远保留一处不时用来逃避的自由天地。这处自由的天地就是卡达凯斯，我们几个月躲藏在那儿，把那如同巫婆的锅一样沸腾的巴黎抛在身后。动身前，我往这口锅里丢了些会在我们离开时烧熟的菜、一些对超现实主义团体是必不可少的意识形态口号。为那些鸡奸者，我重新实

现了帕拉第奥式的古典浪漫主义。为那些吸毒者，我提供了一种有关即将入睡的各种形象的完整理论并谈到了我为彩色的梦发明的面具。为上流社会的人士，我使一些司汤达式的感情冲突流行起来，或是用革命的禁果引诱他们。为超现实主义，我提供了另一种禁果，这就是传统。

动身前，我准备了一份最后那些拜访的单子：上午，一位立体主义者，一位君主主义者，一位共产主义者；下午，一些上流社会的人士，他们是从相互最为憎恨的那些人中挑选出来的；晚上，留给我和加拉！这些晚上显示了我们所撞憬的那一切，在餐馆，周围的一对对伴侣，看到我们怀着度蜜月的情侣特有的温柔和激情讲话做事，时常感到吃惊。我们谈什么？我们谈那属于我们两人的孤独，谈回到卡达凯斯的前景。在那儿，我们将有一堵布满阳光的墙为我们挡风、一眼井给我们供水、一些石凳让我们坐。我们用偏执狂批判的方法建造了那些最初的楼梯并继续进行这个共同生活的悲剧性美好工作，这完全是为我们自己。

我们去奥塞站，像蜜蜂一样负载着许多东西。历来，我旅行总是带着一大堆资料，十来只塞满书籍的手提箱，一批各种昆虫和艺术珍品的照片，一些没完没了的笔记。这次旅行，我们也带了巴黎住所里的一些家具、一些油灯，因为那儿没有电。我的那些画箱和带滑槽的大画架也占了我们行李中相当的地方。安家的两大，一直很兴奋。墙壁还是潮湿的，我们不得不用油灯的热度烤干它。终于，第二天晚上，我能躺在夜晚改成床用的大沙发上了。地中海沿岸的北风像疯子那样在外面呼啸。“身强体壮的女人”丽第娅坐在我面前的一个镀铬小凳上。她跟我们讲着神秘、老爷、一篇老爷刚写成的论威廉·泰尔的文章。

“威廉和泰尔，这是两个不同的人，一位是卡达凯斯人，另一位是罗萨人……”

她来给我们做汤，但由于关于威廉和泰尔的谈话会持续展开下去，她就去拿来鸡、盘子和刀，以便坐在我面前杀鸡。随后，他坐好了，继续解释欧仁尼奥·多尔斯最近的这篇论文，她利落地把刀插进鸡脖子的动脉血管。鸡头落在一个陶盘里。

“没有谁会相信我就是‘身强体壮的女人’。我明白这种情况。他们不像我们三人这样不受世俗之见的束缚。他们没有灵性。他们只能看到留在纸面上的文字，更多的东西就看不到了。毕加索非常爱我，尽管他很少谈及这件事；他能为我牺牲！有一天，他借给我一本哥德的著作……”

鸡又抽搐了二三下，接着便僵硬了，爪子一动不动地伸起来。丽第娅拔着它的毛，细细的绒毛在我们房间里飞舞。再一刀，她把胸膛剖开了，用流淌着鸡血的手指拉出内脏，放在玻璃桌上的一只盘子里，距一本非常珍贵的论述乔凡尼·贝利尼的书很近。看到我不安地站起身挪那本书，丽第娅严厉地对我说：

“不会染上血迹的。蜜比血更甜。我本人是血，而别的女人是蜜。此刻我的儿子正在反对着血，追赶着蜜。”

这时门开来，那两位儿子出现在门口，第一位留着红棕色胡子，脸色非常沉郁；第二位装出一种不变的假笑。

“她马上要来了。”第二位说。

“她。”也就是我们的女仆，丽第娅为我们选中了她，她将从第二天起照料这个家。一刻钟后，一位四十岁左右的妇女来了，她闪闪发光的黑头发

就像马鬃似的。她的面孔可能是列奥纳多画的。她的眼睛显出一点点疯狂的劲头。以后我们会得到这种疯狂的种种戏剧性证据。那么多次我觉察到疯子吸引疯子！我所去的地方，总有疯子和自杀者在等着我，他们组成了一个仪仗队。他们本能地知道我属于他们，尽管他们也明白我与疯子的唯一不同点就是我不是疯子。然而，我散发的气息吸引着他们，两天后，在这如此孤零零的利加特港，我的小房间里已挤满了疯子。这种势态有使人难以生活下去的危险，我必须采取些措施。每天，我七点钟起来画画。由于一打开门就会影响我工作，再没有谁进来了。我看到他们都呆在外面。那些疯子在住宅周围不怀好意地转来转去，只允许他们在星期天跨进门槛。利加特港那些讨厌的人中，有那么一位拉蒙·德·海尔莫撒，他很像个五十岁上下的阿道夫·门茹。这是个世界上最懒的人。他总是重复着：“有这样的一些年头，大家什么都不干！”事实上，对他来说，这样的年份从童年起就一直持续着。一旦他看到别人工作，他便会摇晃着脑袋说：

“我不懂他们做这一切怎么会不觉得疲倦！”

这种无所事事使他在卡达凯斯的渔夫中获得了某种声望。大家像说格言那么讲：

“只怕拉蒙答应干这件事！”

要是他答应了，他会让他们全体都感到沮丧。他的懒惰仿佛是当地的一种光荣，一种别处找不到的独创现象。这个寄生虫是所有渔夫的骄傲。可当他们拖着沉重的网，在一个夏天的午后穿过广场，发现拉蒙坐在一家小酒馆的露天座上品着咖啡、酒和雪茄时，他们决不会错过发怒的机会，向他抛去一连串臭骂，可这一连串臭骂只不过让这位受难者露出一些很难理解的微笑。由于知道他无法谋生，有钱的人就给他些旧衣服和钱，他用这些东西勉强维持着生活。多亏这些旧衣服，他总像是位绅士。有一些年，人们看到他穿着件英式便装上衣。镇长让他使用一处有点儿破旧的大住宅，他得跟路过的流浪汉们分享这处住所。他能让他们收拾房间，打几桶水，不过很难看到这些流浪汉。我好几次到他的住宅去看他。院里长着两棵漂亮的无花果树，上面挂满了腐烂的果实，拉蒙甚至不愿花点力气摘它们，他不喜欢它们。雨从穿孔的屋顶滴落进来，屋内到处是水。数不清的跳蚤开始了战斗，一群猫则追逐着那些老鼠。一天，加拉召唤拉蒙，让他用水泵打水，灌满洗衣物的小木桶。每天他只要干一小时就够了，而且还能在日落后天气凉爽时干这件事。第二天后，小木桶总没有水，可却能听到水泵有规律的声响。我到现场去看发生了什么故障，却发现拉蒙躺在一棵橄榄树下，正在熟练地撞击两块铁模仿水泵吱吱嘎嘎的声音。一个绳子的机械系统使他能花最少的气力干这件事。每天，我都看到他来收集我们剩下的饭菜，我问他：

“拉蒙，这怎么样？”

“不怎么样，很差，达利先生，越来越差了！”

他的胡子下露出一种淡淡的狡黠微笑。拉蒙有种天赋，能怀着对什么都不遗漏的细心，以《伊利亚特》的那种史诗调子来讲述世上最乏味的东西。他最好的故事是他提着一位台球冠军的小箱子进行的三天旅行。他一分钟一分钟讲述它，要讲完得花上三天。经过巴黎那些激动的、紧张的、充满着弦外之音、恶意和圆滑的谈话后，拉蒙的故事达到了一种心灵平静的境界和一种爱讲轶事的高度，这会让人感到无比的厌烦。同样地，利加特港渔夫们那种完全荷马式的闲谈，对我那厌倦了“思想”和装模作样的头脑来说，也属

于一种富于营养的现实。我和加拉，我们整整度过了好几个月，相伴的只有丽第娅、她的两个儿子、女仆、拉蒙·德·海尔莫撒以及在利加特港停泊小船的十来名渔夫。每天晚上，这伙人，甚至包括女仆，全都返回卡达凯斯；我们独自呆在这处荒凉的海湾岸边。清晨五点，我们的灯经常还亮着。月亮将要融入白昼，一名渔夫敲打着门。

“我看到了灯光，我想给你这条狗鱼。你明早就会有新鲜很鲜的鱼了。这块石子是我为加拉太太捡的。我知道她喜欢这些奇特的石子。萨尔瓦多先生，你工作得大多了。前天你也睡得很迟……”

于是他跟加拉讲了起来：

“萨尔瓦多先生应当服点儿泻药。我昨天就已经同他讲过了。他抱怨的这些失眠，全是他肚子引起的。他应当一劳永逸地把它排泻光，那就不会再想它了！天空像鱼眼睛一样明亮了！从这个月亮看，我们会有好天气的。晚安……”

这个渔夫走了，我看着加拉，恳求她：

“你去睡吧，你晒死了。我再画半小时。”

“不，我等着你。睡前我还有许多东西要整理。”

不知疲倦的加拉编织着我杂乱无章的珀涅罗珀的布匹。她刚把资料和笔记整理好，我就为了找一件东西重又把一切弄乱了，而这件东西并没有什么用处，不过是我一时的心血来潮罢了。我几乎总是把它留在了巴黎，不顾比我更明白我需要什么什么的加拉的劝告。钟敲五点，月亮离开了亮起来的天空。加拉绝望地匆匆打开那些费了很大劲才整理好并关上的箱子，她明白我们再不能睡觉了。要是我不睡，她就也不睡，怀着比我还紧张的心情一直关注着我的工作，因为我本人经常为了从我的戏剧中获得快感，甚至为了懂得受苦而故弄玄虚。

“加拉，我画我这些画，尤其有你的心血。”有一天我对加拉说。

我决定永远签上我们两人联合的署名。我们就这样在利加特港连续生活了三个月，我们像两个癌瘤那样紧抓住这三个月，一个在时间的胃里，另一个在他的喉咙里。我们不愿有一点时间流逝，除非毁灭性的紧逼耗尽这些组织的生命。我们折磨时间，迫使他想到我们。每天，没有一个小时能逃过我们的搜索。我们关心着这些滑溜的锋利岩礁、枯燥的利加特港、饥饿的猫、生病的女仆、兴奋的疯子、穿绅士装的满身跳蚤的拉蒙、十来位面对死亡的时刻显出一派高贵的漠然置之态度的渔夫、抠鱼肠子的黑指甲、长满苦艾色老茧的坚硬的脚。差不多一刻钟路的光景，在那把我们分开的丘陵后面，在那我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房子里，隐藏着父亲的强烈敌意，我能猜到它的各种气味。我在散步的途中，从远处看到父亲的这所房子，我觉得它就像浸在怨恨中的一块糖。

利加特港、苦行和孤独的生活的象征……正是在这儿，我懂得了使自己变穷、懂得了约束和润饰我的思想，使它变得像斧头那样锋利。这无暗喻也无烧酒的艰苦生活，这染有一种永恒光彩的生活……巴黎的胡言乱语、城市的智慧、和平街的首饰都无法抵抗这有如密涅瓦前额一般全面的智慧，这种智慧已有千年之久，永远是从容宁静的。到利加特港生活了两个月后，我日复一日看到那些天主教的永恒基础在我的思想中耸立起来。风景和我们的灵魂仿佛沐浴在一种拉斐尔式的光芒中。每天晚上，我们到我们偏爱的那些地方的一处去散步。

我对加拉说：“应该把我们的井再挖深五米，好有更多的水。我们将在新月下钓沙丁鱼。我们将在井边种植两棵桔树……”

这些话消除了漫长一天给我们带来的疲劳。我们的目光停留在那万里无云的浩瀚天空中，它像圆屋顶一样笼罩在我们头上，在期待着用偏执狂批判方法歌颂它的光荣的壁画。啊，那懂得用石头圆屋顶应和天空圆屋顶的文艺复兴多么让人怀念！在我们的时代，那些曾在若干世纪里庇护过人的灵魂、思想和良心的宗教、美学和道德的圆屋顶到哪儿去了？今天，灵魂呆在外面，在街头，像狗一般！人们发明了一种机械脑：收音机！我们用跟诺斯特拉达穆斯、帕拉切尔苏斯和埃及星相学家们闪电般迅速的视觉现象相比是极为缓慢的速度从欧洲、从中国收到的所有这些可怜的噪音，对我们能有什么用！从一个半球传到另一个半球的这些大喊大叫的康嘎舞曲和战争公报，对一位能听到天空中天使与大天使的战斗的人来说，能有什么用呢？电视机对只想闭上眼睛去瞥见那些最难有形无形地接近的地区、并使梦中的每一处巴格达都从尘埃里重现出来的人，能意味着什么呢？对会相信肉体复活的人来说，社会主义的“生活水平”的改善是什么？要是一头驴开始飞翔、要是一棵无花果树长出些翅膀，这或许会使我们惊异一阵子，得到瞬间的消遣，正如像飞机般被抛到空中的一块飞翔的烙铁并不值得赞扬，我们为什么要对一个会飞的机器感到惊讶？在人把他的灵魂当成飞翔时，飞翔对一个机器来说是什么？

我们的时代充满了道德的怀疑主义和精神的虚无！信赖着战后机械的伪进步之时，想象力的迟钝贬低了精神、解除了精神的武装、损害了精神的名誉。机械文明将被战争和曾建设了它并将充当炮灰的群众毁掉。是的，我想到了你们、有着在田径锦标赛中获得威望的体育英雄洋溢激情的快乐面孔的、各民族热情而又忠诚的年轻人，想到了你们这些愚蠢行为的伙伴！

“加拉，把手给我。我怕跌倒了。黑天了。这次散步让我太累了。你认为女仆能找到今晚饭吃的沙丁鱼吗？要是明天天气继续这么暖和，我就脱掉一件羊毛衫。我们吃点儿安眠药，今晚就能睡个好觉了。明天，在这个时刻重来之前，我得完成些东西……”

我们回到家。一缕烟从我们的房顶飘起。鱼汤从容地焖在火上。我们希望她会在里面放些蟹……我们向前走着，我们紧抱在一起走着，心中怀着做爱的欲望。我突然感到一阵让我浑身颤动的喜悦。

“上帝啊，你我都不是罗丹，这太幸运了！”

每当我完成一幅油画时，我们俩一致特许我们跟渔夫一起到克鲁斯海岬的岩礁处，有一块海上的比利牛斯山区人刚死的地方，我们就在这里烤沙丁鱼和排骨，长久地观察思索这些岩礁非常有助于那“软与硬的形态学美学”的诞生，这就是高迪的地中海哥特式美学。我相信高迪跟我一样，在他的青年时代看到过这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岩礁。我也在这儿看到了我已在本书中多次指出的偏执狂变形原则的具体体现。岩礁暗示的各种形象，随着你的进退而变化着形状。这种感觉并非我独有，渔夫们早就把这种感觉表达了出来，他们给这些海岬、海湾和崩塌的岩石堆起了不同的名字：骆驼、鹰、修士、死女人、狮子头。

我们摇桨前进时，我们的朋友向我们指出那些变形：

“萨尔瓦多先生，看，现在在一匹骆驼的地方，仿佛是只公鸡了。”

骆驼的头变成了鸡冠，它伸长的下唇显现出一个喙。岩礁不间断地改变

着“所模拟的事物”。我在这永恒的伪装中，发现了赫拉克勒斯包含在“自然喜欢隐藏自身”这一谜般公式中的这种自然的害羞里的深刻意义。观察着这些不动岩礁的变动形状，我思考着我思想中那些特有的岩礁。我希望它们像布拉瓦海岸的岩礁一样，是相对主义的、在精神空间中极少变动的、自相矛盾的、装疯卖傻的、伪善的、假装的、含混的、具体的、没有梦的、没有“神奇事物薄雾”的、像花岗石一样能度量的、可查明的、有形的、客观的、物质的。我所企望的事有一些哲学上的前驱，如希腊的诡辩派、西班牙的圣依纳爵·德·罗耀拉的耶稣会思想和德国的黑格尔的辩证法……不幸，后者缺乏思想的本质要素——讽刺。此外，黑格尔还是革命的一个胚胎……

卡达凯斯渔夫摇桨的那种懒洋洋的方式，掩藏着耐心和消极，它们也是讽刺的形式。我暗想要是我打算作为战胜者回到巴黎，我就应该不从我的小船上下来，前额上保留着利加特港光线的光彩，直接驶往巴黎。如同酒一样，精神运输起来也很难，太多的晃动会弄坏它。正是用这些懒洋洋的荡桨节奏，人们能在一些更平静的日子里，运输传统的稀罕的酒。再没有什么会比现代运输手段的速度更让人变蠢的了，再没有什么会比记录的下跌更让人沮丧的了。当一天就能在地球上转一圈时，那多令人烦恼啊！当我们能用一小时或一秒就做到这点时，那是何等的灾难啊！相反，要是有人告诉我们巴黎至马德里的路程要用三百年才能走完，那会多么让人眩晕啊！可这是从浪漫主义到梅里爱啊！三百年稍微多了点儿。理想的速度存在于那些在意大利送哥德和司汤达的驿车的速度中。在那时，每一段距离还考虑到留给智者短暂的休息时间，使他能充分地领会各种风光、形态、情绪。

摇桨吧，萨尔瓦多·达利，摇桨吧！最好还是让别人摇桨，让这些卡达凯斯的正直渔夫摇桨。你知道你想去哪儿，他们将把你送到该处。就是通过摇桨以及受到一群偏执狂的正直水手的包围，哥伦布才发现了美洲。

应当回巴黎去，我们终于把钱花光了，必须再挣些“铜板”，才能尽快重返利加特港。所谓尽快也得三四个月之后了。我尽力最充分地享受这些充满着临别哀歌情调的最后日子。人们开始感觉到如同胡乱复活的秋天一样虚弱和憔悴的春天。无花果树枝上的黄花，就像复活节的枝形大烛台上的蜡烛那样闪着光亮。节日用的蚕豆变得柔软了。一天，我用这种很像是包皮的蔬菜做了一餐饭。卡塔卢尼亚人有一种烹调它的方法，这种方法使我很开心，它是用肥肉、很油腻的血肠、一些巧克力和几片月挂树叶来做的。我吃完蚕豆，看着那块平放在桌子上的东西：我的面包，我的眼睛再也离不开它了。我拿起这块面包，吻着它、吮着它，接着突然一下子用牙咬掉了面包头。这块面包立在桌子上了。我刚重新创造出哥伦布的鸡蛋：萨尔瓦多·达利的面包。同时我发现了面包之谜，即它可以不被吃掉地站立着！这个如此有用的、象征着营养和神圣生命的东西，我想把它变成无用的、审美的东西。我要用面包制作各种超现实主义的作品。有什么事能比在一个面包背上适当挖两个规整的洞并在里面嵌入一对墨水瓶更容易的呢？有什么能比看到溅出的鹈鹕牌墨水渐渐在面包上形成印迹更降低色调和更美丽的呢？在这个面包墨水瓶架上，面包皮被切开了一个长方形小块，绝妙地插着羽毛笔。要是人们总能有颇为新鲜的上好面包心擦拭笔，只需每天早上更换面包就成，再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

一旦我回到巴黎，我就抛出了这新的谜语般的口号：

“要面包、要面包、只要面包。”

人们不无幽默地寻思是否我变成了共党主义者！可他们已经猜到了达利的面包并非用来救济大量家庭的。我的面包是极度反人道主义的面包。它象征着豪华的想象对讲究实际的世界中的功利主义进行的报复。这个面包将是贵族的、审美的、偏执狂的、矫饰的、耶稣会的、与众不同的、令人无力的面包。两个月的沉思、工作、研究和写作，导致了在我离去的前夜出现这一表面上无价值的、受到启示顿悟的行动。直立在我桌子上的面包头总结了我生活中这个时期的心灵体验。这就是我独创性的所在。

有一天，我说过：“瞧，一个拐！”而大家认为这不过是幽默、是随心所欲。五年后，大家开始明白了它的重要性。现在，我说：“瞧，面包！”大家就理解了它的意义。这是因为我总有能力把我的思想实际体现出来，它达到了使那些物品具有魔力的程度，这些物品是我在经过无数次思考、研究和启示后才决定用手指点明的。

回到巴黎一个月后，我跟乔治·凯勒和彼埃尔·柯尔签订了一份合同。没多久，我在后者的画廊里展出了我的《无形的躺椅—马—狮子》，这是我在克鲁斯静观沉思的果实。诺埃尔子爵买下了这幅画，让·柯克多买下了《褻读圣体饼》，安德烈·布列东买下了我的《威廉·泰尔》。我的作品开始让艺术批判家们感到不安。可实际上，只有超现实主义者和上流社会的人士显得被触到了痛处。过了些时候，福西涅一路辛日亲王买了《欲望之塔》，这幅画表现在一个狮子头旁有一男一女，他们赤裸着身体，以一种犯罪的色情姿势搂抱在一起，一动也不动。

我开始越来越经常参加社交界的晚宴，人们抱着混合赞美之情的几分害怕接待由加拉陪伴的我。我利用这种场合安置我的面包。一天晚上，在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府上，听完一场音乐会，一群十分优雅的女人把我包围起来，我觉得她们特别受不了我的这类胡言乱语。我对面包的着迷使我梦想创立一个面包的秘密协会，它的目标是系统地把一些疯子变蠢。那天晚上，饮着一杯杯香槟酒，我阐述了它总的路线。天气极为理想，我们都呆在花园里。一些流星不断划过夜空。我觉得看到了我那些最美的女朋友在笑着，她们的灵魂就反映在她们闪光的首饰上。这些笑从非常美的麻木的嘴里迸发出来，三年来它们从没这么笑过了。另外一些女人克制着，因为她们发觉我可怕；或是只愿挂着几分怀疑微笑着，没思考过，不想装出完全领会的样子。这些笑像螺钿珍珠扇一样展开着，送来一阵令人快慰的清风，我有分寸地接受它，以便在轻浮和讽刺方面走得更远一点儿。

确信已成功地吸引了她们的注意力，我便强调我的“秘密协会”的话题！这个计划很天真，我也知道这一点。可我无法不想到这个计划。人们求我继续讲下去：这个面包的故事是怎么回事？你发明了什么？大家怀着一种不正常的狂热态度笑了起来。我不得不让步……

“要实现的第一点，就是烤一个十五米长的面包。假如有个尺码够大的烤炉，就没有什么比这更容易的事了。除了它的尺寸外，这个面包完全应当跟每个法式面包一样。第二点，要找到一处能安放它的地方。我认为得选择一处不太热闹的地方，这样它的出现会显得更加怪诞，因为唯有它那要让人变蠢的目标才是重要的。所以我建议把它放在王宫花园。在夜间，两队秘密协会的成员，要装成安装管道的工人，把这个面包运到这儿来。得用一些报纸包起它，外面再用绳子捆扎上。一些秘密协会的成员会租下一个朝向王宫花园的房间。他们的职责是观察和记录公众当面看到这个面包的各种反应，

给人们提供详细的第一手报告。事实上，预见到这样的一次行动会在巴黎这样的一座城市中造成极其伤风败俗的后果，这是很正常的。在特定的场合下，尽管有用绳子捆扎着的报纸，某个人肯定能发现这是个面包。这个异乎寻常的东西就这样显露了出来，使人们不得不谨慎地对待它，人们将会把这个面包运进警察局的化验室进行分析。它含有爆炸物吗？没有。它含有毒药吗？没有。这是一个面包商的广告吗？是哪个面包商？不是，这也不是广告。渴望有难以解答的奥秘的报纸将夺取这个问题，社论作者将投入最荒谬的论战。有种看法把这视为精神病的表现，上层人士会认为这是真实的。好多论点将相互冲突起来。实际上一个孤零零的疯子无法烤这个面包，也无法单独把它运到王宫。要是这是个疯子，那么无论如何他就必定表现出实践的意识，他要获得一些助手的合谋和保密。因此，这是一个疯子或一群疯子所为的假设并没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似乎这确涉及了一种如谜的社会倾向的表现。不过既然谁都无法理解它的效果和它的意义，那又怎么来解释这面包象征着什么呢？这显然不会是共产党的一次暴动。它到底证明了什么？除了这个面包是神圣的，大家要它做什么？不，这太愚蠢了！把它设想为是学生们的一个玩笑，也完全无法说服什么人。一群超现实主义者的混乱状态和他们拙于实践的情况，同样会使他们无法搞出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出于更有力的原因，学生们也不会干这件事。人们有可能会想到达利和他的秘密协会，不过那可能性仍然是极为难得的。各种争论还处在高潮之际，一件新事又会出现：在凡尔赛宫的庭院里出现了一个二十米的面包。一下子，新闻记者就会想出存在着一个秘密协会，用它来解释这第二个面包的出现。摄影师们将开始窥伺第三个面包的来临。不应迟迟不给他们提供第三个面包，这样才能使新闻本身感到焦虑并吞食越来越长的面包。同一天同一时，在欧洲的不少城市中，将会出现一些三十米的面包。第二天，美国的有线电报将宣布发现了一些陌生人把一个四十米长的‘法式’面包放在从萨伏依广场到圣莫里兹旅馆的人行道上……显然，这样的一些神秘展示会带来好处，它们诗意的效果无疑将是惊人的、并能创造出一种从未见过的集体歇斯底里和混乱的状态，它为了等级制君主政体的利益，系统地毁灭了这个理性世界的逻辑……”

大家总是怀着高傲的优雅女人特有的专注和轻率的态度听我讲话。我差不多在各地都能看到所有女人在使用我的术语。

“亲爱的朋友，我很想使你变蠢……”

“两天以来，我无法确定我的里比多，你呢？”

“我嘛，我去听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会。这真美妙！这真讨厌！这真是件丑行！”

我到处都辨认出我的句子和观念。那些东西是或不是“食品”。布拉克最近的那些画“纯然是崇高的”，如此等等。这些源于卡塔卢尼亚的丰富用语是我独有的，人们在两次社交界的闲谈之间，怀着幽默感从我这儿借用了它们。然而，我故弄玄虚的意义就像小小的寄生虫那样在他们的头脑里迅速地移动着。

“得啦，达利，现在为什么是面包，总是面包呢？”

“这个嘛，”我说，“亲爱的朋友，你应当询问的是偏执狂批判的方法。”

于是人们请我解释我偏执狂批判的方法，我发表的那些论文实在太费解了。我今天得承认当时我自己并不很明白这个发明会成为什么样子。它“超

越了”我，正如我许多发现一样，我只能在后来才理解其中的全部意义。我一生都在听别人重复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什么意思呢？”

有一天，我彻底挖空了一个面包头的内部，在里面放了个小佛像，用一些死跳蚤把它完全盖上。接着我拿了块木头堵住面包头的开口，抹上水泥，把一切固定住，并在上面写下了：“马的果酱”。这是什么意思呢？

室内装饰家让米歇尔·弗朗克给我提供了两把最纯粹的1900年风格的椅子，我用一个巧克力板代替了其中一把的倚背，从而改变了它的面貌。随后我又用一只门把手接长它的一只脚，使它失掉平衡。另一只脚则永远插在一个啤酒杯里。我称这个不舒服的物品为“大气之椅”。所有看到它的人都感到很不舒服。这是什么意思呢？

那时我开始发起一场运动，大力宣扬超现实主义的物品、具有象征作用的荒谬物品，用来对抗讲述梦的东西、自动书写的东西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超现实主义物品应当是绝对无用的，并且从实用的观点看，是绝对荒谬的。它以最大的可触知性体现着发狂个性的精神奇想。这些物品的出现和流传同有用和实际的物品展开了一场竞争，这种竞争是那么激烈，使得人们相信目击了一场愤怒的公鸡的战斗，正常的物品经常在战斗中被拔光了羽毛赶去。很难抵御超现实主义的巴黎人，在他们房间里迅速塞满了超现实主义物品，初看起来，它们很不和谐，不过每个人都能用手去接触和操纵它们。人们来触摸裸体，并从我的井中汲取这一天主教的真理：物品是种“圣宠的身份”。

超现实主义物品的风行，扫除了那非常令人烦的自动性叙述和梦的影响力。超现实主义物品造成一种现实的需要。人们不再想要“美妙他讲述的事物”了，他们想要用手制造的美妙的东西。”从未见过”，很快就引起中欧的超现实主义者、日本人和各国后来者的兴趣。大体而言，我用自己的物品杀死了最初的超现实主义绘画以及总的现代绘画。米罗说过：“我想谋杀绘画！”我暗自在绘画的两肩里给了致命的一击，从而帮他谋杀了绘画。然而我感觉到米罗明白我们的牺牲者是“现代绘画”，而非古代绘画；在最近重看过梅隆的收藏品后，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古代绘画的状态是极为良好的。满怀着对超现实主义物品迷恋之情，我在一些快镜照片的启示下，画了几幅表面上正常的绘画作品，我给它们添加了点梅索尼埃的东西。疲倦的公众立即上了钩，而我暗想着：“再等一下，别怕，我就要向你们讲出真情的……”

这个新时期不久就要结束了，我和加拉，我们在一个半月内为回到卡达凯斯存够了钱。我的威望已经相当稳固了。批评家们已经把超现实主义分为达利之前和达利之后的了。人们只依据达利来观看和判断……柔软、衰落的装饰、粘糊糊的东西、跟生命有关的事物、腐烂，这全属于达利。一件难以预料的中世纪物品，这是属于达利的。勒南一幅画中奇特或痛苦的目光，这是属于达利的。一部有着通奸的乐队指挥和竖琴演奏家的荒唐的影片，这还是属于达利的。巴黎的面包不再是巴黎的面包了。它成了我的面包、达利的面包、萨尔瓦多的面包！

我的影响的奥秘之一，就是它永远是奥秘。说到加拉的影响的奥秘，那就是它是双重的奥秘。不过我有保持奥秘的秘诀。加拉则有在我的奥秘中对我保持奥秘的秘诀。人们时常认为发现了我的奥秘：谬误！这不是我的奥秘，这是加拉的奥秘！

我们缺钱这件事也是我们奥秘之一。大部分时光我们几乎一无所有，我们一直体验着由缺钱带来的苦恼。然而我们知道我们的力量就是不显露这个奥秘。别人的怜悯被扼杀了。加拉说，这种力量不在于唤起怜悯，而在于唤起羞愧。我们会死于任何人都绝不会知道的饥饿。“至死都保持天才和风度”是我们的座右铭。我们很像这么一位没有东西吃的西班牙人，当中午的钟声敲响时，他回到家中，坐在空荡荡的桌前，既无面包也无酒。他等着别人吃完午饭。空旷的广场在无情的阳光下显出一副无精打采的样子。人们从每扇窗子里看到那首先吃完饭的人正穿过广场。我们这位老兄在他认为恰当的時刻站了起来，唇间叨着根牙签，边剔着牙边在广场上漫步。人们必定相信他吃了饭，否则他不会塞住牙缝。

一旦钱开始稀少了，就应当增加小费，决不让它低于中等水平。人们能省掉某些东西，但人们不能适应种种东西。人们能不吃，但不能吃得坏。从马拉加那时起，我成了加拉的学生，她向我揭示快乐的原则。她也使我懂得了全部的现实。她教会了我穿衣、下楼梯不数次跌倒、不丢钱、吃饭时不把鸡腿抛到天花板上、辨别我的那些敌人。她是宣告了我古典主义的平衡和匀称的天使。我并没丧失个性，就清除了束缚我的那些怪癖。我意识到了我的行动。

生活能够把我变得坚硬，取代这种作法，加拉为我构筑了一个寄居蟹的壳，从而使我能把我的外部镶嵌当成一个堡垒，而在内部，我则继续在柔软和超级柔软中变老起来。于是在我决定画一些表的那一天，我把它们画成软软的东西。这经历了疲劳的一夜。我头痛，感到极不舒服，这种情况很少见。我们本应同一些朋友去看电影，但到了最后时刻，我决定留在家里。加拉跟他们一起出去了，我则早早就睡下了。我们是用一块上好的卡芒贝尔乳酪结束晚餐的，当我独自一人时，我在桌子上支着胳膊时呆了一会儿，想着这块稀乳酪的“超级柔软”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我站起来，走进画室，依照我的习惯最后看一眼我的作品。我正在画的这幅画表现的是利加特港周围的一处风景，它那些岩礁仿佛被黄昏的透明光线照亮了。前景上，我勾勒出一棵截断的无叶橄榄树。这处风景应当作为某种观念的背景，可这是什么观念呢？我需要一个惊人的形象，但我还没找到它呐。我熄了灯，走出画室，这时我完全“看到了”解决的办法：两只软表，其中一只悲哀地挂在橄榄树枝上，虽然头痛，我仍准备着调色板，动手工作起来。两小时后，加拉从电影院回来了，这幅或许是我最近卓越作品之一的画已经完成了。我让她闭上双眼坐在画的前面。

“一、二、三，现在看吧，你会……”

她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幅画，这回轮到她观察她了，她的面容反映着她那种惊奇的赞美之情。于是我确信了我的形象的效果，因为加拉从不会弄错的。

“谁着过都会忘记的。”

“那么，我们睡觉去吧。我头痛得很。我要吃点儿阿斯匹林。电影院上映什么片子？它好吗？”

“我不知道，我记不起来了。”

早晨，我收到一家影片公司的回绝信，我向它提交过一个认真准备的小脚本，事实上，这个脚本最为深刻地总括了我的各种观念。只读了最初几行，我就明白这是个否定的答复，我没再读下去。画完我的油画后，我更平静地

拿起了这封信，从中我读到这些先生觉得我的观念非常好，可是这部影片不会“受大众欢迎”，因此不可能投入商业化的生产，无论如何，观众决不会喜欢这么有力地打乱他们的习惯。

几天后，一个来自美国的家伙买下我这些软表，我给它们起了《永恒的记忆》这个题目。这个家伙举起两只黑色的大翅膀，它们就像格列柯的天使的翅膀。要是人们没看到他的黑色翅膀，那么作为补偿，人们决不会不注意到他的白麻布西服套装和他的巨大的巴拿马草帽。他名叫朱里安·列维，这个人想让美国了解我的艺术。朱里安·列维向我承认，他认为我的作品非常独特，但它是反大众的、也是卖不掉的。他要把我的画挂在自己的住宅里，供自己享受。《永恒的记忆》并没有证实这错误的预言，它被卖掉了，并一再被卖掉，最终进入了现代艺术馆，现在它无疑是该馆最受大众欢迎的画。我时常在外省看到一些绘画爱好者复制它，而他们见到的仅仅是它的一幅黑白照片。在食品杂货店和室内家具店，它也被用来招徕顾客！

过了些时候，我出席一部所谓的喜剧片的放映式，这部影片重复了我那个小脚本的大部分观念。它是愚蠢的、制作得很拙劣，真是非常糟糕……我的“观念”显然是被糟蹋了。不过幸运的是这些观念不时把那些唯利是图者弄得要死了，因为在进行彩排前这些观念在他们手里爆炸开了。如同拉罗斯词典上的那位女子，我吹着我各种危险观念的花朵。但我只让它们有毒的病菌随风播撒。人们无法不受惩罚地模仿萨尔瓦多·达利。那胆敢这么干的人将死于它！虽然被偷窃、被诈骗、被抄袭，要是我无法挣钱，那么作为补偿，我仍然能感到我的威信每天都更加距顶峰近了点儿。经过这么多努力之后，我和加拉，我们将再去利加特港，几乎可以肯定有两个月摆在我们面前：一个半月去西班牙，两周在巴黎，后者是为了在我们回来时静观情况的变化。自从我被家庭赶走，父亲不停地追逼我，试图使我无法在卡达凯斯生活，仿佛我们只要一出现就是他的耻辱。

到达利加特港后，我画了幅加拉的肖像，一对生排骨对称地在她肩上摆动着。这应意味（如我后来明白的）取代吃她，我决定吃一对生排骨。事实上，这排骨仿佛是我流产的赎罪的牺牲品，正如亚伯拉罕偏爱吃母羊和威廉·泰尔瞄准苹果一样。我好几次这样描绘我童年的肖像，把一块生排骨放在我头上，试图象征性地引诱我父亲来吃排骨而不是吃他的儿子。我的那些可食用的、肠腔内的、有助消化的图画在这天变得紧张了。我想吃掉一切并打算用煮鸡蛋建造一个可以吃的大餐桌，我甚至想雕刻一尊米罗的维纳斯像，这只需打碎蛋壳找到蛋白，一直挖到蛋黄就够了。这个夏天，我不仅想把一切全都吃掉，而且我也极为口渴。我相信烧酒（在巴黎时我曾不得不喝它来克服我羞怯的毛病）在胃的刺激中会发挥作用，多亏了这种刺激，我感到我那些北非的祖传意识复生了，这种阿拉伯人的口渴把他们带到了西班牙并使他们创造了阴凉处和喷水柱。

像阿拉伯人一样口渴的我，也跟他们一样好争执。一天晚上，有人邀请我初秋到巴塞罗那，面对公众一试我的口才。我的演讲在巴塞罗那协会里举行，这是该中的知识中心。我决定用最强烈的粗暴方式抨击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当时以发昏的无知态度在一种卡塔卢尼亚爱国主义环境中吃着草。我开始时故意迟到了一刻钟，以便我能发现面对着一群躁动不安的听众。没有开场白，我以萨德侯爵赞美酒神的颂词开始我的演讲，我把他当成一个知识的可耻丑行跟安杰尔·圭梅拉进行对比，圭梅拉死于几年前，我知道他是最受

尊敬的一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作家。我刚一说出：“这位伟大的鸡奸者、这个巨大的毛茸茸的败类，他名叫安杰尔·圭梅拉……”我马上就明白我的演讲结束了。歇斯底里的听众向我扔椅子，对讲台发动冲击，要是协会的工作人员不加以阻止，人们肯定会当场把我像石膏像一样打碎了。把我安排在一辆出租汽车中时，警卫们对我说：“你真勇敢！”事实上，我相信那天我表现得颇为镇定，不过真正的勇气属于替我承受打击的国民卫队这一方面。

这件事又为我赢来一个带有无政府主义倾向的革命团体的邀请。

“在我们这儿，”主席说，“你能讲任何事情，而且越大胆越好。”

我接受了邀请，只要求替我准备一个尽可能长的面包和一些能牢牢捆住它的皮带。演讲的那天晚上，我提前到了几分钟，照我设想的调整好演出的场面。他们让我看到一个非常令我满意的大面包。于是我向他们解释，在我漫谈的某个预定时刻，我会打手势并说出：“把它拿上来。”两名助手将带着面包出现，把它放在我头上，用皮带绕过我的腋窝牢牢固定住它。这个操作程序要极其严肃地进行。两名助手要能有种阴森森的表情，那就更好了。

我以刺激人的优雅方式打扮起来，我出现在讲台上时，立即受到暴风雨般的欢迎。掌声终于把口哨声压了下去。有人说：“首先，要让他讲话！”于是我讲话了。这回不是萨德侯爵的颂词，而是我的一份讲稿，我滔滔不绝地讲着，最粗野最露骨的下流话，一些接着一些，我一生中从没这么讲过。无疑，这是首次有人敢于当众讲出这些话。我保持着亲切自然的语调，仿佛我在谈下雨和好天气。一种普遍的不安控制了易动感情的和人道主义的无政府主义听众，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曾想到：“今天我们要去听这个达利、这个讨人喜欢的有着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人的奇谈怪论，它具有让他的同类吼叫的天赋，听他谈话我们会很开心的。”于是他们携带着妻子女儿来了。我的漫谈持续着，下流话同某些关于卡尔·马克思、唯物主义、唯心主义的思想混在一起了。但真正起关键作用的是那些下流话，它们终于使一位像圣哲罗姆那样消瘦、严肃和漂亮的无政府主义者站起来打断了我，他庄重地提请我注意我们并非在窑子里，而且听众中还有一些妇女。我回答他一个无政府主义中心不再是一所教堂，而我自己的妻子也在场听我讲这些话，他们的妻子同样也可以听我讲这些话。我的回答一下子使人们静下来，可是我以自己特有的、而且还是亵渎神明的赤裸裸方式讲出了一连串新的下流话，使整个大厅中的听众像狮子一般吼叫起来。坐在讲台上，我难于分清这吼叫意味的是愤怒还是快乐。我认为最适当的心理时机到了，我朝呆在幕后的助手打了个手势，他们抬着面包出现了，引起的惊异之情超出我的所有希望。当把这个长面包固定在我头上时，喧闹增加了，并开始变成一场普遍的殴斗，受到这种普遍的歇斯底里的感染，我开始背诵我写的一首关于“腐烂的驴子”的卓越诗歌。一位面孔红得像龙虾的白胡子无政府主义医生，被真正的精神病大发作折磨得发了狂。要有十来位男人费很大力气才能制止他。人们能轻而易举地想象出，在这场全体参与的最后事件之后，晚会就在一片大混乱中结束了。组织者们都显得很满意。他们走过来跟我说：

“你或许做得有点儿过分了，不过这真精采！”

一位男子走近跟我讲话。他的心灵似乎很健全，可却具有种相当令人难耐的犬儒主义味道。他嚼着从一个圆锥形纸袋里拿出的薄荷叶，他的手指甲被污垢弄得那么黑，真让我困惑。

“我，”他对我说，“我整个一生都是个无政府主义者。我只吃禾木科

植物，有时再吃只兔子。我喜欢你，不过还有一位我更喜欢的人，要是我对你讲出来，你不会相信的。因为我本人也不相信他是约瑟夫（显然这是指约瑟夫·斯大林）。相反，另一位，希特勒，要是你刮去他一点儿表皮，你就会在那儿发现尼采。这个希特勒是个 morros de con，他独自一人踢一脚就能让欧洲完蛋。而我，我才不在乎他们的欧洲呢。你明白吗？”

离开我之前，他给我看他的薄荷包，并狡黠地着眼睛补充了一句：

“敬礼。大胆行动吧！”

这时在思想领域巴塞罗那达到了极为混乱的境地，同它相比，巴别尔塔的混乱就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了。出现了各种派别，它们彼此分裂、冲突，一眨眼就转变了，每过一天普遍的仇恨便加重了一点儿。有三个共产主义党派，其中每一个都自认是唯一正统的；有三四个很少区别的托洛茨基主义派别；有一些不问政治的工会组织；有一些社会主义的工会组织；有好几个或多或少从属于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团体；有纯粹的斯大林主义者组织；有分离主义者组织；有左翼的共和主义者团体；如此等等。这种情况是左派方面的，因为右派方面也同样不和。大家都预感到不久西班牙将会发生某种惊人的事情，发生一场大洪水，大主教、三角钢琴、腐烂的驴子将倾泻而下。一位费格拉斯的农夫当着我的面找到了关于国家形势的确切定义：

“如果政治继续这么发展下去的话，那么我们终将陷入一潭无法拔脚的泥浆之中，哪怕耶稣基督本人正好降临人间，也会不明白这究竟是什么时光！”

我们一回到巴黎，就从贝克尔街七号搬到高盖街七号。我觉得这幢现代住宅是建筑家们发明来惩罚穷人的。而我们就是穷人！无法据有路易十五的五斗橱，我们为朝阳的大窗洞选择了一些镀铬的桌子，一些到处摆放的镜子。加拉具有一种天赋，能在她一到来后就使一切焕发出光彩。可这种近乎修道士般的朴素却唤起了我对豪华事物的爱好之情。我觉得自己就像是长在浴室里的一棵柏树。

我第一次体验到人们在巴黎等我，我的不在造成了一种真空。可怎么继续下去呢？我在巴塞罗那的两场演讲治愈了我残存的反常的极度羞怯的毛病。我现在明白了我能随心所欲地激起公众的热情和疯狂，我有种日益增长的欲望，想让自己感到在接触一个“新的肉体”，一个没受到战后污染的新国家。这就是美国！我想去那儿，带上我的计划，把我的面包放到这块大陆上。朱里安·列维刚刚给我寄来一些剪报，它们都是关于他才在纽约用我的软表和另一些借给他的画举办的一个小型展览会的。并没卖掉什么画，可这个展览会显示出一种理解，它远比欧洲批评家的理解客观，也远比他们熟悉情况。在巴黎，人人都进行判断，并且从他的美学偏好出发宣布一种唯一的观点。在欧洲，我仅仅被一些相互拉扯攻击的支持者包围着。在美国，这种内战还没有触及到人们。那在我们这里已经揭示出未来悲剧梗概的现象，在他们那里只是一种消遣。美国的立体主义，除了具有一种已经结束的经验意义之外，从没有什么重要性。远离斗争、不偏不倚、既没获得什么也没失掉什么、既无要捍卫的也无要攻击的，美国人能使自己保持着清醒的头脑，本能地看到那最令他们印象深刻的人，也就是说看到我。在欧洲，当人们认为美国不会有诗的直觉和理智的直觉时，人们就错了。要是他们没犯错误，这并非由于传统或趣味，而是由于一种返祖性的审慎。美国凭它尚未受损的生

物学的深刻的基本力量选择的，要比凭经验和心灵选择的好。它知道自身缺什么、它没有什么。而它在精神领域所缺少的那一切，我将用我偏执狂的作品带给它。

我开始形成的关于美国的观念，通过我跟纽约现代美术馆馆长艾尔弗雷德·巴尔的会见得到了证实。我在诺埃尔子爵府上的一次晚宴期间认识了他。他是个苍白的年轻人，脸色很不好。他那断断续续的动作很像觅食的鸟儿在一跳一跳。实际上，他寻觅着当代的各种价值并明智地区分出良莠。他对现代艺术的知识让我觉得难以置信。熟悉了永远无视毕加索的法国各博物馆馆长，我发觉他更出色。巴尔夫人预言我如果亲自去美国，我在那儿的未来是闪光的。我和加拉已经决定了这次旅行。唉！没钱怎么办呢？

这时，我遇到一位美国女人，她在艾尔门农维尔森林买下了太阳磨坊。列耐·克列维尔向她介绍了我们并把我们带到她家吃中饭，这是在她那套巴黎的住房里。这顿午餐，除了台布和盆碟是黑色的，一切全是白色的。要是拍张照片的话，负片就像是正片。我们吃的东西全是白色的。大家只喝奶。窗帘、电话、地毯都是白色的，女主人本人一身白色的穿戴。她马上就对我的秘密协会的想法发生了兴趣，我们决定建造一个能烤十五米面包的烤炉。艾尔门农维尔的面包师傅对“古怪的事物”很感兴趣，他将参与这个秘密。这位美国女人是那么白，要是人们给她拍照的话，她就会形成一个黑色的负片，她的名字叫卡列丝·克罗斯比。每个周末，我们都被请到太阳磨坊去。大家在布满虎皮和填着稻草的鸚鵡标本的马厩里用餐。在二层楼，有一个巨大的图书室。每个角落都有冰桶，里面放满了香槟酒。总有不少客人，这些人感到在这儿正“发生着什么事情”的上流社会人士和超现实主义者。一架唱机不停地放送着科尔·波特的《黑夜与白昼》。《城市和乡村》、《纽约人》的最初几期落到了我的手中。我痛快地吸收着显示给我的一阵阵印象。

“我要去美国，我要去美国……”这件事具有了顽念的形式。加拉劝慰我。

“一旦我们有点儿钱，我们马上就动身……”

可恰恰在这时，一切变得越发糟糕了。彼埃尔·柯尔通知我我们的合同结束了，他的经济状况不允许他重续合同。钱的忧虑加重了。会购买达利作品的收藏家已有了太多达利的作品，不能梦想再吸引他们购买什么了。正如我某些书的出版使我只剩下一小伙朋友一样，利加特港耗尽了我们能动用的资金。我发觉我经济上的各种可能性减退了。我并不屈服，变得愤怒起来，这是一种有所抑制但却不间断的愤怒。自从马拉加那时以来，我曾决心挣一大笔钱，可我还没能做到这一点。等着瞧吧！我大怒了，我不断地大怒！在街上，我扯下我大衣的钮扣，用牙咬碎它们，我跺着脚，仿佛打算沉入人行道的碎石路面里。

一天晚上，经过一天无效的奔走，我正回家之际，在爱德加·基内大道的附近，我看到一个失去双腿的盲人，他坐在一辆小车里，用手转动着橡胶车轮，带着种奇特的卖俏姿势行驶着。穿过街道那一瞬间，他停在人行道边不动了，拿出一根小小的探路棍使劲敲打路面求人帮忙。这个家伙的无礼和自信中有种让人反感的成分。他要求人们帮他穿过街道。人行道上空荡荡的，我是唯一的过路人。在很远的地方，只有一位盯着我的妓女。我走近这个盲人，朝他车子后部狠狠踢了一脚，用尽全身力气推它。车撞在对面的人行道上，这个机灵的瞎眼家伙本会朝前跌下去的，但他预感到这一打击，用双臂

紧夹住车子不放。他僵硬地保持着受到凌辱的尊严，像旁边的煤气路灯一样纹丝不动。轮到我穿过街道，走过去注视他的面孔。无疑他明白了我就是刚才推他的人，因为他马上改变了态度，不再是愤慨了，而是像他的身体条件要求他的那样，变得谦恭温顺起来。于是我懂了，要是我跟这个瞎子要钱，哪怕他小气也会给我的。

就是这样，我发现了要穿越大西洋该做的事。由于我本人既不长腿也不瞎眼，更非丧失权利地位的可怜人，我不用竹竿无礼地敲打路面，央求陌生人让我航行在这个把我与美国分开的海洋上。不，我没陷入卑劣的境地。恰恰相反，我放射着灿烂的光辉。人们不会来帮助一只老虎，哪怕它是饥饿的，这种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只有从这个瞎子手中夺过竹竿，在我四周敲打。我没瘫痪，我只需行动。

用我剩下的那一点点钱，我在去纽约的下班大型客轮尚普兰号上预定了两个座位。它三天后启航。必须弄到能使我们付清船舱费及在纽约至少维持两周生活所缺的款子。三天内，我配备着瞎子的象征性竹竿跑遍巴黎，这根竹竿在我手里变成了愤怒的魔杖，我无目的地乱敲着，达那厄的神话重现了。摇晃了三天命运女神的权杖后，她终于决定乐一乐，于是一阵金雨使我确切地预见到了出发。这之后，我感到那么疲乏，就像我连续六次做爱似的。我担心误了船，这使我在这艘穿越大西洋的客轮启航前三小时就来了。我死死盯着我的手表和我们的搬运工，我一直怕他背叛我们。加拉握住我的手，让我镇静下来。我知道我只有上了船才会安心。我到了船上，一些记者和摄影师围过来，请我下来到火车头旁拍几张照片。我非常担心船在我摆姿势时启航，不得不向记者提出一种荒谬的解释：

“火车头跟我并不相称。不是我太高了，就是它太小了。”

一旦上了尚普兰号，我担心误了美国之行的情绪并没完全消失，我们刚到公海，我就深深感到对海洋空间的真正恐惧。我一直注视着大陆的沿岸，我觉得船的呻吟和劈啪声更为可疑。我发觉这船太大了，太不好操纵了，难以逃避一场灾祸。每次警报演习时，我是旅客中最认真的人，比别人提早一刻钟扎好了救生带。更糟的是，我迫使加拉跟我一样关注这件事，这使她气恼，也使她笑得流出了眼泪。每次她回到舱中，就会看到我把救生圈带子绑在身上躺着读书。我将是一次海难的牺牲者，一想到这种情况我就浑身发抖，我用指责的目光看着那些公务人员，我觉得他们那么不当回事真有点儿不可思议。我经常喝香槟酒，给自己壮胆，驱除晕船，幸运的是，我并没晕船。

卡列丝·克罗斯比也在乘尚普兰号旅行。她为没能在艾尔门农维尔实现我们十五米长的面包的计划而懊悔，她跟船长谈起这件事，要求他为我们派人烤一个尽可能长的法式面包。安排了我们同船上的面包师联系，他答应给我们做一个内部用根木棍加固的二米五十的面包。第二天，在我的舱内，我收到了这个用玻璃纸包裹得很华丽的面包，我想这会让那些来采访的记者惊讶。船上所有的人都惊异地谈着这些没教养的不知趣的记者，他们嚼着口香糖，不停地向你提出一连串问题。每个人都声称找到躲避他们的办法，可这不过是虚伪罢了，因为所有的人都非常渴望受到记者的采访。我恰恰相反，不停地重复着：

“我很喜欢广告，要是我有幸让记者了解我是谁并向我提出各种问题，我就把我的面包给他们，就像圣芳济各跟鸟儿做的那样。”

这似乎很没意思，以致我的那些对话者不禁皱着眉头、撇着嘴把这种情

况告诉了我。可我仍固执地问每个人：

“为什么你相信我的面包会在记者身上产生最大的效果？”

我除掉包着面包的玻璃纸，用报纸包住我的面包，以便使当着摄影师和记者的面打开它时会更高兴……我们到达了纽约，在填写登陆所需的表格时，有人通知我和记者们在我的客舱里等我。我遇到狄奥根尼遇到过的那种令人困惑的事，他从酒桶里裸体走出来，大白天拿着点燃的蜡烛，没有谁问他要寻找什么。说到我，没有一位记者跟我提任何一点儿有关我面包的问题，我一会儿把这个面包挟在手臂里，一会儿把它像根大棍子似地立起来。相反，他们似乎十分了解我的个性、我的作品和我私生活的细节。

“您刚画了一幅您夫人的肖像，有两条烤熟的排骨在她肩上摇晃，”其中一位说，“这确实吗？”

“这是事实，不过那些排骨不是烤熟的，它们是生的。”

“为什么？”

“因为加拉也是生的。”

“那么为什么要把排骨和您夫人放在一起呢？”

“我喜欢排骨，我也喜欢我的妻子，我没什么理由不把排骨和妻子画在一起。”

这些记者确实胜过他们的欧洲同行。他们对“荒谬的事物”抱着一种冷静而又强烈的兴趣，并且非常熟悉他们的职业，完全明白什么能给他们提供“故事”。他们对耸人听闻事物的敏锐嗅觉立刻把他们引导到每个问题的核心，以便从中抽出将成为几百万饥饿的读者精神食粮的东西。在欧洲，记者揣着已写好的文章去采访。他只是去那儿证实他所想的或他的报纸所想的，而把分辨他说的是真还是假的工作留给了读者。欧洲具有“历史感”，但没有新闻意识。

我们到达美国的那天，记者们经过清晨的狩猎，带着他们胜利地抛向天空的一对排骨和令人满意的猎物回去了。当晚，大家吃着生排骨；我知道至今在远离纽约的地区人们还在继续啃着我的骨头……

我走上尚普兰号的甲板，一眼就看见了纽约，它呈现着灰绿和脏乎乎的白颜色，就像一个巨大的哥特式羊乳干酪。由于我喜欢羊乳干酪，我欢呼道：

“纽约在向我致敬！”

接下来，轮到我向它那真正宇宙般的宏伟气势致敬了。纽约，你是一个埃及！不过你像一个颠倒的埃及，因为法老们树起了死亡的奴隶制的金字塔，而你树起了战胜它的民主制的金字塔！

第二天早晨六点左右，在圣莫里兹旅馆第八层楼里，我经历过一场涉及情欲和狮子的长长的梦之后醒来了，眼睛虽然完全睁开，可我还惊奇地听到在睡眠中追逐我的狮子的吼叫声。我觉得这些吼叫声同野鸭的叫声和另一些难以分辨的动物叫声混合在一起。除了这种情况外，差不多就是一派彻底的静寂了。我曾预想会是一个充满可怕的嘈杂声响的城市，而现在我在这儿却发现了一种狮吼都难以穿透的静寂。给我端来早点的楼层侍者是个加拿大人，法语讲得好极了。他向我证明我的确听到了狮吼。因为我们位于中央公园动物园的上方。事实上，我从窗子里看到了那些笼子，甚至还看到了在水池中嬉戏的海豹。

我一天的各种体验，恰好系统地驳斥了纽约是个“机械的现代化城市”的陈词滥调，这是欧洲先锋派美学家们希望当作反艺术的纯洁范例强加给我

们的。不，纽约不是一座现代化的城市，或者说至少它不再是这样的一座城市。纽约不喜欢现代主义。

由公园路的一所房子（它的立面就开始强烈地显示着反现代主义的精神）起，我开始了一系列的午后鸡尾酒会。这幢楼是新的，一队配备着黑烟枪的工人把过于白的墙壁涂成能显得年代久远的色彩效果，使它们具有那种特殊的巴黎色调；而就在这时，欧洲的建筑家们、勒·柯布西埃和其他一些人则在发现浮华的新材料方面碰破了头，为了模仿所谓的纽约光彩，他们没把这些材料弄黑。刚一进入电梯，我就注意到这一惊人的情况：并没用电照明，只有一只粗大的蜡烛作为全部的照明设备。在楼梯间深处，挂着一幅相当熟练的埃尔·格列柯的复制品，四周用西班牙红天鹅绒边饰装潢着。我觉得这种天鹅绒是真的，可能是十六世纪的。而这并非一切。这个套间也没让我失望，在这儿可以看到哥特式的东西、西班牙文艺复兴的东西、一幅达利的作品、两架管风琴……

整个下午，我用来参观一系列连续不断的其他套间和旅馆的房间。我们从一处鸡尾酒会到另一处鸡尾酒会。有时，好几个鸡尾酒会在同一大楼里举行，这造成了一些动人的混乱，我不通英语的情况更加重了这些混乱。我从中得到这样一种总印象：纽约是座无电的城市，人们只用蜡烛来照明。在用电灯照明的场合，处处都用路易十六式灯罩，羊皮纸手稿或贝多芬乐谱来抑制电灯的光线。

晚上，我参观了一座疯狂的电影殿堂。它装饰着从《萨莫色雷斯的胜利女神》到卡尔波的小雕像等最不同的青铜艺术品，装饰着从讲述小故事的绘画到用令人惊异的镀金线脚框住的油画。一股泉水从一群最恶俗的白鹭中涌出来。另外还有一些管风琴、一些管风琴、到处是一些管风琴……

睡觉前，我由一位戴着大礼帽的非常讲究礼节的公会会教徒陪同着，在圣莫里兹的酒吧里喝了最后一杯威士忌。我碰到他时，他正在哈莱姆区的肮脏夜总会里偷偷地花天酒地。他再不愿离开我，讲着法语，让我猜他想向我吐露的一个秘密。加拉也预感到这一点，因为她天真地跟他说：

“我确信你生活在一种同超现实主义者相近的精神状态中。”

这个人轻松了起来，向我们讲了他是个完全独创的通灵论派系的公会会教徒。他的每个朋友都不了解这个秘密，但由于我是个超现实主义者，他打算向我泄露这个秘密，因为他明白我会理解的。多亏了最近的一种发明，这个派系的成员与死人讲了话。这种谈话只能在死亡后的四个月内进行，在这段时间内，死者的灵魂留在死亡的地点。加拉问了一些更精确的情况。这位通灵论的公会会教徒等的就是这个，以便能进一步说明：

“我借助一个橡胶吸盘，把一个小的铜号固定在墙上。就是这样，从我父亲死后两个月来，我每夜在睡前跟他讲话。”

我让他明白同死者谈话的时间临近了，我们该分手了……

在纽约的第二夜，我在睡前通过想象重睹了与美国初次相会的各种细节。不，一千次不，纽约的诗意并不存在于他们曾想使我们理解的那种事物中，尤其是不存在于洛克菲勒中心的严格直线建筑中。不，纽约的诗意是古老而又激烈的，就像世界的诗意，就像永远不变的那种诗意……

连续许多个早晨，我臂下挟着面包独自一人到纽约街头散步。有一次我走进五十七街的食品杂货店，要了份荷包蛋，面对着大家的惊愕，我从我那个大面包上切下一小块，就着荷包蛋吃下去。一些人迅速围住我，向我提出

各种截然不同的问题，可我却并不能理解这些问题。我耸耸肩，羞怯地微笑着，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我的面包渐渐变干变小了。到该摆脱它的时候了。可在哪儿摆脱它？一天上午，我走到瓦尔多夫—阿斯托里亚旅馆门前时，它裂成了两块，钟敲了十二下，这是幻想的时刻，我决定去塞尔特屋吃午饭。我打算穿过街道之际，滑倒在地上，两块面包落在老远的车行道上。一名警察跑来扶起我。我转过来去看那块面包在哪儿。它们已经不见了！一丝痕迹都没留下，它们的隐没对我一直是个谜。既不是警察、也不是行人把它们拿走了。我十分不安地感到这涉及了一种发狂的主观现象，面包就在我眼皮底下的某个地方，而我却由于一些感情因素没能看到它，这些感情因素此后我必然会确定的。

这次意外事件是一个发现的出发点，我答应到巴黎索邦大学用“无形的面包”这一能引起联想的标题来揭示这个发现。在这个报告中，我介绍并解释了那些突然看不见某些东西的现象，某种据其遗忘症性质难于发现的消极幻觉。人看不见他所注意的一切，这并非一种平平常常的疏忽现象，而是一种幻觉现象。随意诱发它的能力显然会使有形的实在变得看不见了，并使偏执狂的魔法具有了它最有效的一种武器。所有发现就这样得到了一个不由自主的出发点。哥伦布在寻找相反的地点时发现了美洲，炼金术士们在研究点金石时发明了合金，而我则在寻求论证面包的顽念时刚发觉看不见它了。我无法用一种满意的方式在我的“无形的男子”的肖像中解决的，正是这同一个看不见的难题。人所不能做到的事，面包却能做到！

我在朱里安·列维处举办的展览是次巨大的成功。大部分画找到了买主，新闻界，尽管好斗，同样承认了我画家想象力的天赋。我必须乘清晨两点离港的诺曼底号重返欧洲。动身的前一天，卡列丝·克罗斯比和她的几位美国朋友，为了向我表示敬意，下午在红公鸡组织了一场“如梦的”舞会。这次庆典在美国很出名，它接着在外地不同的城市里引发了一系列类似的庆典。主题是“一个超现实主义的梦”的这场舞会，使一些美国人头脑中萌发出的疯狂奇想得到了宣泄。我本人在这个领域内几乎不会感到惊异了，可那晚在红公鸡举办的舞会上显示出的粗野和疯狂也让我感到吃惊。一些社交界的妇女头上套着鸟笼，身体的其余部分完全裸露着出现了。另一些妇女装扮出吓人的毁容和伤疤，把一些保险别针插在皮肤上，厚颜无耻地剥去了她们的美。一位苍白瘦长的、颇为风趣的妇女，在她的缎子连衣裙中央佩戴着一个“活的”嘴巴。一些眼睛长在面颊上、后背上、腋窝下，就像可怕的肿瘤。一位男子，穿着带血迹的长睡衣，头上平稳地顶着一个床头柜。他打开床头柜门时，一群蜂鸟飞了出来。在楼梯中央，以不稳定的均衡方式放置了一只装满水的浴缸，水随时都可能溢出来，令来宾们担心。晚会期间，有人把一头巨大的剥皮公牛拿进客厅，一些拐支撑着它被剖开的肚子，里面塞满了十来台留声机。加拉扮成“美丽的死尸”出现了。她头上放了个如实模仿婴儿的玩偶，一些蚂蚁吞食着它的肚子，一只闪着磷光的螯虾紧夹着它的脑子。

第二天，我们天真地动身去欧洲，我说天真地，这是因为我们一到巴黎，我就了解到“如梦的”舞会引起了纷纷议论。事实上，当时劫持林白家孩子的人和《小巴黎人》的记者正受到传讯，德鲁西·德·萨尔斯先生，在他每日的乏味报道后，觉得拍发画家萨尔瓦多·达利妻子头上平稳地顶着林白婴儿带血的形象参加舞会的消息是最妙的办法。他描述了纽约这场闻所未闻的事件，除了他并没有别人目睹过这一事件。作为回报，这一新闻在巴黎传遍

了各界，造成一种真正的惊愕。我不再能自己做主了。从此，超现实主义将越来越混为一体，很快就仅仅成为我一个人了。此外，团体也解体了，整整有一个乱党追随着路易·阿拉贡的口号，这位神经质的小罗伯斯庇尔，盲目地朝着共产主义演变。我提议制造一个由摆满一杯杯热奶的摇椅组成的思想机器的那天，危机爆发了。阿拉贡愤怒地说：

“结束掉达利那些怪念头吧！热牛奶应当给失业者的孩子。”

布列东，了解到共产主义派系显示出来的这种令头脑糊涂的危险性，决定把阿拉贡及其支持者驱逐出去，这些支持者包括布努埃尔、于尼克、萨杜尔等人。列耐·克列维尔是唯一真诚的共产主义者。他在其智力平庸的行程中，不打算追随阿拉贡。然而他也跟我们的团体保持着距离。不久之后，由于无法解决战后意识形态的那些难题的戏剧性矛盾，他自杀了。克列维尔是自杀的第三位超现实主义者的，从而证实了这一运动在它开始时提出的诘问：“自杀是种解决的办法吗？”我回答不是，我非理性活动的延续决定着这个不是。另一些人沉浸在咖啡馆露天座的长篇大论中，慢慢地自杀了。就个人而言，我对政治从不感兴趣。我发现它是轶事的、可悲的，甚至是危险的。相反，我研究宗教史，特别是研究我日渐感到是“完美建筑”的天主教。巴黎、利加特港、纽约、巴黎、利加特港，我在不断的旅行中远离了团体。我在巴黎的那些次出现，使我有机会无数次出入社交界。非常富有的人总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同样利加特港的穷人也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只有不富不穷的人没引起我什么反应。那时，在超现实主义者的周围聚集着一些小资产阶级、一伙难于适应洗澡的气味相投的家伙，我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他们。每月我去看布列东三次，每月我跟毕加索和艾吕雅见一次，但从不同他们的弟子会面。可我每天早晚都能看到上流社会的人士。大部分上流社会的人士都没显示出聪明才智。然而他们的妻子都佩戴着跟我的心一样坚硬的首饰，身上洒着大量的香水，欣赏着我所讨厌的音乐。我一直是名天真而又狡黠的卡塔卢尼亚的农夫，一位国王栖息在这个农夫的身体里。我是自命不凡的，无法摆脱明信片上撩人的形象，它表现一位挂满了一大堆首饰、戴一顶华丽帽子的裸体女人，正拜倒在我肮脏的脚下。这就是我内心里深深向往的事啊！

我又犯了一次优雅病，它跟马德里那次很相似。我觉得优雅是一个精致时代的有形象征，是宗教童子军的军号声。实际上，没什么能比时装更富悲剧性、更虚妄的了。正如1914年的战争由莎耐尔小姐象征一样，艾尔莎·夏帕列里的服装店宣告了未来的战争，这场战争将清除红色或白色的社会主义革命。我又一次是那么正确！几年后，以夏帕列里时装和达利作为掩护，穿着厚颜无耻地模仿的衬衫，沾着沙粒的头发上缀满

刚在法国扯下的树叶，德国军队进入了比亚里兹。夏帕列里店铺的灵魂是贝蒂娜·贝格利，她很像螳螂，她也明白这一点。她也是巴黎最好幻想的女人，她是前驻莫斯科和安卡拉大使加斯东·贝格利的配偶，加斯东·贝格利是位绝无仅有的人，他继承了北欧人的蓝眼睛和一种司汤达式的智慧。贝蒂娜与莎耐尔小姐和鲁西·塞尔特（穆第瓦尼公主的亲生女）一起，尽管有死亡有分离，一直是我最好的朋友……

伦敦带给我一种拉斐尔前派精神的光彩，我无疑是唯一能辨别和品味这种情况的人。彼得·沃森最爱好建筑和家具。他买下了最让人想到罗赛蒂作品的每一件毕加索的作品，而毕加索本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极为富有的爱德华·詹姆斯理所当然地买了一些达利的作品。贝纳斯爵士像潜水员那样用幽

默的盔甲保护自己，他毫无表情地出席波利尼亚克公主在她那由霍塞—玛利亚·塞尔特装饰的大客厅里举办的高质量音乐会。在塞尔特第一位妻子米西娅·塞尔特的家里，烧煮着巴黎最有营养的闲话。在玛丽—露易莎·布斯凯特的家中，每星期四晚上，在一间宁静的灰色沙龙里，人们品尝着另一些闲话、文学的和社交界的闲话，我有时在这儿见到沃拉尔，甚至还有保尔·波瓦列特。在春天，波利尼亚克伯爵夫人家里，天气非常美妙，人们在花园中听到客厅里在演奏一首弦乐四重奏曲。客厅里，蜡烛照亮着那些雷诺阿的作品和一幅具有不吉利的食粪性的芳丹—拉图尔的无比的色粉笔画。各种小蛋糕、糖果、甜食陪伴着一切。在诺埃尔子爵夫人家里，情况则与此相反，这儿是文学和绘画的对位、黑格尔的传统、巴伐利亚的路易二世、居斯塔夫·多雷、罗伯斯庇尔、萨特和达利。我们在这儿如鱼得水，但比在别处更庄重。

还有雷金纳德·费洛斯夫人家的舞会和晚宴。人们在这儿没看到她穿柯克多为她设计的连衣裙、没听到格特鲁德·斯坦因讲话，真感到双重的沮丧。

福西涅—路辛日亲王和亲王夫人具有最无可争辩的“态度”，这种态度几乎跟那西班牙风度、那“外貌”同样强烈。在亲王夫人身上，这种态度是奥布里·比尔兹利异国情调的优雅形象有点儿变质的残渣。她总穿着一种我不了解的会残暴压迫时装的过时服装。正如她的过时仿佛属于新闻一样。她是具有最确切的巴黎式优雅感的女人。

波蒙伯爵和伯爵夫人保管着整个这一世界戏剧的钥匙。进入他们家中，就是进入剧院。看到桂在管风琴银光闪闪管子上的一幅毕加索灰色时期（原文如此——译者）的作品，就足以了解到这一点了。艾蒂安·德·波蒙像戏剧的主角那样讲话，穿着极为昂贵的麂皮鞋。每一舞蹈编排的策划、加基列夫的策划和其他俄国芭蕾舞的策划，都诞生在他那树上挂着一些假花的花园里。人们能不受损害地在他们家见到玛丽·罗兰珊、德·拉·罗克上校、列奥尼德·马西纳、谢尔盖·里法尔（他疲惫死了，就像是尸体一样）、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西班牙大使和超现实主义。巴黎的“上流社会”变成了各类人大混杂的场所，它预示着1940年的战败。受到大众欢迎的、失败主义的、粘糊糊的费尔南代尔的牙床，以一种迷人的方式同身穿最精美的勒隆长裙的娜塔丽·帕莱公主高贵的、幽灵般的苍白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亨利·伯恩斯坦在这种卡萨诺瓦式的风流夜总会的昏暗光线下，面对着一盘意大利面条，以富于预言性的闲话，讲出一种犬儒主义的和感伤的结局。贝贝·贝拉尔的胡子，继我特有的胡须之后，是巴黎最聪明的画家的胡子。他到处游荡，胡子上沾染着鸦片，身上有种混合了勒南味的罗马末期的颓废气息。在这个仍装点着对路易十五各种回忆的巴黎（以阿尔图罗·洛佩斯家族的一对阿兹台克人和巴西人的夫妇为代表），一切都为拉斯普廷作风、贝贝—花花公子派头、加拉—达利方式做好了准备。除了他那些稀有的卓越绘画之外，贝拉尔身上有三种我觉得是美妙动人的情况：他的肮脏、他的目光和他的聪明。鲍利斯·柯沙诺怀着愤怒和坚定的态度，刮掉了他的哥萨克式胡须。他“照亮了”俄国的芭蕾舞，他道过歉，迅速地吃着，在餐后点心端来前就匆匆走掉了，无疑他将到别的地方吃餐后点心。他满脸通红时，面孔就变成鲜红色，同他雪白的礼服衬衫形成强烈的对比，他好像是一面法国国旗。霍塞—玛利亚·塞尔特具有十分鲜明的耶稣会式的西班牙人的智慧。他让人在距利加特港三小时路程的地方建造了一幢住宅。勒—马—容格无疑是欧洲最贫穷也最奢华的地方。我和加拉，我们去那里呆了几周。夏末，巴黎的整个团体都跑

到那里，我们在那儿度过了一些日子，它们不过是对这无法模仿的辉煌战后岁月的一种怀旧式回忆。

这种受到萨尔达那舞蹈音乐和布拉瓦海岸的各种海上景观摇晃的狂喜生活，不幸被发生在帕拉莫斯到费格拉斯的公路上的一场车祸打断了。阿历克斯·穆第瓦尼王子和蒂桑男爵夫人因此而丧生。阿历克斯的妹妹鲁西，受到悲伤的折磨，四年后也去世了。要衡量我多么喜爱她，只需说她跟收藏在海牙博物馆中的那幅维米尔的少女肖像如同两颗珍珠一般相似就足够愿人们不要急于太肤浅地判断战后的这个绝望而又浪漫的欧洲的主角们。在重审那些动不动就自杀的诗人 and 上流社会的妇女之前，要先过掉一个世纪。我们中间很少有人会在大灾难后活下来，而我们热爱的这个大陆将沉没在既无纪念也无光荣的当代历史的废墟中。

第十二章

牙齿间的光荣——大腿间的苦闷—— 加拉发现并鼓舞我灵魂的古典主义

我第二次美国之行，是所谓的“光荣”正式开始了的一次旅行。在开幕式当天，我的所有的画全买掉了。《时代周刊》在封面上登了曼·雷为我拍的一张照片，并加上了如下的标题：超现实主义萨尔瓦多·达利——一棵柏树、一位大主教、一片从窗口飘出的轻如羽毛的云彩。在不少场合，都有人告诉我这份杂志的出版，可在我收到它时，我非常失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份发行量很少的杂志。只有到了后来，我才了解到这份杂志的惊人影响，全美国都在读它。我一下子成为众所周知的人物。人们在街头拦住我要求签名。从美国最偏远的角落给我寄来不少信件，各种荒谬的提议像雨点般向我扑来。

作为一种示范，我同意在邦威特—泰尔商店的玻璃橱窗搞一个超现实主义的阵列，所有别的商店随后也采用了超现实主义的样式。我在那里布置了一个人体模型，头是用红玫瑰做成的，指甲是用鼬毛做成的；在一只桌子上，我摆了一部螯虾形的电话；在一把椅子上放置着我著名的刺激性欲的无尾常礼服，我在常礼服上又摆了八十八只小玻璃酒杯，里面灌满了绿薄荷酒，杯中插着鸡尾酒的吸管。这件上装刚在伦敦的超现实主义展览会上获得巨大的成功，在那儿，我藏在潜水服里发表了一篇伟大的演说。贝纳斯爵士负责租借这件服装，有人打电话问他达利先生打算潜到多深的地方。贝纳斯爵士以同样严肃的态度回答：

“潜到无意识的深度，随后他马上就上来。”

“先生，很好，”出租人继续说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给他放上一个特殊的潜水帽。”

我穿上潜水服，一名专家来把潜水帽牢牢地封好。铅靴显得很沉重，我几乎抬不起脚来。两个朋友帮忙把我硬拖到讲台上，我穿着这套怪异的服装出现在那儿，手中紧紧牵着两只白色的猎兔狗。伦敦的公众肯定特别恐慌，因为全场一片静默。有人成功地让我坐在麦克风前，因为我终于了解到我无法在潜水服的玻璃后面讲话。此外，我这时感到要因窒息而昏倒了，我不得不匆匆招呼我的朋友卸下潜水帽。不幸，那位专业工人刚悄悄地走掉了，无人知道怎么动手。有人试图撕开服装，于是用一把锤子敲打起螺栓来。每一敲打，都让我相信自己要死了。公众听说这涉及到一场各个细节早已规定好了的哑剧，突然热烈地鼓起掌来。但在我露出头来，像垂死的人一样面色惨白地出现之际，我每一行动都缺不了的这富于戏剧性的一面令大家激动不已。这次不由自主地成功和我在伦敦展览会（52）上更自觉的成功，表明了对我来说一切将会更好，这些成功本应使我兴奋，但并不是这样，而是我成了一种无法形容的消沉的牺牲者。我想尽快回到西班牙去。一种难以克服的疲倦压在了我那总保持警惕的歇斯底里之上。我受够了人们从窗户外丢出来的柏树、大主教、软钢琴、螯虾电话、潜水服，受够了广告和鸡尾酒会。我想马上重见利加特港，在那儿我最终能做些“意义重大的事情”。

我们在十二月的一个黄昏到达了利加特港。我从没有如此深地了解这处风景的闻所未闻的美。在这次已开始的居留期内，我打算好好地领略每一秒钟，可是一种沉重的苦闷敲击着我的太阳神经丛。第一夜，我无法入睡。第

二天，我沿着海边漫步。在伦敦、纽约、巴黎度过的最近几个月的辉煌生涯，在我看来是那么遥远、那么不真实了。我无法确定令我心情沉重的东西的性质，也无法确定那些理由。发生了什么事？你已有了六年来所渴望的东西。你来到了你的利加特港，此处你在世界上最偏爱的地方。你不再可耻地操心金钱了。你能开始把时间花在你那些最伟大的作品上了，那些你从心底里想着手进行的作品。你身体非常健康。你可以自由地在人们向你提供的各种戏剧或电影的制作计划中进行选择……要是加拉还没因那使你额头出现皱纹的事情而心绪不宁，那她就会是幸福的。

我为了对抗这毁了我的各种幻象的苦闷，突然开始愤怒地倾诉起来。一点儿用也没有。就连那些最令人放心的论证也没用。如果这种情况这样继续下去的话，我就只有哭泣了……

加拉多次劝我用冷水浴镇定我的神经。我脱掉衣服，投入被冬天催眠的海滩那透明冰冷的水中。裸露着身体站在像夏天一样灼热的阳光下，我感到苦闷继续在我的肉体里升起……加拉喊我去吃午饭，我打着哆嗦本能地把一只手放在胸口上，把另一只手放在生殖器上，从我的生殖器上散发出一股好闻的味道，我觉得这是我本人死亡的味道。顷刻之间，我感到我命运的全部重量和它那已腐烂的肮脏断手都压在我大腿间了。在回家的路上，我向加拉解释了一切。

“我一无所有。我知道我的光荣就在那儿，像奥林匹斯山的无花果一样成熟。我只有咬紧牙齿，嚼着品味它。我毫无理由这么苦闷。然而这种苦闷却越来越浓重了，我不知道它来自何方，也不知道它会走向何方。不过它强烈得让我害怕。这就是我所有的：我毫无可害怕的，而我怕害怕，怕会害怕这件事就令我害怕！”

从远处，我瞥到了身强体壮的丽第娅的身影，她穿着黑衣服，坐在我们家的门槛上。一看到我们，她就站了起来，哭着朝我们迎来。跟儿子们共同生活变得令人无法忍受了。他们不再捕鱼，不停为他们的镭矿争吵。他们不伤心时，就在可怕的发作中殴打她。她遍体是伤。一周后，人们不得不把这两个儿子关进赫罗纳的疯人院。丽第娅到我们家里哭了整整一个下午。拉蒙·德·海尔莫撒又来看我们。可我发觉他身上爬满了太多的虱子，我终于只好禁止他走近住宅了。丽第虹每晚把我们的剩饭带给他。我们的女仆开始在厨房里一个人自言自语。一天早上，她裸露着上半身，戴了一个纸帽子，爬到屋顶上。她疯了，我们被迫找人接替她。我怕害怕的心情变得明显起来：我担心发疯和死掉。在疯人院中，丽第娅的一个儿子死于营养不良。我几乎马上担心起不能吞食了。一天晚上，我真落到了这种地步！我不能吞咽了。我再也睡不着觉，苦闷得衰弱起来。白天，我无力地跑出去，躲在那些等待地中海沿岸北风停息的渔夫中，他们不幸的故事让我摆脱了一点困扰我的那些念头。我向他们打听害怕不害怕死，他们并不害怕。

“我们，”他们说，“我们已死了一大半了。”

一位渔夫从脚下切去一大层老茧，另一位蹭着化脓的手上的痂盖。加拉给我拿来一些美国杂志，我读到了优雅的女人擦上达利的胭脂，格布尔特拉的土邦主的妻子刚出现在花园聚会中，戴着一颗有如流动在天然蔷薇花上的大水珠的钻石。年纪最大的渔夫瓦尔托萨放了个没完没了的屁，开始说：

“我再不想吃章鱼了。我妻子有种该死的怪癖，喜欢在章鱼里放许多油，这让我反胃。”

“不是这么回事，”另一位说，“这是由于你前天吃的蚕豆。蚕豆会使你在两天后放屁的！”

我让人拿来一些香槟酒，我们在海滩上，边吃海胆边喝香槟酒。风还要整整再刮三天。

“加拉，到这儿来，把坐垫挪到我旁边，握住我的手。我相信我要睡着了。我不那么苦闷了。在这个时候，这里的天气很好。”

听着那持续下去的模模糊糊的轻声谈话，闻着这些具有荷马式灵魂的渔夫的浓烈气味，我终于睡着了。我醒来时，他们已离开了。风似乎也停息了。加拉关心着我的睡眠，担忧着我的复活。像一个蛹，我被想象的一层层丝裹住了。应当撕破它们，让已变化成的、活生生的、真实的我精神偏执狂的蝴蝶飞出来。没有加拉，我的各种“牢监”、这些我变形的条件，就会威胁我，要成为我本人的棺材。

“起来，前进吧，”她命令道，“你还没获得任何成功。等待就是死亡！”

只要我不能把超现实主义与传统结合在一起，作为超现实主义者的我的光荣就毫无价值。我的想象应当转向古典主义。这是一桩有待完成的工作，而我的余生不足以完成它。加拉说服我相信自己能完成它。不要在我微小的成功中停滞不前，我应当为那些意义重大的事情去奋斗，第一件事就是要把我生活的体验古典化，赋予它一种形式、一种大体演化论、一种综合、一种永恒的建筑。

第十三章 变形——死亡——复活

叮咚，叮咚……

怎么回事？

这是历史的大钟在敲响。

加拉，这口大钟在说什么？

一些“主义”响过一刻钟后，就要敲响一些个体的时刻了。萨尔瓦多，那是你的时刻。

战后的欧洲使自己垮于各种缺少政治的、美学的、道德的严密性的“主义”和它们的无政府状态。欧洲垮于缺乏综合和信仰的怀疑主义、武断、软弱、不定型。由于它已咬了专门化的禁果，它相信了解一切并信任那属于“集体的”一切无名的懒惰。我们所吃的就是我们的粪便。欧洲已吃了一些“主义”和一些革命。它的粪便有战争的色彩和死亡的气味。它忘记了幸福是个人和主观的东西，忘记了它可怜的文明在废除各种限制的借口下已成了它自由本身的奴隶。卡尔·马克思写下了：“宗教是人民的鸦片。”但是历史将很快证明唯物主义是最浓缩的仇恨的毒药，人民终将会因为它而在现代生活的纠缠人的、气味难闻的、肮脏不堪的地铁中窒息死亡。

加拉促使我对到意大利旅行发生了兴趣。我每天都觉得有着帕拉第奥和布拉曼特的文艺复兴建筑是人类精神在美学领域内所获得的最完美和最出乎意料成果。我想看看和摸摸这智慧的具体体现。加拉同样让人动手在我们的利加特港住宅上建造个三层，这样就在这儿有了另一种手段，它使我能对外界感兴趣，使我能排解苦闷，使我能恢复自信。

“不可能像古人那样重新学习。”我说，“技巧的所有痕迹都消失了。我甚至再没有时间学习像以前的人那么描绘。我从没达到某个勃克林的技巧。”

可坚持不懈的加拉，用无数充满灵感和热情的坚信论断，向我证明了我能变成另一个人，一个与现在我这个“最杰出的超现实主义”不同的人。我们把时间精力全花在欣赏拉斐尔作品的复制品上。在他那儿一切都恢复了正常，而且是在一种极为完整的综合程度上，我们同时代人都没注意到这种情况。战后的分析性近视分解了整个“古典的作品”，在牺牲掉其他因素的情况下，把每个分析出来的因素当成了自身的目的。

战争把人变成了兽。他们的感觉衰竭了。人们只看到那放大的和失常的东西。炸药发明之后，人们就不注意那没爆炸的一切了。人们本来尽可以在拉斐尔、彼鲁基诺、彼埃罗·德拉·佛兰切斯卡面前睁开眼睛，而他们却只通过契里柯的那些图解性小册子了解透视的形而上的忧郁。愿人们能想到德尔夫特的维米尔已经不同他超级的视觉清晰性在一起了！这种超级的视觉清晰性以其客观的诗意和独创胜过了所有诗人加在一起的充满隐喻的浩大辛劳。一件古典的作品运用一切也包含一切，它是各种价值的等级化总和。古典主义意味着整合、综合、天体演化论，而不是分散、实验、怀疑主义。它眼新古典主义和新托马斯主义的不断“回归传统”无关（人们看到这种情况一点一点地从瓦砾堆中、从对各种“主义”的反感中涌现出来），恰恰相反，它是对我“征服非理性”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是对加拉使我恢复的信仰的经验的强有力肯定。

这些想法必然成为我应邀在巴塞罗那发表的一次演讲的内容。离开利加特港之前，我们跟给我们住宅加顶的屋面工和泥瓦匠一起喝了杯酒。他们正在争论政治问题。

“在那些有趣的事情中，”一位说，“在那些我认为有趣的事情中，无可怀疑，最有趣的就是无政府主义，也就是极端自由主义的共产主义。它确实是种很有趣的想法，可实际上是无法实现的。我也会满足于一种按照我的趣味略加修正的相当自由的社会主义。”

“而我，”另一位说，“只有一种事情让我喜欢，这就是完整的不受约束的爱。一切的恶都来自人们无法尽情做爱。”

“至于我，”第三位说，“唯一令我喜爱的事物就是不问政治的工团主义，为了它，我在什么事情面前都不会后退，就连推翻有轨电车也不会让我后退，这是我已有过一些实践的事情。”

“既非工团主义，也非社会主义，”第四位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共产主义和斯大林式的解决办法。”

“当然，我赞成共产主义，”第五位答道，“不过还应当明白除了我这种真正的共产主义之外，还有五种不同的共产主义。无论如何，斯大林分子已证明了他们屠杀自由人，同法西斯分子一模一样。”

托洛茨基主义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了，不过不如内战期间那么尖锐了。对这些人具有意义的，首先是闹革命。什么还没说的泥瓦匠工头做了结论：

“你们愿意我向你们讲这一切会如何结束吗？这将由一位军事独裁者来结束，他将使我们大家缩成一团，让我再也没有喘息的机会……”

我们一到巴塞罗那，就了解到形势要变糟了。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联合会的炮弹几乎到处爆炸。午后宣布了总罢工，城市显出了极其阴森不祥的样子。曾把现代艺术介绍到巴塞罗那的老画商达尔茅，在那天组织了我们的演讲会，钟敲五点时，他叩着我们在卡门街租的房子的门。

“请进！”我喊道。

我从忘不掉达尔茅突然出现时的样子，他的白胡子乱糟糟的，头发竖了起来，呼吸急促。显然，他有急事要告诉我们，可他却一动不动呆立在门前，他裤子的开裆大敞着，他在那里面放了一份我请他带给我的杂志。我在封面上能看到“超现实主义革命”这几个字，稍微歇息了一会儿（这一暂息使他能欣赏到他没扣扣子的出现造成的惊异效果），他通知我们：

“你们得赶快溜走，巴塞罗那就要下雹子了。”

我们把下午余下的时间用来找一位肯开车把我们送到边界的汽车司机，再就是为弄份通行证进行一些必要的活动。街道上，民众拿着武器，一群又一群闹事者跟假装没看到他们的骑在马路上的阴沉的国民卫队交错而过。在内务部，我为了通行证不得不足等了两小时，不时人们停止打字，在窗口安置机关枪。妇女们用卡塔卢尼亚的旗帜缝制着担架布。传来了孔帕尼斯将宣布卡塔卢尼亚共和国成立的消息。

每时每刻都有可能遭到雹子的猛烈袭击，尤其是如果军队首先采取行动的话。我在等待证件之际，认出了办公室里的两位卡塔卢尼亚分离主义的领袖巴狄亚兄弟。他们两人一顿一顿的悲剧性动作和预示着死亡的苍白肤色，使他们跟布斯特·基顿相似得很。事实上，几天后无政府主义者就杀死了他们。

我的通行证到手了。我又见到了达尔茅，他花了极大一笔钱，好不容易

才替我们找到一位司机和一辆汽车。我、加拉、达尔茅、无政府主义司机，我们都被迫呆在一个小便处，来确定旅行的费用。

“我预先考虑了一切，”这个男人从口袋里抽出一面卡塔卢尼亚小旗，对我们说，“这面旗去时用。”

接着他又从另一个口袋里拿出一面小小的西班牙国旗，补充道：

“这个回来时用，因为正规军肯定会把革命镇压下去。再者这个问题也与我们无关，我们是无政府主义者。这不过是西班牙和卡塔卢尼亚之间的算帐罢了。我们的时刻还没到来。你们听到的这些炮弹声是我们的，但我们爆炸它们只是为了练练手艺。在那有尸体的地方，我们定要为了我们的名声给它添加一些尸体。仅此而已。伟大的重磅炸弹的日子还没到来呢（56）……”

我们出发了。平时只用四小时的旅程，由于经常碰到一群一群要我们出示安全通行证的武装人员的拦截，我们花了三倍的时间才走完。大多数闹事者处在一种危险的狂热状态中，我们之所以能继续我们的行程，这主要得归功于这位无政府主义司机的能言善辩。中途，我们停车在海边的一个小村庄加油。人们在这儿的一个大“盎沃拉特”下狂舞着，一个临时乐队演奏着《蓝色的多瑙河》。有些少女和小伙子拥抱着在散步。布满灰尘的白色公路上，翻倒了一个黑色的酒桶。从咖啡店敞开的门能窥到两个成年人聚精会神地打着乒乓球。加满了油，司机对我们说：

“现在请你们原谅，出发前我得去换一下橄榄水。”

他消失在咖啡店里，回来时一只手扣着裤子，另一只手背擦着下巴。他刚一口喝干了一杯茴香酒。一个打乒乓的人没接到球，他把球捡起来，跟另一位打乒乓的人熟练地打了几板，然后朝我们走来。

“赶快上路吧，”他说，“收音机刚广播了孔帕尼斯宣告成立了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巴塞罗那街头已经打了起来。”

在盎沃拉特下面，乐队第三次开始演奏《蓝色的多瑙河》，除了在一辆汽车旁争论的一群武装人员外，一切都显得平静正常。争论的声音很大，连我们都能听到，争论的问题是要弄清向我们开枪好不好。无论如何，他们一致同意从加拉箱子的性质上寻到挑衅的因素。可我们的司机没工夫等他们做出决定，开始非常愤怒地破口大骂起来，结果他们恭敬地散开了。

第二天，我们在法国边境的塞尔白尔车站的一家旅馆中醒来。报纸宣布起义已被镇压下去，那些首领不是死就是被关进了监狱。卡塔卢尼亚共和国只活了几小时。我们刚经历过十月六日这历史性的一夜。从此以后，我只能把历史性的一夜想象成如下的一种面目：你险些因一点小事就被枪杀的一夜，有人打乒乓球，而低级乐队不倦重复演奏《蓝色的多瑙河》的一夜。达尔茅往巴黎给我们写了封信，告诉那位司机在返回的途中于巴塞罗那城关被一阵冲锋枪扫射死了。

显然，我没有历史的灵魂和感情。事件越发展，我就越感到自己不关心政治、越成为历史的敌人。我既太超前又太落后了，但可以肯定我不是那些打乒乓球的人的同代人。内战的预感萦绕在我心间。我一回来，就动手画了一幅题为《内战的先兆》的画，我在这幅画上表现了一个巨大的人体，它的手臂和大腿乱堆在一起，发狂似地交缠着。

在伦敦、在萨伏依吃宵夜的期间，内战的最初一些消息赶上了我。我点了一些清水炖荷包蛋，它们让我想到那个海边村庄的乒乓球。那些打乒乓球的人和他们的乒乓球不断纠缠着我。我跟坐在旁边的伊戈尔·马尔凯维奇说

用清水炖荷包蛋打乒乓会多么可悲，甚至要比用死鸟打网球还糟。鸡蛋进行了报复，它们让我用牙咬得咯咯响，就像它们掺了沙子一样。萨伏依的厨师与此毫无关系。爬上我嘴的是造反的西班牙的非洲沙子。只有一种利用它的办法，那就是痛饮香槟酒！

然而我并没喝香槟酒。我进入了一个艰苦的禁欲主义时期，它将决定我的风格、我的思想和我痛苦的生活。燃烧中的西班牙将以一种美学照亮这文艺复兴的戏剧。它将给受到各种意识形态的戏剧和各种道德与艺术的不安折磨的战后欧洲摆上祭品。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者举着写有“死亡万岁”的旗帜扑向火焰，而他们的对手则在只需两个字母“FE”的传统旗帜指引下向前冲去。一下子，从被意识形态的蛆和害虫啃了一半的西班牙的尸体中央，突然显现了隆起的伊比利亚的生殖器，它就像一座塞满了仇恨的白色炸药的大教堂那么巨大。埋葬、挖掘！挖掘、埋葬！要重新挖掘！这就是在这个焦急不安的西班牙中产生的内战的肉欲。人们将看到西班牙能受苦、能让人受苦、能埋葬、能挖掘、能杀人、能让人复活。要找寻传统就得扒开土地，要做到重受国家藏在它深处的珍宝的诱惑，就得糟蹋一切。人们会在挖掘特鲁埃尔地区的情人们时使肉体复活，人们会在相互残杀中相爱。总有一天，一位民兵会带着一名十二世纪修女的木乃伊进入一家咖啡馆。他再也不愿跟这个木乃伊分离，将把它作为壕沟中的吉祥物拿走。我的一位老朋友会看到下葬的高迪身体，一根绳子套着他的脖颈，由兴高采烈的一个顽童拖在巴塞罗那的街道上。他可能会补充一句，高迪好像涂了防腐香膏，保存得很好，哪怕他脸色显得不太好。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可让人吃惊的，因为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了。在维奇，士兵们每天下午把大主教的头当足球踢……

整个受难的西班牙升腾起一股气味，这是香火的气味、烧焦神甫的气味、受磔刑宗教肉体的气味，它混合着私通人群的汗水的强烈气味，并伴随着死神。无政府主义者体验了他们从不相信的梦想。他们走进公证人的办公室，在桌子上大小便。在许多村庄里，人们建立起极端自由的共产主义制度，烧掉了钞票。

内战既没能改变我各种观念的进程，也没能改变它们的升华趋势。它只是更强烈地把整个革命的可怖深嵌在我心上。我也不想成为一个“反动派”，因为我像惰性物质一般无所反应。我想仍旧成为达利。在我周围，舆论的鬣狗狂吠着，希望我表态：成为希特勒分子还是成为斯大林分子；不，一百次不。我是达利分子，只是达利分子！到死我都是这样！我不相信任何革命。我只相信传统的崇高品质。要是革命有利于某种事情的话，那就是通过它抽搐的痉挛，重又恢复了传统失掉的各种因素。通过内战，人们将重新恢复西班牙特有的真正的天主教传统。大家怀着信仰的骄傲和勇气战斗，无神论者和教徒、圣人和罪犯、挖掘者和埋葬者、刽子手和受难人，全都是如此。因为大家都是西班牙人，来自属于各民族中的贵族的这样一个种族。从战争一开始，我伟大的朋友，“不幸死亡”的诗人费德里柯·加西亚·洛尔卡就在佛朗哥分子占据的格拉纳达遭到了枪杀，这座城市是他的故乡。赤色分子贪婪地夺走了这一事件，为着他们自身的利益，不择手段地利用它。太无耻了！尤其洛尔卡是大地上最不问政治的诗人。他作为革命混乱的赎罪牺牲品象征而去世了。这三年间，人们并非出于观点而杀人。人们是因个人的理由而杀人，因个性的理由而杀人。在我看来，洛尔卡具有转卖和出租的个性，这足够使他在所有别人之前被随便哪位西班牙人射杀的了。

他的死和内战的各种反响令巴黎激动不已，这些情况使我决定离开一阵子。我动身去意大利，在我的祖国察看死亡和毁灭时，我则在察看未来之谜、文艺复兴之谜。这场战争过后、显露在天际的欧洲大灾难过后，我应当成为第一位宣布文艺复兴这一词汇的人。

我的意大利之行，被接近我的人愚蠢地解释成是我思想轻浮和我浅薄的一个例证。只有几位密友猜到了，恰恰是在这次旅行期间，我的灵魂投入了一些最严酷和最关键的战斗。我在罗马漫步，手里拿着本司汤达的著作，为我本人也为司汤达，对想重现凯撒的城市的现代罗马平庸的资产阶级深感气愤。新城市的各种都市化的需求毁掉了各个时代真实的活生生罗马的不可思议的神话。人们刚开辟出一条直达梵蒂冈的长长的现代林荫大道；过去要经过一些迷宫般的肮脏小巷，才能面对梵蒂冈的雄伟规模，从而使心灵受到震撼，这种情况不见了；现在人们提前一刻钟就瞥到它了，这就像国际博览会建筑师的可怜头脑构想的那样。

我在罗马度过了漫长的一季，诗人爱德华·詹姆斯邀请我到他家去，他的家在一座花园旁边，据说瓦格纳就是在这座花园里获得他《帕西发尔》的灵感的。我已想到我的幽灵般的《疯狂的特利斯坦》了。随后，我移居到古罗马广场的贝纳斯爵士家中，我在这儿度过了两个月；接下来在西西里岛短暂的逗留期间，我找回了一些我的卡塔卢尼亚和非洲的记忆，我画了《非洲印象》。我根本不了解罗马社交界的生活，我的孤独以及加拉几乎就是一切了。我仅仅见过几位难得的英国朋友。葛莉塔·嘉宝由列奥波德·斯托科夫斯基陪同，当时正在意大利旅游；一天晚上，我碰到她独自一人参观朱理教皇别墅的伊特鲁里亚博物馆。她缺乏优雅的样子和她相当皱巴的大衣让我吃惊，昨夜，在贝纳斯家中有人谈到过她缺少媚态。我不认识她，没向她问好，是她首先非常可爱地朝我微笑，使我不得不低头致敬，接着继续在博物馆里参观。刚一出来，我就发觉她跟在我身后。我特地随意转了几个弯，可我发觉她一直在我身后几步远的地方。我觉得这种不像真的情形有点太滑稽了。该跟她重聚还是该逃掉？人群这时向墨索里尼演讲的威尼斯广场拥去，夹在骚动的人群中，我们很快就动弹不得了。在阳台上，领袖讲完了结束语，人群在每一停顿时就朝他热烈的欢呼。看到嘉宝满怀激情行法西斯礼，我感到非常惊讶。她坚持不懈地望着我，仿佛在责备我不伸直手臂敬礼、仿佛在责备我太扭捏。终于人群闪出个缺口，她来到距我不过一米的地方，一些大腹便便的罗马人墙挡住了她。嘉宝向我做了个我不理解的手势，拿出一些明信片，从那些举起的手臂缝隙中向我展示它们。我觉得整个这件事就是反常和令人烦恼的。那些明信片表现了罗马的名胜，她用手把它们弄成扇形一张张给我看。我突然受到了震动。在这些关于这座永恒城市的风景中，我看到一张极为色情的照片。接着又是一张，随后她带着假装的纯洁神态，用一种优雅的害羞动作合拢了这堆明信片。真无法让人相信！我死死地盯着她的眼睛，明白了我虚构的故事。她只是我误入歧途的想象的葛莉塔·嘉宝，再者她跟这位明星肉体上也很少相似之处。这个女人是位裸体模特儿，是我的一位模特儿的朋友。她一定是从那位模特儿处了解到我收集色情画。她碰到我，在博物馆里认出了我，想向我提供她本人的收藏，于是就追赶着我。

这个明显的混淆令我不安。我的脑子有了问题。一些时候以来，我犯了一个又一个错误。加拉发现我太孤独了，把我带到了山区；在接近柯尔蒂纳和奥地利边界的特列—克罗西，我们住在一家旅馆。她从这里回到巴黎呆了

十五天，把我一人留下来。

就在这儿，我收到来自卡达凯斯的环消息。无政府主义者枪杀了我三十来个朋友，特别是利加特港的三名渔夫。我该决定重返西班牙继续我这些自己人的命运吗？我始终呆在房间里，一直担心加拉不在时我会生病。我得补充一句，四面八方环绕的山峰真把我迷住了。或许应当去西班牙！但那时，我应当加紧享受我所有的健康，以便在这一牺牲的过程中拥有最大限度的活力。我怀着恐慌，严格地照料着自己，为了一点点不正常的粘液，我就匆忙往鼻子里滴几滴药水。我白天都花在漱口上。最微小的丘疹或湿疹全让我惶恐，夜晚我擦抹护肤霜。由于监视疾病和担心炎症而不停地摸着阑尾，我也再睡不着了。我细致地检查我的粪便，心跳着像挂钟一样准时走进厕所。六天来，每当我坐在那儿，看到那挂在墙上的白色马约里卡陶器粘着一大块鼻涕，我就心神不安起来。除此之外，厕所是清洁的。只有这块鼻涕让我恶心。最初我注视着别处，装作没看到它，可它越来越强迫我注意它。这块鼻涕显然是有暴露癖的东西。它卖弄风骚地紧紧缠着那个马约里卡陶器，我不妨冒昧说一句，不可能不看到它。另处，它还是块相当干净的鼻涕，具有略带绿味的美丽的珍珠灰色，中间有点儿棕色。它末端呈尖形，从墙上翻立起来，好像撩拨人们对它采取行动似的。六天过去了，而我却无法同我的顽念做斗争。第七天，我开始行动。这块鼻涕破坏了排便给我带来的那种满意的快乐。我鼓足勇气，用一块薄纸裹住食指，用最猛烈的动作捏着这块鼻涕，想把它弄下来。一股难忍的疼痛袭上我的手指。这块鼻涕像针一般坚硬，刚深深刺入了我的肌肉。血立即涌流出来，疼得我泪水直流。在我的房间里，我想用双氧水给自己消毒，不过最严重的是一部分鼻涕仍贴在指甲下的皮肉上，我不知怎么能弄出它来。疼痛有所缓解，可出现了阵阵刺痛。感染开始了！我像死人般面色惨白，下到餐厅，跟旅馆老板说明我的情况。从我开始住到这儿起，这个人就尽力亲切地同我讲话，可我十分冷淡地回答他，使他无法再继续下去。面对着我这么意外的新态度，他殷勤地连声回答我。他希望仔细看一下我的手指。

“别碰它，”我说，“请只看别碰。这严重吗？”

“这东西好像扎得根深，”他说，“可这是什么？是木刺吗？是根针吗？”

我没回答。我怎么回答呢？我不能跟他泄露这块微黑的东西是鼻涕。只有萨尔瓦多·达利才会遇到这种事！一块鼻涕嵌入了这只变得发紫的手的皮肉，必须在破伤风感染身体其他部分前把这只手切下来。

我回到房间里，躺在床上，陷入最阴暗的绝望之中。内战的任何一种折磨都无法同我这天下午经受的这一想象的酷刑相比。我想象着手被切了下来。怎么处置它？有装手的棺材吗？要立刻埋掉它吗？我从没这样生活过：总想着跟我分离的手将在一个匣子里腐烂。极度痛苦使我浑身冒冷汗，我站起来奔向厕所，跪在那儿查看鼻涕的碎屑。事实上，我发现并查看了它们。怎么搞的！它不是鼻涕。它不过是一滴干的胶水，无疑是安放马约里卡陶器时掉下来的。

我的恐惧一下子无影无踪了，我能从指甲中除掉那深深嵌入的碎屑了。这之后，我美美地睡了一大觉。醒来时，我明白我不会去西班牙了。我死里逃生。仿佛是羽斯曼小说中的主人公德·艾珊特（他在动身前，完美地想象出到伦敦的旅行，结果他不需要去那儿了）一样，我刚体验了内战的所有暴行。无想象力的人感到需要周游世界或等待欧洲战争以便形成对地狱的观

念。至于我，呆在原地，碰到一块鼻涕，而且还是一块假鼻涕，就足够做到这一点了。

第十四章

佛罗伦萨——慕尼黑到蒙特卡罗——邦威特——
泰尔——欧洲战争重起——莎耐尔小姐与卡尔
维特先生之战——回归西班牙——里斯本——
发明拍摄思想的机器——宇宙论——老鸦企属
植物叶的永久胜利——文艺复兴

保尔·艾吕雅提出过一个纹章的铭文：“靠谬误和芳香生活。”经过葛莉塔·嘉宝和鼻涕的谬误之后，我了解了“预知力”的芳香。我越在直接和普通的事情方面出错，我就越能看清未来。

我们刚在佛罗伦萨附近租了一个别墅。在柏树的环绕下，我重又获得一种相对的平静。我的好朋友莎耐尔小姐，当时正在西西里游历。一天晚上，我突然感到她患了斑疹伤寒，我立刻给她写了一封信：“我非常担心你患斑疹伤寒。”第二天，我收到一份米西娅·塞尔特的电报，告诉我莎耐尔在威尼斯病得很厉害。我跑去看她。她患了伤寒，在发着高烧。加基列夫之死的回忆让我们都很害怕。

床头柜上放着个卡普里大贝壳。从此以后，并没什么明显的理由，我便总把卡普里同发烧的念头联系在一起，反复说着：

“在卡普里，风景总是发着高烧。应当用它的岩洞治愈卡普里的毛病。”

我吩咐从病人房间里拿掉这个贝壳。随后有人来量了体温，体温突然恢复正常了。从此，这样一个问题始终纠缠着我，那就是想知道加基列夫死的那天在他的桌子上有没有一个卡普里贝壳。

我相信巫术，确信天体演化论或超验的每一新尝试需要以巫术为依据，需要重新恢复那种指引过帕拉塞尔斯或雷蒙·吕尔等人头脑的精神状态。偏执狂批判对我的感觉摆脱不掉的那些形象的解释，对撒满我日程中的那些偶然事件的解释，对伴随着我各种无意义行动而来的时常具有“客观偶然性”的那些现象的解释，这一切都不过是向各种符号、各种占卜、各种预兆提供“客观严密性”的尝试而已。要是我不时能预告某些即将发生的事情，那么作为报偿，加拉便是一位真正的通灵者，是一位从该词的科学意义上来说的通灵者。她从不会搞错，并以一种惊人的准确性抽出牌来。就是这样她预言了我父亲一生的确切经历，预言了克列维尔的自杀，预言了德国的宣战。加拉相信我的木片，这是在我们最初的一次散步期间，我有一天在克鲁斯海岬的岩礁上发现的。从此以后，我们始终没放弃这个达利的护符。有一次，我把它遗忘在伦敦的科文特花园，但第二天又找回了它。又有一次，它被卷在纽约圣莫里兹旅馆的床单中送去浆洗了，为了找回它，得把全部脏床单翻个遍。这个木片在我这儿具有了古怪的神经官能症的形式。每当我想摸它时，我就忍不住要这么做。就连现在我也不得不从桌边站起来去触摸它……看哪，行了！一瞬间，我的烦恼就缓解了。

在有这个木片之前，我受到各种不像是真的古怪毛病的侵袭。尤其是睡觉的仪式，已达到了精神错乱的程度。抽屉全要关上，东西都要均衡地放在安乐椅上，门要半开着。稍微违反一点儿这想象的规矩，都迫使我再起来把一切安排好。现在只要我能在想的时候摸到这个护符，它就会使这些怪癖全消失掉……

九月的秋分将给我们带来慕尼黑的危机。尽管加拉的纸牌向我们证明这

还不会战争，可我们还是谨慎地离开了意大利，来到位于蒙特卡罗附近的罗克布鲁纳的拉波萨，住在柯柯·莎耐尔的家里，我在她那儿呆了四个月，相伴的还有大诗人彼埃尔·何维地。何维地是立体主义者那一代的全面的诗人。他是“粗重的”、反知识的、完全跟我相反。这是个使我们争辩并加强我们各自观点的绝好机会。我们把“研究问题”称为是我们交战的乐趣，就像两只公鸡那样。在这期间，我写了我的《生活奥秘》的大纲，准备了我在纽约的展览，并画了《希特勒之谜》，这是幅很难阐释的画，我仍然抓不住它的意义。无疑它是由慕尼黑之后纠缠着我的那些梦的移位构成的。我觉得它的价值是预言性的。这幅画清楚地宣告了欧洲将经历的那种中世纪时期。张伯伦的雨伞以一只阴险的蝙蝠的面目出现在画布上……

我到达纽约时，第五大道的商品陈列并不太令我惊奇。大家全试着变成达利。邦威特—泰尔又请我重新布置两个橱窗。我接受了，因为我觉得这有助当众证明什么是真达利什么是假达利。但我提出了一个条件，我有权怎么想就怎么做，该商店的负责人接受了这个条件，他们让我跟陈列主任李先生联系，他对我极为亲切。我讨厌现代的人体模型，这些可怕的女人体太硬了、太缺少食用因素了，而且鼻子翘得很滑稽。我需要肉体，人造的和过时的肉体。我们去一家老商店的顶楼发掘1900年时期的蜡制人体模型。它们那死人的长发使它们显得十分吓人，多年来，灰尘和蜘蛛网布满在它们上面。

我对李说：“尤其不能碰这些灰尘，正是有了它们，这些人体模型才更美。我要把它们献给第五大道的公众，就像人们送上一瓶小心从酒窖中取出来的阿尔玛涅克陈酒一样。”

照我们发现时的样子，极其小心地把这些人体模型运了出来。要是我把它们展示在一个衬有软缎和镜子的环境中，那种对比的效果就会更加奇异。两处陈列的主题十分单纯：昼与夜。在白昼，一个人体模型进入一只套着卷毛羔皮的、注满了水的“毛茸茸浴盆”里。非常美的蜡制手臂托着一面镜子，用来象征纳尔西斯的神话。一些真正的水仙直接从地毯和家具中长出来。为夜晚，我搭起了一张床，它的天盖是用黑色水牛头和一只嘴中带血的鸽子做成的。床脚是用水牛蹄做成的，床单则是烧过的不规整的黑缎。在那些破洞里，可以看到人造的燃烧着的木炭；另一方面，这些木炭还成为了人体模型头枕着的枕头。睡眠的幽灵挂满闪光的珠宝首饰呆在床边，这些珠宝首饰正是蜡制的女睡眠者梦寐以求的东西。

在街中心，这种表现定然不可避免地吸引过往行人的注意力，从而向他们显示一种真正达利的超现实主义景观。

我们刚在大都会歌剧院观看了一场《罗恩格林》的演出，一出歌剧院，我和加拉就到邦威特—泰尔商店去，人们完成了我这两处陈列的创造。在现场，我又发明出一些新东西，最后我们一直呆到凌晨六点，往那些人体模型上挂珠宝首饰，在几乎所有的地方钉上花朵和披布。

第二天，我们吃了顿丰盛的午餐，等我们能去第五大道判断效果时，已是下午五点了。看到一切都变了，可没人礼貌地预先通知我，我是多么愤怒多么惊讶啊！我那些布满灰尘的人体模型已被商店通常用的人体模型取代了。只留下衬着缎子的墙壁，也就是说，留下的恰恰是我开玩笑似的搞出来的东西。从我惨白的脸色上，加拉明白了我的气愤，她恳求我保持平静。

“去跟他们讲，”她说，“但要有理智。让他们拿掉全部这些垃圾，我们就不用提这件事了。”

她猜到每一劝告都只会是多余的、无异于火上浇油，便离开我。我走到邦威特一泰尔经理室，他们先让我在走廊里等了一刻钟。终于一个男人接待了我，他向我表示很荣幸能见到一位像我这样杰出的艺术家。随后轮到我将通过一名翻译回答他了，我极其客气地说，我的作品遭到篡改，可并没预先通知我。我因而希望或是撤下陈列中我的签名，或是照我所想的那样恢复我的装饰。这种把我的观念弄甜的作法有损于我的名声。这位经理回答我他有权保留我的观念中为他们喜欢的东西，无论如何也不能在大白天降下橱窗的帘子。我坚持着自己的观点。这些变化不到十分钟就能解决好。我的对话者的粗鲁使我决心提出最后通牒，我要求立刻撤下我的名字，否则我将采取行动。这个家伙仍试图向我解释不得不改变橱窗的原因，因为它们留住了太多的行人，影响了交通。现在全都清楚了，他什么都不想改变。我不再坚持了，向我的两名对话者致敬后，我就平静地走向保留着装满水的浴缸的那个橱窗。我走入陈列，一动不动地呆了一会儿，透过玻璃窗注视在人行道上行走的人群。我的出现必定显得颇为奇特，因为立即就有一大群人开始聚拢过来。我期待的就是这个。我用双手抓住浴缸，把它微微提起想翻过它来。它比我相信的要重，我觉得得向参逊要点儿力气了。浴缸滑了下去，靠近了玻璃窗。在我终于成功地把它翻转过来时，它撞到玻璃上，玻璃碎片飞溅开来。人群喊叫着躲开，同时水流到了街上。冷静地端详着这个形势，我认为最好还是从打破的缺口走出去，而不是再经过店门出去。我跳到了人行道上。我跳出后不到一秒钟，一大片玻璃就从高处脱落了，哗啦一声掉下来，差一点儿我就被处决了。始终很平静，我披上大衣，生怕因天气凉快而感冒，随后我慢步走向我住的旅馆。我刚走了约十多米，一位非常有礼貌的便衣警察轻轻把手放在我肩上，为拘留我表示歉意。

加拉和一些朋友赶到我刚被带进的警察分局，我的律师让我在两种解决办法中选择：一是我能马上获得保释，以后再对我进行诉讼；二是我接受留在分局一两个小时，随后进行审判。尽管我觉得监狱的混杂很可怕，我还是选择了第二种解决办法。大部分囚犯是酒鬼、流浪汉，他们到处呕吐。我试着躲在囚房的一个隐蔽的角落里，避开所有这些人的臭虫虱子和他们溅出来的污水。我的悲伤一定十分明显，使得一位颇为女人气的、戴满戒指和金手镯的身材矮小的先生走近我。

“你是西班牙人，”他对我说，“立刻就能看出这一点来。我是波多黎各人。你为什么来这儿？”

“我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

“这没什么，只会要你交点儿罚款。是不是一家酒吧间的玻璃橱窗？在哪个区？”

“不是酒吧间，是第五大道的一家大商店。”

“第五大道！”这位矮小的男子以赞美的口吻说，“以后再告诉我这一切。目前就呆在我身边，只要你跟我在一起，就没人敢碰你。”

显然，在这些爱打架的人和这些酒鬼中间，这位矮小的男人似乎享有出人意料的尊重。审判我的法官，虽然表面上有意显得很严肃，可并不能完全掩盖住他开心的神态。他判定我的行为是极为粗暴的过火行为，我既然打碎了一个玻璃橱窗，我就必须加以赔偿。讲完这个后，他承认艺术家有权彻底捍卫他的作品。第二天，新闻界为了我行动起来，向我显示一种令人感动的理解和赞同的态度。我接到数百封美国艺术家的信件，向我肯定我的举动明

显地证明了有必要捍卫美国艺术。我刚刚无意地碰到了这个国家的新伤疤。

一家股份有限公司向我提供了一份完全依照我的趣味为国际博览会的一个陈列馆搞另一个玻璃橱窗的合同。他们保证我享有“艺术家想象的绝对自由”。这个陈列馆应当称为“维纳斯之梦”。这个梦是场可怕的恶梦，因为我很快就发现这家股份有限公司有自己的想法，要根据它本身的趣味梦见维纳斯。他们不过是从宣传的角度考虑利用我的名字罢了。我跟他们展开了一场荷马式的搏斗。他们强加给我一些材料，我怀着愉快的态度把它们搞得一塌糊涂，割下那些美人鱼的橡胶尾巴，用柏油粘那些鸚鵡，把那些东西整个翻过来，用剪刀破坏一切。这家股份有限公司终于求饶了，并听凭我随意搞了。不幸，总工在各工作室里继续着，人们只不过大致照我所想的干那么一下。感到厌倦的我写了一份宣言：《一名狂人的权利和想象的独立宣言》。我在该文中拒绝为国际博览会的这个陈列馆承担道义上的责任。

我厌恶了维纳斯之梦，没看我的作品完工，就动身去欧洲了。在尚普兰号上，我得到了必要的安静，得以理清我的观念和近来的体验。尽管有这些意外事件，我仍然觉得美国是一块极为自由的土地，在那儿，可以手里拿着剪刀对话和争论，在那儿，有肉体有生命。我回到的欧洲，不幸已被一种精致的手淫搞得精疲力竭了。美国具有某些孤独和清醒的智者，他们给我们这些欧洲人上了先验的有教训意味的课。博物馆和私人收藏的选择远不像欧洲的选择那样显示着折中的怀疑主义，它们已经在那边预示出一种深刻的综合。詹姆斯·思罗尔·索白，从我首次旅行时起，就同我建立了联系，这种联系刚刚变得更加密切了，他是第一位把毕加索以来的那些美学价值归类的人。他有力地排斥抽象艺术和非具象艺术，以便随后把新浪漫主义和偏执狂超现实主义的超级具象艺术集中起来。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这还必定是“分了类的”。从精神上说，贝拉尔—达利轴心要比那些超现实主义者的表面的相似更为“真实”，这些表面的相似因袭成规地把这个派系的某些拥护者纠集在一处了。欧仁·贝洛尔曼的浪漫古典式（或古典浪漫式）绘画，显得比“正式的超现实主义者”的绘画神秘多了。索白和在他画廊工作的朱理安·列维为同一目标奋斗着，这个目标就是等级和综合。索白也是那些为我的偏执狂批判方法把自动性经验排除掉的最初人士之一。自动性的支持者固执地重复他们的老调。重返巴黎后，在我重又见到永远扎根在同样疯狂中的团体时，我体验到一种悲哀的感觉。他们用一个超现实主义的展览会答复我划分等级的要求，在这个展览会中，作品竟然是依字母表顺序排列的！值得为重建这顺序弄乱一切吗？我从不能成功地背出字母表的顺序，可我在偶然打开的一本词典里寻找时，总会发现我想要的东西。字母表顺序并非我的特长，我总是忽视它。既然超现实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只属于我一个人了，因而我也会忽视超现实主义的字母顺序的。

一如既往，我的《疯狂的特利斯坦》，这件我最好的戏剧作品，也无法原样上演。我不得不把它改成《维纳斯山》，然后再改成《酒神节狂欢》，后者相当于定本。我刚为蒙特卡罗俄国芭蕾舞团构想了这出芭蕾舞。我跟列奥尼德·马西耐相处得十分融洽，他是个百分之百的达利式人物。与诺埃尔子爵一样，切尔瓦齐泽王子是欧洲贵族的最纯粹代表，他极为细心地完成了我的布景，在我们这个马马虎虎工作的时代，在任何人那儿都不能找到这种细心的态度了。莎耐尔以大量的白鼬皮和珠宝首饰设计出最豪华最美妙的服装。可惜，我和莎耐尔还没完成我们的工作，各种国际事件就迫使这个舞蹈

团移居美国了，《酒神节狂欢》用一些临时服装在大都会歌剧院上演了。不管怎样，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

加拉让我下了到山间去的决心，我住在靠近边界的比利牛斯山地区的枫—罗墨大旅馆里休息。战争大步走来了。我的休息主要由每天画十二个小时画组成。我们到达枫—罗墨时，有人告诉我们旅馆的大房间刚被视察的甘末林将军征用了。我不得不耐心地等待他离开后才能占据那个我想做画室用的房间。晚上，他走了，我们睡在最高统帅的床上。加拉替我抽了纸牌，预言了宣战日。局部动员迫使旅馆关闭了。我们重返巴黎，我向纸牌打听我冬天战斗的消息，试着安排一处既远离可能的入侵又会满足我吃得好的欲望的地方。最后，我把手指点在了一处令人怀念的法国饮食的著名场所上，这就是波尔多。万一（我觉得不大可能）德国人成为胜利者，他们最后才能到达这儿。此外，波尔多意味着美酒、红酒洋葱烧野兔、葡萄鸭肝、香橙鸭和阿尔卡孔牡蛎。阿尔卡孔！我刚发现这个距波尔多数公里的适宜地点。宣战三天来，我们还没找到它。我把画室安排在朝向阿尔卡孔盆地的一座殖民地风格的别墅里。这所别墅是世上最健谈的卡尔维特先生租给我们的。在柯柯·莎耐尔到我们这儿度过一些时光时，我证实了他确是世上最健谈的人。在那之前，我一直认为莎耐尔是最健谈的人。一天晚上，面对着一盘烤沙丁鱼和一杯梅多克葡萄酒，我比较着他们，想看看谁是冠军。经过漫长的3小时，决斗的结果始终不明确。随后，当第4个小时不易觉察地过去时，卡尔维特终于占了上风。他的胜利尤其得归功于他熟练的呼吸技巧。他极好地控制着气息的节奏，他不必停歇；而柯柯却狂热地投入了一场她必须停下来呼吸一下的演说中。于是卡尔维特先生不露声色地重又顺着其思路走下去，不再停顿了。他也巧妙地选择了一些令莎耐尔不知所措的话题，特别是白蚁的话题。很快她不得不承认再没有关于这些昆虫的想法了。而卡尔维特先生利用这个机会，把他非洲经历的全部故事都倒了出来。

在这期间，德国军队推进着，在对抗他们的前线打开了一些突破口。柯柯·莎耐尔仿佛是在即将淹没一切的历史洪流中前进的一只头微微垂下的白天鹅，法兰西“种族”中最美好的东西都体现在她身上了。此外，她跟任何人一样谈起她深情爱恋的这个法国。哪怕在最悲惨的情况下，她也决不离开这个国家。像我本人一样，柯柯·莎耐尔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这个时期的化身，我们的观点差不多全汇合在了一起。她在阿尔卡孔度过的两周，促使我们修正我们的观点，用一个更清晰的线条勾勒出它们来。当前的战争已经需要这种我们想使自己的思想具有的形式了。不过莎耐尔的独创性跟我的独创性不同。历来，我无耻地炫耀我的思想；可她虽然不隐藏她的思想，却从不炫耀它，她只是打扮它。在她的店里，高级时装永远具有一种生物学的规定性，一种有着耻感的血统。她的身体和灵魂就是大地上最好的服饰。

在莎耐尔之后，马塞尔·迪尚来拜访我们，从没发生的轰炸巴黎让他担心。跟我相比，迪尚更是历史的大敌。在我们身旁，他继续沉湎于他特有的美妙而又神秘的生活。他的不活动刺激了我本人的工作。在这场战争期间，我在阿尔卡孔从没怀着这么灼热的知识分子责任感工作过。我完全投入了技巧和材料的艰苦斗争中。这件事变成了炼金术。一场为了正确混合颜色、油、光油而进行的残酷斗争，这种正确的混合将把我灵魂所感到的东西体现得完美无暇。我度过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只因为我多倒了两滴油！只有加拉一人目睹了我的那些愤怒，那些绝望，那些转瞬即逝的狂喜，那些苦涩的一错

再错。只有她一人知道对我来说绘画当时变成了何等过分的生活理由，一种比爱加拉还要过分的理由，因为她是现实，而我要画的她的肖像将成为我的“作品”。为了完成如我所称的我的加拉丽娜的这幅肖像，首先就是拼命工作，整理所有价值，创造我本人的天体演化论。这真累死人了！只有加拉养活了我！她收集起一些波尔多酒，把我领到“小号城堡”或“美味阉鸡”，由列奥诺尔·费尼陪伴着用晚餐。她把一块加香料的大蒜牛肝菌放到我舌尖，命令道：

“吃下去！”

“这很香。”我大声说道。

跟发生在我头脑中的斗争相比，我觉得欧洲战争就像是街头小孩之间幼稚的打架。然而在短暂的时期内，这种打架显得很有趣，这些快活的、沉默的孩子中的一伙登上布满天真绘画和树枝的装甲车，奔涌在这个国家上。我暗想对我来说这显然变得太历史味了。我们整理好箱子出发了，我们在波尔多的日子与最初的轰炸是同一天，这不吉祥。德国人占领昂代依桥两天前，我们来到西班牙。加拉匆忙地溜到了里斯本，一旦我的证件符合了手续，我就要到那儿去找她。在那边，她试着克服密布在我们旅途上的种种官僚主义的刁难。至于我，我从伊伦回到费格拉斯并穿过了西班牙北方。我看到遍地废墟的祖国，它处在高贵的贫穷之中，但却通过对它命运的信心复活着。霍塞·安东尼奥死亡的太阳神话用钻刀刻在所有沉浸在哀伤中的心上了。我敲了一扇门：

“谁呀？”

“是我。”

“你是谁？”

“我，萨尔瓦多·达利，你们的儿子。”

凌晨两点，我敲了我们家的门。我拥抱着亲人们，妹妹、父亲、姑姑。他们为我做了橄榄油西红柿鳀鱼汤。我感到害怕，因为我觉得自革命以来什么都没改变。现实客体的永恒、力量和不可破坏啊！我在家中度过的这一夜，让我确信自己体验了一个醒着的梦。睡觉前，我久久地在我过去的房间里徘徊，我发觉我留下的一切仍在这儿，旧的扣子、穿孔的小钱、保险别针、象牙兔子、生锈的钥匙。一只蜘蛛永远呆在小小的圆框后。妹妹曾被军事调查委员会拷问得发了疯，这是实情，不过她现在已痊愈了。一颗炸弹掀掉了住宅的阳台，这也是实情，不过这很简单，现在不再使用它就是了。餐厅里，无政府主义者烧饭后不熄灭的火弄黑了镶木地板，这更是实情，不过重新在那儿放的一张桌子使什么都看不出来了。如同一场大灾难的影片，在放映完之后，人们接着就把它倒回去，一切又恢复了原状。消失的钢琴慢慢又回来了，确实是回来了。这些革命何必呢？我忆起我的一位朋友，这是一位愤世的反法西斯主义者、西班牙战争的战士，1939年4月1日后，到巴黎居留时，他对我说：

“在我们祖国应干的事，就是消灭佛朗哥，恢复君主立宪政体！需要一位国王！”

我认识一些圣像画家，他们在晚年重新学习素描，可笑地暗中醉心于画最学院派的东西！达利不是他们这种人。达利毫不后退，因为即便是在他所谴责的那个战后时期，他也要使这个时期“升华”，把它跟传统结合起来，因为拒绝传统已经是一种传统了。

第二天，在卡达凯斯，我拥抱着身强体壮的丽第娅。她活了下来，始终那么强健。拉蒙·德，海尔莫撒死在了收容所，不过他是个身体很差的人。丽第娅对我说：

“在整个革命期间，大家都爱我。在那些人动不动就死掉的时刻，人们看得很清楚。人们看到了精神性在哪儿。”

“可没有儿子和男人来帮你，你怎么生活呢？”

“我从没生活得比这更好过，”她说着，感到我幼稚得可笑，“我有所有必需品，此外我还保持着我的精神性。你懂吗？”

“可这精神性由什么构成呢？它真是能吃的吗？”

“当然，这精神性是能吃的！民兵们从一辆卡车上下来，在海滩上露营。他们争论着，相互之间不停地谩骂。我什么也不说，找了个合适的角落，从容地点起一堆火，好像只有我一人知道替他们这么做。吃饭的时候到了，我听到民兵们相互询

问：‘那边的女人是谁？’‘我不知道。’‘她点火点了很久了。’接着他们重又争论起来。下午应杀掉全村人并火烧神甫和教堂吗？要在一周后夺取政权吗？在这期间，我小心地往火里添了些嫩枝，它们劈啪劈啪爆响了一阵。民兵们必然地走到火旁，有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我没回答，把火拨旺起来。‘我们去找点儿吃的吧！’一个人带来了一些排骨，另一个拿来一头羔羊，第三个人弄来只鸽子。他们吃完后想到了我，他们变得像绵羊一样温顺，仿佛这些杀人犯想补救他们刚干的坏事似的。对身强体壮的丽第娅来说，再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了。这就是理想的生活。他们每次都去老爷们的住宅寻找新餐具。盘子脏了时，民兵就把它们摔得粉碎，或是把它们丢在水里。当然，这种情况并没持续多久。一天，突然来了另一批民兵，他们杀掉了第一批民兵。终于轮到分离主义者了。他们又吃了起来。每次我都继承了被子、勺子、鞋子、塞得鼓鼓的垫子。没有人想到吃饭，可是我，在夜晚来临时，就重新点起火来，把它拨得旺旺的，过一会儿，他们走过来打量着我，一个人说：‘该考虑吃饭了。’……第二天，另一些士兵又赶走了他们，但吃饭的时刻总会再来……上帝，真是奥德欧西）啊！这不能用语言表达了！”

我又见到了利加特港的正直渔夫，他们全都保持着对红色时期的一种恶梦似的记忆。

“不，不，”他们说，“这应当结束了。比一切更糟的是无休无止的抢劫和谋杀。现在又像过去一样，你回到住宅时，你是在自己的家里了。”

我打开我家的门。一切都不见了：家具、藏书、餐具以及其他物品……相反，墙上涂满了下流的或政治性的词语和图画，它们大部是对立的。在下方是一串向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联合会的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分离主义者、社会主义的共和派、托洛茨基分子致敬的题词。用沥青写的“桑提亚哥的泰西奥万岁！西班牙起来吧！”结束了这些东西。

我在马德里呆了一周。会见的早年朋友之一是雕塑家阿拉德俄，他是美术学院时期我们那个团体中最年轻的人。在诗人马尔基纳家里，我又看到了我在卡达凯斯古典时期之初画的一幅画。在作家里，我重见了欧仁尼奥·蒙代斯。过去十二年间，我跟他我在知识上最为接近。我把蒙代斯看成是我们当代哲学家中最严谨最抒情的一位。我感情洋溢地拥抱欧仁尼奥·多尔斯这位老爷、巴罗克的佩特罗尼乌斯、地中海地区的“身强体壮的女人”的创造者，

并带给他一些关于卡达凯斯那位永远“身强体壮的”丽第娅的新消息。多尔
斯浓密杂乱的眉毛，使他越发像柏拉图了。我认识了狄奥尼西奥·鲁依德约，
他是年轻的诗人中最富活力的热情风格的人。同具有天主教呼吸形态学的、
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目光的、反贡哥拉主义者拉斐尔·桑切斯·马扎斯相见时，
我一眼就看出了他通晓意大利文艺复兴的所有奥秘，而且对将临的西方文艺
复兴的所有奥秘更熟悉。

大家都迅速而又聪明地掌握了超现实主义。在天体演化论（它建立在传统之上并用我们的血肉筑成）的这一痛苦分娩上，他们达到了跟我相同的程度。

可为了这一分娩，我需要安静和照顾。欧洲战争以及它的嘈杂混乱有可能使我流产。我应当尽快动身，离开历史的这些盲目和嘈杂的拥挤状态，要是这样下去，我可能没分娩就死了，可能只生下一个早产儿。不，我不是那种生孩子半途而废的人，不论去什么地方都成！我尊重礼仪！我已经在为孩子的未来和行装操心了。我将去美国为加拉、孩子和我挣钱……我在三伏天动身去里斯本，我发现在蝉的狂热歌声下这座城市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煎锅，里面放满并烧煮着无数从不同国家和种族游来的鱼。在宗教裁判所烧死过许多牺牲者的罗西奥广场上，现在又有新的殉难者任凭签证和护照的烙铁烫杀。这种烤焦皮肉的气味使人透不过气来。在里斯本演出了欧洲戏剧的最后一幕。在一些挤得满满的旅馆和宿舍房间中上演的孤独的、不露声色的戏剧在厕所里结束了，要到这些厕所里割断静脉自杀，还得先排会儿队呢。

我在葡萄牙逗留的日子，仍让我觉得像一场梦。一直感到在街上能碰到个朋友。只要一转身，就有个朋友。

“瞧，那个女人多像夏帕列里啊！”

“正是夏帕列里。”

“好像是列耐·克莱尔！”

“正是列耐·克莱尔。”

霍塞—玛利亚·塞尔特从有轨电车上走下来，同时温莎公爵正沿着人行道行走，经过一位坐在长凳上的老人身边，这位老人非常像帕德列夫斯基，而这老人也正是他。一名银行业的大王带着一只装在镀金笼子里的鸟儿在街头漫步。这位穿一套棕色西装正在一家航运公司办公室前排队的先生，完全有萨尔瓦多·达利的风度……

我乘坐艾克桑比翁号终于来到美利坚合众国。我一到这儿，立刻去了我们亲爱的太阳磨坊的朋友卡列丝·克罗斯比位于汉普顿庄园的家里。我们要尽一切力量试着复活一点儿在距艾尔门农维尔不远的地方刚刚落下去的法国太阳。我花了五个月时间写书、工作、画画，把这牧歌般的弗吉尼亚埋藏在心底，弗吉尼亚让我想到我一生中从没看到过的都兰。加拉给我读巴尔扎克，有些夜晚，爱德加·波的鬼魂乘着沾满墨水的极为漂亮的敞篷车从里士满来跟我相会。一个黑夜，他送给我一只配有一些黑狗的黑鼻子的黑色电话，在它缠绕着一些黑线的内部，我发现了一只黑色的死老鼠、一只黑色的短袜。一切都用墨汁浸透了。下雪了，我把爱德加·波的电话放在雪上，效果真是惊人：白之上的黑！眼睛是何等神奇的东西啊！我的眼睛，我终于把它当成了一架真正的柔软照相机，它不是从外部世界获得底片的，而是从我最持久的思想和那普遍的思想获得底片的。由此我推断出人能拍摄思想，从而确立了我发明的理论基础，当我完成聚焦时，我就会把它提供给美国科学界来考

虑。我的相机实际上能获得如下的奇迹：客观地显现不论任何个体的想象和思想的虚象。我要在学者们的陪伴下，把全部余生用在完善我的相机上。五月八日凌晨六点到六点半之间，在纽约圣列吉斯旅馆我的房间中，这个念头首次出现在我的脑海里。我刚一醒来，就在草稿纸上记下了我自己都不敢相信的我惊人发现的大纲。从此，一些漫长而又成熟的思考使我确信我的相机远非无法实现的，相反，它展示出具体实现的所有可能性……

这本书写完了。通常，作者在生活过之后、在他们生存接近尾声时才撰写他们的回忆录。与大家相反，我觉得首先写下我的回忆录，然后再体验它们是更为聪明的作法。体验！为了这，应当懂得清理生活的一半，以便富于经验地追寻那另一半。我杀死了我的过去，像蛇蜕下旧皮那样摆脱掉它，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旧皮就是战后我的不定型的、革命的生活。这最后的几行体现着我最近的激变，这些激变将使我把仍粘在身上的往日的最后一些碎皮抛进遗忘中去。

新的皮和新的土地！如果可能就去自由的土地，最好是美国的土地，因为它是年轻的处女地，没有悲剧的阴影。我的旧皮，人们将在各处找到它的一点，它扩散在新世界的那些路线上，在亚利桑那荒原上，在远东的平原上，在加利福尼亚海滩或匹茨堡工业城，在盐湖畔或落基山脉的峰顶，在旧金山的“大洪水之前”的桥栏杆上（沿着桥栏杆，一万名美国最美丽的裸体处女，在我经过的路上排队欢迎我，她们就像以天使肌肤制成的两排管风琴管子），在海洋贝壳形的性器官上……

我的变化就是传统，因为传统恰恰就是更换和再造另一层皮。它不涉及美容外科学或毁形，而是涉及复活。我什么都不放弃。我继续着。既然我用结尾作为开始，我就用从头开始来继续下去。我终于会变老吗？我总是用死亡来开头。死亡和复活，革命和再生，这就是我的传统中的达利式神话。我和加拉的牧歌，险些在死亡中展开。我写这几页文字时，经过共同生活的七年，我决心把这本书当成一部小说或一个童话故事来结束，我决心在天主教教堂的神甫面前正式与加拉结为夫妻。到达巴黎时，我也想同胡安·米罗一起谋杀绘画。今天却是绘画谋杀了我，因为我只想拯救它，我觉得世上的任何一种技术都不能使它复生。

由此证实了达利并不在乎达利，证实了我永远是同样的人，证实了我不合常理的传统是我个性的真正力量之所在。我继续着……欧洲也继续着……从我守望的那一天起，我就看到了一切，我就理解了一切。我甚至猜出了未来。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欧洲被它的旧皮搞垮了；被它的放弃、它的懒散、它的各种精神上的狂欢、它的唯物主义的怀疑论、它的畸形的专业化、它的丧失信仰搞垮了。它擦干泪水后，将更为清醒地醒来。那些革命将被洪水淹没，而天主教的真实力量（在法国是哲学的，在西班牙是战斗的）将获得胜利并把欧洲统一起来。梵蒂冈仍然是这个古老大陆不可分割性的象征。

在我们的文明开始之际，那些要奠定西方美学永恒基础的人在大量存在的不定型叶子中选择了老鸦企属植物叶子，这时他们就在无意之中体现了与东方和远东的莲花相对抗的希腊罗马美学的天体演化论的常数。在柯林斯式柱头上变得坚固起来的老鸦企属植物叶饰，经由罗马、帕拉第奥、路易十四、巴洛克、法国大革命、帝国和现代风格，始终保持着一种不朽的美德。人们可能会认为它在最近死掉了，但是它已经在萨尔瓦多·达利的头脑中展现出它新的涡纹饰。是的，我预示了生命，预示了一种未来的风格……该用整合

代替瓦解了，该用超现实主义构成一种与我们博物馆中的艺术同样坚实、同样完整、同样经典的艺术了。让那完了的东西完结吧！我拜访流亡在英国的弗洛伊德的那一天，是在他死亡的前夜，他对我说：

“在古典的绘画中，我寻找潜意识；而在超现实主义的作品中，我却寻找那有意识的东西！”

换句话说，这是给作为教条和派系的超现实主义判了死刑，因为把它归入了“精神状态”中；正如在列奥纳多那儿，风格的戏剧牵涉到一种生活和艺术的悲剧感情。弗洛伊德当时也特别关心“摩西和宗教的现象”。我记得他非常热情地多次提到“升华”这个词。“摩西是升华的肉体”。我们时代那些特殊的学科专门研究生活的三种常数：性本能、死亡感、时空的苦闷。一旦分析了这些价值，重要的就是使它们升华：把性本能变为美学，把死亡感变为爱，把时空的苦闷变为宗教的形而上学。结束否定吧！应当肯定。结束痊愈的愿望吧，应当升华。风格将取代自动性，技巧将取代虚无主义，信仰将取代怀疑论，严格将取代放任，个人主义和等级制将取代集体主义和一致，传统将取代实验。

在反动和革命之后，是文艺复兴。

结束语

今天是 1941 年 7 月 30 日，这是我答应为我这本书的英文版在这份手稿尾端写下结束语的一天。我独自一人裸体呆在弗吉尼亚汉普顿庄园我的房间里。站在一面大镜子前，我能细细打量这个达利，三十六年来，我是唯一了解他内心的人。我的头发永远具有我极为喜爱的闪光的漂亮黑颜色。我的脚就连一个鸡眼都没有。我的手臂、我的大腿、我的躯干仍然跟我有过的光辉青春时期的情况一样。我的腹部刚有了一点儿轻微的凸起，这丝毫没令我不快。我没想马上就动身到中国旅行，我也没想很快离婚。我不再想到自杀或跳入深渊，绝望地悬挂在绸降落伞柔软温热的胎盘上。我不想跟谁决斗。我只想两件事：爱我的妻子加拉，以及懂得变老，这是一种极为精美的艺术，许多别的人都无法掌握它。

还有你，我心爱的欧洲，我希望不久能再见到你由于所有这些磨难而老了一点儿。我认识的这个孩子变厉害了，在恶的阴影下成长了起来。我仍喜欢折磨人。但一些时候以来，我就明白了我开始爱我娶了已有七年的妻子。我更好地开始按照天主教和罗马教会的观念来爱她，我能像为这爱下了定义的乌纳穆诺一样跟自己说：“要是你的妻子左腿疼，你的左腿就会感到这种疼痛。”

我刚写了这本论述我生活奥秘的厚书，只有它能使我具有让别人了解我的必要权威。我想让全世界了解我，因为在体验了所有奇遇、所有探索、所有戏剧之后，我是战后欧洲最有代表性的化身。作为超现实主义革命的自由射手，我日复一日地认识了以国家社会主义名义建立在血统和种族之上的那些伪哲学教义和辩证唯物主义演变的那些最微小后果、那些最微小知识的反响。神学对我也无什么秘密可言了。我的精神忙于成为一切中最优秀的精神，忙于比他人人都了解得更早，哪怕为它那些特殊的发现，我得付出最多的汗水和最狂热的激情。

如果说我以一个西班牙人的疯狂参与了所有思辨的探索、甚至是最为对立的思辨探索的话，那么与此相反，我在一生中从没接受过属于某一政党，无论该政党标榜什么样的意识形态。在这个政治听任宗教吞食的时刻，我今天还会去接受它吗？

从 1929 年起，我不停地研究近一百年来科学的各种进展和发现。如果说它们日益高度专业化的情况使我无法从人的角度深入它的所有奥秘的话，那么我仍然可以从本能上去理解它们的方向和本体论的意义。在那么多我们仍然感到神秘和无法解释的事物中间，一个独一无二的真理以更大的力量和威严体现了出来，它就是任何哲学的发现、伦理学的发现、美学的发现或生物学的发现都无法否定上帝。更妙的是，时间（各个特殊的学科用它来建造它们的墙壁）仍然只把神圣的上天当成屋顶。

上天，我那醉心于绝对的灵魂在整个一生中寻求的就是它，这一生可能显得有些令人惭愧，简言之，它可能沾上了恶魔的硫黄。上天啊！不理解这点的人是不幸的。我初次看到女人剃光腋毛的腋窝时，我就寻求过上天；我用拐搅动死刺猬身上那堆腐败的蹩动的虫子时，我就寻求过上天。

上天是什么？加拉已是现实了啊！

上天既不在上方，也不在下方；既不在右，也不在左；上天恰恰就在有信仰人的胸膛里。

萨尔瓦多·达利
正中午于汉普顿庄园

附言：在我还没有信仰时，我害怕见不到上天而死。

译后记

在艺术史的文献中，我很早就偏爱艺术家本人的各种著述，如谈话录、回忆录、自传、论文等等。我觉得通过这类著述，往往能更鲜明地窥到艺术家的个性、艺术家的观点、艺术家创作的动力、艺术家生活的时代……而这无疑对准确把握和认识艺术家、艺术、艺术史极有价值。我的第一部译作就是《马蒂斯论艺术》，从那时起，我总想再译介一些这类的文献，现在终于又在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把这一现代艺术的重要著作介绍给广大的艺术工作者和艺术爱好者了。

超现实主义是西方现代文艺中影响最为广泛深远的运动之一。达利，作为该运动在美术领域的主要代表人物，一直是人们关注和争论的对象，深入了解他，其意义是不言自明的。要深入了解他，就不仅要看他的画，也要读他的书；他的这本自传将给读者提供许多有用的资料。在阅读本书时，明智的读者自然能区分良莠，这似乎也是不言自明的。

欧阳英

1996年春于杭州浙江美术学院

